

江山语言学丛书第二期

汉语语义学义理举实

李开著

江山语言学丛书第二期

汉语语学义理举实

李 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古音和古音学史

论高本汉和汉语上古音研究 / 001

围绕脂、微分部的古音学史演进 / 017

江有诰《唐韵四声正》研究 / 030

重组音理考 / 056

上古音的韵部及其研究 / 114

古代语言的学理反思和文化诠释

《尚书》篇目类属和学理 / 118

《诗经》的语言和思想 / 138

论《三礼》主体名式和类旨 / 147

《春秋经》和《左氏传》的若干名例和思想 / 172

中国传统语学和思维中的名和象 / 191

焦循注疏赵岐《孟子题辞》研究 / 209

中国古代的语言反思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解读 / 215

先秦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记录

——读《郭店楚墓竹简》 / 227

先秦儒家语言思想论 / 240

战国简儒家“仁”论元语言的蜕变

——学习《郭店楚简》和《沪博楚简》(第一、二册) / 253

新时代的经学：“轴心时代”文化史的考问

——读黄丽丽新著《左传新论》 / 263

中国语言学史的几个研究法

——兼谈围绕规范化研究语言学史 / 275

故训资料的纂集和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兼论《故训汇纂》对章黄学派的新开拓 / 286

现代语言学专题

伦敦学派的兴起及其流变 / 302

认知语言学说略 / 317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黄景欣 / 335

汉字简化不能走回头路 / 341

边学边思

晚晴光华铸宝典

——论邹酆先生现代辞书学理论研究 / 349

一部规范性和知识性并重的字典

——读《新华多功能字典》 / 360

语言世界中的异同和相反对待之辨

——读《同义成语词典》和《反义成语词典》 / 367

一部有解释功力的辞书

——读《当代民谚民谣》 / 375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序 / 384

《汉语词语与对外汉语研究》序 / 387

《两汉韵部与声调研究》序 / 391

《〈通雅〉古音考》序 / 393

《〈广雅疏证〉中的语义学研究》序 / 396

《学生常用成语多视角解析词典》序 / 400

《中西方语言学史之比较》序 / 403

《叶音研究》序 / 407

后记:本体研究和本体“延异”研究 / 410

古音和古音学史

论高本汉和汉语上古音研究^①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 10. 5—1978. 10. 20)是瑞典著名汉学家,1910年2月来中国调查方言,历时两年。先用数月学会了略带山西腔的汉语,随即开始调查方言,几乎跑遍各地,自苦为极,辛劳不堪。王力先生曾说,高本汉的这种精神值得中国学者学习。高本汉这样做,完全出于他对汉学的追求和对汉文化的深情。他曾对赵元任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嘛!”(1924)又说:“中国民族史上的研究工作何等的大……他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或者还可以效些许的劳力。”(1936)在调查中,高本汉口问手写,调查了24个点的方言(如含域外方音有33个),记录了10万多个字音,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高本汉是将他渗入肌髓的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精神和田野作业方法置于华夏大地的最执著的实践者。高氏将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带回欧洲后,1915年便开始著论和出版单行本《古代汉语》。1919年关于中古音构拟的单行本《历史上的研究》一发表,即被钱玄同用作北京大学教材。全书四大块至1926年竣工,合版为《中国音韵学研究》。整个中译本工作从1931年秋开始,至1936年9月告成,1940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基于方言而出于方言,《中国

① 本文原载《跨文化对话》第21辑(中国—瑞典文化专号),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钱林森执行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音韵学研究》只能是方言音系和中古音研究之作,但高氏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上古音。由中古音推证上古音,逻辑上是能成立的,清儒由《广韵》上推古音,走的就是这条路,但具体实施之,则有许多工作要做,几乎与研究中古音同时,高本汉走上了研究上古音的荆棘不归之路。从1923年至1940年先后发表的专治上古汉语的论著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Problem in Archaic Chinese, 1928)、《藏语与汉语》(Tibeten and Chinese, 1930)、《诗经研究》(Shiking Researches, 1932)、《老子韵考》(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 1932)、《汉语词类》(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到1934年,高本汉已基本完成上古音的构拟工作。最后,高氏把上古音构拟成果写进了《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1940,修订本1957,修订本译本1997)。^①除中古音、上古音研究之外,还研究过金文、甲骨文、古汉语语法、语源学,高氏是对汉语语言世界大规模作系统擘画和研究的现代早期拓荒者。^②学术界曾以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与《马氏文通》(1898)、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将传统小学改为“语言文字之学”(1906)一起,作为20世纪早期催生和引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暮鼓晨钟”^③,其影响和地位可见一斑。

高本汉的上古汉语音韵著论,绝大部分都是在现代学术史古音学第二次(1923…1928—1933…1938)和第三次(1930—1935)大讨论中写成

① 高本汉这些著作的中译本,《中日汉字分析字典》(原1923)一书的《叙论》第三节,赵元任译为《汉语谐声说》,载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1927年第一卷第二号;《叙论》的第二节王静如译为《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载《史语所集刊》1930年第二本二分。《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原1928),赵元任译,载《史语所集刊》1934年第一本第三分。《藏语与汉语》(原1930),唐虞译,载《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四卷第三期。《〈诗经〉研究》(原1932),周祖谟译,未刊。《汉语词类》(原1933),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原1953),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年版。《汉文典》(原1940、1957),潘悟云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有关高本汉的身世和成果简介,据《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缩印版,载《著者略历》;《汉文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载《编译前言》(张世禄)等写成。

③ 参见盛林等《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学》,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的,或者说是高的论著引起了大讨论。^①综合高著,可见其主要贡献。

一、上古音构拟谐声原则和阴声韵尾的构拟

一是高氏提出了上古音构拟的原则,开创了中国古音学从古韵分部走向古音构拟的新路。古音学研究中的古韵分部从顾炎武分古韵十部到江有诰分古韵二十一部,继有章炳麟、黄侃补苴罅漏,王力等集其大成,几成完局。下一步怎么走?那就是要在分部的基础上定音值,这是学理逻辑的必然。章炳麟《二十三部音准》(1915)已作了初步尝试,“音准”即音值,但问题远远没有解决。高本汉 1923 年《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一书的《叙论》,提出了利用谐声字构拟上古音的原则:即主谐字和被谐字在上古造字时代声母、韵母部分的主元音、韵尾应该相同或相近。高氏立足于中古音对此原则作出的解释是:(1)从中古音看,只要主谐字和被谐字声母发音部位相同,即可认为上古互谐。例如:古 kuo/苦 k'uo,干 gan/罕 xan,干 gan/旱 ɣan,中古声母都是舌根音;般 puan/盘 b'uan,半 puan/判 p'uan 中古都是唇音。有时声母发音部位相近,如才 dz'ai/豺 dz'ai,仅是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之别,尚 zjaŋ/堂 d'aŋ,仅是舌面前和舌尖中之别,上古也可互谐。(2)中古主谐字和被谐字主要元音不同,大概是受介音 i 和 u 的影响,例如瞿 kuan/權 giwen,𪚩 liɛp/獵 lap,倉 ts'aŋ/槍 ts'jaŋ,上古仍是互谐字。(3)因为口音和鼻音的互换,有些中古主谐字和被谐字尾辅音不同,如占 tɕiem/帖 t'iep,上古仍是互谐字。高氏分析了 1.2 万谐声字,认为约有 4/5 的字,主谐字和被谐字三要素相同,不同的只是那些失去辅音声母(变喻母字),失去尾辅音的字。从逻辑上看,高氏原则既讲了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的三要

① 参见李开《现代学术史关于古音学的三次大讨论》,《南开语言学刊》2006 年 1 期,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素相同,又讲了部分不同,甚至是主要部分的不同,但不管何种情况,总是互谐的,应而逻辑上获得了周延性。高氏的归纳法,是培根的“唯一真实的新归纳法”的运用,它不是“枚举”,它不仅讲了“是”,而且讲了“非”,让“是”跟在“非”的后面,注重“否定例证”,让肯定跟在否定后面。从汉语史看,注重谐声偏旁是清儒的传统,段玉裁以“谐声偏旁相同,古韵相同”为原则作古韵分部。清儒是高本汉汉学研究的学术起点。高氏把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等称为“清代的大师”,称赞他们对《诗经》用韵的研究“大体上是很聪明很可信的”。并认为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比得上清代的大师”,同时又能充分运用“近代文史语言学的新工具”。高本汉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继续探究清代大儒开创的基业,并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来钻研他们所收集的材料,以便构拟出某个阶段的古汉语语音系,而这个阶段要古得足以为我造就研究现代方言的必要基础”。(1949)可以说,高氏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继承传统,引进西学,建设现代语言学的新路。高氏利用汉字谐声偏旁构拟上古音,比段玉裁利用谐声偏旁作古韵分部,当然又高出一头。

二是提出了尾辅音构拟见解。关于尾辅音的构拟,上述谐声原则已涉及。阳声韵的韵尾,入声韵的韵尾,用谐声原则对应解决之,一般不成问题,问题是阴声韵尾。高氏是根据谐声原则对阴声韵中的去声字能和入声韵字相谐提出两条音变条例,继而推证未变时的阴声韵尾(1923)。其一,例如乍(去声)→作(入声);夜(去声)→液、腋(入声)之类的阴声字,曾失落上古原有的舌根韵尾-g。其二,例如至(去声)→侄、蛭、室、室(入声);曳(去声)→洩、綫(入声)之类的阴声字,曾经失落上古舌尖韵尾-d。高氏说:“这种结论可以从现代方言中得很好的比例。”高氏还举出瑞典方言里 bed←be, bet 始终读 bet 未变,说明浊音韵尾易变,清音韵尾不易变化。^①以上是说,从声调的角度看,清声尾会

① 赵元任译《汉语谐声说》,第47、48页。

使整个字的字调调高,浊声尾会使整个字的字调调低,调高者不易掉韵尾,调低者容易掉韵尾。中古去声就是掉韵尾-g, -d造成的,这就是说,韵尾的掉与不掉决定声调。到1928年《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改变1923年的看法,认为去声和入声在上古韵母系统中都是清声,但去声是降调,入声是平调,从上古到中古,去声失掉韵尾,入声仍保留韵尾。是声调决定韵尾的掉与不掉。演变如下:

列(入)lĭet→例(去)lĭet→lĭei。 白(入)b^ok→怕(去)p'ek→p'e。

这就是说,中古阴去失落的上古韵尾是-t, -k,至于阴声韵字中的平声字则拟为-g,与韵尾求声调时的去声韵尾同。这样,上述声调和韵尾互求,高氏所得上古阴声韵尾为-d, -g, -k, -t,都是塞音,与高氏所拟上古入声韵的收清塞音-p, -t, -k相比,可知高氏主张上古阴声韵尾同上古入声韵的收尾,都收塞音。

1927年,德国学者西门华德发表《古汉语韵尾辅音之构拟》,对《切韵》时代仍保留着的上古入声韵尾,构拟成浊塞音-b, -d, -g,与高氏相比,仅是一浊一清的区别。上古阴声韵尾辅音则构拟成双唇擦音-β,舌尖齿间擦音-ð,舌根擦音-ɣ。这和高氏的构拟收塞音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高氏无论是韵尾脱落与否决定声调,还是声调决定韵尾脱落与否,都是以入声韵为参照的,则西门氏以某韵部系统内诸韵相关为参照,不限于入声韵。在思想方法上,高氏有类于古韵分部中的“以入声为枢纽”的审音派,西门氏有类于古韵分部中尤重《诗经》用韵的考古派。例如,为寻找上古阴声韵之部的韵尾,西门氏认为《切韵》里的-əu韵,即尤侯韵,有少量字在上古与《切韵》里的之(止)、哈(海)、灰(贿)、脂(旨)诸韵有联系。这当然是对的,段玉裁在《诗经韵分十七部表》将少量尤、侯韵字列入上古第一部之部,并作为古本音或古合韵。^①从谐声字看,如:否(有上)→栢(杯,灰平)、痞(旨上)。九(有上)→轨(旨

①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华书局音韵学丛书本,1983年版,第34页。

上)。某(厚上)→媒(灰平)。从《诗经》押韵看,如:《秦风·蒹葭》四章“采、已、涘、右、沚”为之部字,但“右”字中古为宥韵去声。西门氏将中古-əu 构拟成上古-əʎ,从而推出阴声韵之、哈、灰、脂上古也应有舌根音韵尾-ʎ,同理可推,可与阴声韵韵尾豪韵(-au)、肴(-au)通押的尤、侯韵(段玉裁第二部萧宵肴豪部有尤、侯韵字作古本音或古合韵)上古也应有舌根音韵尾-ʎ。用同样的办法可求得阴声韵鱼、虞、模、麻的上古韵尾,如此等等。西门氏的方法,就是选择那些顾炎武说的“某韵半”,或段氏所说的那些古本音或古合韵中的舌根音为参照,准此以求相关阴声韵尾,而得三个擦音韵尾。西门氏的优点,事实上是把古韵分部与古韵构拟结合在一起考虑的。高氏与西门氏的共同点(这一点最重要)是都认为上古阴声韵带韵尾,不同点是推求的参照点和方法不同,结果不同。高氏是上古汉语阴声韵带韵尾说的开创者。至于带塞音韵尾还是带擦音韵尾,则以西门氏为合理。王力在理论上是接受高氏、西门氏上古汉语阴声韵带韵尾说的。他在1984年重新撰写《清代古音学》评价王念孙古韵二十一部时说:“阴声韵都具备四声。”并列表说明阴声韵歌、支、脂、之、鱼、侯均可分四声平、上、去、长入,且可与相承相配的入声韵月、锡、质、职、铎、屋(短入)对立起来并作对比。^①那长入正是阴声韵的韵尾,它不同于入声韵的韵尾短入。既然阴声韵长入韵尾不同于短入,高氏所说的阴声韵塞音尾就不大可能了,剩下的,西门氏所说的阴声韵擦音韵尾则为王先生所激赏。他曾说:“西门的影响要比高本汉的影响大,至少是一样大。”“西门的学说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②王先生的学生郭锡良先生在《汉字古音手册》中逐字构拟上古音读时,阴声韵一律不带韵尾。上古音作为《诗经》时代的语音,从当时“当下”的上古汉语存在看,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看

① 参见《王力文集》第十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51页。

②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1页。

待古希腊语音的当时“当下”存在,只能是在场的存在,可是,从文字的“延异”(德里达术语,differance difference)作用看,不囿于当时“当下”存在,可“延异”至于远古。我们不妨把高本汉、西门氏、王力所主张阴声韵带韵尾说理解为远古汉语(甲骨文时代,前 2070 至前 1046)阴声韵有韵尾,上古《诗经》至《说文解字》(前 6 世纪、5 世纪至后 2 世纪)始已脱落。

高本汉 1928 年《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一方面是阴声韵尾的自我调整,从韵尾决定声调调整为声调决定韵尾(见前);另一方面对西门氏 1927 年的阴声韵构拟有所批评而写有“simon 的韵尾说”。1930 年《汉语和藏语》再次力辟西门氏,主要有:据日译汉音资料再次证明上古入声韵收-p-t-k(1923 年已有),而拒西门氏收-b-d-g。据谐声字的统计资料再次重申阴声韵韵尾失落与去声声调的关系(1923 年已有)。针对西门氏从阴声韵内部诸韵关系求阴声韵尾的做法,强调求阴声韵尾必以入声为参照(1923 年已有)。针对西门氏的具体做法,认为西门氏以尤、侯韵为参照求之、哈、灰、脂韵尾则可,而推及豪、肴则不可,西门氏推理因太泛而失据云。由以上四条,可见高氏 1930 年的批判主要是重申和推进 1923 年的观点。可是到 1933 年《汉语词类》有重大转变:构拟出阴声韵尾舌尖前滚音-r,这与西门氏收擦音说似乎接近了。对西门氏阴声韵尾收双唇擦音-β,舌尖齿间擦音-ð,舌根擦音-ɣ 表示基本同意,尤其是收舌尖音-ð 几乎全部接受,仅仅以尤、侯为参照求得之歌、鱼、模、虞收舌根擦音-ɣ 之说不同意。^①1938 年西门氏又撰《中国上古音的构拟》,主演观点有:重申上古入声韵尾是浊塞音,而上古阴声韵尾是浊擦音;欢迎高本汉《汉语词类》不再强调须由入声韵尾求阴声韵的做法,因该书中构拟的大部分舌尖韵尾与入声无关;不赞成舌尖前滚音-r 之说;韵尾辅音在谐声字里可看到它与入声的关系,也仅限于谐声字,故以入声为参照无优势,而可以据元音化-i、-u(阴声韵尾)能

① 参见张世禄译《汉语词类》,第 4—68 页。

跟鼻韵尾-m、-n、-ng(阳声韵尾)互换来推测,即在理论上提出以阳声韵尾为参照来求阴声韵尾;关于上古唇音韵尾脱落的原因,西门氏赞同高本汉的看法,即声母为唇音,韵母的介音多为合口-u-,韵尾受到合口介音的影响而异化,唇音韵尾,舌尖音韵尾,舌根音韵尾都会脱落而成开音节。以上五条,会同高本汉 1933 年的两条,可知从 1933 至 1938 这五年间,高氏和西门氏在争论中不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这正是古音学史上的所谓第二次大讨论(1923—1938)中的逻辑必然。只看到对立,不看到融合,夸大高本汉在探索中的某些不足,都是不适当的。

还有,高本汉的尾辅音构拟,是与古韵分部相结合,并为古韵分部服务,为古韵各部而构拟的。高本汉分上古韵 22 部(后来《汉文典》分古韵 26 部),各部音值均构拟确定。据董同龢的介绍,这 22 部的韵尾:之部(-g-k),蒸部(-ng),幽部(-g-k),中部(-ng)宵部(-g-k),侯部(-g-k),东部(-ng),鱼部(-g-k),阳部(-ng),佳部(-g-k),耕部(-ng),歌部(开音节,-o),祭部(-d-t),元部(-n),脂部(-r-d-t),真部(-n),微部(-r-d-t),文部(-n),叶部(-b-p),谈部(-m),缉部(-b-p),侵部(-m)。阴声韵尾有:-g, -k, -d, -t, -r, 阳声韵尾有:-ng, -n, -m, 入声韵尾有:-b, -p。入声韵尾也收了-b,不再拒西门,足见对西门氏的吸收,此又一证据。^①

二、上古主元音构拟和介音构拟

三是关于主要元音的构拟。前述高氏 1923 年提出古音构拟谐声原则,首先是说主谐字和被谐字的声纽、主元音、韵尾是相同的,这要占到 4/5,这对解决主元音问题是很可观了。其次,如对高氏三点说明从主元音方面作评价,则第一点主要讲主谐字和被谐字声母的不同,而主

①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第 72 页。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

元音实际上仍是相同的;第二点主要讲主谐字和被谐字的介音会造成主元音不同;第三点主要讲主谐字和被谐字的尾辅音相同,少量不同,例中可见主元音不同。总的说,高氏 1923 年已把主元音构拟同声母、介音、尾辅音及其音变互换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这是高本汉主元音构拟的基本走向。后来从 1928 年至 1938 年十年间高氏和西门氏就阴声韵尾展开论争时,双方都没有太注意到主元音的构拟问题,尤以西门氏为甚。高氏 1928 年《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还写有“主要元音”专章,重申他的“谐声原则”对主元音构拟的作用。如前所说,争论中高氏的注意力集中在声调和尾辅音的关系上,特别是以入声韵为参照求阴声韵尾,得出收塞音,收舌尖滚动音的结论;西门氏的注意力集中在以古韵内部选择到的韵部(如尤、侯)为参照,后来又提出以阳声韵为参照求阴声韵尾的新路,始终坚持收擦音的结论。可是,当时就有人在高氏、西门氏忽视主元音时强调主元音对谐声、押韵、音变的影响,不难看出,人们所强调的,正是高本汉 1923 年谐声原则中积淀的有关主元音问题。几乎可以这样说,人们要求以 1923 年的高本汉来修补 1928 到 1938 年间的高本汉。

十分重要的是,高本汉是构拟出上古汉语主元音系统的第一人。主元音的构拟与辅音韵尾的构拟一样,也是因其 22 部构拟的。共构拟出 14 个主元音:ə、ɛ、ü、ō、Ô、o、â、ō、u、â、ă、a、ě、e。^①22 部按阴声韵和阳声韵合二为一摄,如“之、蒸部”,“幽、中(冬)部”,“侯、东部”,“鱼、阳部”,“佳(支)、耕部”,“祭、元部”,“脂、真部”,“微、文部”,等等。^②如仅从“阴阳相配对转”看,王力、罗常培、周祖谟与此并无不同。^③各摄各韵部均分上古四等,如缀以韵尾,则有:之、蒸部(-g-k-ng):一等

① 据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第 72 页提供的材料归纳。

②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第 72 页。

③ 王力无祭部,并入了月部,以歌—月—元三声相配。罗常培、周祖谟继承戴震、王念孙,祭部独立,以祭—月—元三声相配。参见《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3 页。

ə, 二等 ε, 三等 ə, ü, 四等 ×。幽、中部(-g-k-ng): 一等 ô, 二等 Ô, 三等 ô, 四等 ô。宵部(-g-k): 一等 o, â, 二等 ǒ, 三等 o, 四等 o。歌部(开音节-Ø): 一等 â, 二等 a, 三等 a, ā, 四等 a。如将 14 主元音、35 个韵尾、四个等都配入, 则 22 部就有 145 个构拟。^①够全面细致的了! 14 个主元音尽管就主要音质而言, 只有 6 个: ə、ε、o、u、a、e, 衍为 14 个。高本汉区分了元音的长短松紧, 正是元音的长短松紧使 6 增至 14。那么有无长短松紧呢? 董同龢, 严学窘都赞成长短松紧说, 一般说, 壮侗语多元音长短对待, 藏缅语多元音松紧对待。王力则认为上古入声有长短之分, 从而铸就他的阴声韵尾说(见上文), 还说: “上古阴阳入各有两个声调, 一长一短。”“元音的高低长短都是构成声调的要素。”^②上古韵分等吗? 正是等与韵尾使 14 衍为 145。董同龢、陆志韦都是主张有四等之别的, 李方桂、王力也主张有等的区别。王力说: “上古没有四等之名, 而有四等之实。”还把长短和等紧密联系起来而论述之。^③但又认为分等的主要依据在介音, 不在主元音, 因此主要靠介音来区分等。应该说, 元音的长短与等事实上是有密切关系的。^④如此看来, 高本汉 14 主元音因长短松紧而构拟体系化, 复杂化; 22 部的构拟因阴声韵尾、分等而构拟体系化, 复杂化。这里, 主元音的松紧长短、韵尾、等三大要素都大有存在的理由, 不能轻易否定。高本汉各部的音值构拟成了三大要素的动态函数值, 表现为一部多音值, 与王力《韵表》一部一音值判若二事。

鉴于高氏构拟出的上古韵系复杂, 受到的批评不少。陆志韦批评

① 据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第 72 页提供的材料统计: 之、蒸部 3(韵尾)×4(主元音)×幽、中部 3×4+宵部 2×5+侯、东部 3×3+鱼、阳部 3×4+佳、耕部 3×3+歌部 1×5+祭、元部 3×6+脂、真部 4×2+微、文部 4×5+叶、谈部 3×6+缉、侵部 3×4 = 145。

② 王力《汉语音韵》, 中华书局 1991 年二版, 第 150 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87 页。

④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84 页。

说：“高氏的音表不单是累赘，也不免是七零八乱的。”^①十分重要的是，高本汉的主要元音和 22 部的构拟是对汉语上古音韵部系统的描写、分析的理性体系，明显地受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经验主义的影响。该学派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形成，首先广泛流行于欧洲大陆，与高氏著论古音学正好是同一时期。该学派强调实证经验的重要性，更强调对实证经验作深入、细致、系统的逻辑分析。高本汉上古音构拟的做法的学术精神与此完全一致。相比之下，李方桂和王力的构拟要简单得多，不分等，不计入阴声韵尾都是造成简单的原因。不过，如将王力的六个主元音 ə、e、a、o、ô、u 与前述对高氏再细绎而得的六个相比，也仅仅只有 [ô] 与 [e] 不同，其余全同，故如说王力的六个主元音继承了高本汉，亦不为过。这里，我们要说，李、王简单，李、王的古音构拟是一实证经验主义的评价判断的价值体系，与高氏的逻辑实证经验主义的真值体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李、王都强调主元音与《诗经》押韵的关系，这正好说明他们的构拟是个强调实际应用的价值系统。李方桂认为，押韵的字它的主要元音是最重要的，韵尾还在其次，元音差的太多，押韵是不可能的。并以此来解释《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三章来与赠韵，来 [ləŋ]，赠 [dz'əŋ]。^②这是最典型的实用价值论。我们认为，高氏的真值系统与李方桂、王力的价值系统当可两存，价值系统往往需要由真值系统导出，不存在要消解谁的问题。

四是关于介音的构拟。要对汉字进行构拟，当然要知道声母、韵母，韵母是由介音、主元音、韵尾构成的。上古有无介音，严学窘、李新魁认为无介音，高本汉等人认为有介音。高氏 1923 年就谐声字提出构拟原则时，必然涉及介音（见前），提到介音 -i、-u。高氏 1928 年与西门

①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8 页。

② 参见李方桂《切韵 â 的来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版，第三册，第 4 页。

氏论争尾辅音时,文中举例非常注意介音,还讲到马伯乐《唐代长安的方音》对开口一等韵在历史音变中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有介音,一种无介音。^①在高氏本人的著作中,介音的叙述总的说是比较零散的。^②较系统的叙述是董同龢 1944 年根据高本人的介音构想作出的概括:关于介音对主元音在音变中的影响,同一个主元音在声母、介音或韵尾的作用下,变成了后代各种不同的元音。关于介音和开合、等第的关系,“我们既把韵部看作上古的韵摄,就假定开合与等第的分别原来也存在于上古”,于是,(1)中古的开口字上古原来也是开口,合口字原来也是合口。(2)变入中古一等韵与二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没有介音。变入中古三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有辅音性的介音-j-。(3)变入中古四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有元音性的介音-i-。^③这里的基本主旨是,等韵学归摄的思想是作对象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上古的开合、等第的假定虽然是虚拟的,但这是完全必要的,虚拟的条件成了推理的前提,这本身就是西方形式化数字化思想方法的做法;根据语音有可能作全方位转移或称“全族转移”(王力语)的思想,以为中古开合源于上古开合,中古等第源于上古等第;据中古可推知上古介音的存在是必然的,上古介音的音值构拟是可知的。王力对高氏的介音构拟是认可的。王力三等、四等基本同高氏,尤其是开口。试比较如下:开口一等高×王×,二等高×王-e-,三等高-i-王-i-,四等高-i-王-i-;合口一等高-w-王-u-,二等高-w-王-o-,三等高-iw-王-iu-,四等高-iw-王-iu-。^④王力二等以元音[e][o]为介音,这是与高氏大不同之处。

① 《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第 358 页。

② 《汉文典》一书有叙述介音的专节,主要还是对上古到中古的两个介音j、w 的演变作了解释。参见该书 553 至 554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修订本。

③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268 页。该书原名《中国语音史》,1944 年台湾出版。

④ 王力的介音构拟见《汉语语音史》第 5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三、由上古音系推证汉语词汇系统字(词) 族和同源字(词)

如果说,高本汉研究汉语方言和中古音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上古音,研究上古音呢?是为了揭示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内在构成规则,特别是上古词汇系统的内在规则。系统和规则,是近代逻辑的基本范畴和终极范畴。这在《汉语词类》(1933),特别是《汉文典》(1940, 1957)一书中得到充分展示。《汉语词类》后半部分的十个表,两千多个语词,按意义相同或相近类聚,以示它们间的亲族关系;再进一步,显示相关例词上古音注的声母、介音、主元音、韵尾之间的种种语转关系。^①这比清代学者的“因声求义”,章炳麟《文始》(1910)仅从古韵分部讲转语不可同日而语。研究上古音和语源学的《汉文典》,是一部可与研究方言学和中古音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媲美的名著。《汉文典》在揭示上古音系统规则方面,可以说是高氏 1923 年以来一系列上古音构拟思想的系统化。《汉文典》列出上古声母 33 个,韵部 26 个(可视为高氏古韵分部在其音值构拟层面上所作的定论)。因为在构拟层次上讲分部,又因对韵尾、主元音、介音都作过全面研究,与诸家仅仅言韵部的做法不同,故高氏能构拟出各部的韵母层次。又因完全从历史语音的发展考虑,故一一对应出上古韵部的韵母音值与《广韵》韵目的音值。试例解读如下:例高氏韵部 I, 上古韵母 1. a, 2. wa, 3. a, 4. wa, 5. ɿa, 6. ia, 7. wia。对应中古的韵类有:第 1 类(a),第 2 类(wa),第 3 类(a、wa、ɿa),第 7 类(ia、wia)。如此等等。

如以高氏 26 部对应王力以传统命名的古韵分部,则有:高氏第一部歌部,第二部鱼部,第三部侯部,第四部元部,第五部月部,第六部

① 参见张世禄译《汉语词类》,第 109—259 页。

(歌)支脂(微)部,第七部真部,第八部质部,第九部文部,第十部术部,第十一部微部,第十二部谈部,第十三部叶部,第十四部侵部,第十五部缉部,第十六部阳部,第十七部铎部,第十八部耕部,第十九部锡部,第二十部蒸部,第二十一部之职部,第二十二部冬部,第二十三部觉部,第二十四部沃部,第二十五部东部,第二十六部屋部。这里,虽然比 1953 年的 35 部减少了 11 部,但之、职同部,支、脂不分,缺点仍是明显的。^①不过,高氏分部以构拟为基础,与中古的韵目对比精细,且落实到韵母的音值,故音值资料可贵,研究价值甚高。

《汉文典》上古各韵部的下面都有从上古到中古历史语音演变的一些最主要特点的说明。如韵部 I 的说明,讲了后 a 和前 a 的具体分布,以及在不同分布中的音变情况,“但是在开音节中一直到中古保持不变,这一点是很引人注意的”。^②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实在发人深省。谓之语音史工具书,亦不为过。

高氏有了构拟上古音的较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汉文典》对各字的上古音构拟就不成问题了。中古音呢?则利用《切韵》和约晚三十年的《经典释文》来审音,确立了中古音。至于现代音,则完全可以在方音和通语中加以证实。正如王力以上古《纽表》和《韵表》为贯穿来组列同源字(词)那样,高氏以上古音和历史语音的发展为线索,来胪陈字(词)族。例如,合于高氏韵部 I (歌部)共 7 个韵母的共收 31 组 232 字,它们是字族。第 1 组以“可”为谐声偏旁的 10 字,上古声纽为[kʰ、k、g、x、ʔ],韵母为[a];以“何”为谐声偏旁的 1 字,上古声纽为[g、ɣ],韵母

① 高本汉 1953 年《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分上古韵三十五部。如对应成常用的传统韵部的名称,大体可说第一部元部、二部月部、三部祭部、四部文部、五部没部、六部脂部、七部微部、八部歌部、九部真部、十部质部、十一部齐部、十二部谈部、十三部盍部、十四部侵部、十五部缉部、十六部阳部、十七部铎部、十八部模部、十九部职部、二十部之部、二十一部蒸部、二十二部耕部、二十三部锡部、二十四部支部、二十五部沃部、二十六部宵部、二十七部觉部、二十八部豪部、二十九部冬部、三十部屋部、三十一部侯部、三十二部东部、三十三部鱼部、三十四部侯虞部、三十五部歌支部。参见聂鸿音译本第 108 至 230 页,齐鲁书社 1987 年版。

② 《汉文典》,第 554 页。

为[a];以“哥”为谐声偏旁的3字,上古声纽为[k],韵母为[a];以“奇”为谐声偏旁的18字,上古声纽为[g、k、k'、ʔ],韵母为[ia]。它们各各更是关系紧密的字族。谐声偏旁相同,声纽和韵母各各相近或相同的字字族能同源吗?再看它们的意义,如以“奇”为谐声偏旁的18字中,奇、畸同义(奇数、单个),掎、踦(均含一足义),掎、敺、倚(均含斜义),在声韵母层次上的音,在义项层次上的义近同,它们可能是同源字。如再加以拓展,以王力《韵表》中的音转为参照来解读,则因歌月对转,高氏1歌部有“何”字,高氏313月部有“曷”字,二字上古声纽、主元音同,仅韵尾不同,意义同。因歌鱼通转,高氏2歌部有“我”字,高氏58鱼部有“吾”字,二字上古声纽同、主元音近同,意义同。二字下都有丰富的古文字资料可参。高氏在音值层次上提供了同源字依据,这一点后为王力所仿效,《同源字典》在同源字双方都表明了字的音值^①,不限于声纽和韵部各自间的音转关系。利用音转关系可在《汉文典》全书范围内统观之而寻找同源字。这是《汉文典》读法又一略例。按此做法,可在《汉文典》全书字族的基础上系联出同源字,这对从深度上认识同源字当然是十分有益的。不能系联成同源字的仍暂作字族看待,解读《汉文典》,可使汉语字族与汉语同源字并存。重要的是,无论是字族,还是同源字都被高本汉置于语音发展史的视域中。

末了,我们要说,中古音和上古音的研究是高本汉毕生学术成就的精粹。如果说,研究中古音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比较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结合韵书韵图,运用印欧语研究中卓有成效的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古音,开创了汉语音韵研究的一个新时期”^②,那么,高本汉从1923年到1957年有关构拟上古音的系列论文和著作,开创了古音构拟的新时期,开创了汉语词汇系统研究的新时期,总之,开创了上古乃至远古

① 参见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该书各同源字都标出了上古音值。

② 沈家煊《〈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序》,见载徐大明、蔡冰主编《语言变异与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汉语语音史和词汇史系统研究的新时期。

主要参考文献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

[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缩印版。

[瑞典]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黄山书社 2002 年版。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围绕脂、微分部的古音学史演进^①

0.1 王力先生在古音学领域内有两项重要的贡献，一项是古韵分部中的脂、微分部，一项是古音构拟中的阴声韵脂、微、歌三部复元音构拟。^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贡献都涉及到脂、微两部。脂、微分部首见于1936年7月《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个意见，如1937年7月《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列有《脂微分部的理由》专章，1956年7月给该文写的《后记》中说：“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稿……将来也不能说不再改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了的，就是脂微分部。”那么，1936年以前的情况又怎样呢？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接近两分到最终分开的漫长的认识史过程。

0.2 王力将脂、微分开后，最终形成了“脂、质、真，微、物、文”这一“阴声韵—入声韵—阳声韵”三分相配的格局。我们可以以这六大韵部为参照，权衡历史上的相关分合，以见其成败得失。

0.3 正因为脂、微分部问题不啻是脂、微两部的问题，涉及面颇广，尤其涉及到质部和物部，故与质部、物部相关者均列入本文讨论范围。

0.4 如此看来，如果说，中古韵乃至近代音研究中的热门问题是知、庄、章问题，上古音研究中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脂、微分部问题。

1.1 顾炎武分上古韵十部时，他的第二部不仅脂、微不分，连支、脂、之也不分。段玉裁解决了支、脂、之三分，戴震迫近区分脂、微而未能达到。这里的“三分”和“二分”都曾经是古音学史上的重大问题。

① 本文原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

1.2 戴震是如何迫近区分脂、微的呢？戴震的《答段玉裁论韵书》（1776春）有一段话：“昔人以质、术、栳……或隶彼，或隶此，尚宜详审。”这段话涉及了三大问题，一是对陆法言，对《广韵》以入声韵隶承阳声韵作了简要的归纳，那是“以质 \wedge （隶，今用“合取”符号表示）真”、术 \wedge 諄、栳 \wedge 臻、物 \wedge 文、迄 \wedge 殷（欣）、月 \wedge 元、没 \wedge 魂、曷 \wedge 寒、末 \wedge 桓、黠 \wedge 删、辖 \wedge 山、屑 \wedge 先、薛 \wedge 仙。^①二是批评段玉裁第十五部隶承之误。段氏以“质栳屑”隶承“真臻先”，戴认为合陆氏，做对了。而段以“术物……”十个入声韵隶承段氏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祭泰夬废”韵，戴认为这种情形与段氏第十三部、第十四部也与入声韵“质栳屑”相承是一样的，但第十三、第十四部分为两部，而第十五部的阴入相承仅订第十五部唯一的一部，这种情形属于“分合未当”（意即段氏十三部是多余的，应合并至十二部，段氏第十五部也不当，应另分出他部如祭部），更何况戴震认为《广韵》入声第六号术韵字，实际上还包括八号物韵、九号迄韵、十一号没韵，不足以配脂、微，应当“合质、栳与术始足相配”，即应以质、术配脂、微，这里明确告诉我们，段氏脂、微不分，戴合入声韵枢纽质、术以配脂、微，更是表明了脂、微不分。这还不够，戴主张“其平声亦合真、臻、諄（即真、文合并）始足相配（质、术、物、脂、微）”。此处完全可见戴震批评段十五部时的自我失足在于真、文不分，质、术不分，脂、微不分。

1.3 戴震那段话涉及的第三个问题最重要，那是一边批段第十二、十三、十五部，一边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这里又有三条：甲，“屑配齐者也，其平声则先、齐相配”，意即“先—屑—齐”构成三分相配；批评段“今不能”如何如何，实际上是说应当如何如何，应当“别出六脂韵字配真、臻、质、栳者，合齐配先、屑为一部”，意思是说，六脂韵中的

① 戴震这段话以《广韵》13个入声韵配14个阳声韵，多出一个痕韵。早在1769年戴震著《声韵考》时，卷二内《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已明确痕韵无入声韵承配，此处戴自误。

开口字,(含皆韵开口),与真、臻、质、栳(它们当然都是开口),连同先、屑(有开有合),形成“先开合、臻开、真开—屑开合、栳开、质开—齐开合、皆开、脂开”各各相对应的三分相配体系。乙,应当“别出脂韵字配淳、术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没为一部”。这里当然只能指脂韵合口与他韵相配的情形。“合微”当指微韵合口和极少量的微韵开口,绎文意当为“淳合、文合—脂合、微合”,“殷开—迄开—微开”,“魂合、痕开—没合、麤开—灰合、哈开”。丙,应当“废配元、月,泰配寒、桓、曷、末,皆(怪)配删、黠,夬配山、鎋,祭配仙、薛为一部”。如以祭、泰、怪、夬、废序排之,则有“仙开合—薛开合—祭开合”,“寒开桓合—曷开末合—泰开泰合”,“删开合—黠开合—怪开合”,“山开合—鎋开合—夬开合”,“元开合—月开合—废开合”。这正是说祭部独立的审音之理。^①戴震还说:“而以质、栳、屑隶旧有入之韵(按:阳声韵,甲条),余乃隶旧无入之韵(按:阴声韵,乙、丙条),或分或合,尚宜详审。”

1.4 以上三种情形,甲条讲了“真—质—脂(开口)”的相配,乙条讲了“文—物—微脂(合口)”。丙条讲了祭部独立。可是,从1.2节看,戴强调的是质、术(物)不分,真、文不分,从而导致脂、微不分,这与1.3节的分析矛盾,可以说,从系统内部的逻辑推理看,戴氏“三不分”,从以开合等第审音看,戴震会得出质、术分,真、文分,脂、微分的结论。区分的焦点在于开口和合口之分野。“真—质—脂”是开口类;“文—术—微”是合口类,如此而已。但戴震还是服从了他的真、文不分之推理,脂、微也没有分开。逻辑推理胜过了审音。如以王力脂、质、真、微、物、文六部之分绳之,戴震六部中分出了三部,是3:6。

2.1 王念孙(1744—1832)研究古韵分部的四大贡献,缉、盍分部(同戴震),质部独立,祭部独立(同戴震),在分立侯部和幽部的基础上,

① 有关甲、乙、丙三种开合、等相配的情形,陈新雄先生曾列表说明。陈新雄《戴震答若膺论韵书对王力脂微分部的启示》,《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台湾《史语所》集刊》第59本1分,第1—5页。

改段氏仅有幽部有入声韵屋、沃、浊、觉为：侯部有入声屋韵，尤幽部有入声韵毒韵（觉韵）。段氏晚年闻此赞为“精确之极”。这四大贡献都是经王念孙本人的考古独立发现的。其中第二、第三项，又都和脂微部有关，可谓从脂微部分出至部，从脂微部分出祭部，因而客观上同样形成了针对段氏第十五部“脂微祭术物”的再分部，与戴震对段氏第十五部的再分部的研究目标同，但途径不同，王是考古，戴是如前所述的斤斤明于审音。

2.2 王氏《答李方伯论韵书》^①（1816年）名至部、《韵谱》（1827）《合韵谱》（1827年后）^②名质部的独立尤为重要。戴震质部已独立（1777），但因真、文不分，脂、微不分，故质、术不分，以质术与真文、脂微相配，戴氏的质部独立是有缺陷的。王念孙（1744—1832）晚年定论的质部独立是从脂部分出质部，王氏真、文分，术韵仍留在脂部中，王氏是真正将质部从脂、术韵部中独立出来了。

2.3 王氏《答李方伯论韵书》从谐声偏旁对质部的细绎称：“案去声之至、霁二部，及入声之质、栴、黠、屑、薛五部中，凡从至、从寔、从质、从吉、从七、从日、从疾、从悉、从栗、从黍、从毕、从乙、从失、从八、从必、从口、从節、从血、从徹、从设之字，及闭、实、逸、一、抑、别等字，皆以去入同用，而不与平上同用，固非脂部之入声，亦非真部之入声。”“同用”指上古用韵中“同为一韵”，与“合韵”、“通韵”不类，王说是正确的。王氏以质部与脂部、真部无涉，从审音派的角度看，当然是大可商榷的，但这里从考古的角度看，是说质部不含在脂部和真部（如段氏）内，应该独立为单独的一部。文中批评段氏说：“《六书音韵表》（约1770）以为真部之入声，非也。《切韵》以质承真，以术承諄，以月承元。《音韵表》以术、月二部为脂部入声，则諄、元二部无入声也。而又以质为真部之入，

①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51页。

② 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13页。

是自乱其例也。”王氏此处以《切韵》入声承阳声的明显情况,推阐质承真(段氏可),而术不承諄,月不承元,以致“諄、元二部无入声”之误是“自乱其例”。故王氏在纠段的基础上以脂旨韡术为其第十三部,祭月部独立为第十四部,真、諄、元分别为第七、第八、第九部,质部独立为第十二部。因王氏考古派,不考虑内部韵类之间的音转关系,较少考虑音理逻辑制约关系,故古韵各部各自排列序号以名类。

2.4 王氏为证质部独立,决非仅上述批段阐理,而是有大量实证可据。王氏晚年《诗经韵谱》举《桃夭》二章实、室韵等,共计 37 例,《群经韵谱》计 19 例,《楚辞韵谱》6 例。以 62 例证上古质部独立,应当是可有信度的。

2.5 由以上看,对照王力脂、质、真,微(念孙合于脂)、物(物,念孙合于脂)、諄文六部,王念孙分出了四部,是 4:6。

3.1 江有诰古韵二十一部,与王念孙古韵二十一部很接近,但江有诰分古韵二十一部时,并未见到王氏分部。据王国维考订,江氏分部在 1812 年,刊于 1814 年,而王氏公布其二十一部的《答李书》1817 年才刊入《经义述闻》。^①有诰二十一部的主要贡献有:祭部独立,而段玉裁含在第十五部脂部内不独立;緝、叶(即王念孙的盍部)分部;《入声表》使其古韵分部更加精密化,王力说:“《入声表》是江氏古音学最精彩的部分。”^②

3.2 有诰和王念孙最大的分歧是质部要不要独立的问题。前述王念孙质部独立共举文献考古 62 例,不可不谓精详,有诰的古音学也是“精深邃密”(段玉裁评语),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

3.3 公元 1821 年秋王念孙写给江有诰的信说:“段氏以质为真之入,非也。(王的看法有误,段将质承真是对的,但段将质含于真部内而

① 王国维《江氏音学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卷八第 404—407 页。

② 《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卷十二,第 571 页。

未独立)而分质、术为二,则是。(王质部独立,术仍含在脂本内)足下谓质非真之入,是也。而合质于术,以承脂,则似有未安。(有诰第八部脂部并含脂微皆灰,入声质术栻物)。”^①紧接着,王念孙举出仅有3例说明《诗经》质、术同用而承于脂,它们是:《邶风·载驰》三章“济(上古脂部/中古霁韵)闕(质/至)”(王力脂、质通韵)、《大雅·皇矣》八章“类(物/至)致(质/至)”(王力以该句中的“附”与“侮”为侯部字,类、致不入韵)《大雅·抑》首章“疾(质/质)、戾(质/霁)”(王力质部)。王念孙认为仅此3例“不得因此而谓其(王的脂韵术韵与质韵之间)全部皆通也”。有诰说还有《邶风·终风》三章“噎(质/霁)、噎、寐(物/至)、嚏(质/霁)”。(王力以噎、嚏、嚏入韵,质部,寐字不入韵)王念孙未以此例作为有诰质术不分例,恐亦以寐字不入韵之故。此外,念孙又云:《小雅·宾之初筵》二章“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是两“礼”字(脂/霁)入韵“至”字不入韵,故不存在质、脂通用、质含于脂的问题(王力以礼、至二字为脂部、质部通韵)。^②《商颂·玄鸟》“四海来格,来格祁祁”念孙以两“格”字(铎/陌,念孙以为质部)入韵,以证质部独立(王力“格”字不入韵,以“祁”和下文“河、宜、何”构成歌、脂合韵)。^③念孙还举出术、月相通的例证6例^④,多于术、质相通的例证,但有诰却没有使术、月通(有诰使术质隶承于脂部,月隶承于祭部不乱),反而使术、质通,以至于质部不能独立,念孙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念孙还从质、月的共性,术、脂的共性看出质部应该从他的术脂部(念孙第十三部)独立出来,说:“念孙以为质、月二部皆

① [清]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页上右。

② 由此例可知,考古派和审音派对通韵、合韵的理解和处理往往有所不同。考古派一旦理解为通韵、“同用”,就可能将两个韵看作同一韵部,而审音派则仍可理解为两个不同韵部之间的通用或合用。

③ 由此例可知,考古派和审音派对入韵字的理解和处理也往往有所不同。念孙以两“礼”字、两“格”字入韵,认为“凡下句之上二字与上句之下二字相承者皆韵”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④ 它们是《曹风·侯人》四章荃(月/泰)蔚(物即术部/末)、《小雅·出车》二章旆(月/泰)瘁(物/至)、《小雅·雨无正》二章灭(月/薛)戾(质/霁)勖(月/祭)、《小雅·小弁》四章嘒(月/霁)湮(质/至)届(质/怪)寐(物/至)、《小雅·采芣》二章湮嘒(质/至)届、《大雅·生民》四章旆(月/泰)穡(物/至)。凭此6例,念孙说:“术月之通,较多于质术,而足下尚不使之通,则质术不可通明矣。”

有去而无平上,术为脂之入(术含在脂部内之意),而质非脂之入,故不与术通(质不含在术脂部内之意),犹之月非脂之入(有诰、念孙均祭部独立,月含祭部内),故亦不与术通也。”从逻辑推理看,这段话大体能成立,但王念孙质部独立毕竟与月含于祭部是二事。以“质非脂之入,故不与术通”来说明质部当从脂术部独立出来,是语言经验事实的概括,如说是推理,则近乎同义反复。

3.4 同年江有诰给王念孙的回信说“质术之分合”(即质部从脂术部独立出来)，“思之至忘寝食而断其不能分”，共立理由四条。一是材料本身，论古韵必以《诗》《易》《楚辞》为宗，质与脂术之分，于《诗》《易》似可，而《楚辞》可分者仅4例，不可分者7例。^①《楚辞》而外，则更是“犬牙相错，平侧不分”，很难离析。二是对象区分的参照系，段玉裁真、文分立可以真、耕多通，文、元多合为参照，孔广森东、冬分立可以东、阳多通，冬与蒸、侵多合为参照。“今质、术二部《诗》中与祭部去、入合用十一章”。^②三是从《广韵》四声分配的情况看，“《唐韵》去入二声分承平上，统系分明”。有诰认为，如果将至、霁从脂类(脂旨至目)齐类(齐荠霁目)分割出来，与质栉屑另成一部^③，那么脂类、齐类就没有去声、入声。而《广韵》206韵有平、去而无上、入者有之(如冬、祭、泰、夬、废)，无有有平、上而无去声的，也就是说，《广韵》各大类都是有去声的。有

① 这可分之4例是：《东君》“节(质/屑)、日(质/质)”、《远游》“一(质/质)逸(质/质)”、《招魂》“日瑟(质/栉)”、《高唐赋》“室(质/质)乙(质/质)毕(质/质)”。此外《高唐赋》“物(物/物)出(物/术)”为有诰的“术部字合用”。不可分之7例是：《九章·怀沙》“抑(质/职)替(质/霁)”、《悲回风》“至(质/至)比(脂/旨)”、《九辩》“济(脂/荠)至(质/至)死(脂/旨)”、《风赋》“慄(质/质)歛(微/微)”、《高唐赋》“出忽(物/没)失(质/质)”、《笛赋》“节结(质/屑)一出疾(质/质)”、《钓赋》“失术(物/术)”。可分与不可分共11例。

② [13]共11例。质、祭合韵4例：《邶风·旄邱》首章“葛(月/曷)节日”、《小雅·正月》八章“结厉(月/祭)灭(月/薛)威(月/薛)”、《小雅·十月之交》八章“彻(月/薛)逸”、《小雅·宾之初筵》首章“设(月/薛)逸”。术、祭合韵7例：《曹风·侯人》四章“荟蔚”、《小雅·出车》二章“旆旆”、《小雅·雨无正》二章“灭戾勑”、《小雅·小弁》四章“嘒嘒屈寐”、《小雅·采芣》二章“嘒嘒屈寐”、《大雅·皇矣》五章“翳(脂/霁)榭(月/薛)”、《大雅·生民》四章“旆旆”。

③ 王念孙质部由至、霁、质、栉、黠、屑、薛构成。[清]王引之《经义述闻》，第752页上右。

诒还说,至、霁二目为质之去者占 $2/10$,为术之去者占 $8/10$,如分立质部,就会“宾胜于主,无可擘画”。此外,如果入声独立出来,质迄栳屑成一部,“则又有去声数十字牵引而至,非若缉盍九韵(缉合到业乏)之绝无攀缘也”。^①有诒认为他的《入声表》专述四声之分配,恰恰就是说明质术不能分立之理的。四是对王念孙证例本身的驳正。如说《小雅·宾之初筵》二章当以“礼至”韵,不当以二“礼”字韵。《商颂·玄鸟》,以“祁、河、宜、何”构成歌、脂合韵,不当以二“格”字韵。并说上古脂、歌合韵是很普遍的事,并举多例说之。有诒对念孙二例的驳正是很有道理的。

3.5 不能不承认,有诒从考古入手,述质、术不能分是有说服力的。从2节和3节的比较,从3.3节和3.4节的阐释看,分歧在于,对《诗经》韵字的圈定不同。如有诒的第四点理由,说《宾之初筵》和《玄鸟》入韵字王、高不同;对《广韵》声调分配的全局之在于上古韵部分立有何价值认识不同,有诒上述质术不分的第四点理由最有说服力,连制《入声表》也与审音派以入声为枢纽形成内部三分相配的系统不同,在于确立个别韵部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入声表》恰恰是证明质、术不能分的;在获得经验事实即韵字之后,王念孙的推理则有牵强之处,见3.3节;在或得韵字后,对相关韵字形成用韵的纵向类聚的方法不同,见3.4节第一点理由和2.4节之比较;在预设参照系的对照方面,有诒为高明,念孙似未及,见3.4节有诒的第二点理由。

3.6 我们认为,在考古派系统内,质部不独立,质术不分是有根据的,也有可取之处。今学界高度评价王念孙质部独立,多半出于审音派质、术必分为优越的潜意识,有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起作用。审音派质部必独立,以形成“脂质真、微物(术)文”系统线,直接服务于脂、微问题。考古派质部不必独立,它不必形成某种体系性的结论,考古派质部

① [清]江有诒《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页上左。

独立后也只是形成原子主义的单边构成,无有如审音派阴、阳、入三分相配那样的严格的内部系统。关于王念孙、江有诰质部要否独立的争论,要看你从审音派还是考古派立场来评判。但既已分出或不分出质部,从其与脂、微分部的关系看,如以王力 6 部为参照,则江有诰分有真、文、脂部,是 3 : 6。从表面看,有诰比王念孙的 4 : 6 退步了,但从考古派的立场看,有诰的阐述是合理的。

4.1 章炳麟《丙午答刘光汉书》(1906)叙述的早年分古韵二十二部与王念孙晚年《合韵谱》(1827 年以后)分古韵二十二部(1816 年《答李书》21 部加孔广森冬部)没有什么不同,章氏《文始》(1910、1911、1913)二十三部比王念孙多出了一个队部。就是这个队部,王力说他的脂、微分部受章氏队部独立的影响。^①

4.2 《文始》二“队脂諄类”说:“队、脂相近,同居互转。若聿(物/术)、出(物/术)、内(物/队)、朮(谷子名,物/术)、戾(质/霁)、骨(物/没)、兀(物/没)、鬱(物/物)、勿(物/物)、弗(物/物)、卒(物/术)诸声,谐韵则《诗》皆独用,而自(微/脂合口)、佳(微/脂合口)、霁(微/灰)或与脂同用。乃夫留(物/没)昧(物/队)同言,坻(脂/脂)、汝(chí 脂/脂)一体,造文之则已然,亦同门而异户也。”^②这段话是说《成韵图》队脂近转;举例是说从《诗经》韵字看,那些物(术)部字都是独立的韵字,均应独立出来单独成部的,入声韵物(术)部即队部;微与脂同用不分;“乃夫”之言,是说队部必从脂部独立出来。综上,是说队部必从脂部独立出来,而脂微仍不分。

4.3 略早于《文始》的《国故论衡·成韵图》(1910)说:“脂、队二部同居而旁转,旧不别出,今寻队与术、物诸韵,视脂、微、齐平入不同,其相转者,如豕(物/至)从豕(支/纸)声,渠魁(微/灰)之字借为颍(物/

① 《王力文集》,卷十七,第 181 页。

② 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2 页。

没),突(物/没)出(物/木)之字借为自(微/脂合口)頔(chuí 微/脂合口)。”这是说,脂、队二部形成近转,而队部中从造字、借字看,队部既含物术韵,又含脂微韵。比较可知,《文始》队部即物部,而略早的《国故论衡》队部是物术与脂微两栖之地。事实正如此,从队部的归字看,章氏原先队部还收一部分脂微的平声、上声字,如“崔(微/灰平)嵬(微/灰平)鬼(微/尾上)夔(脂/脂平)虺(微/灰平)衰(微/脂平)自(微/灰平)佳(微/脂平)雷(微/灰平)”,后来为实现“古平、上声与去、入韵截然两分;平、上韵无去、入,去、入韵亦无平、上”的主张,就把平声、上声字全部划出去进了脂微部,章氏队部只剩下物术韵的去声、入声字了。这就是说,章氏已完成入声韵物部的独立。章氏有脂、质、真、物、文,对照王力那六部,章氏得五部,是 5 : 6,章氏卓卓。

5.1 从阴阳入三分相配的系统看,如章炳麟已分出五部,特别是质、物分成各自独立的两部,那脂、微分部就成定局。章氏未分,因为他是考古派。黄侃是审音派未分,那是他的二十八部(约 1915 年)以“灰(微脂部)—没(物部,章氏修正后的队部)—痕魂(文部);×—屑(质部)—先(真部)”三分相配,改变了格局的内容,这就为曾运乾脂、微分部(1927 年冬)留下了余地。^①

5.2 曾运乾正是以黄侃的灰部为基础进行整合,形成微部:“灰部即威摄(灰合口、微合口、脂合口、皆合口)—没部即威摄入(没、迄、术、黠、物)—痕魂部即显摄(痕、魂、欣、諄、山、文)”。又将《广韵》齐韵一分为二,齐半合于支佳,另齐半合于脂微的开口,形成“‘齐半’部即衣摄(齐半、脂开口、皆开口、微开口)—屑部即衣摄入(屑、质、栉)—先部即因摄(先、真、臻)”。^②

5.3 从 1910 年或稍后章氏已分出质、物,审音派黄侃本极易进到

① 司马朝军等《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2 页。

② 对曾运乾在黄侃二十八部的基础上分出脂、微的概括,参考了陈新雄《曾运乾之古音学》。

脂、微分部,但1915年黄侃仍是脂微、物、文、质、真五部,也是5:6,至1927年冬曾运乾分出脂、微,达到6:6,从章氏到黄氏再到曾氏,已走过17年,可见古韵分部作为一种对象认知之艰难。

6.1 王力1936年7月发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发现脂独用,特别是微独用的大量用例,进而考定《切韵》里的脂韵舌齿音合口呼在南北朝归微韵,它们是“追(微/脂合三平)绥(微/脂合三平)推(微/灰合一平)衰(微/灰合三平)谁(微/脂合三平)蕤(微/脂合三平)”六字。这六字在南北朝二期(从沈约441—513到梁元帝508—554)不再与脂韵字“悲(微/脂开三)眉(脂/脂开三)师(脂/脂开三)姿(脂/脂开三)迟(脂/脂开三)龟(之/脂合三)”等字通押。^①这就是说,脂韵合口归微部,脂韵开口归脂部,脂韵合口与脂韵开口不相混。而脂韵合口的六字就是章氏原先属队部,后因其古平声改入脂微部的字,黄侃归于灰部(脂微部)的字。可见王力1936年脂、微分部受章氏队部的影响,是从“原先属队部,后因其古平声改入脂微部”说的,并非受仅有去、入声的队部即术物部的影响。但分定脂部、微部后,后来改从阴阳入三分相配的体系,形成“微—物—文”相配时,王氏物部即章氏修正过的队部。从审音派的角度看,章氏质、物(修正过的队部)分立,脂、微分立就很容易,但王力审音派时期重新公之于世的脂、微分部,并非“质、脂;物、微”的简单的逻辑推定,而是他在1936年仍是考古派时期的脂、微分部成果的继续。相较之下,曾运乾倒是在黄侃基础上直接审析音理(《广韵》齐韵和黄氏灰部)而成的。

6.2 王力进而审析《广韵》,将齐韵(以平赅上去)部分字(17个)、脂皆韵(以平赅上去)开口字19个列为脂部。脂皆韵(以平赅上去)合口字14个,微韵(以平赅上去)合口,也包含少量开口,共18字,灰韵

① 《王力文集》,卷十八,第23页。

(以平赅上去)合口 9 字,哈韵开口 3 字,列为微部字。共审析《广韵》80 字。^①审析齐类,将部分齐类字列为脂部,又审析灰韵,将灰韵列入微部,与曾运乾参《广韵》审析黄侃齐部、灰部的做法同。曾氏分别列入衣摄和威摄。

6.3 王力 1982 年作为晚年定论的二十九部《韵表》里的脂、微分部^②,其优点有哪些?一是在 1936 年《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基础上的发展,有丰富的考古材料为证,因而结论更为切实可靠。二是具体审析《广韵》韵字,最终区分脂、微两部的是开、合口,大别为脂、微韵开口的归脂部,脂、微韵合口的归微部。三是考古材料的处理,受章氏原先队部的影响,“追、绥”等六字是队部中的脂韵合口平声字,与原先队部里的脂韵开口字、章氏脂微部里的开口字不通押,从而认为章氏修正队部,别出脂、微古平声和上声时,应脂、微合口归微部,脂、微开口归脂部。四是注意到黄侃的灰部主要是微、脂合口,也有脂、微开口,需要改进。^③但王本人不从改进黄侃入手,而是另辟了一条更宽广的大道:南北朝诗人用韵和参照章氏队部审析《广韵》相结合的大道。五是以脂、微分部命名说之,比用其他说法,如齐半、灰之分,衣摄(衣字本身是微部字)、威摄之分更为割切。六是从古韵构拟深化了脂、微分部。之所以能分立,且形成系列,是音值相异而各相系。微[əi]—物[ət]—文[ən];脂[ei]—质[et]—真[en]。以上六条,使王力的脂、微分部达到了有更多优点的 6:6。

主要参考文献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陈新雄《戴震答若膺论韵书对王力脂微分部的启示》,《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

① 《王力文集》,卷十七,第 183 页。

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 页。

③ 《王力文集》卷十七,第 182 页。

集》，台湾《“史语所”集刊》第 59 本 1 分。

陈新雄《曾运乾之古音学》，《中国语文》2000 年第 5 期，第 399—406 页。

[清]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司马朝军等《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王国维《江氏音学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王力《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扬州广陵书社 2006 年版。

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江有诰《唐韵四声正》研究^①

一、《唐韵四声正》论“古有四声”

清江有诰(?—1851)著《唐韵四声正》，道光二年(1822)冬天(壬午年冬月)《再寄王石臞先生书》概述其古有四声，可看作全书序言。从明末陈第到江有诰，上古声调问题研究一直是热门课题，但未有定论。明末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主张“古无四声”。顾炎武谓“四声一贯”，意即古人虽有四声，但可以并用，表现在《诗经》中随语调的抑扬，韵字可不拘声调而通押，平上去三声，古多通贯，入声与入声为韵者占十分之七，入声与平声、上声、去声为韵者占十分之三，所谓“入为闰声”。^②闰声者，本为历法一岁之余分，积三年多夏历加一个月为闰月，入声为闰声，意即入声除了与入声通押外，还有余，自身有变化，而加入平上去声行列与之通押，以至于入声转变成平上去声。顾氏“四声一贯”，“入为闰声”，从积极方面看，实为启示“以入声为枢纽”，“阴阳入三分相配”之说的先导。江永《古韵标准》信奉“四声一贯”，提出“数韵共一入”，与“入为闰声”同例，但有诰认为江永较炎武为进步：“其说者不一而足，然所撰《古韵标准》仍分平上去入四卷”。^③段玉裁谓古有平上入而无去声，孔广森谓古有平上去而无入声，江有诰于嘉庆年间在他的《诗经韵读》初刻时曾认为“古无四声”，后经“反复绌绎”，始知古“实有四声”，不

① 本文原载《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

② 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43页上栏。

③ 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音韵学丛书”本，第277页上栏。

过上古四声读法(调值,轻重,长短)与中古不同。近现代学者中,黄侃主张上古无上、去,只有平、入二声,王力则认为上古平、入二调又包括长短两类,平声长调,中古仍读平声,平声短调中古变为上声(一部分变为去声),入声的长调中古变为去声,入声的短调中古的读入声。^①

隋陆法言撰《切韵》后演为《广韵》已是中古声调,有诰则认为《切韵》四声当为上古四声,不幸“陆氏编韵时不能审明古训,特就当时之声误为分析”。^②这一批评当然是不对的。但有诰从陆韵中看出上古声调,诚为可贵。例如:

例字	有诰对例字的声调的评述	陆 韵	王力古韵韵部	备 注
享	古平,陆误收上声	养韵上声	阳部	上古平 ^③
飧	古平,陆误收上声	养韵上声	阳部	上古平
颈	古平,陆误收上声	静韵上声	耕部	上古平
顛	古平,陆误收上声	荡韵上声	阳部	上古平
讼	古平,陆误收去声	用韵去声	东部	上古平
化	古平,陆误收去声	禡韵去声	歌部	上古平
震	古平,陆误收去声	震韵去声	文部	上古平
患	古平,陆误收去声	谏韵去声	元部	上古平
偕	古上,陆误收平声	皆韵平声	脂部	上古平,有诰误
狩	古上,陆误收去声	宥韵去声	幽部	上古上
怠	古平,古上,陆仅收上声	海韵上声	之部	上古上
愆	古平,古上,陆仅收平声	仙韵平声	元部	上古平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64页,102—104页。

② 《音学十书》,第277页上栏。

③ 陆法言据当时中古音,非上古音,有诰误。参见唐作藩编著《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续表)

例字	有诰对例字的声调的评述	陆 韵	王力古韵韵部	备 注
信	古平,古去,陆仅收去声	震韵去声	真部	上古平
居	古平,古去,陆仅收平声	鱼韵平声	鱼部	上古平
喜	古上,古去,陆仅收上声	止韵上声	之部	上古上
顾	古上,古去,陆仅收去声	暮韵去声	鱼部	上古去
意	古去,古入,陆仅收去声	志韵去声	职部	上古入
得	古去,古入,陆仅收入声	德韵入声	职部	上古入
时	古平,古上,古去,陆仅收平声	之韵平声	之部	上古平
来	古平,古去,古入,陆仅收平声	口台韵平声	之部	上古平
至	古上,古去,古入,陆仅收去声	至韵去声	质部	上古入
上	古平,古上,古去,陆仅收上声去声	养韵上声	阳部	上古平
静	古平,古上,古去,陆仅收上声	静韵上声	耕部	上古平

从上表可见,有诰发现上古四声与《唐韵》所标声调的矛盾,为例证《唐韵》声调而仿顾炎武《唐韵正》而著《唐韵四声正》。顾著考求《诗经》用韵,对《广韵》韵目内的字一一考求,使《广韵》韵目有分有合,从而找出上古韵部。江有诰曾评述说:“昆山顾氏,始能离析《唐韵》以求古韵。”^①作为考求古韵分部的一种方法,顾氏是非常正确的,“离析《唐韵》是顾氏在研究古韵分部的科学方法上的最大贡献,它和江永、戴震审析等韵以求上古音的方法,和段玉裁分析谐声偏旁以求上古音的方

① 《音学十书》,第19页上栏。

法,和戴震、黄侃、王力阴阳入三分相配而求和谐美的上古韵部体系的方法,都是同等重要的。”^①但在指导思想上是不正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说:“《唐韵》则本为四声而设,非言古韵之书,声随世移,是变非误,概名曰正,于义未协,是则炎武泥古之过,其编亦不可不知也。”^②用以上评顾著之说评《唐韵四声正》亦切合。王念孙在 1823 年(癸未)三月给有诰的复信已提出“陆氏以当时之声”。今读有诰书,可弃其不确之“论”回取其精确之“法”,看重其结论:古有四声,各字可求。

有诰认为,既然上古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声调,就不应将《诗经》四声通押字看作“四声一贯”,乃至视作“字无定调”之类。例如《诗经·唐风·扬之水》:“扬之水,白石皓皓(上古幽部上声,陆韵皓韵上声)/素衣朱绣(上古幽部去声,陆韵宥韵去声)/从子于鹄(上古觉部入声,陆韵沃韵入声)/既见君子,云何其忧(上古幽部平声,陆韵尤部平声)”。韵脚字为上、去、入、平通押,王力为幽觉通韵。我们还注意到,上古的声调与陆氏《切韵》中的声调往往是一致的。通韵而声调各异却并不一贯,这就是有诰要得出的结论。又如《诗经·小雅·大东》:“……职劳不来(赍)(上古之部去声,陆韵代韵去声)/……粲粲衣服(上古职部入声,陆氏屋韵入声)/……熊羆是裘(上古之部平声,陆氏尤韵平声)/……百僚是试(上古职韵入声,有诰作去声,陆氏志韵去声)”韵脚字为去、入、平、入通押,王力为“来、裘”之部韵,“服、试”职部韵。此例告诉我们,有诰的四声通押,与韵部为韵,往往是有龃龉的,显然,四声各异只能属手声调本身,不能作为解释押韵和韵式(同部为韵,异部通韵,隔句韵,一韵到底)等的依据,相反,只能提古韵分部说明押韵情况,进而顺便观察不同声调的押韵情况,且明“四声非一贯而各异自定”。又如《易·遁》象传:“……不往,何灾也(灾,上古之部平声,陆氏海韵上声)/……执用黄

① 柳士镇主编,《中国典籍精华丛书·语文名著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内载《音学五书评介》第五节。

②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版,上册第 368 页上栏。

牛,固志也(志,上古之部去声,陆氏志韵去声)/……有疾惫也(惫,上古职部入声,有诰作去声,陆氏怪韵去声)/……不可大事也(事,上古之部上声,有诰作去声,陆氏志韵去声)/……君子吉,小入否(上古之部上声,陆氏有韵上声)/……无所疑也(疑,上古之部平声,陆氏之部平声)。”按有诰的说法,以上六字是平、上、去声同为韵,四声非一贯,今谓以上六字是平上去入同为韵,为“之、职”通韵。又例《楚辞·九辩》其六:“……灭规矩而改凿(上古铎部入声,陆氏铎韵入声)/……愿慕先圣之遗教(上古宵部去声,陆氏效韵去声)/……非余心之所乐(上古药部入声,陆氏铎韵入声)/……宁穷处而守高(上古宵部平声,陆氏豪韵平声)。上例为平、去、入声字押韵,为铎、宵、药部通韵和合韵。有诰认为,不管是同声调押韵,还是异声调押韵,都只能说明“古有四声”,“此亦如二十一部(按:有诰分古韵为二十一部)之分,瞭然不紊,而亦间有通用合用者,不得泥此以窒其余也。”^①这就是说:古有四声,四声各异,偶有通用合用,不碍其各有己质,有诰视四声如他的二十一部,四声是上古的音位。他还指出,他的二十一部中四声的包含情况是不一样的。列表如下:

上古四声	有诰上古二十一韵部	韵部总数
古平上去入全	第一之部,第二幽部,第三宵部,第四侯部,第五鱼部,第七支部,第八脂部	7
古平上去,无入	第六歌部,第十元部,第十一文部,第十三耕部,第十四阳部,第十五东部,第十九谈部	7
古平上,无去入	第十八侵部	1
古平去,无上入	第十二真部	1
古去入,无平上	第九祭部	1
古平,无上去入	第十六中部,第十七蒸部	2
古入,无平上去	第二十叶部,第二十一缉部	2

① 《音学十书》,第277页下栏。

王念孙对有诰的上述见解大都是同意的。只指出“馆”上古去声,“至”上古只收去声、入声。此外侵部和谈部仍有分配未确之处。^①事实上,王念孙说古平上去入全,仅有入而无平上去的韵部,与有诰全同。有平而无上去入的韵部,王念孙定为东冬(中)蒸侵谈阳耕真淳元歌十一部。有去入而无平上的,王氏为质、月二部。此说与有诰相近。^②钱大昕的孙子钱师康于道光四年(甲申,1824)七月给有诰的复信,除表示赞同有诰的做法外,仅补了几个“未及引证”的用例。^③

二、《唐韵四声正》平声考论

有诰以中古陆韵上平声,下平声为切入点考上古若干字(46字)为平声而同时有其他声调。

列表如下: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规	平	上平五支	平	去	寘	平	漠	平	上平十一模	平	去	暮	平
夷	平	上平六脂	平	上	旨	平	柴	平	上平十三佳	平	去	卦	平

① 《音学十书》,第278页上栏。

② 参见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上册第41页。

③ 《音学十书》,第278页下栏。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作生 潘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作生 潘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资	平	上平六脂	平	去	至	平	偕	平	上平十四皆	平,上	上	骇	平
时	平	上平七之	平	上,去	止,志	平	该	平	上平十六哈	平	上	海	平
疑	平	上平七之	平	去,入	志,职	平	来	平	平十六哈	平	去,入	代,德	平
缙	平	上平七之	平	上	止	平	勋	平	上平二十文	平	去	问	平
司	平	上平七之	平	去,入	志,职	平	愆	平	下平二仙	平	上	猕	平
期	平	上平七之	平	上,去	止,志	平	僚	平	下平三萧	平	上	蓀	平
辞	平	上平七之	平	去	志	平	飘	平	下平四宵	平	去	笑	平
嘻	平	上平七之	平	上	止	平	昭	平	下平四宵	平	去	笑	平
威	平	上平八微	平	上	尾	平	朝	平	下平四宵	平	去	笑	平
归	平	上平八微	平	去	未	平	苞	平	下平五肴	平	去	效	平
居	平	上平九鱼	平	去	御	平	高	平	下平六豪	平	去	号	平

(续表)

例	陆韵		有诂正			唐先生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诂正			唐先生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车	平	上平九鱼	平	去	御	平	女夸	平	下平九麻	平	上	马	平
予(我)	平	上平九鱼	平	上		上	家	平	下平九麻	平	上,去	马,祢	平
祛	平	上平九鱼	平	去	御	平	行	平	下平十一唐	平		平	平
蹠	平	上平九鱼	平	去	御	平	忱	平	下平十八尤	平	去	宥	平
虞	平	上平十虞	平	去	遇	平	休	平	下平十八尤	平	上	有	平
诛	平	上平十虞	平	去	遇	平	谋	平	下平十八尤	平	去	宥	平
孚	平	上平十虞	平	去	遇	平	留	平	下平十八尤	平	去	宥	平
俱	平	上平十虞	平	上	虞	平	黼	平	下平十八尤	平	上	有	平
涂	平	上平十一模	平	上,去	姥,暮	平	鰕	平	下平十九侯	平	上	侯	平
图	平	上平十一模	平	上,去	姥,暮	平	能	平	下平十七登	平	上	海	平

有诂是如何确定某字除平声以外,还有其他声调的?当然只有通

过上古用韵。例“疑”(上古之部,中古之韵平声)字说成上古平声另有“去,入二声”。说“疑”字有去声,是因为本为平声的“疑”与去声字押韵。例《易·小畜》象传:“……不独富也(富:陆氏中古宥韵去声,上古职部)……尚德载(上古之部,中古代韵去声)……德积载也,有所疑也。”《易·损》象传:“……尚合志也(志:上古之部,中古志韵去声)……三则疑也……亦可喜也(喜:上古之部,中古止韵上声)。”《易·升》象传:“……有喜也……无所疑也……顺事也(事:上古之部,中古志韵去声)。”《易·兑》象传:“……行未疑也……信志也。”《管子·七臣七主》:“芒主通入情以质疑,尽臣下无信,是自治其事(去声),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植(上古职部,中古职韵入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赞:“士无贤不肖(上古宵部,中古笑韵去声),入朝见疑。”有诂谓:“疑与肖合韵。”今可称其上古之部与宵部同类旁转。有诂称“以上去声。”意即“疑”字与有关去声字押韵,“疑”本身在上古除平声外当有读去声的。事实上,上例中还有上声(喜),入声(植)。此外,有诂可不必说,“疑”字上古除平声外,还“古有去入二声”,“必同声调押韵”与有诂主张的“古有四声”而可“四声通押”是互相矛盾的。按“古有四声”而“四声通押”,平声字可与去声、入声字相押,而不必说原平声字变读为去声、入声,更不必说原平声字有二读,三读为去声,入声字才能与其他去声、入声字相押。由此而观之《唐韵四声正》某字下注反切,并言“按古有某声”,“按古有某某二声”“当与某部,某某部并收”的说法,是自乱其例“古有四声”之例,反倒可推导出“四声通押”,但所举丰富的例证告诉我们:某字除自身本调字间的相押外,还可和本调以外的三个声调($4-1=3$)相押,例证或夥。如循此理解,我们仍可看出“疑”字平声与入声字相押的例证。《书·洪范》:“次六曰乂用三德(上古职部,中古德韵入声),次七曰明用稽疑……次九曰用五福(上古职部,中古屋入)。”《诗经·大雅·桑柔》:“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毛诗》:“疑,定也。”陆德明释文:“疑,鱼陟反。”意即“疑”读入声,因反切下字“陟”中古为叶韵入字。此

当别一字。以上平声可看作平声“疑”与入声字相谐。

以上列表的内容,和举证多例以说某字本调以外还可读其余三种声调($4-1=3$,其实应解读为某字可以与本调以外的声调的字相谐相押),是《唐韵四声正》全书的体例。如果说本调可变读为其余三种声调而与相应的三种声调的字相押,那肯定还有顾氏“四声一贯”、古声调不确定的影子,如果说某字本调不变,但可与本调以外的三种声调的字相谐、相押,那就是说“古有四声,四声有时可通押”,而通押需有文献据证,不可乱叶,而后者本身就说明“古有四声”,四声有一定的质(哪怕是初步确定性的),某字的声调是不可随便变来变去的,这才是有诰的本意。说到底,有诰在体例上有缠夹,主要还是不明陆韵为中古,责陆韵不合上古用韵情况所致。例“规”字下云:“居隋切,按古有去声,当与寘部并收。”完全立足于补正陆韵而言之,如立足于上古,当云:“规,上古平声,上古另有与去声相押。”根本不可能再说“上古平声,上古有去声”之类的话了。对此,李方桂也是有批评的:“有些字不像这样一致的时候,他也往往说上古有两读或三读,这类的字我们就不敢十分肯定了。”^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王力《古无去声例证》一文中,也是立足于上古韵文用韵,进而说出上古某字不读去声而读平声或上声或入声。例:“仲,古读平声。《诗·邶风·击鼓》叶仲宋仲;《小雅·出车》叶虫蠹仲降仲戎。”^②从这一点看,似乎有诰的体例缠夹又不是情有可原的,但问题是,有诰既定或可定某字为平声,就不当再说该字上古还有上、去、入声,而王力的前提是不可定某字为去声,为“古无去声”,故经相押之证而说某字只能读平或上或入,而不能读去。再进一步的考虑,王力以古韵文用韵的若干个,许多个用例而全部否定古有去声,思想方法上也是可以再讨论的。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页。

② 《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卷十七,第341页。

三、《唐韵四声正》上声考论

有诰以中古韵上声为切入点考出上古若干字(67字)为上声同时兼有其他声调(按上一节的分析,显然应解读为上声能与其他声调相押)。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潘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潘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动	上	一董	上	平	东	上	衍	上	二十八狝	上	平	仙	上
靡	上	四纸	上	平	支	上	善	上	二十八狝	上	平	仙	上
指	上	五旨	上	平,去	脂,至	上	繇	上	二十九篠	上	平	萧	平
死	上	五旨	上	去	至	上	沼	上	三十小	上	平	笑	上
美	上	五旨	上	去	至	上	好	上	三十二皓	上	平	豪	上
矣	上	六止	上	平	之	上	道	上	三十二皓	上	平	豪	上
祀	上	六止	上	去	志	上	左	上	三十三哿	上	平	歌	上
喜	上	六止	上	去	志	上	洒	上	三十五马	上	平	麻	平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里	上	六止	上	去	志	上	写	上	三十五马	上	去	祢	上
斐	上	七尾	上	平	微	上	养	上	三十六养	上	平	阳	上
圉	上	八语	上	去	御	上	象	上	三十六养	上	平	阳	上
序	上	八语	上	去	御	上	爽	上	三十六养	平	平	阳	平
鼠	上	八语	上	去	御	上	飡	上	三十六养	平	平	阳	平
所	上	八语	上	去	御	上	享	上	三十六养	平	平	阳	平
举	上	八语	上	去	御	上	赏	上	三十六养	上	去	漾	上
阻	上	八语	上	平	鱼	上	罔	上	三十六养	上	平	阳	上
侮	上	九虞	上	去	遇	上	往	上	三十六养	上	平	阳	上
古	上	十姥	上	去	暮	上	仰	上	三十六养	上	平	阳	上
解	上	十二蟹	上	入	麦	上	荡	上	三十七荡	上	平	唐	上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作生 潘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作生 潘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待	上	十五海	上	平,去	哈,代	上	朗	上	三十七荡	上	平	唐	平
怠	上	十五海	上	平	哈	上	顛	上	三十七荡	平	平	唐	平
倍	上	十五海	上	去	代	上	慷	上	三十七荡	上	平	唐	上
引	上	十六軫	上	平	真	上	广	上	三十七荡	上	平	唐	上
泯	上	十六軫	上	平	真	平	静	上	四十静	平,去	平,去	清,劲	平
闵	上	十六軫	上	平	諄	上	颈	上	四十静	平	平	清	平
隕	上	十六軫	上	平	諄	上	逞	上	四十静	平	平	清	平
愤	上	十八吻	上	平	文	上	酒	上	四十四有	上	平	尤	上
远	上	二十阮	上	平	元	平	否	上	四十四有	上	平	尤	上
婉	上	二十阮	上	去	愿	上	守	上	四十四有	上	平	尤	上
反	上	二十阮	上	去	愿	上	咎	上	四十四有	上	去	宥	上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损	上	二十一混	上	平	魂	上	喉	上	四十五厚	上	入	屋	上
转	上	二十八狝	上	平	仙	上	纠	上	四十六黝	上	平	幽	平
变	上	二十八狝	上	去	线	平	饮	上	四十七寝	上	平	侵	上
浅	上	二十八狝	上	平	仙	平							

由表内可见,中古上声字上古不一定是上声字。有诰对“爽、飧、享、颢、静、逞”七字的考证是十分重要的,对“混、远、浅、繇、洒、朗、纠”七字的考证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余 53(67-14)个上声韵字纷纷与平声、去声、入声相押,如何能说明古有上声呢?莫不是恰恰相反,只能说明古无上声;这里也如上文所说,《唐韵四声正》的目的是正《唐韵》的上声,考其上古为上声或平声,且有与其他声调相押的复杂情形,但这个目的在有诰书中体现得不明确,究其原委,正如周祖谟先生所说:“其说独出胸臆,无所因假,故不敢勇于自信。”“夫王(念孙)江(有诰)两家能知古有四声,诚为段氏之后一大进步。然而两家对于古入所以解有四声之故,犹未阐发。”^①道光二十年(1840),当涂人夏燮著《述韵》,进一

① 《问学集》上册,第 40、41 页。

步独立阐发古有四声之理,方法上不是像有诰那样,仿古韵文韵字纠正《唐韵》,从而明某字上古为某调,或有与余三调通押(这就在逻辑上随之有两种可能,一是四声混用,二是有一定声调,通押仅为偶相谐,有诰显为后者),而是从古韵文出发,尽揭其同调之合,异调之分,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证明古有四声。周祖谟先生当举出夏氏四声分用之例,试列表“夏氏(含周祖谟补)举《诗经》中一章四声分用例”^①: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7	7			1	1		
4		4		6		6	
2			2	2	2	2	
	3		3			2	2
		2	2		8	8	
	3	3		1		1	
1			1		2		2

由表可知平上分用(亦即平上对举时,平声与平声相押,上声与上声相押,下同)7例,平去分用4例,平入分用3例,上入分用3例,去入分用2例,上去分用3例,共22例。另由周祖谟先生列“群经诸子秦刻石四声分用例”表^②可知,在群经诸子中,多见四声分用例有:平上分用1例,平去分用6例,平上去分用2例,去入分用2例,上去分用8例,平去分用1例,上入分用2例。共22例。这44例中,均可证“上古四声”分用而不相间杂。以上仅举的44例中,涉及上声共26例,均可说明古有上声,而不是如黄侃所说的那样:古无上声。

① 《问学集》上册,第42、43页。

② 《问学集》上册,第43、44页。

四、《唐韵四声正》去声考论

先列表以明有诂考上古去声成果。

例 字	陆韵		有诂正			唐先 作生 潘定	例 字	陆韵		有诂正			唐先 作生 潘定
	中古 调	中古 韵	上古 声调	上古 他调	上韵 古并 与收 某	上古 声调		中古 调	中古 韵	上古 声调	上古 他调	上韵 古并 与收 某	上古 声调
冻	去	一送	平		东	平	镇	去	二十一震	平		真	平
风	去	一送	平		侵	平	慎	去	二十一震	去	平	真	去
用	去	三用	去	平	钟	平	进	去	二十一震	去	平	真	去
颂	去	三用	去	平	钟	平	顺	去	二十二稊	去	平	谆	平
诵	去	三用	去	平	钟	平	汶	去	二十三问	去	平	文	平
讼	去	三用	平		钟	平	训	去	二十三问	去	平	文	平
众	去	三用	平			平	运	去	二十三问	去	平	文	去
议	去	五真	去	平	支	平	献	去	二十五愿	去	平	元	平
被	去	五真	去	平	支	上	宪	去	二十五愿	平		元	平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义	去	五真	去	平	支	平	闷	去	二十六恩	去	平	魂	平
戏	去	五真	平		支	平	避	去	二十六恩	去	平	魂	去
至	去	六至	去	上,入	旨,质	入	漫	去	二十九换	去	平	桓	去
悴	去	六至	去	入	质	入,平	谏	去	三十谏	去	上	潜	上
备	去	六至	去	入	职,志	入	慢	去	三十谏	去	平	删	去
肆	去	六至	去	入	质	入	患	去	三十谏	平		删	平
地	去	六至	去	平		平	眩	去	三十二霰	去	平	先	平
志	去	七志	去	平	之	去	甸	去	三十二霰	平		先	平
试	去	七志	去	上	止	入	笑	去	三十五笑	去	平	宵	去
悒	去	七志	去	上	止	上	挫	去	三十九过	去	平	戈	去
事	去	七志	去	上,入	止,职	上	货	去	三十九过	去	平	戈	去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意	去	七志	去	入	职	入	稼	去	四十祆	去	上	马	去
记	去	七志	去	上	止	去	暇	去	四十祆	去	上	马	平
畏	去	八未	去	平	微	平	化	去	四十祆	平		平	
气	去	八未	去	入	物	入	让	去	四十一漾	去	平	阳	平
御	去	九御	去	上	语	上	怆	去	四十一漾	去	平	阳	平
著	去	九御	去	平	鱼	去	障	去	四十一漾	去	平	阳	平
虑	去	九御	去	上	语	去	帐	去	四十一漾	去	平	阳	去
豫	去	九御	去	上	语	去	上	去	四十一漾	去	平	阳	平
去	去	九御	去	平	鱼	上	贲	去	四十一漾	去	平	阳	去
倨	去	九御	去	平	鱼	去	壮	去	四十一漾	去	平	阳	去
助	去	九御	去	上	语	去	抗	去	四十二宕	去	平	唐	去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潘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潘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赋	去	十遇	去	上	虞	去	葬	去	四十二宕	去	平	唐	平
路	去	十一暮	去	上	姥	入	伉	去	四十二宕	去	平	唐	去
顾	去	十一暮	去	上	姥	去	敬	去	四十三映	去	平	庚	去
固	去	十一暮	去	上	姥	去	庆	去	四十三映	去	平	阳	平
悟	去	十一暮	去	上	姥	平	命	去	四十三映	去	平	真,庚	平
步	去	十一暮	去	上	姥	入	病	去	四十三映	去	平	阳	去
济	去	十二霁	去	平	齐	上	政	去	四十五劲	去	平	清	去
岁	去	十三祭	去	入	薛	入	圣	去	四十五劲	去	平	清	去
制	去	十三祭	去	入	薛	入	性	去	四十五劲	去	平	清	平
毙	去	十三祭	去	入	薛	入	姓	去	四十五劲	去	平	清	平
世	去	十三祭	去	入	薛	入	盛	去	四十五劲	去	平	清	平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厉	去	十三祭	去	入	薛	入	定	去	四十五径	去	平	青	去
害	去	十四泰	去	入	曷	入	佞	去	四十五径	去	平	真,青	去
隘	去	十五卦	去	入	麦	入	证	去	四十七证	平		蒸	平
戒	去	十六怪	去	入	德,代	入	佑	去	四十九宥	去	平,上	尤,有	上
坏	去	十六怪	去	平	皆	平	祐	去	四十九宥	去	平,上	尤,有	上
背	去	十八队	去	入	德,代	入	救	去	四十九宥	去	平	尤	去
晦	去	十八队	去	上	海	上	狩	去	四十九宥	上		有	上
佩	去	十八队	去	平	哈,代	平	兽	去	四十九宥	上		有	上
代	去	十九代	去	入	德	入	臭	去	四十九宥	去	平	尤	平
载	去	十九代	去	入	德	上	旧	去	四十九宥	去	上	有	去
阕	去	十九代	去	上	海	入	富	去	四十九宥	去	入	屋	入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潘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潘定
	中古 调	中古 韵	上古 声调	上古 他调	上韵 古并 与收某	上古 声调		中古 调	中古 韵	上古 声调	上古 他调	上韵 古并 与收某	上古 声调
废	去	二十 废	去	入	月	入	候	去	五十候	去	平	侯	去
震	去	二十一 震	平		文	平	茂	去	五十候	去	上	厚	上
信	去	二十一 震	平		真	平	戊	去	五十候	去	上	厚	平
刃	去	二十一 震	去	平	文	去	借	去	五十 六桮	去	平	侵	平

从上表可知,有诰对“冻、风、讼、众、戏、震、信、镇、宪、患、甸、化、证、狩、兽”¹⁵字的考订有重要价值。对“用、颂、诵、议、义、至、悴、备、肆、地、饵、事、意、畏、气、御、岁、制、毙、世、厉、害、隘、戒、坏、背、晦、佩、代、废、顺、汶、训、献、闷、谏、眩、让、怆、障、上、葬、庆、命、性、姓、盛、佑、祐、臭、富、茂、僭”⁵³字的考订也有重要意义。另外,从有诰的考订中,确也使我们认识到:去声和平声,和上声,和入声的联系很紧密,很多中古去声字在上古是平上入声,上古多“去派三声”,这就极易造成“古无去声”的假象。由表可知不足的是,有诰考中古去声 114 个例字中,没有中古读去声,上古肯定也有读去声的例字(“上古他调”栏内没有一个标去声的),无疑这容易得出“古无去声”的结论。而前举夏燮平去分韵 4 例,去入分韵 2 例,上去分韵 3 例,周祖谟平去分韵 6 例,平、上、去分韵 3 例,去入分韵 2 例,上去分韵 8 例,平去分韵 1 例,计共 29 例均能说明去声为一单独的声调。

周祖谟先生评说其古韵 22 部内的声调分布情形,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声兼与他声合。周说:“昔姚文田著《古音谐》,已以四声分判例字,然不辨合用独用,犹未美备,故不嫌重作矣。”考古韵字四声,辨合用独用是不可避免的追溯过程。对江有诰《唐韵四声正》中所言某字“独有 X 声,当与 X 部并收”这一说法,周先生理解为“兼调”,这样可防止混淆或抹煞原声调。例如周就东部上去声兼平声例说“凡上去二声字已有独用之例,而古书中与平声相协者尚多,今依江夏两家说姑定为古人兼有平声一音。”^①故前述有诰考证《唐韵》而得上古另有某声为“上古他声调”之说,按周先生的理解为兼声调,抑或更符合有诰本意吧。不过“他调”也好“兼调”也好,最有说服力的是独用例。周先生考各韵部去声独用例是最能说明上古有去声的。周说显可补有诰 114 字无去声独用之不足。周的去声独用例是:东部 4,冬部 0,蒸部 0,侵部 2,谈部 1,阳部 7,耕部 41,真部 3,諄部 8,元部 38,歌部 9,支部 4,至部 7,脂部 81,祭部 88,盍部 0,辑部 0,之部 106,鱼部 88,侯部 18,幽部 20,宵部 23,周氏二十二韵部共 548 例。^②例如:

东部:去声独用例。《诗·郑风·太叔于田》:“抑罄控(上古东部去声,中古送韵去声)忌,抑纵送(上古东部去声,中古送部去声)忌。”《荀子·天论》:“从天而颂(诵,上古东部去声,中古用韵去声)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上古东部去声,中古用韵去声。周祖谟注:诵用二字江、夏以为古惟读平声)之。”^③《管子·权修》:“我苟种(上古东部去声,中古用韵去声)之,如神用(上古东部去声,中古用韵去声)之。”《楚辞·离骚》:“……夏康娱以自纵(上古东部去声,中古用韵去声)……五子用失乎家巷(上古东部去声,中古绛韵去声)。”

谈部:去声独用例。《诗·商颂·殷武》:“天命降监(上古谈部去

① 《问学集》上册,第 48 页。

② 《问学集》上册,第 49—79 页。

③ 《问学集》上册,第 49 页。

声,中古衍韵平声)……不僭不滥(上古谈部去声,中古阡韵去声)。”

阳部:去声独用例。《礼记·儒行》:“今众人之命儒也妄(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常,以儒相诟病(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映韵去声)。”《左传·僖公七年》:“心则不竞(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映韵去声),何惮于病(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映韵去声)。”《管子·七臣七主》:“乱臣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厚赏(上古阳部去声,中古养韵上声);居为非,母动为善栋(上古东部去声,中古送韵去声)。”《管子·牧民》:“上无量(上古阳韵去声,中古漾韵去声),则民乃妄(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楚辞·天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上古阳部去声,中部漾韵去声)之?女媧有体,孰制匠(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澜韵去声)之?”《楚辞·远游》:“……精醇粹而始壮(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神要眇以淫放(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宋玉《神女赋》:“进之既妖,远之有望(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骨法多奇,应君之相(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视之盈目,孰者克尚(见前),私入独悦,乐之无量(见前),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他人莫睹,王览其状(上古阳部去声,中古漾韵去声)。”

五、《唐韵四声正》入声考论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福	入	一屋	入	去	宥	入	折	入	十七薛	入	去	祭	入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作生藩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禄	入	一屋	入	去	候	入	舌	入	十七薛	入	去	祭	入
轴	入	一屋	入	平	尤	入	灭	入	十七薛	入	去	祭	入
玉	入	一屋	入	去	遇	入	碣	入	十七薛	入	去	祭	入
欲	入	三烛	入	去	遇	入	竭	入	十七薛	入	去	祭	入
慾	入	三烛	入	去	遇	入	绝	入	十七薛	入	去	祭	入
学	入	四觉	入	去	效	入	若	入	十八药	入	上	语	入
斲	入	四觉	入	去	候	入	落	入	十九铎	入	去	暮	入
实	入	五质	入	去	至	入	凿	入	十九铎	入	去	号	入
疾	入	五质	入	去	至	入	薄	入	十九铎	入	去	暮	入
失	入	五质	入	去	至	入	索	入	十九铎	入	去	暮	入
室	入	五质	入	去	至	入	穫	入	十九铎	入	去	暮	入
日	入	五质	入	去	至	入	宅	入	二十陌	入	去	暮	入
绂	入	八物	入	去	未	入	泽	入	二十陌	入	去	暮	入
物	入	八物	入	去	未	入	逆	入	二十陌	入	去	御	入
发	入	十月	入	去	废	入	隙	入	二十陌	入	去	御	入
越	入	十月	入	去	废	入	獲	入	二十一麦	入	去	暮	入
謁	入	十月	入	去	废	入	脉	入	二十一麦	入	去	卦	入

(续表)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潘定	例	陆韵		有诰正			唐先生 潘定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中古调	中古韵	上古声调	上古他调	上韵古并与收某	上古声调
突	入	十一没	入	去	怪	入	螯	入	二十二昔	入	去	御	入
达	入	十二曷	入	去	泰	入	敌	入	二十三锡	入	去	寘	入
脱	入	十三末	入	去	夬	入	适	入	二十三锡	入	去	寘	入
拔	入	十四黠	入	去	泰	入	式	入	二十四职	入	去	志	入
察	入	十四黠	入	去	泰	入	匿	入	二十四职	入	去	志	入
切	入	十六屑	入	去	霁	入	极	入	二十四职	入	去	志	入
臬	入	十六屑	入	去	祭	入	德	入	二十五德	入	去	代	入
穴	入	十六屑	入	去	未	入	得	入	二十五德	入	去	代	入
决	入	十六屑	入	去	废	入	克	入	二十五德	入	去	代	入
列	入	十七薛	入	去	祭	入							

以上 55 个字中,有诰考订无有上古仅读入声的,相反多与去声、上声通押而作为去声、上声看待,这当然也是极易与“入为闰声”相通的,

但有诰的本意,我们仍应理解为“古有入声”(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可能有诰认为无须多作证明),多与平上去通押(对此有诰“按古有去声”云云是失于准确性的)。前述周祖谟先生举夏燮《诗经》四声分用例:平入分用 3 例,上入分用 3 例,去入分用 2 例,周先生自举群经诸子去入分用 2 例,上入分用 2 例,共 12 例,皆可证入声与入声相押,上古入声单独为韵,上古有入声。而周氏《古韵二十二部上去二声字辨》述上声独用,去声独用,未涉及入声独用,是为体例所限。分用 12 例,已可补有诰不足。又有诰《入声表》^①虽然是讨论入声在上古音中的分配,显然也必需“古有入声”为前提的。

主要参考文献

- 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 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 1987 年版。
- 王力《音韵通论·上古音》,《王力文集》第十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王力《诗经韵读·楚辞韵读》,《王力文集》第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陈其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① 《音学十书》第 261—275 页。

重纽音理考^①

零 引 言

0.1 重纽研究是《广韵》研究中的经典课题。它的研究不仅属于重纽本身,而且可获得许多带普遍性的认识,如经重纽研究,可知古音构拟中的若干关节点、同一音位中不同音素的差异;可知《广韵》存古是大量的,因据我们的认识,重纽是上古音构拟不同所致;可知戴震对《广韵》独用、同用的考定是正确的,如说上声琰、忝同用,并不与佅同用,去声艳与忝同用,不与酺同用,极是,否则难以释读《韵镜》外转第三十九图的盐添韵类的重纽(如第144例)和第四十图的严盐韵重纽的复杂性(如第150、151);可更深切而具体地理解等韵门法,重纽假四等只在标准式中如此,其余则可能是真四等;甚至可深入理解证实与证伪的关系,等等。

0.2 关于重纽研究,学术史上有多位学者作过深入研究,树立了几可与三次古音学大讨论(1923—1935)媲美的丰碑。^②如果说,重纽的研究给古音构拟带来了莫大的益处,今天,在古音构拟中若干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形下回首重纽,则同样有意义。本文的研究正是立足于

① 本文原载《南大语言学》总第四期,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② 主要有:陆志韦《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载《燕京学报》26期)、《古音说略》(1947,载《燕京学报》专号之20),王静如《论开合口》(1941,载《燕京学报》29期)、《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8,载《燕京学报》35期),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1948,载《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1948,载《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李荣《切韵音系》(1956,科学出版社),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中华书局)。文中引用上述论著时,不另作注释,仅引“作者姓名(年代,页码)”,如“董同龢(1948,14页)”。

古音构拟看重纽,并注意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

0.3 重纽,简称重出喉、牙、唇音,学界公认的,是说中古《切韵》(但可见之《切韵》系统韵书,如近古《广韵》和韵图)中的八个三等韵类:支、脂、祭、真(諄)、仙、宵、盐、侵,但经我们研究,虞韵类,清韵类,(均举平声以赅上去)韵中的喉(影喻晓匣)、牙(见溪群疑)、唇音(帮滂並明)字,还有舌齿音(半舌音来纽、半齿音日纽)字,声母、韵、开合、等、声调基本相同(个别还有例外),但分作两个重出的小韵,在近古韵图中一类排在三等,一类排在四等,形成韵书(图)内部安排上的虚拟对待,也反映了并非三等、四等的实际语音的对待,学界习称重纽。如:《广韵平支》:“陂,彼为切。卑,府移切。”都是帮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但分排在两处,小韵“陂”携 11 字在一处,小韵“卑”携 11 字在另一处,《韵镜》“陂”在三等,“卑”在四等,形成假四等。^①

0.4 从古音构拟看重纽,就一般情况而言,音理上中古拟音相同的:声纽同、主元音同、韵尾同、介音同,或虽有不同,但因中古两韵“同用”,故可设中古两字拟读为同音字,或近音字,而上古音略有差异,有的甚至差异很大,如两字上古声母不同,也构成重纽。故至少可对重纽的外延稍加推广,即从古音构拟看,两字中古不一定是完全同音字的,也视为重纽而说之。更重要的是,从中古和上古音的比照中,看出重纽的音理依据在于上古音,这是语音史发展中的定则。

壹 上古主元音不同是重出条件之一

1.0 中古音两字音同或音近,《广韵》因上古主元音不同而重出(安排在两处),形成重纽。

1.1 支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支韵(平赅上去)开口出

① 参见《永禄本韵镜》第四图,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现了重出喉牙音。它们是：唇音陂/卑、铍/披、皮/陴、糜/弥，牙音奇/祗，喉音×；纸韵（开口）——唇音彼/俾、破/諲、被/婢、靡/弭，牙音掎/跻、绮/企，喉音×；真韵（开口）——唇音×，牙音寄/駢、搃/企，喉音×。韵图排列时固只能以“三等/四等”为对待，但实际上都是三等。计13例。

1.1.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例有（文中重组例的序号依《韵镜》重组次序编出，下同）：

1[陂/卑] 陂，《广韵平支》彼为切，上古帮纽歌部 pĭa/中古帮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pĕi；卑，《广韵平支》府移切，上古帮纽支部 pĕi/中古帮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pĕi。可知列为重组的原因是中古音全同，同是三等字，但“陂”排在三等，“卑”排在四等。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歌部-a，一为支部-e。

2[铍 pĭ/披 pĭ] 铍，《广韵平支》敷羈切，上古滂纽歌部 p'ĭa/中古滂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p'ĕi；披，《韵镜》作“披”，误，宋本《广韵》铍、披为同一小韵，不构成重组。杨军《韵镜校笺》第四图第11条校作“披”。披，《广韵平支》匹支切，上古滂纽支部 p'ĕi/中古滂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p'ĕi。构成重组的原因和重出的条件同1。

3[皮/陴] 皮，《广韵平支》符羈切，上古並纽歌部 bĭa/中古並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bĕi；陴，《广韵平支》符支切，上古並纽支部 bĕi/中古並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bĕi。同1。

4[糜/弥] 糜，《广韵平支》靡为切，上古明纽歌部 mĭa/中古明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mĕi；弥，《广韵平支》武移切，上古明纽脂部 mĕi/中古明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mĕi。可知列为重组的原因是中古音全同，同是等字，但“糜”排在三等，“弥”排在四等。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一为歌部，一为脂部；上古主元音不同，一为单元音-a，一为复合元音-ei。

5[奇/祗] 奇，《广韵平支》渠羈切，上古群纽歌部 gĭa/中古群纽支

韵开口三等平声 gĭe; 祗,《广韵平支》巨支切,上古群纽支部 gĭe/中古群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gĭe。同 1。

6[彼/俾] 彼,《广韵上纸》甫委切,上古帮纽歌部 pĭa/中古帮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pĭe; 俾,《广韵平支》并弭切,上古帮纽支部 pĭe/中古帮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pĭe。同 1。

7[殍/諲] 殍,《广韵上纸》匹靡切,上古滂纽歌部 p'ia/中古滂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p'ie; 諲,《广韵上纸》匹婢切,上古滂纽支部 p'ie/中古滂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p'ie。同 1。

8[被/婢] 被,《广韵上纸》皮彼切,上古並纽歌部 bĭa/中古並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bĭe; 婢,《广韵上纸》便俾切,上古並纽支部 bĭe/中古並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bĭe。同 1。

9[靡/弭] 靡,《广韵上纸》文彼切,上古明纽歌部 mĭa/中古明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mĭe; 弭,《广韵上纸》绵婢切,上古明纽支部 mĭe/中古明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mĭe。同 1。

10[掎/枳] 掎,《广韵上纸》居绮切,上古见纽歌部 kĭa/中古见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kĭe; 枳,《韵镜》作“踦”,误,宋本《广韵》掎、踦为同一小韵,不构成重纽。杨军《韵镜校笺》第四图第 28 条校作“枳”。枳,《广韵上纸》居纸切,上古见纽支部 kĭe/中古见纽纸韵开口三等上 kĭe。同 1。

11[綺/企] 綺,《广韵上纸》墟彼切,上古溪纽歌部 k'ia/中古溪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k'ie; 企,《广韵上纸》丘弭切,上古溪纽支部 k'ie/中古溪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k'ie。同 1。

12[寄/駢] 寄,《广韵去真》居义切,上古见纽歌部 kĭa/中古见纽真韵开口三等去声 kĭe; 駢,《广韵去真》居企切,上古见纽支部 kĭe/中古见纽真韵开口三等去声 kĭe。同 1。

13[廛/企] 廛,《广韵去真》卿义切,上古溪纽歌部 k'ia/中古溪纽真韵开口三等去声 k'ie; 企,《广韵去真》去智切,上古溪纽支部 k'ie/中

古溪纽真韵开口三等去声 $k'ie$ 。同 1。

1.1.2 以上 13 例,可谓重纽的标准格式:中古音读音全同,重出两对待韵字都是三等字,不过一排排在韵图的三等,一排排在韵图的四等,在韵图上是人为设置的虚拟对待。重出的条件,当然也可说成原因,是上古主元音不同。

1.1.3 这 13 例,又与“上古歌部字、支部字不同,一主元音为 $-a$,一主元音为 $-e$,上古二部到了中古都成了一个支韵类”极有关系,简言之,是上古歌、支二部,到中古合为支部而同音,或者说,中古支韵半上古为歌部,另半为本部支部,是《广韵》重出之因。以往,我们寻找上古歌部与支部关系字例,颇不易,今以《广韵》支韵开口重纽观之,例夥(每个小韵字后还有一串字)。可见《广韵》重纽对研究上古歌、支二部的关系极有价值。

1.2 支韵类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支韵(平赅上去)合口出现了重出喉牙音。它们是:支韵(合口)唇音 \times ,牙音 𪛗/规、亏/闕,喉音 𪛗/隰,为/蟻;纸韵(合口)——唇音 \times ,牙音 \times ,喉音 𪛗/莢;真韵(合口)——唇音 \times ,牙音 𪛗/𪛗,喉音 𪛗/𪛗、𪛗/𪛗。计 9 例。

1.2.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 6 例,另有 3 例(第 17、18、22)移入因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纽,见 § 3.2.1。

14[𪛗/规] 𪛗,《广韵平支》居为切,上古见纽歌部 $k'wa$ /中古见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k'we$;规,《广韵平支》居隋切,上古见纽支部 $k'we$ /中古见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k'we$;可知列为重纽的原因是中古音全同,同是三等字,但“𪛗”排在三等,“规”排在四等。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一为歌部,一为支部;上古主元音不同,一为 $-a$,一为 $-e$ 。

15[亏/闕] 亏,《广韵平支》去为切,上古溪纽歌部 $k'wa$ /中古溪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k'we$;闕,《广韵平支》去随切,上古溪纽支部 $k'we$ /中古溪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k'we$;二字中古同音,构成重纽的原因和重出的条件同 14。

16[麾/隳] 麾,《广韵平支》许为切,上古晓纽歌部 xīwa/中古晓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xīwe;隳,《广韵平支》许规切,上古晓纽支部 xīwe/中古晓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xīwe;二字中古同音,同 14。

19[鵠/瞞] 鵠,《广韵去真》诡伪切,上古见纽歌部 kīwa/中古见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kīwe;瞞,《广韵去真》规悲切,上古见纽支部 kīwe/中古见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kīwe。二字中古同音,同 14。二字中古皆为去声,今亦去声,《汉语大字典》将“瞞”注音为 guī,有误。

20[餒/恚] 餒,《广韵去真》於伪切,上古影纽歌部 ĭwa/中古影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ĭwe;恚,《广韵去真》於避切,上古影纽支部 ĭwe/中古影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ĭwe;二字中古同音,同 14。

21[毀/嬌] 毀,《广韵去真》况伪切,上古晓纽歌部 xīwa/中古晓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xīwe;嬌,《广韵去真》呼悲切,上古晓纽支部 xīwe/中古晓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xīwe。二字中古同音,同 14。

1.3 脂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脂韵(平赅上去)开口出现了重出喉牙音。它们是:唇音丕/𪔐、邳/毗,牙音×,喉音×;旨韵(开口)——唇音鄙/匕、否/牝,牙音×,喉音×;至韵(开口)——唇音秘/痹、凵/屁、备/鼻、鄆/寐,牙音器/弃,喉音黷/咽。计 10 例。

1.3.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组者 9 例(其中有 2 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2 例涉及上古韵尾不同):

23[丕/𪔐] 丕,《广韵去脂》敷悲切,上古滂纽之部 p'īə/中古滂纽脂韵开口三等平声 p'i;𪔐,《广韵去脂》匹夷切,上古滂纽脂部 p'iei/中古滂纽脂韵开口三等平声 p'i。构成重组的原因是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ə,一为-ei。这实际上涉及六脂、七之在上古须分部问题。丕、𪔐二字重组,中古音同,上古音必不同,就必然说及脂、之的区分,如将丕的上古音构拟成 p'īəi,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则又涉及脂微的区分问题。此二字重组的出现是暗含脂、之相分,脂、微相分之理的,否则不能成为重组。

24[邳/毗] 邳,《广韵去脂》符悲切,上古並纽之部 *bǐə*/中古並纽脂韵开口三等平声 *bi*;毗,《广韵去脂》房脂切,上古並纽脂部 *bǐei*/中古並纽脂韵开口三等平声 *b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和相关价值的说明同 23。

25[鄙/匕] 鄙,《广韵上旨》方美切,上古帮纽之部 *pǐə*/中古帮纽旨韵开口三等上声 *pi*;匕,《广韵上旨》卑履切,上古帮纽脂部 *pǐei*/中古帮纽旨韵开口三等上声 *pi*。二字中古同音,同 23。

26[否/牝] 否,《广韵上旨》符鄙切,上古並纽之部 *bǐə*/中古並纽旨韵开口三等上声 *bi*;牝,《广韵上旨》扶履切,上古並纽脂部 *bǐei*/中古並纽旨韵开口三等上声 *bi*。二字中古同音,同 23。

27[秘/痹] 秘,《广韵去至》兵媚切,上古帮纽脂部 *pǐei*/中古帮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pi*;痹,《广韵去至》必至切,上古帮纽质部 *pǐēt*/中古帮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p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复元音)不同,一为 *-ei*,一为 *-ēt*。此条说明,中古去声至韵,上古可能是阴声韵脂部,也可能是人声韵质部,正是上古脂部字和质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

28[漚/屁] 漚,《广韵去至》匹备切,上古滂纽职部 *pʰǐāk*/中古滂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pʰi*。屁,《广韵去至》匹寐切,上古滂纽物部 *pʰiāt*/中古滂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pʰ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 *-āk*,一为 *-āt*。二字介音不同,一为 *-i*,一为 *-i*。也可说二字韵尾也不同不同,一是 *-k*,一是 *-t*。此条说明,中古去声至韵,上古可能是入声韵职部,也可能是入声韵物部,正是上古职部字和物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

29[备/鼻] 备,《广韵去至》平秘切,上古並纽职部 *bǐāk*/中古並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bi*。鼻,《广韵去至》毗至切,上古並纽质部 *biēt*/中古並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b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同 28。此条说明,中古去声至韵,上古可能是入声韵职部,也可能是入声韵质部,正

是上古职部字和质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

30[郿/寐] 郿,《广韵去至》明秘切,上古明纽质部 mǐēt/中古明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mi。寐,《广韵去至》弥二切,上古明纽脂部 mǐei/中古明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m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ēt,一为-ei。正是上古质部字和脂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

31[器/弃] 器,《广韵去至》去冀切,上古溪纽微部 kǐəi/中古溪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kʰi。弃,《广韵去至》诘利切,上古溪纽质部 kʰiēt/中古溪纽至韵开口三等去声 kʰ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əi,一为-ēt。正是上古微部字和质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此外,有下例:

原 32—(0)[𪚩 xiè/咽] 𪚩,咽《广韵去至》皆为虚器切,“咽”在小韵字“𪚩”字后,非重出字。《韵镜》有误。杨军《韵镜校笺》第六图第 29 条认为“咽”当删。“(0)”表非重纽,下同。

1.3.2 以上脂韵开口的九例重纽字,有四例(23 至 26)是上古韵部之、脂当分和脂、微当分而到中古不分,都成了脂韵字所致。有五例(27 至 31)是上古入声韵质、职、物部或阴声韵脂、微部,发展到中古都成了至韵字,造成重纽。中古至韵字的来源极复杂,并非只有上古质部发展而来。

1.3.3 董同龢(1948, 14 页注)曾说及脂韵重纽对脂、微分部的意义,并以至韵重纽对王念孙脂、至分部有解释作用,但有关介音不同问题,有如以上 28、29 例,一为-i,一为-i,则认为不好作出解释。以上九例进一步就重纽说明了脂部独立、脂、微分部,以及中古至韵的复杂来源和成立至部的复杂局面。由此可见,王念孙说至(质)部独立和江有诰说至(质)部不独立,皆事出有因。周法高(1948, 84 页)则认为《广韵》“脂韵开口无重纽”,不确。当以 23、24 例补正之。

1.4 脂韵类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脂韵(平赅上去)合口出现了重出喉牙音。它们是:唇音×,牙音逵/葵,喉音×;旨韵(合口)——唇音×,牙音轨/癸、郇/揆,喉音洧/唯;至韵(合口)——唇音×,牙音槐/季、匱/悸,喉音位/遗。计7例。

1.4.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7例(其中有7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2例涉及上古声纽不同):

33[逵/葵] 逵,《广韵平脂》渠追切,上古群纽幽部 *giəu*/中古群纽脂韵合口三等平声 *gwi*。葵,《广韵平脂》渠追切,上古群纽脂部 *giwei*/中古群纽脂韵合口三等平声 *gw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əu,一为-ei,介音不同,一为-i,一为-ɨw。正是中古脂(赅上去)半在上古的幽部字,半在上古脂部字,发展到中古都变成脂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重纽与中古的“某韵半”即上古古本韵有关。

34[轨/癸] 轨,《广韵上旨》居洧切,上古见纽幽部 *kjəu*/中古见纽旨韵合口三等上声 *kwi*。癸,《广韵上旨》居谏切,上古见纽脂部 *kjwei*/中古见纽旨韵合口三等上声 *kw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和有关说明同33。

35[郇/揆] 郇,《广韵上旨》暨轨切,上古群纽幽部 *giəu*/中古群纽旨韵合口三等上声 *gwi*。揆,《广韵上旨》求癸切,上古群纽脂部 *giwei*/中古群纽旨韵合口三等上声 *gwi*。二字中古同音,同33。

36[洧/唯] 洧,《广韵上旨》荣美切,上古匣纽之部 *xjwə*/中古云纽旨韵合口三等上声 *jwi*。唯,《广韵上旨》以水切,上古余纽微部 *ɬjwei*/中古余纽旨韵合口三等上声 *jw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ə,一为-əi;介音不同,一为-ɨw,一为-iw;声纽也不同,一为匣纽 *x-*,一为余纽 *ɬ-*。其理正是中古脂(赅上去)半在上古的之部字和上古微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脂(旨)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此条还说明,中古喻三(云纽)上古可能是匣

母,上古匣母与余母音值不同,而中古喻_三云纽或这里的中古余纽(喻_四)音值构拟同为 j-,从而形成了重纽。^①

37[媿/季] 媿,《广韵去至》俱位切,上古见纽微部 kiwəi/中古见纽至韵合口三等去声 kwi。季,《广韵去至》居悸切,上古见纽质部 kiwət/中古见纽至韵合口三等去声 kw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复元音不同,一为-əi,一为-ət;介音不同,一为-iw,一为-iw;其理正是中古脂(赅上去)半在上古的微部字和上古质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脂(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这说明,中古至韵的来源是较复杂的,它可能来自上古微部字,也可能来自上古脂类质部字。

38[匱/悸] 匱,《广韵去至》求位切,上古群纽物部 giwət/中古群纽至韵合口三等去声 gwi。悸,《广韵去至》其季切,上古群纽质部 giwət/中古群纽至韵合口三等去声 gw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复元音不同,一为-ət,一为-ət;介音不同,一为-iw,一为-iw;其理正是中古脂(赅上去)半在上古的物部字和上古质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脂(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这说明,中古至韵的来源是较复杂的,它可能来自上古微类物部字,也可能来自上古脂类质部字。

39[位/遗] 位,《广韵去至》于愧切,上古匣纽物部 ɣiwət/中古云纽至韵合口三等去声 jwi。遗,《广韵去至》以醉切,上古余纽微部 ɣiwəi/中古余纽至韵合口三等去声 jwi。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复元音不同,一为-ət,一为-əi;介音不同,一为-iw,一为-iw;其理正是中古脂(赅上去)半在上古的物部字和上古微部字发展到中古都有可能变成脂(至)韵字而同音,造成了重纽。这说明,中古至韵

① 李方桂 1980 年曾将喻_三(云纽)和群纽相配,又认为喻_三来自圆唇舌根音,也是有道理的。可见喻_三音值本身的复杂性。参见《中国语文》1992 年第 5 期。这里又按王力的构拟系统把喻_三的音值等同余纽。

的来源是较复杂的,它可能来自上古微类物部字,也可能来自上古微类微部字。关于声纽造成重纽之理,同第36条下的说明。

1.4.2 以上脂韵合口的七例重纽字,它们说明,中古平声脂韵合口的来源有上古的幽部、脂部(33);中古上声旨韵合口的来源有上古的幽部、脂部、之部、微部(34至36);中古去声至韵合口的来源有上古的微部、质部、物部(37至39)。从声纽上看,上古的匣母、余母(音值不同)发展到中古而成云纽和余纽(音值相同)(36、39)而成重纽。从介音看,都有上古介音不同者(33至39),发展到中古介音大大简化划一了。

1.4.3 周法高(1948 p. 57)在研究脂韵合口重纽时,曾讲到两难的情形:“在有重纽而又分做两类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决定它们的分合。”并举出上述33例“逵/葵”为例言之,二字同为渠追切,“切语下字不分二类”,但应该分属二类,并认为“葵”与“惟”应同属微类,实际上“葵”上古脂部,“惟”上古微部,“追”上古幽部,当年的揣度,今可通过古音构拟加以廓清。古音构拟系统对解析重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5 附验证虞、麌、遇韵(3例举3)能否构成重纽。文中加“()”的序号是重新验证后的《韵镜》中的重纽,含半舌音、半齿音重纽等,下同。

(2) 虞韵喉音[于/逾] 于,《广韵平虞》羽俱切,上古匣纽鱼部 xiwa/中古云纽虞韵合口三等平声 jiu。逾,《广韵平虞》羊朱切,上古余纽侯部 xiwo/中古余纽虞韵合口三等平声 jiu。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一为鱼部,一为侯部;主元音不同,一为-a,一为-o;上古声纽也不同,一为匣纽 x-,一为余纽 h-。此条还说明,中古喻三(云纽)上古可能是匣母,上古匣母与余母音值不同,而中古云纽(喻三)或这里的中古余纽(喻四)音值构拟同为 j-,从而形成了重纽。

(3) 麌韵喉音[羽/庾] 羽,《广韵上麌》王矩切,上古匣纽鱼部 xiwa/中古云纽麌韵合口三等上声 jiu。庾,《广韵上麌》以主切,上古余纽侯部 xiwo/中古余纽麌韵合口三等上声 jiu。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

条件及相关原理的说明同(2)。

(4) 遇韵喉音[芋/裕] 芋,《广韵去遇》王遇切,上古匣纽鱼部 ɣiwa/中古云纽遇韵合口三等去声 jiu。裕,《广韵去遇》羊戎切,上古余纽侯部 ʎiwo/中古余纽遇韵合口三等去声 jiu。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及相关原理的说明同(2)。

1.6 祭韵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祭(霁)韵(开口)——唇音×,牙音獠/计、憩/契、剿/诣,喉音×。应该指出的是,能在韵图上对祭(霁)韵指称,就是因为霁韵与祭韵同用,戴震的考定也如此,从实际语音看,霁韵与祭韵同用特多,几乎可合成一韵。^①从韵图上指认祭(霁)重纽,颇可见重纽之一端中古同音确是实际语音(或是方言的录入)的反映。计3例。

1.6.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2例(其中有2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另有1例纯为介音不同而重纽,见§2.2.1。

40[獠 zhì/计] 獠:《广韵去祭》居例切,上古见纽月部 kiāt/中古见纽祭韵开口三等去声 kiei。计,《广韵去霁》古诣切,上古见纽质部 kiēt/中古见纽霁韵开口四等去声 kiei。从构拟的音值看,二字中古并不同音,不能构成重纽。但因祭、霁同用,实际读音“祭开三去”与“霁开四去”已近同,故设中古音构拟 kiei≈kiei,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月部和质部的不同,主元音复元音不同,一为-āt,一为-ēt;介音不同,一为-ɿ,一为-i;但因中古已视两介音同,故上古介音之别亦可从略。

42[剿/诣] 剿:《广韵去祭》牛例切,上古疑纽月部 ɳiāt/中古疑纽祭韵开口三等去声 ɳiei。诣,《广韵去霁》五计切,上古疑纽质部 ɳiēt/中

① 李荣《隋韵谱》:“三等祭韵独用、四等霁韵独用各五例,祭、霁同用共三十一例。除霁韵外,祭韵和其他韵同用例未见。”见李荣《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页。鲍明炜《唐代诗文用韵研究》载:霁独用9例,祭独用16例。霁、祭同用37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古疑纽霁韵开口四等去声 ηiei 。从构拟的音值看,二字中古并不同音,不能构成重纽。但实际读音“祭开三去”与“霁开四去”已近同,故设中古音构拟 $\etaiei \approx \etaiei$,则重出的音理条件同第 40 例。

1.7 祭韵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祭(霁)韵(合口)——唇音 \times ,牙音别/桂,喉音缘/噤。此外,原理的有关说明同 1.6。计 2 例。

1.7.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 1 例(其中有 1 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和韵尾不同),1 例不能构成重纽,存此。

43[别/桂] 别《广韵去祭》居卫切,上古见纽月部 $kīwāt$ /中古见纽祭韵合口三等去声 $kīwei$ 。桂,《广韵去霁》古惠切,上古见纽支部 $kiwe$ /中古见纽霁韵合口四等去声 $kiwei$ 。从构拟的音值看,二字中古并不同音,不能构成重纽。但从实际读音看,“祭合三去”与“霁合四去”已近同,故设中古音构拟 $kīwei \approx kiwei$,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月部和支部的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 $-āt$,一为 $-e$;介音不同,一为 $-i$,一为 $-i$;韵尾的情况不同,一为有韵尾 $-t$,一为无韵尾。

原 44—(0)[缘 $huì$ /噤] 缘《广韵去祭》呼吠切,上古晓纽月部 $xīwāt$ /中古晓纽废韵合口三等去声 $xīwēi$ 。噤,《广韵去霁》呼惠切,上古晓纽月部 $xiwāt$ /中古晓纽霁韵合口四等去声 $xiwei$ 。因废韵独用,霁韵不与废韵同用,故二字中古并不同音,不能构成重纽。杨军《韵镜校笺》第十四图第 44 条认为“缘”当删,无有重纽。

1.7.2 以上 40、42、43 例是祭韵开合(霁韵开合)的重纽,是以实际语音霁同用于祭为预设前提的,从而取消了两韵中古构拟的区别。中古同音但又重出,表明上古的不同,有上古月部与质部的不同(40、42 例),月部与支部的不同(43 例),主元音不同还含介音的不同(40、42、43 例),主元音不同还含韵尾的不同(43 例)。重出的条件是较为复杂的。

1.8 真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臻)真韵(諄、臻同用)

(开口)——唇音彬/宾、贫/频、珉/民,牙音×,喉音瞽/因、囡/龔;轸韵(开口)——唇音愍/泯,牙音叁/紧,喉音隄/引;震韵(开口)——唇音×,牙音抃/吻、鼓/蠓,喉音×;(栳)质韵(开口)——唇音笔/必、弼/郈、密/蜜,牙音暨/吉、姑/估,喉音乙/一、肸/馭、颺/逸。从韵图上指认(臻)真韵重纽,同指认祭(霽)重纽一样,颇可见重纽确是实际语音的反映。韵图之所以出现“‘(臻)真韵’共排说重纽”的情况,是因真韵可与諄、臻同用,戴震考定同此。计 18 例。

1.8.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 16 例(其中有 6 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1 例涉及上古韵尾不同,2 例涉及上古声纽不同)。另有 1 例可移入上古纯介音不同而重纽,见 § 2.2.2。1 例移入上古声纽和介音不同而重纽,见 § 3.2.3。

45[彬/宾] 彬,《广韵平真》府巾切,上古帮纽文部 pĭən/中古帮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pĭěn。宾,《广韵平真》必邻切,上古帮纽真部 pĭen/中古帮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pĭěn。构成重纽的原因是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文部和真部的不同,韵部音值不同,一为-ən,一为-en,即主元音不同。其理正是中古真韵(赅上去)半在上古的真部,半在上古的文部;发展到中古,真韵字既可能是上古真部演变而来,也可能是上古文部字演变而来,上古真部和文部相近,很难区分。上古真、文部的演变造成了重纽。

46[贫/频] 贫,《广韵平真》符巾切,上古並纽文部 bĭən/中古並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bĭěn。频,《广韵平真》符真切,上古並纽真部 bĭen/中古並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bĭěn。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及相关说明同 45 例。

47[珉/民] 珉,《广韵平真》武巾切,上古明纽文部 mĭən/中古明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mĭěn。民,《广韵平真》弥邻切,上古明纽真部 mĭen/中古明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mĭěn。二字中古同音,同 45 例。

48[瞽/因] 瞽,《广韵平真》於巾切,上古影纽文部 ĩən/中古影

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iĕn。因,《广韵平真》於真切,上古影纽真部 iĕn/中古影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iĕn。二字中古同音,同 45 例。

50[愍/泯] 愍,《广韵上轸》眉殒切,上古明纽文部 mĭĕn/中古明纽轸韵开口三等上声 mĭĕn。泯,《广韵上轸》武尽切,上古明纽真部 mĭĕn/中古明纽轸韵开口三等上声 mĭĕn。二字中古同音,同 45 例。

51[𩇛/紧] 𩇛,《广韵上隐》居隐切,上古见纽蒸部 kĭĕng/中古见纽隐韵开口三等上声 kĭĕn。紧,《广韵上轸》居忍切,上古见纽真部 kĭĕn/中古见纽轸韵开口三等上声 kĭĕn。因中古音构拟 kĭĕn≈kĭĕn,故可按韵图构成重组,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不同,一为蒸部,一为真部,音值一为-əng,一为-en。主元音和韵尾都不同。因中古一为隐韵,一为轸韵,可说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杨军《韵图校笺》第十七图第 48 条以“𩇛”字位当空缺,则无重组可言,可参,但从构拟看,两字中古音近,可构成重组。

52[隕/引] 隕,《广韵上轸》于敏切,上古匣纽文部 yiwĕn/中古云纽轸韵合口三等上声 jĭwĕn。引,《广韵上轸》余忍切,上古余纽真部 ĭĭĕn/中古余纽轸韵开口三等上声 jĭĕn。因中古音构拟 jĭwĕn≈jĭĕn,故可按韵图构成重组,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一为文部,一为真部,音值一为-ən,一为-en,亦即主元音不同。上古声纽不同,一为匣纽 y-,介音也有不同,一为-iw,一为-i,综合之为上古主元音和声纽都不同。

54[𪔐/螻] 𪔐,《广韵去震》去刃切,上古溪纽文部 k'ĭĕn/中古溪纽震韵开口三等去声 k'ĭĕn。螻,《广韵去震》羌印切,上古溪纽真部 k'ĭĕn/中古溪纽震韵开口三等去声 k'ĭĕn。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及相关说明同 45 例。

55[笔/必] 笔,《广韵入质》鄙密切,上古帮纽物部 piĕt/中古帮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pĭĕt。必,《广韵入质》卑吉切,上古帮纽质部 pĭĕt/中古帮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pĭĕt。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

韵部不同,一为物部,一为质部,音值一为-ǝt,一为-ět。介音也有不同,一为-i,一为-ĩ。

56[弼/邲] 弼,《广韵入质》房密切,上古並纽物部 bĩǝt/中古並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bĩět。邲,《广韵入质》毗必切,上古並纽质部 bĩět/中古並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bĩět。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一为物部,一为质部,音值一为-ǝt,一为-ět。

57[密/蜜] 密,《广韵入质》美毕切,余迺永定稿本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作美笔反,上古明纽物部 miǝt/中古明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miět。蜜,《广韵入质》弥毕切,上古明纽质部 miět/中古明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miět。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同 55 例。

58[暨/吉] 暨,《广韵入质》居乙切,余迺永校注定本作“又,居乞切”,上古见纽物部 kĩǝt/中古见纽迄韵开口三等入声 kĩət。吉,《广韵入质》居质切,上古见纽质部 kĩět/中古见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kĩět。因中古音构拟 kĩət≈kĩět,故可按韵图构成重组,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一为物部(-ǝt),一为质部(-ět)。因中古一为迄韵,一为质韵,可说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此例中古音的差别较上古音的差别小些,因一为高位央元音[ə],一为高位元音[e]的短音。而上古一为高位央元音[ə]的短音,一为高位元音[e]的短音。而从方音的读法看,中古居乞切、居乙切与居质切的读音几无区别(反切下字的韵在方言中多同),这也可知二字上古读音有明显差别,而中古读音差别不大。二字中古音尤近,可成重组字。

59[媿/佶] 媿,《广韵入质》巨乙切,上古群纽质部 gĩět/中古群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gĩět。佶与媿为同一小韵字,按《广韵》不能构成重组。《韵镜》列为重组是按宋代实际读音而为之的。《集韵入质》其吉切,上古群纽质部 gĩět/中古群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gĩět。其吉切与巨乙切的中上古音值均相同,媿、佶二字中古同音,上古也同音,缺乏重出的条件,不能构成重组。但杨军等诸家均肯定《韵镜》列二字为重组不

误。现将“佶”按重纽四等字构拟,则上古和中古均为 *giɛt*,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主元音不同,音值一为 *-ɛt*,一为 *-et*。介音也有不同,一为 *-i*,一为 *-i*。

60[乙/一] 乙,《广韵入质》於笔切,上古影纽质部 *ĩɛt*/中古影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ĩɛt*。一,《广韵入质》於悉切,上古影纽质部 *ĩɛt*/中古影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ĩɛt*。二字中古同音,构成重纽。上古音构拟亦同,重出无据。按高本汉《汉文典》构拟(p. 219、p. 171),二字中古皆为 *ʔiɛt*,上古“乙”为 *ʔiæ̯t*，“一”为 *ʔiɛt*,重出条件为上古主元音不同,一为 *-æ*,一为 *-ɛ*。

61[肸/𪔐 xī] 肸,《广韵入质》義乙切,上古晓纽物部 *xiɛt*/中古晓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xĩɛt*。𪔐,《广韵入质》许吉切,上古晓纽质部 *xĩɛt*/中古晓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xĩɛt*。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同 55 例。

62[颺 yù/逸] 颺,《广韵入质》于笔切,上古匣纽物部 *xiɛt*/中古云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jĩɛt*。逸,《广韵入质》夷质切,上古余纽质部 *ʎĩɛt*/中古余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 *jĩɛt*。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匣纽 *ɣ-*,一为余纽 *ʎ-*,韵部不同,一为物部,一为质部,音值一为 *-ɔt*,一为 *-ɛt*。介音也有不同,一为 *-i*,一为 *-i*,综合之为上古主元音、介音和声纽都不同。

1.9 淳韵类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淳韵(合口)——唇音×,牙音麤麤/均,喉音贊/𪔐,筠/匀;准韵(合口)——唇音×,牙音×,喉音×;稔韵(合口)——唇音×,牙音×,喉音×;术韵(合口)——唇音×,牙音屈/趨,喉音×。因真、淳韵同用,故也可视为真韵类的合口。计 4 例。

1.9.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 1 例(其中有 1 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另有 2 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纽,见 § 3.2.4。1 例不能构成重纽,存此处。

63[麤麤/均] 麤,《广韵平真》居筠切,上古见纽文部 *kiwən*/中古

见纽真韵合口三等平声 kiwēn。均,《广韵平諄》居匀切,上古见纽真部 kīwen/中古见纽諄韵合口三等平声 kīuēn。因中古音构拟 kiwēn≈kīuēn,且中古真、諄本来就同用,故可按韵图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是上古文部和真部的不同,一为-ən,一为-en。介音也不同,一为-iw,一为-īw。因中古一为真韵,一为諄韵,可说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此例上古真、文分立,中古真、諄同用即真、文不分而成重组例。此外,有下例:

原 64—(0)[贇 yūn/霰 yūn] 贇,《广韵平(真)諄》於伦切,上古影纽文部 iwən/中古影纽諄韵合口三等平声 īuēn。霰,在《广韵平(真)諄》与贇为同一小韵字,两者不能构成重组,《韵镜》有误。杨军《韵镜校笺》第十八图第 16 条“霰”字位校作当空位无字,无重组可言。

1. 10 仙(先,可与仙同用)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仙先韵(开口)——唇音×,牙音甄/坚、愆/牵、妍/研,喉音焉/烟、囁 xiān/袄;獮铎韵(开口)——唇音辨 biàn/编、辨/辨、免/沔,牙音蹇/茧、齟 yǎn/齟 yǎn,喉音舛 yǎn/螭 yǎn;线霰韵(开口)——唇音×,牙音彦/砚,喉音軫 yǎn/宴;薛屑韵(开口)——唇音罄/警、弥/别、罄,牙音揭/结、竭 qiè/猓 qiè、孽/齧,喉音焮 yè/嚏、契 xiè/沓 xiè。计 20 例。

1. 10. 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组者 11 例(其中有 9 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另有 8 例移入上古介音不同而重组,见 § 2. 2. 3, 1 例不能构成重组,存此。

67[甄/坚] 甄,《广韵平仙》居延切,上古见纽元部 kīan/中古见纽仙韵开口三等平声 kīen。坚,《广韵平先》古贤切,上古见纽真部 kien/中古见纽先韵开口四等平声 kien。因中古仙先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īen≈kien,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元部和真部的不同,一为-an,一为-en。介音也不同,一为-ī,一为-i。因中古一列在仙韵,一为先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68[愆/牵] 愆,《广韵平仙》去乾切,上古溪纽元部 kīan/中古溪

纽仙韵开口三等平声 $k'i\epsilon n$ 。牵,《广韵平先》苦坚切,上古溪纽真部 $k'ien$ /中古溪纽先韵开口四等平声 $k'ien$ 。因中古仙先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i\epsilon n \approx k'ien$ 。重出的条件和有关说明同 67。此外,有下例:

原 69—(0)[妍/研] 妍、研同在《广韵平先》五坚切,不能构成重组,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三图第 16 条以妍、研二字有一空缺。

70[焉/煙] 焉,《广韵平仙》於乾切,上古影纽元部 $i\epsilon n$ /中古影纽仙韵开口三等平声 $i\epsilon n$ 。煙,《广韵平先》乌前切,上古影纽真部 ien /中古影纽先韵开口四等平声 ien 。因中古仙先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i\epsilon n \approx ien$ 。同 67。

71[嘯/xiān/袂] 嘯,《广韵平仙》许延切,上古晓纽元部 $x\dot{i}an$ /中古晓纽仙韵开口三等平声 $x\dot{i}en$ 。袂,《广韵平先》呼烟切,上古晓纽真部 $xien$ /中古晓纽先韵开口四等平声 $xien$ 。因中古仙先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x\dot{i}\epsilon n \approx xien$ 。同 67。

72[辩/biàn/编] 辩,《广韵上獮》符蹇切,上古並纽元部 $b\dot{i}an$ /中古並纽獮韵开口三等上声 $b\dot{i}en$ 。编、扁,《广韵上铎》方典切,上古帮纽真部 $pien$ /中古帮纽铎韵开口四等上声 $pien$ 。因中古獮、铎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b\dot{i}\epsilon n \approx pien$ 。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元部和真部的不同,一为 $-an$,一为 $-en$ 。介音也不同,一为 $-i$,一为 $-i$ 。上古声纽也不同,一为 b ,一为 p ,因中古一列在獮韵,一为铎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74[免/沔] 免,《广韵上獮》亡辨切,上古明纽元部 $m\dot{i}an$ /中古明纽獮韵开口三等上声 $m\dot{i}en$ 。沔,永禄本《韵镜》作沔字,《广韵上铎》无此字,有丐、眇字,二字当合此位,但考虑到尽管铎、獮同用,同一獮韵目下更好,且考虑到字形相近,以沔为沔之误字更好。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三图第 58 条校作沔。沔,《广韵上獮》弥充切,上古明纽真部 $m\dot{i}en$ /中古明纽獮韵开口三等上声 $m\dot{i}en$ 。免、沔二字中古完全同音,更合乎重组多为中古同音字之理,重出二处的条件是上古元部和真部的不同,一为 $-an$,一为 $-en$ 。免、沔二字同在獮韵,是同一韵目下不同小韵

的重纽。

77[𦏧 yǎn/𧈧 yǎn] 𦏧《广韵上獮》於寔切,上古影纽元部 $\text{ian}/$ 中古影纽獮韵开口三等上声 ien 。𧈧,《广韵上铎》於殄切,上古影纽文部 $\text{ian}/$ 中古影纽铎韵开口四等上声 ien 。因中古獮、铎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ien} \approx \text{ien}$,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元部和文部的不同,一为 $-\text{an}$,一为 $-\text{en}$ 。因中古一列在獮韵,一为铎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80[𧈧/𧈧/𧈧] 𧈧《广韵入薛》并列切,上古帮纽月部 $\text{piät}/$ 中古帮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piet 。𧈧,此字《韵镜》原作𧈧,今据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三图第 118 条改。𧈧,《广韵入屑》方结切,上古帮纽质部 $\text{piët}/$ 中古帮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piet 。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piët} \approx \text{piet}$,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月部和质部的不同,一为 $-\text{ät}$,一为 $-\text{ët}$ 。介音也不同,一为 $-\text{i}$,一为 $-\text{i}$ 。因中古一列在薛韵,一为屑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82[揭/结] 揭《广韵入薛》丘竭切,上古溪纽月部 $\text{kïät}/$ 中古溪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kïet 。结,《广韵入屑》古屑切,上古见纽质部 $\text{kiët}/$ 中古见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kiet 。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text{kïet} \approx \text{kiet}$,重出的条件同 80。

85[焞 yè/噎] 焞,《广韵入薛》於列切,上古影纽月部 $\text{ïät}/$ 中古影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ïet 。噎,《广韵入屑》乌结切,上古影纽质部 $\text{iët}/$ 中古影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iet 。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text{iët} \approx \text{iet}$ 。同 80。

86[𧈧 xiè/𧈧 xiè] 𧈧,《广韵入薛》许列切,上古晓纽月部 $\text{xïät}/$ 中古晓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xïet 。𧈧,《广韵入屑》虎结切,上古晓纽质部 $\text{xiët}/$ 中古晓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xiet 。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xïet} \approx \text{xiet}$ 。同 80。

1. 11 仙(先,可与仙同用)韵类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仙先韵(合口)——唇音 𧈧,牙音 𧈧 $\text{juān}/$ 涓,喉音 𧈧 $\text{xuān}/$ 僊;獮铎韵(合

口)——唇音×,牙音卷/𪔐,喉音宛/蛭;线霰韵(合口)——唇音×,牙音眷/睆,喉音×;薛屑韵(合口)——唇音×,牙音蹶/玦,喉音𪔐/抉、旻/血。计8例。

1.11.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组者2例(其中2例均涉及上古介音不同,其中1例还涉及上古声纽不同)。另有5例移入上古介音不同而重组,见§2.2.4。1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组,见§3.2.5。

87[勑 juān/涓] 勑,《广韵平仙》居员切,上古见纽文部 *kīwən*/中古见纽仙韵合口三等平声 *kīwən*。涓,《广韵平先》古玄切,上古见纽元部 *kiwan*/中古见纽先韵合口四等平声 *kiwen*。因中古仙、先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īwən*≈*kiwen*,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文部和元部的不同,一为-ən,一为-an,介音也不同,一为-īw,一为-iw。因中古一列在仙韵,一为先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88[嫫 xuān/𪔐] 嫫,《广韵平仙》於缘切,上古影纽元部 *īwan*/中古影纽仙韵合口三等平声 *īwən*。𪔐,《广韵平仙》许缘切,上古晓纽元部 *xīwan*/中古晓纽先韵合口三等平声 *xīwən*。中古音韵母相同,构拟同为 *īwən*,声母虽中古影、晓同为喉音,是中古音近而异构成的重组。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影纽和晓纽的不同,一为 ϕ ,一为 x ,是同一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按:《广韵》重组的说法,该二字不误,为中古音近有异而重组例。此外,则有校改此二字为“嫫 *yuān*/𪔐 *xuān*”之说。可参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四图第24、31条。嫫,《广韵平仙》於缘切,上古影纽元部 *īwan*/中古影纽仙韵合口三等平声 *īwən*。𪔐,《广韵平先》火玄切,上古晓纽真部 *xiwen*/中古晓纽先韵合口四等平声 *xiwen*。因中古仙、先同用,故可知中古音韵母相近,为 *īwən*≈*iwen*,又声母影纽和晓纽音近而异,为中古音近有异而重组例。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元部和真部的不同,一为-an,一为-en,主元音不同。介音也不同,一为-īw,一为-iw。此外重出的条件还因上古声纽的不同,一为 ϕ ,一为 x 。

因中古一列在仙韵,一为先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从重纽看,本条目可不必改字,改后中古声纽仍不相同,仍不能构成中古音相同之重纽。

1.12 宵(萧,可与宵同用)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宵萧韵(开口)——唇音×,牙音骄/骁、蹻/鄣 qiāo、尧/峽,喉音妖/么、囂/曉 xiāo;小篠韵(开口)——唇音×,牙音矫/皎,喉音𪔐/查;笑啸韵(开口)——唇音×,牙音骄/叫,喉音×。计8例。

1.12.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1例(其中1例涉及上古介音和上古声纽不同)。另有5例移入上古介音不同而重纽,见§2.2.5;另有1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纽,见§3.2.6;1例不构成重纽,存此。

原97—(0)[尧/峽] 尧、峽,《广韵平萧》同为五聊切。不能构成重纽。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五图第22、31条认为《韵镜》此条有误,当是“□/尧”,“□”表空缺无字。

102[轿/叫] 轿,《韵镜》作骄,误,当校。轿,《广韵去笑》渠庙切,上古群纽宵部 g_īau/中古群纽笑韵开口三去声 g_īeu。叫,《广韵去啸》古弔切,上古见纽幽部 kiəu/中古见纽啸韵开口四等去声 kieu。因中古啸、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g_īeu≈kieu,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主元音不同,一为-a,一为-ə;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ī,一为-i;上古声纽的不同,一为-g-,一为-k-。

1.13 庚清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庚清韵(开口)——唇音兵/并、明/名,牙音卿/轻、擎/颈,喉音英/婴;梗静韵(开口)——唇音丙/饼、皿/陌,牙音×,喉音影/瘳;敬映韵(劲韵,开口)——唇音柄/摒、病/僻、命/詔,牙音敬/劲,喉音×;昔韵唇音樛 bó/擗 bò。计13例。

1.13.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12例(其中9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另有1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纽,见§3.2.5。

103[兵/并] 兵,《广韵平庚》甫明切,上古帮纽阳部 $pi_{aŋ}$ /中古帮纽庚韵开口三等平声 $p\check{i}e_{ŋ}$ 。并,《广韵平清》府盈切,上古帮纽耕部 $p\check{i}e_{ŋ}$ /中古帮纽清韵开口三等平声 $p\check{i}e_{ŋ}$ 。因中古庚与耕、清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p\check{i}e_{ŋ} \approx p\check{i}e_{ŋ}$,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主元音不同,一为-a,一为-e,上古介音也不同,一为-i,一为- \check{i} 。

104[明/名] 明,《广韵平庚》武兵切,上古明纽阳部 $mia_{ŋ}$ /中古明纽庚韵开口三平声 $m\check{i}e_{ŋ}$ 。名,《广韵平清》武并切,上古明纽耕部 $m\check{i}e_{ŋ}$ /中古明纽清韵开口三等平声 $m\check{i}e_{ŋ}$ 。因中古庚与耕、清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m\check{i}e_{ŋ} \approx m\check{i}e_{ŋ}$ 。重出的条件同 103。

105[卿/轻] 卿,《广韵平庚》去京切,上古溪纽阳部 $k'ia_{ŋ}$ /中古溪纽庚韵开口三平声 $k'\check{i}e_{ŋ}$ 。“卿”非清韵字,但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三图 12 条校此字不误,当从。轻,《广韵平清》去盈切,上古溪纽耕部 $k'\check{i}e_{ŋ}$ /中古溪纽清韵开口三等平声 $k'\check{i}e_{ŋ}$ 。因中古庚与耕、清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check{i}e_{ŋ} \approx k'\check{i}e_{ŋ}$,可视此条为重纽。同 103。

107[英/婴] 英,《广韵平庚》於惊切,上古影纽阳部 $i_{aŋ}$ /中古影纽庚韵开口三平声 $i_{eŋ}$ 。婴,《广韵平清》於盈切,上古影纽耕部 $i_{eŋ}$ /中古影纽清韵开口三等平声 $i_{eŋ}$ 。因中古庚与耕、清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i_{eŋ} \approx i_{eŋ}$,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阳部和耕部的主元音不同,一为-a,一为-e。

108[丙/饼] 丙《广韵上梗》兵永切,上古帮纽阳部 $p\check{i}a_{ŋ}$ /中古帮纽梗韵开口三上声 $p\check{i}e_{ŋ}$ 。饼,《广韵上静》必郢切,上古帮纽耕部 $p\check{i}e_{ŋ}$ /中古帮纽静韵开口三等上声 $p\check{i}e_{ŋ}$ 。因中古梗与耿、静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p\check{i}e_{ŋ} \approx p\check{i}e_{ŋ}$,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同 107。

109[皿/眊 míng] 皿《广韵上梗》武永切,上古明纽阳部 $m\check{i}a_{ŋ}$ /中古明纽梗韵开口三上声 $m\check{i}e_{ŋ}$ 。眊,《广韵上静》亡井切,上古明纽耕部 $m\check{i}e_{ŋ}$ /中古明纽静韵开口三等上声 $m\check{i}e_{ŋ}$ 。因中古梗与耿、静同用,戴震

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m\ddot{r}e\eta \approx m\ddot{i}e\eta$, 可视此条为重纽。同 107。

110[影/癭] 影,《广韵上梗》於丙切,上古影纽阳部 $\dot{r}a\eta$ /中古影纽梗韵开口三上声 $\dot{r}e\eta$ 。癭,《广韵上静》於郢切,上古影纽耕部 $\dot{r}e\eta$ /中古影纽静韵开口三等上声 $\dot{r}e\eta$ 。因中古梗与耿、静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dot{r}e\eta \approx \dot{r}e\eta$, 可视此条为重纽。同 107。

111[柄/摒] 柄,《广韵去映(敬)》陂病切,上古帮纽阳部 $pia\eta$ /中古帮纽映韵开口三去声 $p\ddot{r}e\eta$ 。摒,《韵镜》原作拊,据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三图 60 条校改。摒,《广韵去劲》界政切,上古帮纽耕部 $p\ddot{r}e\eta$ /中古帮纽劲韵开口三等声去 $p\ddot{r}e\eta$ 。因中古映与诤、劲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p\ddot{r}e\eta \approx p\ddot{r}e\eta$, 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同 103。

112[病/僻] 病,《广韵去映(敬)》皮命切,上古並纽阳部 $bia\eta$ /中古並纽映韵开口三去声 $b\ddot{r}e\eta$ 。僻,《广韵去劲》防正切,上古並纽耕部 $b\ddot{r}e\eta$ /中古並纽劲韵开口三等去声 $b\ddot{r}e\eta$ 。因中古映与诤、劲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b\ddot{r}e\eta \approx b\ddot{r}e\eta$, 可视此条为重纽。同 103。

113[命/詔 mìng] 命,《广韵去映(敬)》眉病切,上古明纽阳部 $mia\eta$ /中古明纽映韵开口三去声 $m\ddot{r}e\eta$ 。詔,《广韵去劲》弥正切,上古明纽耕部 $m\ddot{r}e\eta$ /中古明纽劲韵开口三等声去 $m\ddot{r}e\eta$ 。因中古映与诤、劲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m\ddot{r}e\eta \approx m\ddot{r}e\eta$, 可视此条为重纽。同 103。

114[敬/劲] 敬,《广韵去映(敬)》居庆切,上古见纽阳部 $kia\eta$ /中古见纽映韵开口三去声 $k\ddot{r}e\eta$ 。劲,《广韵去劲》居正切,上古见纽耕部 $k\ddot{r}e\eta$ /中古见纽劲韵开口三等声去 $k\ddot{r}e\eta$ 。因中古映与诤、劲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ddot{r}e\eta \approx k\ddot{r}e\eta$, 可视此条为重纽。同 103。

115[糲 bó/擗 bò] 糲,《广韵入陌》弼戟切,上古並纽铎部 $biäk$ /中古並纽陌韵开口三入声 $b\ddot{r}ek$ 。擗,《广韵入昔》房益切,上古並纽锡部 $b\ddot{r}ek$ /中古並纽昔韵开口三等入声 $b\ddot{r}ek$ 。因中古陌与麦、昔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b\ddot{r}ek \approx b\ddot{r}ek$, 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铎部和锡部的主元音不同,一为-ǎ,一为-ě,介音也不同,一

为-i, 一为-ī。

1.14 庚清韵类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 庚清韵(合口)——唇音×, 牙音×, 喉音兄/𪔐、营/荣; 梗静韵(合口)——唇音×, 牙音憬/顷, 喉音永/颖; 敬劲韵(合口)——唇音×, 牙音×, 喉音×; 陌昔韵唇音×, 牙音×, 喉音×。计4例。

1.14.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 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纽者2例(其中1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 2例涉及上古声纽不同)另有1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纽, 见§3.2.8。

116[兄/𪔐 xiōng]兄, 《广韵平庚》许荣切, 上古晓纽阳部 xiwaŋ/中古晓纽庚韵合口三平声 xiweŋ。𪔐, 《广韵平清》火营切, 上古晓纽耕部 xiweŋ/中古晓纽清韵合口三等平声 xiweŋ。因中古庚与耕、清同用, 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xiweŋ≈xiweŋ, 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阳部和耕部的主元音不同, 一为-a, 一为-e。介音也不同, 一为-i, 一为-ī。

118[憬/顷] 憬, 《广韵上梗》俱永切, 上古见纽阳部 kiwaŋ/中古见纽梗韵合口三上声 kiweŋ。顷, 《广韵上静》去颖切, 上古溪纽耕部 kiweŋ/中古溪纽静韵合口三等上声 kiweŋ。因中古梗与耿、静同用, 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iweŋ≈kiweŋ, 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阳部和耕部的主元音不同, 一为-a, 一为-e; 上古声纽也不同, 一为见纽 k-, 一为溪纽 k'。

119[永/颖] 永, 《广韵上梗》于憬切, 上古匣纽阳部 xiwaŋ/中古云纽梗韵合口三上声 jiweŋ。颖, 《广韵上静》余顷切, 上古余纽耕部 xiweŋ/中古余纽静韵合口三等上声 jiweŋ。因中古梗与耿、静同用, 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jiweŋ≈jiweŋ, 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阳部和耕部的主元音不同, 一为-a, 一为-e; 上古声纽也不同, 一为匣纽 x-, 一为余纽 ʎ-。

1.15 尤幽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 尤、幽韵(中古同用,

开口)——唇音不/彪、浮/滂 biāo、谋/缪,牙音鸠/缪、丘/怵 qiū、求/虬、牛/馨 yóu,喉音优/幽、休/颀 xiū、尤/由;有、黝韵(中古同用,开口)——唇音×,牙音久/纠、臼/繆 liú,喉音黝 yōu/黝、有/酉;宥、幼韵(中古同用,开口)——唇音莓/谬,牙音𪔐 qiù/蹠 qiù、旧/跣 jiù,喉音宥/狻 yòu。计 18 例。

1. 15. 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组者 9 例(其中 8 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2 例涉及上古声纽不同)另有 8 例移入上古介音不同而重组,见 § 2. 2. 6。另有 1 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组,见 § 3. 2. 9。

120[不/彪] 不,《广韵平尤》甫鸠切,上古帮纽之部 pīwə/中古帮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pīəu。彪,《广韵平幽》甫然切,上古帮纽幽部 piəu/中古帮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piəu。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pīəu ≈ piəu,能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之部与幽部的主元音不同,一为-ə,一为-əu,上古介音也不同,一为-iw,一为-i。

124[丘/怵 qiū] 丘,《广韵平尤》去鸠切,上古溪纽之部 k'īwə/中古溪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k'īəu。怵,《广韵平尤》去秋切,上古溪纽幽部 k'īəu/中古溪纽尤韵开口三等平声 k'īəu。因中古音构拟全同,故能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同 120。

126[牛/馨 yóu] 牛,《广韵平尤》语求切,上古疑纽之部 ŋīwə/中古疑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ŋīəu。馨,《广韵平幽》语切切,上古疑纽幽部 ŋiəu/中古疑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ŋiəu。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ŋīəu ≈ ŋiəu,能构成重组。同 120。

129[尤/由] 尤,《广韵平尤》羽求切,上古匣纽之部 ɣīwə/中古云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jīəu。由,《广韵平幽》以周切,上古余纽幽部 ɣīəu/中古余纽尤韵开口三等平声 jīəu。因中古音构拟全同,能构成重组。

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的主元音不同,一为-ə,一为-əu。上古的声纽也不同,一为ɣ-,一为ʎ-。

130[久/纠] 久,《广韵上有》举有切,上古见纽之部 kīwə/中古见纽有韵开口三上声 kīəu。纠,《广韵上黝》居黝切,上古见纽幽部 kiəu/中古见纽黝韵开口四等上声 kiəu。因中古声纽相同,且有、黝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īəu≈kiəu,能构成重组。同120。

134[莓/谬] 莓,《广韵去宥》亡救切,上古明纽幽部 mīəu/中古明纽宥韵开口三去声 mīəu。谬,《广韵去幼》靡幼切,上古明纽觉部 miəuk/中古明纽幼韵开口四等去声 miəu。因中古声纽相同,且有、幼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mīəu≈miəu,能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一为幽部-əu,一为觉部-əuk。介音也不同,一为-ī,一为-i。

135[𪔐/蹠] 𪔐,《广韵去宥》丘救切,上古溪纽幽部 k'īəu/中古溪纽宥韵开口三去声 k'īəu。蹠,《广韵去幼》丘谬切,上古溪纽觉部 k'īəuk/中古溪纽幼韵开口四等去声 k'īəu。因中古声纽相同,且有、幼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īəu≈k'īəu,能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同134。

136[旧/𪔐] 旧,《广韵去宥》巨救切,上古群纽之部 gīwə/中古群纽宥韵开口三去声 gīəu。𪔐,《广韵去幼》巨幼切,上古群纽幽部 giəu/中古群纽幼韵开口四等去声 giəu。因中古声纽相同,且有、幼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gīəu≈giəu,能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同120。

137[宥/狽] 宥,《广韵去宥》于救切,上古匣纽之部 ɣīwə/中古云纽宥韵开口三去声 jīəu。狽,《广韵去宥》余救切,上古余纽幽部 ʎīəu/中古余纽宥韵开口三等去声 jīəu。中古音构拟相同,能构成重组。重出的原因是上古韵部的主元音不同,一为-ə,一为-əu,介音也不同,一为-īw,一为-ī。上古声纽不同,一为匣纽 ɣ-,一为余纽 ʎ-。

1.16 侵韵类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侵韵(合口)——唇音×,牙音×,喉音音/愔;寢韵(合口)——唇音×,牙音吟 qīn/願 yǐn,喉音×;沁韵(合口)——唇音×,牙音×,喉音×;緝韵唇音×,牙音×,喉音邑/揖、煜/熠。计4例。

1.16.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组者0例。另有2例移入上古介音不同而重组,见§2.2.7,2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组,见§3.2.10。

1.17 盐添韵类开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盐、添韵(中古同用,开口)——唇音×,牙音×,喉音娑 chān/馮 xiān;琰、忝韵(中古同用,开口)——唇音×,牙音檢 liǎn/嬾 jiǎo、顛 qiǎn/歉,喉音×;艳、忝韵(中古同用,开口)——唇音×,牙音×,喉音憺 yàn/𩇛 yàn。叶、帖韵(中古同用,开口)——唇音×,牙音紉 jié/颊、痃 qiè/愜,喉音僕 xiè/挾 qiè。计7例。

1.17.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不同而成重组者1例(其中1例涉及上古介音不同),另有2例移入上古介音不同而重组,见§2.2.8。另有4例移入上古声纽不同而重组,见§3.2.11。

145[憺 yàn/𩇛 yàn] 憺,《广韵去艳》於艳切,上古影纽谈部 iām/中古影纽艳韵开口三去声 iēm。𩇛,《广韵去忝》於念切,上古影纽侵部 iām/中古影纽忝韵开口四等去声 iem。据戴震《声韵考》卷二《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艳仅与忝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iēm≈iem,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主元音不同,一为-a,一为-ə,上古介音不同,一为-i,一为-i。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1.18 严盐韵类合口。以《韵镜》的指认为例,严、盐韵(合口)——唇音×,牙音×,喉音醢/厯;俨、琰韵(宋本《广韵》同用,合口)——唇音×,牙音×,喉音淹/廛;酽、艳韵(宋本《广韵》同用,合口)——唇音×,牙音酽/验,喉音×。业、叶韵(合口)——唇音×,牙音×,喉音腌/魔、磔 dié/叶。计5例。

1. 18. 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因主元音(元音)不同而成重组者 4 例,1 例经校勘证明不能构成重组。

149[醺/愿 yān] 醺,《广韵平严》於严切,上古影纽谈部 ĩam/中古影纽严韵开口三平声 ĩem。愿,《广韵平盐》一盐切,上古影纽谈部 ĩam/中古影纽琰韵开口三等上声 ĩem。二字中古声纽同,如设中古音构拟 ĩem≈ĩem,则可构成重组,但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无据,需另作研究。如按高本汉《汉文典》提供的音系构拟,则此二字的中、上古音构拟相同。郑张尚芳《上古音系》(p. 514 左、p. 515 左)认为:醺,上古音构拟 qom;愿,开口三等重四,上古音构拟 qem,此二字重组的条件是有上古韵部元音不同。可参。

150[埤/𩇑 yǎn] 埤,《广韵上俨》於广(yǎn)切,上古影纽谈部 ĩam/中古影纽俨韵开口三上声 ĩem。𩇑,《广韵上琰》於琰切,上古影纽谈部 ĩam/中古影纽琰韵开口三等上声 ĩem。二字中古声纽同,且按宋本《广韵》俨、琰二韵同用,如设中古音构拟 ĩem≈ĩem,则可构成重组,但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无据,需另作研究。如按戴震考定琰不与俨同用,则此二字因中古音不同而不能构成重组,如按高本汉《汉文典》提供的音系构拟,则此二字的中、上古音构拟相同,同样无法解释二字重组之理。郑张尚芳《上古音系》(p. 514 左、p. 515 左)认为:埤,上古音构拟 qom?;愿,开口三等重四,上古音构拟 qem?,此二字重组的条件是有上古韵部元音不同。可参。又此条重组解释的复杂性反证戴氏考定之审。

原 151—(0)[酺/验] 据杨军《韵镜校笺》第四十图第 63、67 条校作“□/□”,无重组可言。^①

① 此条如设二字按《韵镜》构成重组,则酺,《广韵去麌》鱼欠切,上古疑纽谈部 ŋĩam/中古疑纽麌韵开口三去声 ŋĩem。验,《广韵去艳》鱼窆(biǎn)切,上古疑纽谈部 ŋĩam/中古疑纽艳韵开口三等去声 ŋĩem。二字中古声纽同,且按宋本《广韵》酺、艳二韵同用,如设中古音构拟 ŋĩem≈ŋĩem,则可构成重组,但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无据。如按戴震考定艳不与酺同用,艳只与榛同用,则此二字不能构成重组。此条解释的复杂性亦能反证戴氏考定之审。现文中按杨军校笺说为无重组。

152[腌/魔] 腌,《广韵入叶》於业切,上古影纽叶部 $\text{iap}/$ 中古影纽业韵开口三入声 iep 。魔,《广韵入叶》於叶切,上古影纽叶部 $\text{iap}/$ 中古影纽业韵开口三等入声 iep 。二字中古声纽同,如设中古音构拟 $\text{iep} \approx \text{iep}$,构成重纽,但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无据,需另作研究。如按高本汉《汉文典》提供的音系构拟,则此二字的中、上古音构拟相同。郑张尚芳《上古音系》(p. 514 左、p. 515 左)认为:腌,上古音构拟 qob ;魔,开口三等重四,上古音构拟 qeb ,此二字重纽的条件是上古韵部元音不同。可参。

153[殒/葉] 殒,《广韵入叶》余业切,上古余纽叶部 $\text{ɿiap}/$ 中古余纽业韵开口三入声 jiep 。葉,《广韵入叶》与涉切,上古余纽叶部 $\text{ɿiap}/$ 中古余纽叶韵开口三等入声 jiep 。二字中古声纽同,如设中古音构拟 $\text{jiep} \approx \text{jiep}$,则可构成重纽,但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无据,需另作研究。如按高本汉《汉文典》提供的音系构拟,则此二字的中、上古音构拟相同。郑张尚芳《上古音系》(p. 464 右)认为:殒,上古音构拟 lab ;葉,上古音构拟 leb ,此二字重纽的条件是上古韵部元音不同。可参。

1.19 以上古主元音不同为重出条件小结。

1.19.1 以上 101 例重纽以上古主元音不同为重出条件。101 例中有“主元音+介音”42 例,“主元音+介音+声纽”7 例,“主元音+声纽”6 例,“主元音+介音+韵尾”1 例,“主元音+韵尾”3 例;可见 101 例中以上古介音不同为重出条件者有 50 例,以上古声纽不同为重出条件者有 13 例,以上古韵尾不同为重出条件者有 4 例。另有 6 例不能构成重纽。记录到《广韵》在《韵镜》中被指为重纽的共 107 例。

贰 上古介音不同是重出条件之二

2.0 中古音两字音同或音近,《广韵》纯粹因上古介音不同而重出(安排在两处),形成重纽。

2.1 以上论述因上古主元音不同而形成重组时,101 个主元音例中已涉及介音不同者 50 例。

2.2 《广韵》全书纯因上古介音不同而形成的重组例释,计 32 例。

2.2.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祭韵开口 1 例:

41[憩/契] 憩:《广韵去祭》去例切,上古溪纽月部 *k'iat*/中古溪纽祭韵开口三等去声 *k'iei*。契:《广韵去霁》苦计切,上古溪纽月部 *k'iat*/中古溪纽霁韵开口四等去声 *k'iei*。从构拟的音值看,二字中古并不同音,不能构成重组。但实际读音“祭开三去”与“霁开四去”已近同,故设中古音构拟 *k'iei*≈*k'iei*,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的长短不同,一为-ĩ,一为-i,前者为短音。

2.2.2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真韵类之震韵合口 1 例:

53[揀/吮] 揀:《广韵去焮》居焮切,上古见纽文部 *kien*/中古见纽焮韵开口三等去声 *k'ien*。又揀:《集韵去稊》居覲切,上古见纽文部 *k'ien*/中古见纽震韵(稊同用)开口三等去声 *k'ien*。吮:《广韵去震》九峻切,上古见纽文部 *kiwən*/中古见纽稊韵合口三等去声 *kiuən*。现按韵图构成重组,故设中古音构拟 *k'ien*≈*kiuən*,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不同,一为-i,一为-iw。因中古一为焮韵,一为稊(震、稊同用)韵,可说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此例中古音的差别较上古音的差别大,但上古一为高位元音[ə]未引起高位半圆唇同化,一为高位元音[ə]引起高位半圆唇同化而得[-w]。而从方音的读法看,居焮切与九峻切的读音几无区别,从而可推断二字上古读音有明显差别,而中古读音差别不大。如“揀”依《集韵》,则中古 *k'ien*≈*kiuən*,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不同,一为-ĩ,一为-iw,上古读音更有明显差别。

2.2.3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仙先韵类之獮铎韵开口 3 例,线霰韵开口 2 例,并另入声薛屑韵开口 3 例:

73[辨/辩] 辨:《广韵上獮》符蹇切,上古並纽元部 *b'ian*/中古並纽獮韵开口三等上声 *b'ien*。辩,永禄本《韵镜》作辩字,《广韵上铎》无辩

字,有辨字。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三图第 57 条校作辨。辨,《广韵上铕》薄玄切,上古並纽元部 *bian*/中古並纽铕韵开口四等上声 *bien*。因中古獮、铕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b\ddot{i}en \approx bien$,重出的条件是上古辨、辨音值介音也不同,一为 $-i$,一为 $-i$ 。因中古一列在獮韵,一为铕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75[蹇/莛] 蹇,《广韵上獮》九攀切,上古见纽元部 *kĭan*/中古见纽獮韵开口三等上声 *kĭen*。莛,《广韵上铕》古典切,上古见纽元部可 *ki-an*/中古见纽铕韵开口四等上声 *kien*。因中古獮、铕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ddot{i}en \approx kien$,重出的条件同 73。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76[齷/齷] 齷,《广韵上獮》鱼蹇切,上古疑纽元部 $\eta\ddot{i}an$ /中古疑纽獮韵开口三等上声 $\eta\ddot{i}en$ 。齷,《广韵上铕》研岷切,上古疑纽元部 $\eta\ddot{i}an$ /中古疑纽铕韵开口四等上声 $\eta\ddot{i}en$ 。因中古獮、铕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eta\ddot{i}en \approx \eta\ddot{i}en$,重出的条件同 73。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78[彦/硯] 彦,《广韵去线》鱼变切,上古疑纽元部 $\eta\ddot{i}an$ /中古疑纽线韵开口三等去声 $\eta\ddot{i}en$ 。硯,《广韵去霰》吾甸切,上古疑纽元部 $\eta\ddot{i}an$ /中古疑纽霰韵开口四等去声 $\eta\ddot{i}en$ 。因中古线、霰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eta\ddot{i}en \approx \eta\ddot{i}en$,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 $-i$,一为 $-i$ 。因中古一列在线韵,一为霰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79[軀/宴] 軀,《广韵去线》於扇切,上古影纽元部 $\ddot{i}an$ /中古影纽线韵开口三等去声 $\ddot{i}en$ 。宴,《广韵去霰》於甸切,上古影纽元部 $\ddot{i}an$ /中古影纽霰韵开口四等去声 $\ddot{i}en$ 。因中古线、霰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ddot{i}en \approx \ddot{i}en$,重出的条件同 78。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81[别/𦣻] 别,《广韵入薛》皮列切,上古並纽月部 *bĭăť*/中古並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bĭet*。𦣻,《广韵入屑》蒲结切,上古並纽月部 *bĭăť*/中古並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biet*。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b\ddot{i}et \approx biet$,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 $-i$,一为 $-i$ 。因中古一列在薛韵,一为屑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83[謁 qiè/猳 qiè] 謁,《广韵入薛》丘謁切(原为丘謁切。据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改),上古溪纽月部 k'ĩǎt/中古溪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k'iet。猳,《韵镜》原作“揆”(xiè)有误,“揆”为心纽字,不可能与溪纽字构成重组,当为“猳”(qiè),据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三图第 124 条改。猳,《广韵入屑》苦结切,上古溪纽月部 k'ĩǎt/中古溪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k'iet。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iet≈k'iet,重出的条件同 81。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84[孽/齧] 孽,《广韵入薛》鱼列切,上古疑纽月部 ŋĩǎt/中古疑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ŋiet。齧,《广韵入屑》五结切,上古疑纽月部 ŋĩǎt/中古疑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ŋiet。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ŋiet≈ŋiet,重出的条件同 81。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2.2.4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仙先韵类之獮铕韵合口 1 例,线霰韵合口 1 例,声薛屑韵合口 3 例:

89[卷/𪔐] 卷,《广韵上獮》居转切,上古见纽元部 kīwan/中古见纽獮韵合口三等上声 kīwen。𪔐,《广韵上铕》姑沄切,上古见纽元部 kiwan/中古见纽铕韵合口四等上声 kiwen。因中古獮、铕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īwen≈kiwen,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ĩw,一为-iw,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91[眷/睞] 眷,《广韵去线》居倦切,上古见纽元部 kīwan/中古见纽线韵合口三等去声 kīwen。睞,《广韵上霰》古县切,上古见纽元部 kiwan/中古见纽霰韵合口四等去声 kiwen。因中古线、霰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īwen≈kiwen,重出的条件同 89。

92[蹶/𪔐] 蹶,《广韵入薛》纪劣切,上古见纽月部 kīwǎt/中古见纽薛韵合口三等入声 kīwet。𪔐,《广韵入屑》古穴切,上古见纽月部 kiwǎt/中古见纽屑韵合口四等入声 kiwet。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īwet≈kiwet,同 89。

93[𪔐/𪔐] 𪔐,《广韵入薛》乙劣切,上古影纽月部 ĩwǎt/中古影

纽薛韵合口三等入声 iwət 。挾,《广韵入屑》於决切,上古影纽月部 iwät /中古影纽屑韵合口四等入声 iwet 。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iwət} \approx \text{iwet}$,同 88。

94[旻/血] 旻,《广韵入薛》许劣切,上古晓纽月部 xīwät /中古晓纽薛韵合口三等入声 xīwet 。血,《广韵入屑》呼决切,上古晓纽月部 xiwät /中古晓纽屑韵合口四等入声 xiwet 。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xīwet} \approx \text{xiwet}$,同 89。

2.2.5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宵萧韵类之宵萧韵开口 3 例,小篠韵开口 2 例:

95[骄/晓] 骄,《广韵平宵》举乔切,上古见纽宵部 kīau /中古见纽宵韵开口三平声 kīeu 。晓,《广韵平萧》古尧切,上古见纽宵部 kiau /中古见纽萧韵开口四等平声 kieu 。因中古萧、宵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kīeu} \approx \text{kieu}$,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 -i ,一为 -i ,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98[妖/么] 妖,《广韵平宵》於乔切,上古影纽宵部 īau /中古影纽宵韵开口三平声 īeu 。么,《广韵平萧》於尧切,上古影纽宵部 iau /中古影纽萧韵开口四等平声 ieu 。因中古萧、宵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īeu} \approx \text{ieu}$,重出的条件同 95。

99[囂/曉 xīāo] 囂,《广韵平宵》许娇切,上古晓纽宵部 xīau /中古晓纽宵韵开口三平声 xīeu 。曉,《韵镜》作“晓”字,据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五图第 33 条改。曉,《广韵平萧》许么切,上古晓纽宵部 xiau /中古晓纽萧韵开口四等平声 xieu 。因中古萧、宵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xīeu} \approx \text{xieu}$,同 95。

100[矫/皎] 矫,《广韵上小》居夭切,上古见纽宵部 kīau /中古见纽小韵开口三上声 kīeu 。皎,《广韵上篠》古了切,上古见纽宵部 kiau /中古见纽篠韵开口四等上声 kieu 。因中古篠、小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text{kīeu} \approx \text{kieu}$,同 95。

101[𪔐/沓] 𪔐,《广韵上小》於兆切,上古影纽宵部 $i\dot{a}u$ /中古影纽小韵开口三上声 $i\dot{e}u$ 。沓,《广韵上篠》乌皎切,上古影纽宵部 $ia\dot{u}$ /中古影纽篠韵开口四等上声 $ie\dot{u}$ 。因中古篠、小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i\dot{e}u \approx ie\dot{u}$,同 95。

2.2.6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尤、幽韵类之尤幽韵开口 6 例,有黝韵开口 2 例。共 8 例。

121[浮/滂] 浮,《广韵平尤》缚谋切,上古並纽幽部 $b\dot{i}w\dot{a}$ /中古並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b\dot{i}e\dot{u}$ 。滂,《韵镜》原作“滂”,按杨军《韵镜校笺》第三十七图 25 条校。滂,《广韵平幽》皮彪切,上古並纽幽部 $b\dot{i}a\dot{u}$ /中古並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bi\dot{a}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b\dot{i}e\dot{u} \approx bi\dot{a}u$,能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不同,一为 $-i$,一为 $-i$,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122[谋/缪] 谋,《广韵平尤》莫浮切,上古明纽之部 $m\dot{i}w\dot{a}$ /中古明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m\dot{i}e\dot{u}$ 。缪,《广韵平幽》绸缪,武彪切,上古明纽幽部 $mi\dot{a}u$ /中古明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mi\dot{a}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m\dot{i}e\dot{u} \approx mi\dot{a}u$,能构成重组。重出的条件同 121。

123[鳩/繆] 鳩,《广韵平尤》居求切,上古见纽幽部 $k\dot{i}a\dot{u}$ /中古见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k\dot{i}e\dot{u}$ 。繆,《广韵平幽》居虬切,上古见纽幽部 $ki\dot{a}u$ /中古见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ki\dot{a}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k\dot{i}e\dot{u} \approx ki\dot{a}u$,能构成重组。同 121。

125[求/虬] 求,《广韵平尤》巨鳩切,上古群纽幽部 $g\dot{i}a\dot{u}$ /中古群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g\dot{i}e\dot{u}$ 。虬,据杨军《韵镜校笺》第三十七图 26 条校作此字。虬,《广韵平幽》渠幽切,上古群纽幽部 $gi\dot{a}u$ /中古群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gi\dot{a}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g\dot{i}e\dot{u} \approx gi\dot{a}u$,能构成重组。同 121。

127[优/幽] 优,《广韵平尤》於求切,上古影纽幽部 $i\dot{a}u$ /中古影纽

尤韵开口三平声 iəu 。幽，《广韵平幽》於虬切，上古影纽幽部 iəu /中古影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iə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iəu} \approx \text{iəu}$ ，能构成重组。同 121。

128[休/𩇑 xiū] 休，《广韵平尤》许尤切，上古晓纽幽部 x iəu /中古晓纽尤韵开口三平声 x iəu 。𩇑，《广韵平幽》香幽切，上古晓纽幽部 x iəu /中古晓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x iə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尤、幽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x iəu} \approx \text{x iəu}$ ，能构成重组。同 121。

131[臼/𩇑 liú] 臼，《广韵上有》其九切，上古群纽幽部 g iəu /中古群纽有韵开口三上声 g iəu 。𩇑《广韵上黝》渠黝切，上古群纽幽部 g iəu /中古群纽黝韵开口四等上声 g iə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有、黝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g iəu} \approx \text{g iəu}$ ，能构成重组。同 121。

132[飏 yōu /黝] 飏，《广韵上有》於柳切，上古影纽幽部 iəu /中古影纽有韵开口三上声 iəu 。黝，《广韵上黝》於虬切，上古影纽幽部 iəu /中古影纽黝韵开口四等上声 iə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有、黝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text{iəu} \approx \text{iəu}$ ，能构成重组。同 121。

2.2.7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侵韵类合口 1 例，并另入声缉韵合口 1 例：

138[音/愔] 音，《广韵平侵》於金切，上古影纽侵部 iəm /中古影纽侵韵开口三平声 iēm 。愔，《广韵平侵》挹淫切，上古影纽侵部 iəm /中古影纽侵韵开口三等平声 iēm 。中古同音。高本汉《汉文典》(p. 285) 对此二字中、上古构拟皆同音。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无据。需另作研究。郑张尚芳《上古音系》(p. 529 左) 认为：音，中古三等重三，上古音构拟有准介音-r；愔，中古三等重四，上古音构拟无准介音-r。此二字重组有上古准介音-r 有无为据，可参。

140[邑/揖] 邑，《广韵入缉》於汲切，上古影纽缉部 iəp /中古影纽缉韵开口三入声 iəp 。揖，《广韵入缉》伊入切，上古影纽缉部 iəp /中古

影纽缉韵开口三等入声 ĩəp 。中古同音。高本汉《汉文典》(p. 296、299)对此二字中、上古构拟皆同音。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需另作研究。郑张尚芳《上古音系》(p. 525 右)认为:邑,中古三等重三,上古音构拟有准介音 $-r$;揖,中古三等重四,上古音构拟无准介音 $-r$ 。此二字重组有上古准介音 $-r$ 有无为据,可参。

2.2.8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盐、添韵类之琰忝韵开口 1 例,另入声叶帖韵开口 1 例。共 2 例。

144[頼 qiǎn/歉] 頼,《广韵上琰》丘检切,上古溪纽谈部 $k'iam$ /中古溪纽琰韵开口三上声 $k'iem$ 。歉,《广韵上忝》苦簪切,上古溪纽谈部 $k'iam$ /中古溪纽忝韵开口四等上声 $k'iem$ 。据戴震《声韵考》卷二《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琰仅与忝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k'iem \approx k'iem$,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不同,一为 $-ĩ$,一为 $-i$ 。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

147[痲 qiè/愜] 痲,《韵镜》作痲,杨军《韵镜校笺》第三十九图第 122 条已校出当作痲。《广韵入叶》去涉切,上古溪纽叶部 $k'iap$ /中古溪纽叶韵开口三入声 $k'iep$ 。愜,《广韵入帖》苦协切,上古溪纽叶部 $k'iap$ /中古溪纽帖韵开口四等入声 $k'iep$ 。因中古叶、帖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k'iep \approx k'iep$,重出的条件同 144。

叁 上古声纽不同是重出条件之三

3.0 中古音两字音同或音近,《广韵》纯粹因上古声纽不同而重出(安排在两处),形成重组。

3.1 以上论述因上古主元音不同而形成重组时,101 个主元音例中已涉及声纽不同者 13 例。

3.2 《广韵》全书纯因上古声纽不同而形成的重组例释,计 18 例,其中有 8 例含上古介音不同而重出。

3.2.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支韵类合口例有:

17[为/蠡 xī] 为,《广韵平支》蕤支切,上古匣纽歌部 $\text{xīwa}/$ 中古云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jīwe ; 蠡,《广韵平支》悦吹切,上古余纽歌部 $\text{ǎiwa}/$ 中古余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jīwe 。二字中古声纽不全同,有喻纽三等、四等之别,今构拟为两字中古音同为 jīwe ,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匣纽 x- ,一为余纽 ǎ- 。

18[薦 wěi/莢 yì] 薦,《广韵上纸》韦委切,上古匣纽歌部 $\text{xīwa}/$ 中古匣纽纸韵合口三等上声 xīwe ; 莢,《广韵上纸》羊捶切,上古余纽歌部 $\text{ǎiwa}/$ 中古余纽纸韵合口三等上声 jīwe 。两字中古音近同。重出的条件同 17。

22[爲/璫 qíong] 爲,《广韵去真》于伪切,上古匣纽歌部 $\text{xīwa}/$ 中古云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jīwe ; 璫,《广韵去真》以睡切,上古余纽歌部 $\text{ǎiwa}/$ 中古余纽真韵合口三等去声 jīwe 。二字中古同音,重出的条件同 17。

3.2.2 附验证屋韵能否构成重纽。

(1) 屋韵喉音[囿/育] 囿,《广韵入屋》于六切,上古匣纽觉部 $\text{xīʂuk}/$ 中古云纽屋韵合口三等入声 jīuk ; 育,《广韵入屋》余六切,上古余纽觉部 $\text{ǎiʂuk}/$ 中古余纽屋韵合口三等入声 jīuk 。二字中古同音 jīuk ,重出的原因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匣纽 x- ,一为余纽 ǎ- 。

3.2.3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臻)真韵类开口例有:

49[囿 yún/夤 yín] 囿,《广韵平真》为赞切,上古匣纽真部 $\text{xīwen}/$ 中古云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jīwěn 。夤,《广韵平真》翼真切,上古余纽真部 $\text{ǎien}/$ 中古余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jīěn 。二字中古声纽不全同,有喻纽三等、四等之别,不完全同音,现按韵图构成重纽,故设中古音构拟 $\text{jīwěn} \approx \text{jīěn}$,则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匣纽,一为余纽,音值一为 x- ,一为 ǎ- 。介音也略有不同。一为 -iŋ ,一为 -ĩ 。

3.2.4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諄韵类(合口)例有:

65[筠/匀] 筠,《广韵平真》为贇切,上古匣纽文部 $\gamma i w \grave{a} n$ /中古云纽谆韵合口三等平声 $j i u \ddot{e} n$ 。匀,《广韵平谆》羊伦切,上古余纽文部 $\lambda i w \grave{a} n$ /中古余纽谆韵合口三等平声 $j i u \ddot{e} n$ 。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匣纽和余纽的不同,一为 γ -,一为 λ 。因中古一列在真韵,一为谆韵,真、谆同用,但仍可说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此例中古真、谆可以同用,即真、文不分而成重纽例。

66[屈/趨 jú] 屈,《广韵入物》区勿切,《韵镜》列在术韵,杨军《韵镜校笺》第十八图第 65 条校依《集韵入术》“其述切”,亦可从。按区勿切构拟,上古溪纽物部 $k' i w \ddot{a} t$ /中古溪纽物韵合口三等入声 $k' i w \grave{a} t$ 。趨,《广韵入术》居聿切,上古见纽物部 $k i w \ddot{a} t$ /中古见纽术韵合口三等入声 $k i u \ddot{e} t$ 。现按韵图构成重纽,不误,中古音构拟相近而异,可设 $k' i w \grave{a} t \approx k i u \ddot{e} t$ 。重出的条件是上古溪纽和见纽的不同,一为 k' -,一为 k 。因中古一列在物韵,一为术韵,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3.2.5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獮铕韵(合口)例有:

90[蛸/埧 juǎn] 原作[宛/蛸]宛,《广韵上阮》於阮切,上古影纽元部 $i w \grave{a} n$ /中古影纽阮韵合口三等上声 $i w \grave{e} n$ 。蛸,《广韵上獮》狂充切,有违于《韵镜》列上铕,杨军《韵镜校笺》第二十四图 59 条校依《集韵上铕》於兹切,合乎《韵镜》列影纽铕韵内。但“宛”列此不类。今校作[蛸/埧],则蛸,《广韵上獮》狂充切,为上古群纽元部 $g i \grave{a} n$ /中古群纽獮韵合口三等上声 $g i \grave{e} n$ 。埧,《广韵上铕》姑兹切,上古见纽元部 $k i w \grave{a} n$ /中古见纽铕韵合口四等上声 $k i w \grave{e} n$ 。中古獮、铕同用,群纽和见纽音近,故可构成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有异,一为群纽 g -,一为见纽 k -,上古介音也不同,一为 $-i \grave{a}$,一为 $-i w$ 。等亦不同,一为三等,一为四等。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3.2.6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宵萧韵类(开口)例有:

96[躄/鄠 qiāo] 躄,《广韵平宵》巨娇切,上古群纽宵部 $g i \grave{a} u$ /中古群纽宵韵开口三平声 $g i \ddot{e} u$ 。鄠,《广韵平萧》苦么切,上古溪纽宵部

k'iau/中古溪纽萧韵开口四等平声 k'ieu。因中古萧、宵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g\ddot{i}eu \approx k'ieu$,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的不同,一为 $g-$,一为 $k-$;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 $-i$,一为 $-i$ 。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3.2.7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庚清韵类(开口)例有:

106[擎/颈] 擎,《广韵平庚》渠京切,上古群纽耕部 $g\ddot{i}e\eta$ /中古群纽庚韵开口三平声 $g\ddot{i}e\eta$ 。颈,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三图 12 条校此字不误,当从。颈,《广韵平清》巨成切,上古群纽耕部 $g\ddot{i}e\eta$ /中古群纽清韵开口三等平声 $g\ddot{i}e\eta$ 。因中古庚与耕、清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g\ddot{i}e\eta \approx g\ddot{i}e\eta$,可视此条为重纽。因上古音同,找不到重出的原因。颈,又《广韵上静》居郢切,上古见纽耕部 $k\ddot{i}e\eta$ /中古见纽静韵开口三等上声 $k\ddot{i}e\eta$ 。因中古庚上声梗与耕上声耿、清上声静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g\ddot{i}e\eta \approx k\ddot{i}e\eta$,可视此条为上古不同声调、不同韵部的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群纽 $g-$,一为见纽 $k-$ 。

3.2.8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庚清韵类(合口)例有:

117[荣/营] 《韵镜》原作[营/荣],据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四图 6、11 条校改。荣,《广韵平庚》永兵切,上古匣纽耕部 $\gamma\ddot{i}we\eta$ /中古云纽庚韵合口三平声 $\gamma\ddot{i}we\eta$ 。营,《广韵平清》余倾切,上古余纽耕部 $\chi\ddot{i}we\eta$ /中古余纽清韵合口三等平声 $j\ddot{i}we\eta$ 。因中古庚与耕、清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gamma\ddot{i}we\eta \approx j\ddot{i}we\eta$,可视此条为重纽。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匣纽 $\gamma-$ 和余纽 $\chi-$ 的不同。

3.2.9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尤、幽韵类(开口)例有:

133[有/酉] 有,《广韵上有》云九切,上古匣纽之部 $\gamma\ddot{i}wə$ /中古云纽有韵开口三上声 $j\ddot{i}əu$ 。酉,《广韵上有》与久切,上古余纽之部 $\chi\ddot{i}wə$ /中古余纽有韵开口三等上声 $j\ddot{i}əu$ 。二字中古音喻纽三、四等有别,但构拟相同,能构成重纽。重出的原因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匣纽 $\gamma-$,一为余纽 $\chi-$ 。

3.2.10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侵寝韵类(合口),另入声缉韵

(合口)例有:

139[圪 qín/願 yǎn440] 圪,《广韵上寝》丘甚切,上古溪纽侵部 k'ĩəm/中古溪纽寝韵开口三上声 k'ĩēm。願,《广韵上寝》钦锦切,上古溪纽侵部 k'ĩəm/中古溪纽寝韵开口三等上声 k'ĩēm。中古同音。我们按高本汉《汉文典》的音系对此二字构拟,二字中、上古构拟皆同音。重出条件在上古音构拟中无据。需另作研究。郑张尚芳《上古音系》(p. 377 左、p. 378 右)认为:圪,中古三等重三,上古音构拟 khruumʔ;願,中古三等重四,上古音构拟 ŋhuumʔ。此二字重纽的条件是有上古声纽不同、准介音-r 有无为据,可参。

141[煜/熠] 煜,《广韵入缉》为立切,上古匣纽缉部 ɣĩəp/中古云纽缉韵合口三入声 jĩəp。熠,《广韵入缉》羊入切,上古余纽缉部 ʎĩəp/中古余纽缉韵合口三等入声 jĩəp。中古同音。重出条件是上古声纽的不同,一为 ɣ-,一为 ʎ-。

3.2.11 从音理上作个案的解释,盐添韵类开口例有:

142[娑 chān/讎 xiān] 娑,《广韵平盐》失廉切,上古书纽谈部 ɕĩam/中古书纽盐韵开口三平声 ɕĩem。讎,《广韵平添》许兼切,上古晓纽谈部 xiam/中古晓纽添韵开口四等平声 xiem。因中古盐、添同用,戴震考定亦此。又今方言中书纽读晓纽字甚多,即使在造字时代,也有书纽三等字从晓纽字的。^①钱大昕谓上古心、审二纽无别,而后世心、晓二纽音近,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ɕĩem ≈ xiem。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 ɕ-,一为 x-;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 -ĩ-,一为 -i-。此条如按高本汉《汉文典》提供的音系构拟,结论亦同此。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143[撿 liǎn/嬾 jiǎo] 撿,《广韵上琰》良冉切,上古来纽谈部 lĩam/中古来纽琰韵开口三上声 lĩem。嬾,《广韵上忝》兼玷切,上古见纽谈部 kiam/中古见纽忝韵开口四等上声 kiem。据戴震《声韵考》卷二

①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 年版,上册第 129 页。如“饷”字从“向”。

《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琰仅与忝同用,此例为中古音构拟不同而形成的重组,一为 $l\ddot{ie}m$,一为 $kiem$;又从“僉”之字多构拟成 $k-$ 、 $g-$,则此二字中古音构拟可能近同,即来母字读见母字。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 $l-$,一为 $k-$;上古介音不同,一为 $-i$,一为 $-i$ 。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此条还说明,如无戴震的考定,则无法证其为重组。又此处来母字读见母字,说明重组研究可拓宽我们对声转字认识。

146[𪛗 $j\ddot{ie}$ /𪛗] 𪛗,《广韵入叶》於辄切,上古影纽叶部 $\ddot{y}ap$ /中古影纽叶韵开口三入声 $\ddot{y}ep$ 。𪛗,《广韵入帖》古协切,上古见纽叶部 $kiap$ /中古见纽帖韵开口四等入声 $k\ddot{ie}p$ 。因中古叶、帖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ddot{y}ep \approx k\ddot{ie}p$,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的不同,一为 $\phi-$,一为 $k-$;上古介音的不同,一为 $-i$,一为 $-i$ 。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由此重组例可知中古和上古影纽与见纽多相通用。

147[僕 $xi\ddot{e}$ /𪛗 $qi\ddot{e}$] 僕,《广韵入叶》与涉切,上古余纽叶部 $\lambda\ddot{y}ap$ /中古余纽叶韵开口三入声 $\lambda\ddot{y}ep$ 。𪛗,《广韵入帖》苦协切,上古溪纽叶部 $k\ddot{y}ap$ /中古溪纽帖韵开口四等入声 $k\ddot{y}ep$ 。因中古叶、帖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lambda\ddot{y}ep \approx k\ddot{y}ep$,重出的条件是上古声纽不同,一为 $\lambda-$,一为 $k-$ 。介音的不同,一为 $-i$,一为 $-i$ 。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组。此重组例可知中古和上古余纽与溪纽可相通用。

肆 上古韵尾不同是重出条件之四

4.0 中古重组因上古韵尾不同而重出,一般不可能单独出现,据 §1 的研究,已有 4 例可明此,即第 28、29、43、51 条。另 §5 有 1 例。

伍 用证实法验证证明半舌半齿音能否形成重组

5.0 半舌半齿音能否构成重组,学术界的看法大体有两种,一种

认为舌音、齿音也能构成重纽,半舌、半齿音同此(董同龢 1948, 3、9 页),但它属于另一类重纽(周法高 1948, 54 页);一种认为仅唇、牙、喉三、四等能构成重纽,半舌、半齿音则不在其列。本文则认为半舌音、半齿音能构成重纽,与舌音、齿音无关,而应与唇、牙、喉三、四等能构成重纽同列,但有的又不能构成重纽,呈现出较复杂的情况,可予逐个验证。

5.1 用证实法验证祭韵类开口半舌半齿音(1 例举 1)能否构成重纽。

(5) 祭霁韵[例/丽] 例,《广韵去祭》力制切,上古来纽月部 *liāt*/中古来纽祭韵开口三等去声 *liei*。丽,《广韵去霁》郎计切,上古来纽支部 *lie*/中古来纽霁韵开口四等去声 *liei*。中古声纽相同,霁、祭同用,故可设 $liei \approx liei$,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月部-*āt*,一为支部-*e*;上古介音也不同,一为-*i*,一为-*i*。也可说韵尾的情况不同,一为有韵尾-*t*,一为无韵尾。此条说明,《韵镜》中的半舌音来纽(另有半齿音日纽)的三等和四等字是能构成重纽的,惜《广韵》平声东韵(赅上去)并入声至去声祭霁韵反映在《韵镜》上仅此一见。

5.2 《广韵》祭韵合口无成对例可供作半舌半齿音是否重纽的验证。

5.3 用证实法验证谆韵类合口舌齿音(1 例举 1)能否构成重纽。

(6) 准韵[隼 *rǒng*/蜃 *ruǎn*] 隼,《广韵上准》而尹切,上古日纽真部 *nǐwen*/中古日纽准韵合口三等上声 *ɽǐuě̃n*。蜃,《广韵上准》而允切,上古日纽文部 *nǐwən*/中古日纽准韵合口三等上声 *ɽǐuě̃n*。中古音相同,重出的条件是上古韵部不同,主元音不同,一为真部-*e*,一为文部-*ə*;上古介音也不同,一为-*iw*,一为-*iw*。此条说明,舌齿音中的半齿音日纽的三等字是能构成重纽的。

5.4 用证实法验证仙先韵类,并入声薛屑韵开口舌齿音(3 例举 3)能否构成重纽。

(7) 仙先韵[连/莲] 连,《广韵平仙》力延切,上古来纽元部 *lian*/

中古来纽仙韵开口三等平声 $li\epsilon n$ 。莲,《广韵平先》落贤切,上古来纽元部 $lian$ /中古来纽先韵开口四等平声 $lien$ 。因中古仙先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li\epsilon n \approx lien$,因上古都是元部字,从构拟上看,仅介音有别,一为 $-i$,一为 $-i$,是因上古介音不同而构成的重组。

(8) 线霰韵[癰 $li\grave{a}n$ /练] 癰,《广韵去线》连彦切,上古来纽元部 $li\grave{a}n$ /中古来纽线韵开口三等去声 $li\epsilon n$ 。练,《广韵去霰》郎甸切,上古来纽元部 $lian$ /中古来纽霰韵开口四等去声 $lien$ 。因中古线霰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li\epsilon n \approx lien$,因上古都是元部字,从构拟上看,仅介音有别,一为 $-i$,一为 $-i$,是因上古介音和等第不同而构成的重组。

(9) 薛屑韵[烈/隗 $li\grave{e}$] 烈,《广韵入薛》良薛切,上古来纽月部 $li\check{a}t$ /中古来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li\epsilon t$ 。隗,《广韵入屑》练结切,上古来纽质部 $li\check{e}t$ /中古来纽屑韵开口四等入声 $liet$ 。因中古薛屑同用,故可知中古音构拟 $li\epsilon t \approx liet$,因上古一为月部 $-at$,一为质部 $-et$,主元音不同,介音也不同,一为 $-i$,一为 $-i$,等亦不同,一为三等,一为四等,是因上古主元音、介音和等第不同而构成的重组。

由以上可知,仙先韵类,并入声薛屑韵开口半舌半齿音能构成重组,但中古差别较大,介音和等第的差别是主要的。

5.5 用证实法验证宵萧韵类开口舌齿音(3例举3)能否构成重组。

(10) [燎/聊] 燎,《韵镜》作僚,据杨军《广韵校笺》第二十五图26条校改。燎,《广韵平宵》力昭切,上古来纽宵部 $li\grave{a}u$ /中古来纽宵韵开口三平声 $li\epsilon u$ 。聊,《广韵平萧》落萧切,上古来纽幽部 $li\grave{a}u$ /中古来纽萧韵开口四等平声 $li\epsilon 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宵萧同用,可知中古音构拟 $li\epsilon u \approx li\epsilon u$,故能构成重组。上古一为宵部,主元音 $-a$,一为幽部,主元音 $-ə$ 。上古介音有别,一为 $-i$,一为 $-i$ 。是因上古主元音和介音不同而构成的重组。

(11) [僚/了] 僚,《广韵上小》力小切,上古来纽宵部 $li\grave{a}u$ /中古

来纽小韵开口三上声 $li\epsilon u$ 。了,《广韵上篠》卢鸟切,上古来纽宵部 $li\alpha u$ /中古来纽篠韵开口四等上声 $li\epsilon 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小篠同用,可知中古音构拟 $li\epsilon u \approx li\epsilon u$,故能构成重纽。上古均为宵部,但介音有别,一为 $-i$,一为 $-i$ 。是因上古介音不同而构成的重纽。

(12) [疗/𩚑] 疗,《广韵去笑》力照切,上古来纽宵部 $li\alpha u$ /中古来纽笑韵开口三去声 $li\epsilon u$ 。𩚑,《广韵去啸》力吊切,上古来纽宵部 $li\alpha u$ /中古来纽啸韵开口四等去声 $li\epsilon u$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笑、啸同用,可知中古音构拟 $li\epsilon u \approx li\epsilon u$,故能构成重纽。上古均为宵部,但介音有别,一为 $-i$,一为 $-i$ 。是因上古介音不同而构成的重纽。

由以上可知,宵萧韵类的开口半舌半齿音能构成重纽,但中古差别较大,介音和等第的差别是主要的。引起重纽的原因为上古多介音不同。

5.6 验证宵(赅上去)合口、歌(赅上去)合口、戈(赅上去)合口、麻(赅上去)开合、阳(赅上去)开合、药开合中的半舌半齿音是否重纽。检《韵镜》二十六至三十二图无例。

5.7 用证实法验证两不同用之韵清(赅上去)开口、青(赅上去)开口,並另昔、锡韵中的半舌音、半齿音三、四等,不能构成重纽。检《韵镜》三十五图共得 4 例,验证 4 例。

(0) 半舌音[𪔐/灵] 𪔐,《广韵上清》吕贞切,上古来纽耕部 $li\epsilon\eta$ /中古来纽清韵开口三等平声 $li\epsilon\eta$ 。灵,《广韵上青》郎丁切,上古来纽耕部 $li\epsilon\eta$ /中古来纽青韵开口四等平声 $li\epsilon\eta$ 。中古声纽相同,但清、青二韵不同用,中古音构拟 $li\epsilon\eta$ 不同于 $li\epsilon\eta$,故不能构成重纽。

(0) 舌齿音[领/零] 领,《广韵上静》良郢切,上古来纽耕部 $li\epsilon\eta$ /中古来纽静韵开口三等上声 $li\epsilon\eta$ 。零,《广韵上迥》力鼎切,上古来纽耕部 $li\epsilon\eta$ /中古来纽迥韵开口四等上声 $li\epsilon\eta$ 。中古声纽相同,但静、迥二韵不同用,中古音 $li\epsilon\eta$ 不同于 $li\epsilon\eta$,故不能构成重纽。

(0) 舌齿音[令/零] 令,《广韵去劲》力政切,上古来纽耕部 $li\epsilon\eta$ /

中古来纽劲韵开口三等去声 $liɛŋ$ 。零,《广韵去径》郎定切,上古来纽耕部 $liɛŋ$ /中古来纽径韵开口四等去声 $liɛŋ$ 。中古声纽相同,但劲、径二韵不同用,中古音 $liɛŋ$ 不同于 $liɛŋ$,故不能构成重组。

(0) 半舌音[霁 $zhī$ /霁 $lì$] 《韵镜》第三十五图原作[霁/霁],如依原作[霁/霁],或依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五图 88 条校作[霁/历],则同在《广韵入锡》郎击切,是同一小韵字,不能构成重组。今校作[霁/霁]。霁《广韵入昔》之石切,上古章纽铎部 $tʃǎk$ /中古章纽昔韵开口三等入声 $tʃǎk$ 。霁,《广韵入锡》郎击切,上古来纽锡部 $liɛk$ /中古来纽锡韵开口四等入声 $liɛk$ 。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一为半舌音,昔、锡二韵亦不同用,由构拟可知,中古音 $tʃǎk$ 与 $liɛk$ 不同,不能构成的重组。

由以上可知,清(赅上去)开口、青(赅上去)开口,並另昔、锡韵中的半舌音、半齿音三、四等,不能构成重组,根本原因是中古清、青二韵不同用。可见即使中古声纽相同,但韵目不同用,仍不能构成重组。半舌音、半齿音能否构成重组,与唇、牙、喉音一样,对韵目是有选择性的,不是无条件的。

5.8 用证实法验证尤、幽韵半舌音能构成重组(1 例举 1)。

(21) 半舌音尤幽[刘/鏐 $liú$] 刘,《广韵平尤》力求切,上古来纽幽部 $liəu$ /中古来纽尤韵开口三等平声 $liəu$ 。鏐,《广韵平幽》力幽切,上古来纽幽部 $liəu$ /中古来纽幽韵开口四等平声 $liəu$ 。中古声纽相同,可知中古音构拟 $liəu \approx liəu$,能构成重组。重出的原因是上古介音不同,一为 $-i$,一为 $-i$ 。

5.9 用证实法验证盐添韵类开口半舌、半齿音(5 例举 5)能否构成重组。

(22) [廉/髯 $lián$] 廉,《广韵平盐》力盐切,上古来纽谈部 $liam$ /中古来纽盐韵开口三平声 $liɛm$ 。髯,《广韵平添》勒兼切,上古来纽谈部 $liam$ /中古来纽添韵开口四等平声 $liem$ 。因中古声纽相同,且盐、添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liɛm \approx liem$,可构成重组。

重出的条件是上古介音不同，一为-i，一为-i。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23) [敛/稹 liǎn] 敛，《广韵上琰》良冉切，上古来纽谈部 liām/中古来纽琰韵开口三上声 liēm。稹，《广韵上忝》力忝切，上古来纽谈部 liām/中古来纽琰韵开口四等上声 liem。因中古声纽相同，且琰、忝韵同用，戴震考定琰仅与忝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liēm≈liem，可构成重纽。重出的条件同(22)。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0) [冉/苒] 冉、苒，同为《广韵上琰》而琰切，不能构成重纽。杨军《韵镜校笺》第三十九图第 62、70 条校作“冉/□”。

(24) [殄/稹 liàn] 殄，《广韵去艳》力殄切，上古来纽谈部 liām/中古来纽琰韵开口三去声 liēm。稹，《广韵去栺》力店切，上古来纽谈部 liām/中古来纽栺韵开口四等去声 liem。因中古声纽相同，且艳、栺韵同用，戴震考定艳仅与栺同用。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liēm≈liem，可构成重纽。重出的条件同(22)。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25) [猎/甄 liè] 猎，《广韵入叶》良涉切，上古来纽叶部 liap/中古来纽叶韵开口三入声 liēp。甄，据杨军《韵镜校笺》第三十九图第 132 条校，《广韵入帖》卢协切，上古来纽叶部 liap/中古来纽帖韵开口四等入声 liep。因中古声纽相同，且叶、帖韵同用，戴震考定亦此。故可设中古音构拟 liēp≈liep，可构成重纽。重出的条件同(22)。是跨韵目不同小韵的重纽。

5.10 用证实法验证严盐韵类合口半舌音(1 例举 1)能否构成重纽。

(0) 酆艳韵[殄 xiǎn/殄] 据杨军《韵镜校笺》第四十图第 66、73 条校作“□/□”，无重纽可言。

5.11 由以上可知，半舌音、半齿音构成重纽 13 例，因上古介音重出者 13 例，其中含主元音不同而重出者 4 例，其中含韵尾不同者 1 例，不能构成重纽者 6 例。共记录到 19 例。

陆 用证伪法或证实法检核不能形成重组例

6.0 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认为舌音、齿音也能构成重组,也就是说《广韵》所有的三、四等都能构成重组。^①我们需要加以验证,验证任何问题时既可证实,也可证伪。这里用波普(K. Popper)的证伪法(falsificationism)说之,假设“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然后对假设进行检验,只要找出一只是黑的,假设就不能成立。此外,对相关韵类的唇牙喉音并不存在重组问题,也加以一并检核之。

6.1 设《广韵》支韵开口舌音、齿音后所有的三、四等都能构成重组,但《广韵》支韵类开口齿音(9例选3,舌音无例)非重组(犹在舌齿音中找到三只黑天鹅)。

(0) [支/贗] 支,《广韵平支》章移切,上古章纽支部 tʃie/中古章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tʃie; 贗,《广韵平支》即移切,上古精纽支部 tsie/中古精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 tsie;虽然中古皆齿音,韵类、开口、等第、声调均相同(韵母相同),但声纽不同,不是重组,原因正是章组、精组皆齿音,选择性差。

(0) [侈/此] 侈,《广韵上纸》尺氏切,上古昌纽歌部 tʃia/中古昌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tʃie; 此,《广韵上纸》雌氏切,上古清纽支部 ts'ie/中古清纽纸韵开口三等上声 ts'ie。不是重组,原因同上。

(0) [翅/赐] 翅,《广韵去寘》施智切,上古书纽支部 ʃie/中古书纽寘韵开口三等去声 ʃie; 赐,《广韵去寘》斯义切,上古心纽锡部 s'iek/中古心纽寘韵开口三等去声 sie。不是重组,原因同上。

6.2 我们要问,《韵镜》排在舌音、齿音的三等、四等字为什么不能成为重组字?如前所说,重组首先是中古同音字,同音尤需声纽同。

① 参见陈广忠《韵镜通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作的介绍。

《广韵》声母的舌音有两组：舌头音端、透、定、泥，还可含半舌音来；舌上音知、彻、澄，还可含半齿音日。上古舌音只有舌头音，无舌上音，发展到中古舌音，既可能是舌头音，也可能是舌上音，有两组选择，声纽不同，就谈不上同纽同音。同理，《广韵》声母的齿音有三组：齿头音精组精、清、从、心、邪；庄组庄、初、崇、山；章组章、昌、船、书、禅、（日）。上古从齿头音和正齿音发展到中古就可能有三组的选择，声纽不同，也就说不上是重纽。而《广韵》声纽唇、牙、喉音仅一种选择，声纽同音几率高，在同韵类中形成重纽的几率极高。

6.3 用证伪说法说支韵类合口舌音（仅1例，支韵类开口无舌音例可供假设），合口齿音（4例举1），不能构成重纽。

（0）[髻 chuí/锤] 髻、锤，《广韵平支》直垂切，在同一小韵内，中、上古构拟两字全同，纯为同音字，不能构成重纽。

（0）[垂/随] 垂，《广韵平支》是为切，上古禅纽歌部 zǐwa/中古禅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zǐwe；随，《广韵平支》旬为切，上古邪纽歌部 zǐwa/中古邪纽支韵合口三等平声 zǐwe；虽然中古皆齿音，韵类、开口、等第、声调均相同（韵母相同），但声纽不同，中古不同音，不是重纽。原因正是章组禅纽、精组邪纽皆齿音，齿音范围大，选择性差。

6.4 以上我们说及《广韵》五支韵类开口、合口内部舌、齿音不能构成重纽，现验证与五支韵类相邻的一东韵、二冬韵、三钟韵、四江韵（均赅上去），并另入声韵屋、沃、烛、觉的唇牙喉音的三四等能否构成重纽。

6.4.1 验证东、董、送韵，并另屋韵唇、牙、喉音三四等字（1例举1）能否构成重纽。屋韵有字（1例举1），见3.2.2。

（0）东韵喉音[彤 róng/融] 彤、融二字《广韵平东》居戎切。纯为同音字，不能构成重纽。

6.4.2 验证冬、宋韵能否构成重纽：皆一、二等字，更无唇、牙、喉音三四等字，不能构成重纽。沃韵无字。

6.4.3 验证钟、肿、用韵唇、牙、喉音三四等字（1例举1），不能构

成重组。烛韵无字。

(0) 钟韵喉音[容/庸] 容、庸二字《广韵平钟》馥封切。纯为同音字,不能构成重组。

6.5 现验证与六脂韵类相邻的七之韵、八微韵(附去声二十废)、九鱼韵、十一模(均赅上去)唇牙喉音的三四等能否构成重组。十虞见 § 1.5。

6.5.1 检核之、止、志韵(1例举1)能否构成重组。

(0) 之韵牙音[欺/祛 qū] 欺、祛二字均《广韵平之》去其切。纯为同音字,不能构成重组。

6.5.2 检核微、尾、末韵,废韵,鱼、语、御韵,能否构成重组。此七韵无唇牙喉音的三四等字,无重组。

6.5.3 关于模韵(赅上去),均一、二等,且无唇、牙、喉音字成对,故非重组。

6.6 用证伪法说祭韵类开口舌音(3例举1),开口齿音(3例举1),不能构成重组。

(0) [滞/第] 滞,《广韵去祭》直例切,中古澄纽祭韵开口三等去声 d₁iei。第,《广韵去霁》特计切,中古定纽霁韵开口四等去声 diei。中古声纽大不同,一为舌音端系,一为舌音知系,不能构成重组。

(0) [掣/砌] 掣,《广韵去祭》尺制切,中古昌纽祭韵开口三等去声 t_ɕ'iei。砌,《广韵去霁》七计切,中古清纽霁韵开口四等去声 ts'iei。中古声纽大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不能构成重组。

6.7 《广韵》祭韵合口无成对例可供作舌音、齿音不能构成重组的验证。半舌半齿音是否重组的验证。

6.8 用证伪法说(臻)真韵类并入声栳质韵开口舌音(3例举1),开口齿音(12例举2)不能构成重组。

(0) 栳质韵舌音[秩/侄] 秩、侄同为《广韵》直一切,非重组。

(0) (臻)真齿音[神/秦] 神,《广韵平真》食邻切,中古船纽真韵

开口三等平声 dzǐēn。秦《广韵平真》匠邻切,中古从纽真韵开口三等平声 dzǐēn。中古声纽大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不能构成重组。

(0) 栳质韵齿音[失/悉] 失,《广韵入质》式质切,中古书质开口三等入声 ɕǐēt。悉,《广韵入质》息七切,中古心质开口三等入声 sǐēt。中古声纽大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不能构成重组。

6.9 用证伪法说諄韵类并入声术韵合口齿音(12例举1,舌音无例)不能构成重组。

(0) [舜/峻] 舜,《广韵去稕》舒闰切。上古书纽文部 ɕiwən/中古书纽稕韵合口三等去声 ɕǐuēn。峻,《广韵去稕》私润切,上古心纽文部三 siwən/中古心纽稕韵合口三等去声 sǐuēn。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二字不能构成重组。

6.10 现验证与十八諄韵相近的欣、文、元能否构成重组。

6.10.1 二十文(《韵镜》二十图)二十一欣(《韵镜》十九图)唇、牙、喉音均无例可供验证。

6.10.2 二十二元(《韵镜》二十一、二十二图)以元韵/仙韵成对排列成元、仙开口(赅上去,并另入声月、薛韵)共3例,元、仙合口(赅上去,并另入声月、薛韵)唇音0例,牙音3例,喉音8例,共11例,不能构成重组:

(0) 月薛开口牙音[讠 jié/子] 讠,《广韵入月》居竭切,上古见纽月部 kǐāt/中古见纽月韵开口三等入声 kǐēt。子,《广韵入薛》居列切,上古见纽月部 kǐāt/中古见纽薛韵开口三等入声 kǐēt。二字中古月、薛不同用,主元音不同,不能构成重组,即另构成,上古同音字,无重出的条件。

(0) 愿线合口喉音[远/掾] 远,《广韵去愿》于愿切,上古匣纽元部 ɣǐwan/中古云纽愿韵合口三等去声 jǐen。掾,《广韵去线》以绢切,上古余纽元部 ʎǐwan/中古余纽线韵合口三等去声 jǐēt。二字中古愿、线不同用,主元音不同,不能构成重组。

6.11 用证伪法说仙先韵类并入声薛屑韵开口舌音(共 12 例举 1)、开口齿音(共 12 例举 1)不能构成重组。

(0) 仙先韵[遄/颠] 遄,《广韵平仙》张连切,上古端纽元部 tīan/中古知纽仙韵开口三等平声 tīen。颠,《广韵平先》都年切,上古端纽真部 tien/中古端纽先韵开口四等平声 tien。中古仙先同用,但此例中古知纽、端纽已明显不同,一为舌音知系,一为舌音端系,且等亦不同,一为三等,一为四等,此二字为中古构拟不同音而不能构成重组。

(0) 线霰韵[扇/霰] 扇,《广韵去线》式战切,上古书纽元部 eīan/中古书线开三去 eīen。霰,《广韵去霰》苏佃切,上古心纽元部 sian/中古心霰开四去 sien。尽管霰、线同用,但两字中古声纽大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等亦不同,一为三等,一为四等,不能构成重组。

6.12 用证伪法和证实法验证仙先韵类,并入声薛屑韵合口舌音、合口齿音,并合口舌齿音能否构成重组,按《韵镜》第二十四图均无例证可援。

6.13 用证伪法说宵萧韵类开口舌音(共 7 例举 1)、开口齿音(共 4 例举 1)不能构成重组。

(0) [朝/貂] 朝,《广韵平宵》直遥切,中古澄纽宵韵开口三平声 dīeu。貂,《广韵平萧》都聊切,中古端纽萧韵开口四等平声 tieu。因中古声纽不同,一为舌音知系,一为舌音端系,不能构成重组。

(0) [少/啸] 少,《广韵去笑》失照切,中古书纽笑韵开口三去声 eīeu。啸,《广韵去啸》苏吊切,中古心纽啸韵开口四等去声 sieu。因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不能构成重组。

6.14 验证宵(赅上去)合口、歌(赅上去)合口、戈(赅上去)合口、麻(赅上去)开合、阳(赅上去)开合、药开合中的唇、牙、喉三、四等,是否重组。检《韵镜》二十六至三十二图共得 1 例(举 1 例)。

(0) 阳韵喉音[羊/阳] 羊、阳同在《广韵平阳》与章切,不能构成重组。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一图 15 条校此为“□/阳”。

6.15 用证伪法验证两不同用之韵清(赅上去)开口、青(赅上去)开口,並另昔、锡韵中舌音、齿音三、四等,是否能构成重组。检《韵镜》三十五图共得 12 例(举 3 例)。

(0) 齿音清青韵[声/星] 声《广韵上清》书盈切,中古书纽清韵开口三等平声 $\epsilon i\epsilon\eta$ 。星,《广韵上青》桑经切,中古心纽青韵开口四等平声 $sie\eta$ 。中古声纽不同,清、青二韵不同用,中古音 $\epsilon i\epsilon\eta$ 不同于 $sie\eta$,故不能构成重组。

(0) 舌音静迥韵[逞/挺 $t\check{i}ng$] 逞,《广韵上静》丑郢切,中古彻纽静韵开口三等上声 $\check{t}ie\eta$ 。挺,《韵镜》原作挺($d\grave{a}n$),据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五图 32 条校改。挺,《广韵上迥》他鼎切,中古透纽迥韵开口四等上声 $tie\eta$ 。中古声纽不同,为舌上与舌头之别,静、迥二韵不同用,中古音 $\check{t}ie\eta$ 不同于 $tie\eta$,故不能构成重组。

(0) 齿音昔锡韵[释/锡] 释《广韵入昔》施隻切,中古书纽昔韵开口三等入声 $\epsilon i\check{e}k$ 。锡,《广韵入锡》先击切,中古心纽锡韵开口四等入声 $siek$ 。中古声纽不同,清、青二韵不同用,中古音 $\epsilon i\check{e}k$ 不同于 $siek$,故不能构成重组。

6.16 用证实法验证两不同用之韵清(赅上去)开口、青(赅上去)开口,並另昔、锡韵中唇、牙、喉音,不能构成重组。检《韵镜》三十五图共得 3 例,验证 3 例。

(0) 唇音昔锡韵[碧/壁] 碧,《广韵入昔》彼役切,上古帮纽铎部 $pi\check{a}k$ /中古帮纽昔韵开口三等入声 $p\check{i}ek$ 。壁,《韵镜》原作壁,据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五图 79 条校改。壁,《广韵入锡》北激切,上古帮纽锡部 $pi\check{e}k$ /中古帮纽锡韵开口四等入声 $piek$ 。中古声纽相同,但昔、锡二韵不同用,中古音构拟 $p\check{i}ek$ 不同于 $piek$,故不能构成重组。

(0) 唇音昔锡韵[擗 $p\grave{i}$ /臂 $p\grave{i}$] 擗,参见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五图 73 条后校改为此字。擗,《广韵入昔》房益切,上古並纽锡部 $b\check{i}\check{e}k$ /中古並纽昔韵开口三等入声 $b\check{i}ek$ 。臂,《广韵入锡》扶历切,上古並纽锡部

biɛk/中古並纽锡韵开口四等入声 biek。中古声纽相同,但昔、锡二韵不同用,中古音 biɛk 不同于 biek,故不能构成重纽。

(0) 牙音静迥韵[颈/到] 颈,《广韵上静》居郢切,上古见纽耕部 kǐeŋ/中古见纽静韵开口三等上声 kǐeŋ。到,《广韵上迥》古挺切,上古见纽耕部 kieŋ/中古见纽迥韵开口四等上声 kieŋ。中古声纽相同,但静、迥二韵不同用,中古音 kǐeu 不同于 kieu,故不能构成重纽。

6.17 用证伪法说尤、幽韵类舌音(第三十七图无例可援)、齿音(11 例举 3)不能构成重纽。

(0) 齿音尤幽韵[周/啾] 周《广韵平尤》职流切,中古章纽尤韵开口三等平声 tɕiəu。啾《广韵平尤》即由切,中古精纽尤韵开口三等平声 tsɿəu。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精系,不能构成重纽。

(0) 齿音有黝韵[首/滂] 首《广韵上有》书九切,中古书纽有韵开口三等上声 ɕiəu。滂,《广韵上有》息有切,中古心纽有韵开口三等上声 sɿəu。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书纽,一为精系心纽,不能构成重纽。

(0) 齿音宥幼韵[授/岫] 授,《广韵去宥》承呪切,中古禅纽宥韵开口三等去声 ʒiəu。岫,《广韵去宥》似祐切,中古邪纽宥韵开口三等去声 zɿəu。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禅纽,一为精系邪纽,不能构成重纽。

6.18 用证伪法说侵韵类舌音(1 例举 1)、齿音(15 例举 3)不能构成重纽。

(0) 舌音侵韵[琛/磻 tiàn] 磻,《广韵平侵》无此字,据杨军《广韵校笺》第三十八图 11 条校,当为□,即空位无字。琛/□,无重纽可言。

(0) 齿音寝韵[枕/醢 jǐn] 枕,《广韵上寝》章荏切,中古章纽寝韵开口三等上声 tɕiɛm。醢,《广韵上寝》子朕切,中古精纽寝韵开口三等上 dɿɛm。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不能构成重纽。

(0) 齿音缉韵[十/习] 十,《广韵入缉》是执切,中古禅纽缉韵开口三等入声 $ʒiəp$ 。习,《广韵入缉》似入切,中古邪纽缉韵开口三等入声 $ʒiəp$ 。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不能构成重纽。

6.19 用证伪法说盐添韵类开口,并入声叶帖韵开口舌音(10例举1)、齿音(7例举1)不能构成重纽。

(0) 舌音盐添[觚/添] 觚,《广韵平盐》丑廉切,中古彻纽盐韵开口三等平声 $tʃiəm$ 。添,《广韵平添》他兼切,中古透纽添韵开口四等平声 $tʃiəm$ 。中古声纽不同,一为舌音知系,一为舌音端系,不能构成重纽。

(0) 齿音盐添[詹/尖] 詹,《广韵平盐》职廉切,中公章纽盐韵开口三等平声 $tɕiəm$ 。尖,《广韵平盐》子廉切,中古精纽盐韵开口三等平声 $tsiəm$ 。中古声纽不同,一为齿音章系,一为齿音精系,不能构成重纽。

6.20 以上用证伪或证实的方法验证了相关韵图中的舌音、齿音不能构成重纽,有第4、5、6、7、12、13、14、17、18、23、24、25、37、38、39、42图;验证了相关韵图中的喉、牙、唇音(或无例)不能构成重纽,有第1、2、3、8、9、10、11、19、20、21、22、26、27、28、29、30、31、32、35图;一望即明,不必再验证的有第15、16、33、34、36、40、41、43图。可见以上验证已具有周遍性。

柒 小 结

7.1 上古主元音不同是构成《广韵》重纽的重要条件,§1有101例,§5有4例,共105例;上古介音不同也是其重要条件,§1有50例,§2有32例,§3有8例,§5有13例,共103例;上古声纽不同也是其重要条件,§1含有13例,§3有18例,共31例;上古韵尾不同也是其条件,§1有4例,§5有1例,共5例。此外,还有《韵镜》记录为重纽,但实际并不能构成重纽,§1有6例,§5有6例,共12例。本文

共研究据《韵镜》记录到的《广韵》重纽 164 例(101+32+18+13),并非重纽 12 例。还有上古等第相异成为重出的条件,如第 90、96、143、(5)(7)(8)、(9)条等,半舌半齿音之重纽尤显。

7.2 从研究重纽看,对文献材料作证伪和证实都是必须的,有时需两者并用,方能得出结论。求证的周遍性是证实和证伪的双重结果。

7.3 中古韵的同用是确定中古音构拟是否近同的准线,同用方可能使中古音相同而构成重纽,反之则不能。

7.4 在古音构拟中研究重纽,可使对重纽的认识精细化;反过来说,重纽研究可加深对古韵分部的认识,如对支、脂、之三分,真、文二分,脂、微分部等,都能提供旁证。还可拓宽对上古声纽音转的认识,如第 143 例来母字读见母字。

7.5 重纽的个案研究和系统化都是重要的,统计表明系统的形成和系统内部的构成情况,个案是系统的支持,晚近研究重纽的学者大都插用了统计(董同龢 1948, pp. 5—8,周法高 1948, pp. 68—82,王静如 1948, pp. 79—94,陆志韦 1985 中华书局, pp. 101—277)。

7.6 由上文可见,本文对《广韵》重纽一一作了古音构拟,指出中古音近同是构成《广韵》重纽的原因,上古音的主元音、介音、声纽、韵尾,甚至等第相异是重出的条件,有的是五大相异综合作用而重出。除学术界公认的八个韵类:支、脂、祭、真(谆)、仙、宵、盐、侵韵类以外,虞韵类,清韵类,(均举平声以赅上去)韵中的喉(影喻晓匣)、牙(见溪群疑)、唇音(帮滂並明)字,还有部分半舌音来纽、半齿音日纽字,都有可能构成重纽。还验证了不能构成重纽的种种情况,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广韵》重纽和非重纽的界限。

主要参考文献

论文:

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载《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 年。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载《史语所集刊》第十八册，1948年。

龚煌城《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重纽问题》，载《声韵论丛》1997年第六辑，台湾声韵学会等主编，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蒋冀骋《广韵重纽字新探》，载《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蒋希文《徐邈反切系统的“重纽”字》，载新《燕京学报》1999年第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李新魁《重纽研究》，载《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又《李新魁语言学论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陆志韦《三四等与所谓“喻化”》，载《燕京学报》1939年第26期。又《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日本]平山久雄《重纽问题在日本》，载《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邵荣芬《切韵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宋亚云、张蓉《切韵系韵书重纽研究综述》，载《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2期。

王静如《论开合口》，载《燕京学报》1941年第29期。

王静如《论古汉语之腭介音》，载《燕京学报》1948年第35期。

姚荣松《重纽研究与声韵学方法论的开展》，载《声韵论丛》1997年第6辑，台湾声韵学会等主编，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余迺永《中古三等韵重纽之上古音来源及其音变规律》，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2年第13期，香港中文大学主编。

郑仁甲《论三等韵的i介音——兼论重纽》，载《音韵学研究》1994年第3辑，中华书局。

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载《史语所集刊》1948年第十三本。

竺家宁《重纽为古音残留说》，载《声韵论丛》1997年第六辑，台湾声韵学会等主编，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著作：

高本汉著，《汉文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 唐作藩著,《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 王力著,《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郭锡良编著,《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鲁国尧著,《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郑张尚芳著,《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宋本广韵》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2 年影印本。
- 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
- 《永禄本韵镜》,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 杨军著,《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高本汉著,《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 1987 年版。

上古音的韵部及其研究^①

人们读《诗经》时，读到《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就往往会问：“怎么不押韵了？”其实，汉魏以后的人读《诗经》就感到有些不押韵了。宋代的朱熹就在“服”字下注：“叶（念 xié）蒲北反。”意思是说“服”字读和“得”相近的音，这样就押韵了。这就叫做叶音说。据洪诚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叶音说继承吴棫，是改今音以协古韵。更有甚者，叶韵说以今音为主；强古人以合今音，六朝人的叶音多属此类。例如《经典释文》引沈重注《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野，协句，宜时预反。”协句就是叶音，意思是说，“野”字按今音临时改读成“时预反”，才能和上文“羽”字押韵。最早起来批评叶音说的，是明代的陈第，他在《毛诗古音考》中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后人“以今人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不入，于是悉委之叶。”有了陈第提出的语音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观念，古音研究才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

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起，直到今人王力，都对上古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上古音的韵部是怎样研究出来的呢？古音学家们按照《诗经》用韵的实际情况概括出了《诗经》的韵部。归纳《诗经》韵部的方法是用系联法，如《关雎》三章的“得”、“服”、“侧”押韵，在上古当属同一韵部。在《伐檀》第二章中“侧”又和“辐”、“直”、“亿”、“特”、“食”押韵。《硕鼠》第二章中“直”又和“麦”、“德”、“国”押韵。这样，“得”、“服”、“侧”、“辐”、“直”、“亿”、“特”、“食”、“麦”、“德”、“国”当属同一韵部。清儒通

① 本文原载郭维森、柳士镇主编《古代文化基础》岳麓书社 1995 年版，《中国文化基础》，新世界出版社 2007 年版。

过归纳《诗经》韵部,可以看到与《广韵》的韵部不同,于是打破唐韵的束缚,该分的分,该合的合,最早做这个工作的是顾炎武,他的这个工作叫做“离析唐韵”。

为了更广泛地了解上古音各韵部的字,古音学家又在《诗经》而外系联先秦别的诗歌韵文和散文中的韵语。段玉裁还提出了在造字时代“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即凡同一谐声偏旁一定属同一韵部,也一定和《诗经》的韵脚相符,因为先秦的韵部是以《诗经》为基础,并及其他典籍概括出来的。例如:工、功、攻、江、扛、贡、虹、空、红等都具谐声偏旁“工”,上古音必同部,同属从《诗经》概括出来的“东”部,韵部的名称只是同一韵部诸属字的一个代表字,如“之”部、“职”部、“蒸”部等等。有了谐声偏旁这一佐证,上古韵部的研究更严密了。

上古无韵书,为从音理本身揭开上古音的秘密,清代学者江永、戴震据语音变化为系统演变的一般规律,找到了古音分合的另一参照系统,即以中古等韵为手段审析上古音的分合,江永和戴震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在江、戴看来,不明音理,光作文献的归纳系联,是难以精确地区分出上古韵部的。为此,江、戴主张将文献归纳和音理审析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颇有一点近代科学精神。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戴震经等韵审析与文献验证的结合,将去声祭、泰、夬、废四韵独立成他的第二十部霫部,这一分立,为后世所公认。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对上古音韵部越分越细。顾炎武分为十部,段玉裁分为十七部,戴震分为九类二十五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等等。按例,材料同,系联方法同,结论应该同。但由于对《诗经》的韵例,如某处入韵,某处不入韵,某处换韵、合韵的理解还有所不同,故各家分部并不相同。王力曾分为二十三部(与章炳麟不同)、二十四部,后来,又在他早年二十三部的基础上增加入声;即“职”、“觉”、“药”、“屋”、“铎”、“锡”六部,分古音为二十九部。后又增加了

“冬”部。故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分为三十部,又按主要元音的异同和远近,阴、阳、入相配,归纳为十一类,这十一类又可列为三个大类。列表如下:

韵和韵部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类	别			
甲类	第一类	之部[ə]	蒸部[əŋ]	职部[ək]
	第二类	幽部[u]	冬部[uəm]	觉部[uk]
	第三类	宵部[ô]		沃部[ôk]
	第四类	侯部[o]	东部[oŋ]	屋部[ok]
	第五类	鱼部[a]	阳部[aŋ]	铎部[ak]
	第六类	支部[e]	耕部[eŋ]	锡部[ek]
乙类	第七类	歌部[ai]	元部[an]	月部[at]
	第八类	脂部[ei]	真部[en]	质部[et]
	第九类	微部[əi]	文部[ən]	物部[ət]
丙类	第十类		侵部[əm]	缉部[əp]
	第十一类		谈部[am]	盍部[ap]

此表据王力《同源字典》和唐作藩《学点音韵学》一文中的列表制。方括号内为国际音标。

此表极有用。由表可看出,同一类同横行的为对转,同一大类同直行的为旁转,旁转而后对转者为旁对转,不同大类的横行毗连者为通转。均一目了然,但音转关系是为了说明派生词范围内的“音近音通”这一原理的,故是否音转(音近)而能说明意义相通或相同,应当严格地以文献为依据,不可任意妄说,否则会闹出“庄周即杨朱”、“猪八戒”与“郑板桥”可通转之类的笑话的。

至于查检某字的上古音,可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书末的《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和《上古声母常用字归类表》,

最方便的是用唐作藩编著的《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或使用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或使用《汉语大字典》第八册《上古音字表》。

关于上古声母系统,总的说不如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的成就大,原因是材料缺乏。到目前为止,一般只能根据五种材料研究上古声母,一是偏旁,二是声训,三是“读若”,四是异文,五是异切,研究结果不外乎在宋人三十六字母的基础上作一些合并。

古代语言的学理反思和文化诠释

《尚书》篇目类属和学理^①

《尚书》是我国上古的典章文献的汇编,相传为孔子编定。其中还保留了一些商代和西周初年的史料,有很高的价值。从汉代起,《尚书》即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分,秦汉之际,伏胜(伏生)传二十九篇,因用汉隶书写,称《今文尚书》。西汉景帝时,孔安国又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用先秦古文书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了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两汉时期今文和古文《尚书》都很盛行,都曾先后被立于学官。西晋永嘉丧乱后今文和古文《尚书》都先后亡佚。传为三国魏王肃伪造,后由东晋梅賾献出的伪古文《尚书》伪孔传,影响极大,至宋代吴棫始疑其伪。从吴棫至清代中期七百年间,揭梅之声未绝,以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为最著名。后来,孙星衍(1753—1818)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著《尚书今古文注疏》,成为后人研究《尚书》的必读书。但后来的学者并不拘于孙著,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肯定伪书的价值,一方面固然论定梅书中有三十三篇为伏生所传,二十五篇为伪作,另一方面又视二十五篇无妨是西汉时发现的《古文尚书》的西晋辑佚

① 本文原载《中国经学》,彭林主编,总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本,“它补充、丰富了《尚书》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①。

今文、古文、伪古文《尚书》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三书篇目应纳入体式典、谟、训、诰、誓、命六大类。各篇之学理,绌绎为用话语标记引出治世内容、分类逻辑和建立范畴、称名名义和训解名物及名理、道德本体论范畴心性修养、从存在论天命的境域操持到民命民意的转换等五个方面。在研探中应重视出土文物新材料。

一、今文、古文、伪古文《尚书》篇目类属

《尚书》的分类,就时代分可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就体式分,孔安国《尚书序》分为六种:典、谟、训、诰、誓、命。式内含文,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轨范”,“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它的实践行为,至少表现在教学上,“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尚书》的分类、体制名式,是提挈全书的大纲。

典:“典”为典范、规则、法则之义。有虞夏书中的《尧典》、《舜典》、《禹贡》,周书《洪范》、《吕刑》。

谟:“谟”为议谋,谋划出的结果。有梅书《大禹谟》,虞夏书中的《皋繇谟》、《益稷》(伏生合于《皋繇谟》内),周书有《金縢》、《君奭》。

训:“训”为训诫。主要指君对臣的训示,或借先王之遗教训示新君。有梅书《伊训》、梅书《太甲》、梅书《咸有一德》,商书《盘庚》、《高宗彤(按:róng,祭祀名)日》、《西伯戡黎》。其中《盘庚》分上、中、下三篇,是无可争议的殷商遗文,有较高的史料、语料价值。盘庚是成汤的第十世孙,祖丁的儿子,继承哥哥阳甲的帝位,是商的第二十位君王。他为避免水患,迁都殷,但遭到反对,于是多次训示臣民,极言迁都的好处。

① 参见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本文立目和一些提法参用了该书,选择论述对象和引用文字则据以孙星衍本。

史官当即记录了他的训词,事后成文以追记之。依伏生《尚书大传》只作一篇,依《史记》和《十三经注疏》分作三篇。既为追记,时空的转换尤须明确。上篇开头“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明确为迁殷后、在殷地的训话。中篇开头“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明确为迁殷前、在旧地的训话。下篇开头“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也是迁殷后,在殷地的训话。时空既明,视点不同,内容有别,但篇序可错杂,不必说改中篇为上篇了,但也不是不可究其发生先后。

诰:告诫之文。古者上、下有诰。有梅书《五子之歌》、梅书《仲虺之诰》、梅书《汤诰》、梅书《旅獒》、梅书《周官》,商书有《微子》,周书有《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康王之诰》。

誓:古代军中告诫、约束将士的言辞,或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盟约、誓词。虞夏书有《甘誓》,商书有《汤誓》,周书有《牧誓》、《费誓》、《秦誓》,梅书《胤征》、《泰誓》^①。

命: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的册命,乃至临终命辅嗣主。商书有梅书《说命》。周书有梅书《武成》、梅书《微子之命》、梅书《蔡仲之命》、梅书《君陈》、今古文《顾命》、梅书《毕命》、梅书《君牙》、梅书《囯命》、今古文《文侯之命》。

要说及的是,郭店简/沪博简《缁衣》的第19、20简/第10、11简(今本《礼记·缁衣》无),第39、40简/第20简(今本《礼记·缁衣》有)都引了《君陈》,相应而有异的文字在梅书中均能找到。这说明,梅书作伪时也不全伪。楚简引《君陈》文字成了订伪见真之助。此外郭店简第39、40简:“出内(入)自尔币(师)于(虞,沪简作雩),庶言同。”与上文引《诗·曹风·鸛鸣》“淑人君子,其仪一兮”紧接,意为“政教出入,由众臣

① 关于《泰誓》是伪古文问题,可参见顾炎武《日知录》,见《日知录校注》上册,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谋度,意见相同再实施”。下文引《诗》亦为“仪态纯一”之意,谋度、求同划一,皆语言哲学方法,并表现为针对具体事务的概念和逻辑的生成和范式化。

又郭店简《缁衣》第9、10简/沪博简《缁衣》第6简/今本《礼记·缁衣》,均有与梅书《君牙》相应的文字,可知梅书不全伪,文字异形,可资语言文字学上的考索;这段不伪文字的大意是:“无论是夏天炎热大雨,还是冬天严寒大雪,百姓都会怨恨叹息,自伤生计艰难。”为官助民,力行仁义,当以民生为主旨,使百姓不畏难,天下可得安宁。包括今本《礼记·缁衣》和梅书在内的四种文本的比较,虽有文字出入,但可知以上大意各本具在,其内在逻辑无非以“自然灾害—民生—为官之职责”绳之。

伪古文《尚书》,今天已没有必要因其伪而鄙薄之,今文、古文、伪古文《尚书》并而观之,是研究《尚书》的现代版。宋至清代的揭梅,有文献辨伪的意义,清代的揭梅,有思想启蒙意义。今天已确证梅书之伪,甚至知道其伪中含真,辨伪的任务已完成,虽仍有思想启蒙的必要,但根本不必借助揭梅了。所以,三书并观,倒是学术史的进步和必然。

二、话语标记下的治世内容

话语标记(utterance markers)又称话语标记语或语用标记(pragmatic makers),它具有引发话题或转换话题的作用,传统的话题标记更是指话语单位在线性分布中的的连贯语和衔接语。^①

《尧典》开头用“曰若稽古”四字,定位追叙文字,确定当下时空,讲了尧的贡献。经有针对性的具体叙述,说明尧如何命羲和制订历法,如

① 参见 G. . Andersen 著,许家金述评《〈语用标记和社会语言学变异〉述评》,《当代语言学》2004 年第 3 期,第 266 页。

说“两分两至”中的夏至：“其民析（分散在田野），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命令羲叔住在南方的交趾）。平秩南讹，敬致（辨别测量太阳南行，迎接太阳南归）。日永（白昼最长），星火（东方苍龙七宿中的大火星宿二），以正仲夏（出现在正南方，是夏历的五月）。”以及相关订历内容和历法规范，如说“期（jī，一周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文中对“四仲中星”的叙述是形象的、具体的，但它的理数度制却成了中外学者研究古天文的权威依据。^①文中通过尧与大臣的对话，叙述如何选贤任能，包括选继承人，但体现的是尧的用人标准。在叙述时，都是从否定方面讲的，逻辑上用排除法。

周书《吕刑》（即《甫刑》）以“王曰”为标识，貌似周穆王告吕侯的诰词，但实质是吕侯为周穆王相时制定刑典的法律思想和刑罚主张，故入典类。今以孙星衍本分上下篇述之。

《吕刑》上篇开头为史官叙事词，说吕侯助年迈的周穆王以大谋制刑典。下文即以“王曰”为引导，论刑法对治理国家的意义，蚩尤滥施刑罚而灭亡，唐尧用中刑而享有天下。上篇说法制的重要，但从尧的成功经验看，和德治、礼治相比，法治仍是第二位的，“德威维威，德明维明”。郭店简《缁衣》第26、27简、沪简《缁衣》第14简引《吕刑》上篇文字，涉及“苗民弗用灵（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谴责此“杀戮无辜”的做法，竹简引孔子，认为“正（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刑罚不足耻”，合观其旨，是说法制，用刑，也只是政治、治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决不是全部，亦正是“治政事当德治而法治”的思想。今本《礼记·缁衣》引《吕刑》而及“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指向酷刑的效用，当非《吕刑》原貌。此段可明中国最古老的刑法思想的逻辑起点。

《吕刑》下篇一讲诸侯治事的三面镜子：一照伯夷远播的法制刑理，以为警戒；二照施苗民以虐刑，无有善良，后果多多，以为教训；三照使

① 参见李开《戴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修订后重印本，第227页。

用五刑是否公正,是否乱罚无辜,以为如何执法。三对照即用三种名式作自我规约。三对照的目的,是要促使王族勤政慎刑,万民受益。二讲刑律条目和审理案件的方法,皆刑事法理系统的名目。三讲审案态度,强调用中刑。即法制刑罚中的公正适当,刑法与中庸之道的关系,可谓中国古代之最古的法哲学。

《大诰》,即普遍告谕。据《史记》的《周本纪》和《鲁世家》记载,周武王死后,共同监理殷民的“三监”管叔、蔡叔、纣王子武庚联合淮夷等作乱,周公决定率兵东征。出师前,他召集各诸侯国邦君和他们的各级官员,假借周成王口吻申述东征理由,要他们顺从天意,同心协力,去平定叛乱。借成王口吻,标志有“王若曰”和三个“王曰”作为各大段的开头,行文申时度势,申明大义,用第一人称“我”、“予”表述之。“王若曰”作为借成王之口说话的标记,是提挈全文的符号,这类提挈性标记是先秦文章常有的。“若曰”之说,清代学者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若曰’者,史约叙其辞也。”犹言“王是这么说的”。“王曰”的提挈作用同。

《康诰》:周公代成王作诰,告诉康叔如何治邑,巩固周的统治。周公佐成王平“三监”后,将原“三监”辖地殷封给武王同母弟康叔,称卫君。全文以2个“王若曰”、11个“王曰”提挈诰的内容。开头“惟三月哉生魄”一语,“哉生魄”本为“刚刚才生月霸”,哉,时间副词,才。《尔雅·释诂上》:“哉,始也。”魄,通“霸”。“副动宾”结构词汇化、术语化了。并与专名“既死魄、旁死魄、既生魄、旁生魄”并列之。王国维考定“哉生魄”在夏历每月的二、三日至五、六日。^①一“王若曰”总结文王治殷经验是“明德慎罚”,二“王曰”要康叔俯察民意,要像殷先王那样“用保义民”,要像殷长者那样“宅心知训”,要像古圣王那样“用康保民”。三“王曰”治国当苦身劳形,职责是“应保殷民”。四“王曰”告诫“敬民乃罚”,谨慎严明你的处罚。此语为郭店简、沪博简《缙衣》的第27简和第

① 见《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15 简所征引,并与《吕刑》和孔子的相关评述同在,足见此语是上古执法的共同准则。^①五“王曰”要视民罪如己病,视百姓如“赤子”,要亲自掌握刑杀大权。六“王曰”讲断案要循法律,严肃执法,按时宣判,不可急促草率。七“王曰”讲断案不可有主观随意性。以上四至七是执法施刑的原则。八“王曰”提出四条刑律,有的还论及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九“王曰”对老百姓施行教化。十“王曰”社会不安宁,就要问罪于自己。十一“王曰”行德政而安民心。十二“王曰”天命无常须小心。十三“王若曰”时刻警惕,不忘忠告。以标识题记带治事内容。

《酒诰》:周公代成王命令康叔到任后宣布戒酒。《韩非子·说林上》引《酒诰》文句称《康诰》,从体制上看,用一个“王若曰”,四个“王曰”带出相关内容,同《康诰》。如何做到戒酒?说不可酗酒:一以周文王告诫群臣百官戒酒,赢得上帝赐福说之。二告封地百姓应勤勉力穡,孝养双亲,告诫各级官员应忠君尽职、尽孝,不可酗酒。三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说之:周文王和殷先王戒酒兴国,商纣王纵酒亡国。说可以饮酒的场合:祭祀时可饮酒,但要行酒德,“德将无醉”,不能喝醉。从逻辑上看,借助人间和天上的双重权威、尽力尽职和行孝、历史教训说“不可”,以具体场合说“可”。进言之以理性和道德说“不可”,以场景和体事说其“可”。标志彼时的逻辑水平和思维能力。即使今天来写一“戒酒令”、“戒烟令”之类,也仍是件费脑筋的事。

《多士》:洛邑建成后,迁殷人于此,殷人留恋故土,多有怨恨,周公代成王告“多士”(殷众旧臣)。全文亦以“王若曰”、“王曰”为标识导引,一说夏商兴盛在于力行德政,衰亡在于放纵游乐;二说三监叛乱后迁殷人,不用殷旧臣,是不得不然;三说出路何在,“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顺从我周王朝,才谈得上你们的安居。史鉴、任用、出路是全文三

① 参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0 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1 页。

大纲目。主旨是强化对殷商之地的统治。

《无逸》：周公还政成王后，告诫成王不要图安逸，要勤政。以“周公曰”为标识，说一要知“稼穡之艰难”，百姓内心之隐忧。二要知史鉴，殷中宗“天命自度”，位祚长达七十五年，高宗“不敢荒宁”，位祚长达五十九年，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享国五十年；相反，贤主祖甲之后的诸“立王”（在位君主），“惟耽乐之从”，在位仅十至三年不等。三要知勤政之三途：不可淫乐，不要搜括老百姓；不要任性，不要随意变动法度；时刻想到、听到老百姓在怨恨你、咒骂你。以上第一条深刻，第二条合乎史实，第三条切实可行。三条皆实指身边事，可见上古治世之论的崇实、求实的逻辑。或以为“民贵君轻”思想之源，亦无不可。

《君奭》：君，周公对召公的尊称，奭，召公名。为周公对召公的答辞，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对答于周公摄政之时。以“周公若曰”为开头，可比“王若曰”，乃至“曰若稽古”，可知“若曰”、“曰若”皆话语标识，“好像是说”，“要说那”，并无深意，不必穿凿究奥的。全文的理路：一是召公不信天命，强调“时我”，时，恃，依靠自己；周公说“惟人”，强调事在人为。说的都是治理天下的基本思想方法，虽非具体策论，却更为根本。二是征引历史，说古代圣君必有贤臣相辅，如成汤有伊尹，祖乙有巫贤，武丁有甘盘，可见辅臣的重要。三是表明与召公同心协力辅佐成王的志趣，并恳求“乃猷裕我”，多多教导我。四是再次勉励要深知历史重任，“汝克敬德，明我俊民”，从提拔俊才入手共成大业。以上言治世根本，历史教益，志趣和切入点，皆条达明白。值得注意的是，郭店简《缁衣》第36简和沪博简第19（断简可补）、20简都引《君奭》完整的一句话云：“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文字略有不同。割，害，何。申，一再。劝，勉。意思是说：从前天帝为何多次嘉勉文王的德行，把重任加在他身上？《尚书》的回答是文王能治理和谐天下，又有贤臣的辅佐。郭店简和沪简则与《诗·小雅·车攻》圣贤莅事“大成”和孔子“言之有物，行之有格，生不夺志，死不夺名”等语相接，把《尚书》

讲文王的品德、具体的德行,推进到成就大业、言行实践,志趣名节等道德本体论层面上去了。这里可窥察到道德人文向理性本体、知行实践的逻辑发展。时在春秋早期《尚书》时代到战国早中期楚简时代。

《梓材》:也是对康叔的诰词,以“王曰”、“王惟曰”、“惟曰”为引导语而说之。梓材,上等材木。内容可分为二,一是告知治殷的政策,当顺从殷先王常典、慰劳邦君、宽恕罪人、安抚百姓;二是阐说采取上述政策的理由。用了三个比喻:“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梓材”,即好比种地、建造房屋、制梓木家具,均得统筹考虑,分步实施。治策之目、比喻、运思之法具在,且不离殷地殷民对象本体而设诰词。

三、类逻辑范畴自身及其思想内容

分类是最基本的逻辑方法,也是建立范畴的基础。《舜典》(梅本分出,孙星衍本合于《尧典》)提出以特别事件类祭天神,也是类概念的运用。云:“肆类于上帝,禋(按:yīn,祭名)于六宗。”类,通“禋”,《说文·示部》:“禋,以事类祭天神。”这里的“类”虽然是通假字,但显然是分类思想在上古祭示中的应用。事实上,《周礼·春官·小宗伯》、《礼记·王制》、《诗·大雅·皇矣》等都讲到“类祭天神”。下文“禋于六宗”,也是祭示中的分类。除“六宗”外,文中的“七政”、“五瑞”、“五礼”、“五玉”等也无不是分类。“象以典刑”一句,把常用的刑罚刻画下来以警戒世人。孙注引马融曰:“但有其象,无其人。”疏:“象者,画像。”上古有“象刑”,亦马融之说。这里的“象”就有具象思维意义。至于舜命夔“典乐”以教青少年,使“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表达心志的音乐语汇要标准、规范,达于“八音克谐,无相夺论,神人以和”,思致和学理上已由本身、本体而达于神道和人道的本源。

周书《洪范》是《尚书》最重要的篇目之一,用逻辑的眼光看,通篇讲分类法、范畴法、逻辑生成法。“洪范”就是大法、根本范畴。相传禹得

《洛书》(相传即本篇“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极”65字),后传给殷贤相箕子。周灭殷后,周武王向箕子咨询治国方略,箕子据《洛书》阐释了九种大法。一、五行。五行是五种物质: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有五种功能和运动:“水曰润下……土爰稼穡。”“曰”、“爰”皆句中语气词,水潮湿流下,土地种植庄稼。五种运动即五种转化和生成:“润下作咸……稼穡作甘。”向下润湿的水流产生咸味,土地种植收获的百谷产生甜味。逻辑上用顶针表达且层层深入。综观之,说之为五种名及其动态逻辑结构和生成图可也。二、五事。貌、言、视、听、思。五事的存在状态:“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容貌要恭敬,言论要正当……五事的存在状态的运动指向即所要达到的目标:“恭作肃,从作义,明作晰,聪作谋,睿作圣。”容貌恭敬就能严肃,言论正当就能治理……。综观之,“事”为主体和客体的,是主体和客体的间性的。其存在状态,其存在状态的运动指向,都是主体和客体相间的,优点是其本身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三、八政。列举出八种政务官员名,并以官员名目代政务。这样做,正是利用了汉语词某义项的对应来形成修辞借代。例:一曰食,指管民食的官,指代政务“管民食”;七曰宾,指管朝觐的官,指代政务“管朝觐”;八曰师,指管军队的官,指代政务“管军队”。四、五纪。五种记时的方法:岁、月、日、星辰、历数。星辰是说通过观察二十八宿和十二辰以知节气和日食、月食的发生时点。其中历数本是制历度数:太阳循黄道绕地视运动的周天数为 $365\frac{1}{4}$ 度,月每天运行 $13\frac{7}{19}$ 度,按每年十二月计算,则有余日,积余以定闰月,定闰月以调四季。故《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五、皇极。国君的法则。最要者:给百姓谋幸福,百姓才跟你走。要做到它,有九要:君王树立榜样不结党营私,重视百姓中有智慧有作为有操守者,宽容有过失但未犯罪者,赐福于遵行美德恭谨守法从事者,“无虐茆独而畏高明”,让人施展才能,使百官各尽其职,警惕缺德者。以六不要为警戒:不要偏颇不正,应遵守王法;不要私心偏好,应遵照王道;不要为非作

歹,应遵行正路;不要营私结党,应王道宽广和平易;不要走反道走邪道,应王道正直;不要君臣相离相背,应共守法则。以上可谓第五“洪范”：“皇极”下的十五项名目内容。六、三德。三种德性：一是正直，二是过分刚强，三是过分柔顺。进而一一作出具体的解释。并明确国君的选择：“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即抑制刚强不能亲近的人，推崇和顺可亲近的人。七、稽疑。考察疑惑。讲了用龟卜和蓍草卜知吉凶。讲了龟兆之像和卦象的联结，和如何对它们作分析判断。虽迷信甚重，但却显出厚用象思维时的儿童般的真诚。八、庶征。以五种自然现象为据：雨天、晴天、温暖、寒冷、刮风。五种天气齐备，各以时序而进，就会五谷丰登。某种天气过多或过少而失衡，就会闹灾荒。进而以五种天气拟比国君的品德和治事，君王能敬就像及时雨，昏庸愚昧就像久刮大风，如此等等。又以大自然拟比君臣百姓，君王视政，犹一年包括四时，大官员犹一月统属于岁，小官员犹一日统属于月，百姓犹天上的星星。以人类社会等同大自然固然是错的，但以自然秩序拟比人类社会，引出种种治事之途和训诫，应该说是有益的，有重要的价值观念意义。从思想方法看，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到“天人合一”，发展到拟比自然而引出训诫，这一不太清晰的演进不能不说是思维史的发展，它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作为解决当下治事的长久性方案，由庶征微兆预知，竟以宏大的范畴提出，不能不带上“自然验核”的方法论意义。九、五福和六极（苦厄）。值得注意的是，以“攸好德”（遵行美德）为福，以忧愁和懦弱为“极”，不能不说是心理主体世界的深刻洞察和导引。

四、称名、名物和名理形上

《禹贡》可谓由地名、水名、山名、物产名、贡品名、治理、教化构成的称名系统。是上古称名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典范。后代的研究，无非围绕称名系统，作名物考古。

《益稷》是二人名伯益和后稷。全文是舜和禹的对话,更是美不胜收。如舜对禹说:“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按:孔颖达释为雉)、作会(按:绘,绘画)、宗彝(按:马融释为虎。宗庙彝器上有虎)、藻(按:水草)、火、粉米(按:孙星衍释为白米)、黼、黻(按:两者皆花纹)、絺(按:zhǐ,苧,缝,刺绣)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按:按郑玄的说法,做成天子、公、侯伯、子男、卿五个等级的服装),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按:按孙引司马迁校作‘采治乱’),以出纳五言,汝听。”五采、五色、六律、五声、八音,五言,皆专名可稽,亦有规范。文章讨论政治,却写得文采斐然,形象思维贯穿其中。

《微子》,微子启是殷倒数第二代国君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纣王淫乱不止,启多次规劝不听,向太师、少师咨询。启说:“我祖底(zhǐ)遂陈于上”,而纣王沉湎于酒色。“底遂”,底,定,遂,法术。^①“我祖底遂”,指成汤制定的法令制度、治理之术。启又说:“卿士师非度。”师师,众长。官员众长都不守法。又说:“殷遂丧,越至于今。”殷的法令制度、治理之术丧失殆尽,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作比喻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好像要过河没有了渡口和河岸。微子紧扣法令制度且作比而陈。太师少师主张微子逃离以存殷祀,孙星衍注太师少师言“自靖(按:保清白),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按:不反而离殷)”句引《史记》等,微子抱祭器奔周,太师少师抱乐器、图法即前述“底遂”奔周。祭器、乐器、图法皆国之名器。

《立政》:政,正。郭店简/沪博简《缙衣》第23简/13简都引孔子的话“教之以正(政),齐之以型(刑),则民又(有)免心(按:劝勉向上之心)”的话可证。正,长。立政,建立长官。本文是早已有之的正名思想

① 《舜典》:“乃言底可绩。”〔清〕孙星衍注引马融云:“‘底,定’者,《尔雅·释诂》云:‘底,定,止也。’底义同定。”遂,法术。〔清〕黄式三《尚书启蒙》:“遂,法也,与术通。”

在设立官制中的的具体运用,可补充、丰富《论语》正名说。周公晚年告成王,阐述设官理政的一系列原则。其一,任用好君王左右的治事、法官、内务、武官;以史为鉴,任人唯贤,使各尽职守,切不可貌取人,虚有其名。其二,回顾文王、武王时的官制,职责分明,为民作主,善德施宽,建功立业。其三,告诫成王,不可越俎而替代治事、执法之官行使权力;要考察、教育、扶持官员,使其赴命莅事;罢黜小人,不使居位。以上可见设官正名的思想极为丰富,职官名义以外有名理。

《甘誓》:禹的儿子夏启与夏的同姓诸侯有扈氏在甘地作战前的誓师言辞。攻打有扈氏的主要理由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见于《洪范》,故一说有扈氏不遵《洪范》之正道。“三正”,孙星衍据郑注,释为“天地人之正道”。周秉钧《尚书易解》释为“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①马融则释为古代历法之“三正”。孙氏进一步推说为十三月之正、十二月之正、十一月之正。但以为于书无注而取“正道”之说。^②孙氏“正道”之说,与上句有重复之嫌。不如取历法说,古代历法对农业社会来说太重要了。以侮辱“五行”之道,以怠慢历法为讨伐缘由,理由十分充分。五行、三正皆名理。

《牧誓》:武王克商在商郊牧野的誓词。文中所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可与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珷(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鬯夙又商”相印证,完成一次“二重证据”的证明法,以证《牧誓》所言不误。誓师大会一开始,就呼唤诸侯国君、大臣、三卿等官名以动员之,继以“牝鸡司晨家必败”为喻,历数纣王罪行,并言作战规范。如说,“今日之事,不愆(按:超过)于六步、七步,乃止齐(按:等待齐整)焉”;“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不要禁止敌人来投降,来帮助周人。规范,亦即具体莅事的名理。语言表达在语境中获

① 见周秉钧《尚书易解》,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1页。

② 参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1页。

解,名理的反思在实施背景中进行和获证。

《顾命》,含《康王之诰》:为周成王临终前命大臣辅嗣主康王,但大部分内容却是写周成王的丧礼和周康王的即位典礼,为伏生合于《顾命》,梅书别出的《康王之诰》是周康王即位后的第一篇诰命,其中也有不少答拜礼节。王国维《周书顾命考》说:“古《礼经》既佚,后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①成王亡后的丧礼法则,丧礼用的器具,祖庙内的陈设,警卫仪规;康王受册命时的仪式,首次行政令时的答拜之礼,及君臣互勉之词,皆“仪文节目”,“犁然可解”。^②这里,“名”是西周社会转制时期的守则和实践性武器,历史因果成了“名”的指称的决定性因素和内容。^③

《文侯之命》:可看作周平王表彰佐其平定犬戎之乱的晋文侯的册书。平王赏赐给晋文侯秬鬯(jùchàng,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成的酒)和圭瓚(以玉圭为柄的酒勺),这两种文化符号预示一系列的名义,赓续一系列新的指称,如回溯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德,能德辉升天,令名远播;赞扬晋文侯的功绩,继承先祖,遵从王命,制御文武百官,“扞(捍)我于艰”;以厚赏勉励文侯,回去后安抚边远,亲近邻国,“无荒宁”,专心治国,“用成尔显德”,等等。

五、从以去私为核心的主体道德修养 开出求知和事功

春秋儒是以主体自我的道德修养为实践体之本源的。《皋繇谟》是舜的大臣皋繇和禹一起讨论如何以德治国的会议记录。皋繇提出了“慎身”、“知人”、“安民”三件事。加强修养,坚持不懈,带领“九族”宽厚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第50页。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第51页。

③ 参见金力《指称理论的语用维度》,《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顺从,勉励贤人尽力辅佐。知人,理解别人,“知人则哲,能官人”,理解别人就会自己变得聪明,能任人唯贤。安民,安定人心,“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三件事可谓围绕“自我、知、他人”提出的命题。归根到底还是“我”,从我做起。反映了上古对“我”,对自身主体的把握。文中提出“九德”,九种优秀质量,是对德的分析,实际上是十八种:“宽而栗(宽厚并谨慎),柔而立(温和并能独立不移)……强而义(坚强且合乎道义)。”反映当时哲人的分析能力和认识水平。

《金縢》记载周公作册书,祈祷先王,愿代武王去死。金縢为铜盒子,册书装于金縢中,故指代之。武王死后,周公又竭尽忠诚辅佐成王。周公鞠躬尽瘁的故事,以“金縢”为表彰忠君的语言符号而传颂千古。后以“金縢议”专指代君而死之奏议,唐曹唐《三年冬大礼》诗之四:“千官不起金縢议,万国空瞻玉藻声。”又有“金縢功”一说,为忠心事君之典。三国魏曹植《怨歌行》:“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

《盘庚》上篇训诫群臣应抓住去私心,“施实德于民”这个根本,“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穡(按:sè,指耕种)乃亦有秋(按:秋藏)”。一是说德治之本在“去己私”和“施实德”,二是用比喻说实行德治的根本办法和必然途径,触及了逻辑性和必然性问题。上篇引古之贤史迟任的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求旧,用长期在官位的旧人,“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告诫臣民们守正他们所在的官位,遵守旧制,正视法令制度。人惟求旧,器求惟新,实际上讲了名位、名制与器的关系,守旧名而求新器,而名、器之主是“人”,是人之名位,人之用器。

中篇追记盘庚接位后即考虑迁都渡过黄河,训民之词由“先王代代考虑百姓安居乐业、大臣心中清楚而紧跟、天帝顺赞、百姓先祖认同随行”为系统导入,以同于先王的“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为前提,对今臣、今民展开评说,指出其种种不当想法和做法是“自鞠(按:qióng,穷)其苦”,训其当同心同德,“无起秽以自臭”。并以先王与百姓先祖共

赴时艰的患难关系,预设并阐释先王对当今臣民的态度,先祖对当今百姓的态度:如不从,先王就会降灾责罚,先祖就会“断弃汝”。整个训诫过程是以先王、先祖为权威符号,继而裁正当下,指明出路的过程。

下篇是迁都后的施政纲领。如说“用永地于新邑”,永远住在新国都;“用宏兹赉”,发扬光大迁都后的美好事业;“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不任用贪财的人,只信用为民谋利的人;“永肩一心”,永远与民众同心同德。与上篇同是迁都后之说,但上篇重在要大臣向众人陈述迁都之必要,责备官员造谣惑众,对在位大臣申明惩罚看,上篇是刚到达,似立足未稳时的告诫,《盘庚》上、中、下篇,从时序上说,当是中、上、下篇之先后。

《秦誓》:《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有蹇叔哭师。秦将偷袭郑未果,灭滑而还,在崤遭晋军伏击,全军覆灭。秦穆公悔过未从蹇叔,作本篇誓戒群臣。一是深悔随心所欲而误军国大事;二是自责在人才问题上的错误,未能做到“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并从正反两面认识到身为君王的责任:“国家危险不安,由于一人,国家繁荣稳定,‘亦尚一人之庆’。”后代有所谓“罪己诏”,此或其源。

六、天道、天命的境域操持走向民命、民意之实用

春秋早期的天命就是主宰神,天命就是天帝的命令,但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重大军事和政治实践中,天命转变成文王之命,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背弃哲学的上帝,作为自因的上帝的失去神性的思想,也许更切近于神性的上帝。”^①存在过程中接受境域操持的上帝才是存在的本源性上帝,《尚书》中的天道、天命渐行渐止地走向民命和民意,正是这种存在状况。

① 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41页。

《高宗彤日》，传说祭祀殷高宗武丁的那天，有一只野鸡叫，贤臣祖己训导殷第二十四代君、武丁的儿子、接班人祖庚。训示的办法是，先宽新君祖庚的心，然后纠正其祭祀不当。训示中提出的最高权威是天帝：“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天帝实际上只是权威符号，天惩自罪者，“非天天命，民中绝命”，并非老天夭折人命，而是办事不按义理而短命。还告诫祖庚父庙中的祭品不要过于丰厚。

《西伯戡黎》是周文王进剿商的属国黎国后，诤臣祖伊奔告纣王，认为“惟王淫戏用自绝”。“今我民网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一语，与《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一样，是痛恨暴君的名言。

《大诰》借成王之口，是指靠权威之意。文中屡述天帝之命如何如何，占卜之兆如何如何，都是要导出平“三监”之乱的无可动摇的真理性质。文章结尾说：“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天帝之命不会错，龟卜所示须照办，正是指称具体境域中的真理性和至高无上的善，天命与当下现实中的平“三监”之乱画上了等号。

《召诰》：周公摄政的第七年，还政成王。成王重新营建洛邑，派召公主持。史官叙述问卜顺从天意营建洛邑过程，记载的日期成为推历的内容，关键是：“惟二月既望”（孙星衍据司马迁《史记·鲁世家》定为成王七年二月，即公元前1048年二月十六）；其间，周公、成王来视察，召公告成王两件大事：亲政后当知天下隐忧，继续倚靠周公，敬德任贤保民；应总结并接受夏、商灭亡的教训，时刻心忧天下。以一叙二告之脉，展开问卜记事和进言上诰。

《洛诰》：洛邑建成后，周公劝成王居洛主政，成王分析当时形势后决定仍由周公治洛，以安定殷民。成王将这一重要决策册告天下，故名《洛诰》。全文围绕问卜和祭祀展开，力求顺从天帝之意，天意已是现实的打算。全文时、地不定，文脉多变，对话又夹杂问卜、祭祀和祷告辞，以致被认为“阙文错简”、“若无伦次”。今作主线划分后大致有：一在洛邑，周公、成王讨论定都大事。二在镐京，周公劝成王赴洛主事；勉励成

王亲政的诰词；成王面允亲赴洛邑。三在洛邑，成王分析形势，恳请周公继续居洛执政；周公接受王命，有面告成王之言，有祭告文王、武王之言；举行祭礼，大会诸侯，册告天下。围绕治洛，主旨是：成就天命，继承先王，监督臣属，化育百姓。在较复杂的行文中把握主线文脉，主流要旨，是理解本文的门径。

《多方》：诸方国。成王亲政后第二年，又有淮夷、奄国叛乱，成王亲征灭奄，五月回到镐京，诸侯来朝，周公代成王向存有背叛之心的众方国诸侯发表诰文。开头“周公曰：‘王若曰……’”一例即可知“代”。欲泯灭其叛心而笼络打动之，逻辑的力量更不可少。“须顺从天命”一以贯之。文中一说夏亡汤兴是天命，“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二说殷亡周兴是天命，谴责“多方”作乱叛周是“不大宅天命”；三说“多方”都应顺从天命，不要“探天之威”而“致天之罚”。天命，实际上是“民意”。文中共出现 12 个“民”字，其中“民主”连用 3 次，“民命”1 次可证。以“民意”为全文逻辑，可知周公告“多方”之旨。

《汤誓》：商汤出师伐夏桀之前的誓词。借天帝之命以伐桀，是指靠权威符号的做法。汤对民众说：“非台（按：yí，我）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自道“不是我这小子敢犯上作乱，是夏桀犯下许多罪行”，民众责询汤说：“君王不怜悯我们，荒废农事，为何要去打夏国。”汤告民称小，告民而民责之，皆可窥当下社会的民主。最后说出“时日曷丧？予（按：民众）及汝（按：指夏桀）皆亡”的名言，千百年来成为对桀的铁定史评，也表明当下上下同心，道出伐桀必胜的舆论和时机。

《泰誓》：周武王伐商大会诸侯的誓词。《史记·周本纪》载“武王遍告诸侯”，历数纣王之罪，率将士约五万人“以东伐纣”。文中引先祖之遗愿以励群臣之志，述白（殷正色）鱼入于王舟、火复于王屋流为三足赤乌等宗教符号语言，以说周取代殷的必然性。犹言客观必然性要用宗教符号语言证明之。行至孟津，“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未相约而同一时间到，未相谋而说同样的语言：“帝纣可伐矣。”后

来正式发兵时军中手舞足蹈，渡过孟津后作《泰誓》，历数纣王之罪：唯宠姬妲己之言是从，“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断弃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并表述了“共行天罚”的态度和决心。

《费誓》：鲁公伯禽率师征讨淮夷、徐戎在鲁国费地的誓词。全文以命告为誓词，要求全军将士听从主帅传递的王命：一告整治武器装备，二告军民谨守牧政，勿伤牛马，三告不准离开队伍去追逐奴隶，四告后勤给养之干粮、筑城工具、草料须及时供给。全文寓决胜之誓于务实之举。

以上由《尚书》有关篇目的主要内容概括出“话语标记引出治世内容”等五个方面的学理，具体到各篇，可能不止一个方面，而是几个方面都有。五个方面涉及话语标记、类逻辑和范畴、名理、本体、存在论，无一不与西学有关，要属工具论、存在论源流。顾炎武曾就“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之传闻；就“徐市倭国本者”，欧阳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诗句，而责其荒谬，甚确。^①但及“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舍中国之文，求之四海之外”而笼统弃之，则有失切当。战国简既古且远，今求之而录以辨伪中含真之处；工具论和存在论均有超越性，不同于一般文化思想、政治和社会观念，而有语言 and 思维的基本公理意义，有根本性和普遍性法则意义。以西学工具审视传统文化，本文尝试之，以祈察见对象本体的渺末微奥。

主要参考文献

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清]皮锡瑞撰《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① 顾炎武《日知录》，见《日知录校注》上册，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0 页。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谢无量编著《中国哲学史》(1916),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诗经》的语言和思想^①

《诗》可以说是“六经”、“五经”、“七经”“十三经”中的第一经，但它又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十三经”中的《诗经》为西汉鲁人大毛公毛亨和赵人小毛公毛萸所传，故又称“毛诗”。另有“韩诗”也只剩《韩诗外传》了，故研《诗》者据“毛诗”。

传为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引今文《尚书尧典》里的话：“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并说：“诗之道，放（仿）此乎！”涉及诗作、言语、心志、歌唱、吟咏、声音、和谐、韵律、范道等，思想内容是文学的，表述构件是语言范畴的，阐述的原理是“诗之道”，富有哲思的。“诗之道”不就是这些语言范畴的构件造成的吗？后来孔颖达的疏证说：“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坠），故一名而三训。”这就以“诗”为“名”，释名言理，使“诗之道”与语言解释扣得更紧了。不能不说，从《大序》到孔疏，语言范畴是“诗之道”的骨架。贯穿于全《诗》的“诗言志”，是“诗之道”的最简明、最经典的概括，这一概括由语言和心志组成，心志是思维的产物，语言产生于劳动，使劳动者彼此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而迸出了语言。那“非说不可”的语言冲动不就是劳动者的“心志”吗？心志是语言产生的机制，孔子就善于透过语言去把握思虑，沪博简《孔子诗论》第十一简说：“《关雎》之怡，则其思臚矣。”意即《关雎》的欢快的语言，背后反映的是追求者思想上的苦厄；语言即思，心志是言语的内容，语言是心志的思维轨迹。如此看来，“诗言志”的深层理解无非语言。更不

① 原载韩国忠南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 East Asian Culture: Prototypes and Transformations 2007, 11.

用说,贯穿于全《诗》的“六艺”,风雅颂,赋比兴,不论是体裁,还是表现手法,都是语言范畴的。

一、《诗》以思维之“象”为基础

《诗》既然是诗歌总集,当然到处都有形象,文学形象的思维基础就是象、具象。《易》的卦象是象,《诗》的形象也是象。卦象用来说明某一事理,形象用来说明某一感情。但既然都是“象”,就都可以说明某一道理。《诗》中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象”后之理。赋比兴是造象,风雅颂是成象,是已成之象的感情、人物、人文、道理之所在或所指。如《小雅·南山有台》用南山莎草、桑树、杞树、山栲,北山的莱草、杨树、李子树、山柰来作比造象,已成之象:雅体的具体内容是有德之人是国家的根基、国家的光荣、人民的父母、年高德劭者,以及诗人对他的祝颂。又如《小雅·鹤鸣》以“鹤鸣九皋”、“鱼潜在渊”、檀树生长、石可琢玉等取譬造象,来说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又如名篇《小雅·大东》写东国人对周王朝的怨刺,周人、东人各有作比,周人饭盒装满饭,东人织机也被刮精光,末了东人面对星斗抒发情感,即以天上星象作比,象中含意,象即其意,象本身即所指,能指为“天上也像人间一样有压迫者”。诗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按:xī,引,申)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按:高举)。”犹言南方箕星张其舌,若有所吞噬,北方斗星西扬其柄,若挹取于东。

《诗经》本身许多地方是可以以思维逻辑方法来考察的。《关雎》首篇有因“流(求)荇菜”比兴的“寤寐求之”之思虑,思虑之有比配,正是具象思维的继续;当然不免于“辗转反侧”;下文有“采荇菜”比兴的“琴瑟友之”,“芼(择)荇菜”比兴的“钟鼓乐之”,无非“寤寐求之”之思虑的继续和深入。方法不同,思虑一也,从“求之”到“友之”到“乐之”,比兴参照从“流荇菜”到“采荇菜”到“芼荇菜”。一是思维的垂直平面的演进,

一是比兴的垂直平面的不同,它给我们的是由语言范畴应用比配和相应的思维不断演进的景观:《关雎》是“以思演进于荇菜”。沪博简《孔子诗论》第十简评之称:“《关雎》以色喻于礼。”这首先是肯定了色的天然合理性,有如荀子《正名篇》主张“导欲”而不是“绝欲”。喻,通“谕”,晓谕。以色晓谕、明白于礼义。按孔子的评点,《关雎》体现了儒家原本务实的道德哲学,用诗歌形式来表达,一个“喻”字,晓谕、明白,又无非语言理解范围内的事。

《召南·甘棠》美召康公及于甘棠树,犹言爱屋及乌。本是人类的移情作用。……全诗三章三句,合观之无非是说:蔽芾甘棠,勿剪(剪除)、勿伐(砍伐)、勿败(败坏)、勿拜(毛传:拔也。拔除),召伯所茇(按:pèi,宿息)、所憩(qì,休息)、所说(按:毛传,舍也),语言上说得上一唱三叹,反复吟咏,不避重复,效果明显,感人之至。逻辑上语义是层层递进的,越说越重,但潜在的语义中心只有一个:美或爱(召伯)。沪博简《孔子诗论》第十简评之称:“《甘棠》之保(褒)。”语义的齐一,表达的多样,逻辑的态势和走向,大体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一语言逻辑结构特色,不仅本篇,可说全《诗》到处可见。

《豳风·七月》可说是在夏历、周历两种历法背景下的农事交替和饥寒图。全诗共八章,各章都以夏历的两个月(如一章七月、九月)和周历的两个月(如一章的一之日、二之日)共同或交替为题元标识,继而展开农事,诉说不平。本来,中国古代发达的历法因农业而生,农事因历法而序,但在同一首诗中用这么多的历法,实属罕见,人们在读这首诗时,几乎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历法的解释上,而较少注意农事安排了。历法的表述当然是些数字系统,《豳风·七月》是以数字化为领头的农事、心事的编织。例如四章:“四月秀葍,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缋武功,言私其豳,献豝于公。”十一句话中有六句用历法,云:四月里远志结子,五月里知了叫,八月里收谷子,十月里落树叶,十一月打貉子,捉到狐狸就扒皮,替公子

们做皮衣,十二月大伙儿聚起来,打猎习武,打到小猪留自己,打到大猪献公爷。共六个月,诸事全系之,无有例外。诸事对应和交替于历法,形成古代社会的风俗图景。数下留言,言内有理,数、言、理浑然一体,从表达和反思层面去看,这正是语言哲学的做法。

有的诗篇,有历史事实为据,叙述当下场景的字面背后却是史诗。如《郑风·清人》写戍守边防的将士们的生活。首章“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余二、三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是同类、近类之象引出事例者。该诗小序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境,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也。故作是诗也。”又《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如此说来,《清人》是谴责高克不以礼,郑文公不以道而作的。如何处理呢?或许就是中庸临事。郑国公子的观点是,失礼失道为危国亡师之本。也就是说,评价历史事件的标准应当是礼和道。以《国风》为例,有较明确的背景可作史诗读者有:《召南》有《甘棠》(写召康公事,一说召虎)、《何彼秣矣》(写周平王);《邶风》有《击鼓》(写孙子仲);《鄘风》有《载驰》(写许穆夫人闵卫之亡)、《定之方中》(写卫文公徙居楚丘而美之);《卫风》有《淇奥》(美卫武公之德)、《硕人》(怜悯卫庄公嫡妻庄姜);《郑风》有《清人》、有《缁衣》(赞郑武公好贤);《齐风》有《南山》(刺齐襄公)、《敝笱》(刺文姜)、《载驱》(刺齐襄公);《唐风》有《扬之水》(刺晋昭公)、《采芣》(刺晋献公);《秦风》有《驷驎》(美秦襄公)、《黄鸟》(刺秦穆公)、《渭阳》(秦康公念母);《陈风》有《株林》(刺陈灵公)。等等。^①文学语言其表,美刺其里,美刺无不有道德标准可宣,此正语言哲学的做法。

① 有关《国风》里的史诗诗篇的说法,参考了金启华《诗经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二、以“我”“知”及篇章、语义格式化看《诗》旨

以上我们或可说“从单篇纵向而及于若干篇的横向”说《诗》的语义逻辑。现在我们“从代表性的网结入手作横向链接而知纵向深入”。例如,一个“我”字,全书共收录 573 个,是最多的用字之一。“我”参与了哪些有代表性的构成呢?一是“我”单独存在,在句中作主语或宾语,语义多为“我自身”、“我本人”。如《邶风·绿衣》:“我思古人。”《邶风·北门》:“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二是“我”加自身或近身事。如《召南·草虫》:“我心则降。”《周南·卷耳》:“我马玄黄。”三是“我”加他身或远身事。如《小雅·甫田》:“我取我陈,食我农人。”《大雅·皇矣》:“陟我高岗,无矢我陵。”^①这使我们得以窥见的“我”字构成的偌大的语言世界。“我”有明显的切己、自身,近己、贴身之意,即使第三种,“我”加他身或远身事,这“他身或远身事”因用“我”修饰也变得近身多了,以至于在特定语境下“他身或远身事”也带上临时赋予的亲切感。《诗经》中提及属于“少有亲切感”的“他身或远身事”,而用“我”修饰的用例是很有限的。^②即使这些有限的用例中,也还有非排他性的用例。要是从“我心”、“我思”这些切己、近身的语义结构看,又可从语言世界窥见主体世界或外部世界的广袤。例如《召南·草虫》“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知见思念君子,情感起伏跌宕的内心世界。《邶风·载驰》“我心则忧”、“我思不远”窥见许穆公夫人归唁卫侯途中遇到的阻挠

① “吾”字全《诗》只出现了 1 次,《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意为既讨伐了韦国和顾国,还有那昆吾和夏桀。与代词“吾”无关。

② 主要有:《召南·行露》“我狱”2 次、“我壖”1 次、“我讼”2 次,《豳风·七月》“我农夫”2 次、“我稼”1 次,《豳风·东山》“我征”1 次,《小雅·采芣》“我戍”1 次,《小雅·小旻》“我龟”1 次,《小雅·小弁》“我罪”1 次,《小雅·小明》“我事”1 次,《小雅·甫田》“我农人”1 次、“我髦士”1 次,《小雅·蟋蟀》“我劳”1 次,《大雅·烝》“我龟”1 次,《大雅·柔桑》“我圉”1 次,《周颂·振鹭》“我客”1 次,《周颂·有瞽》“我客”1 次。计 20 次。

救卫国的奇怪情形。《大雅·云汉》“我心惮暑”窥见当时旱灾肆虐，民不聊生，而王公大人则不顾百姓死活。如此等等。

又如《诗经》用了 47 个“知”字。从字面上看，都是“知道”、“知识”的意思。但从“知”的对象看，则又别有所见。如“知德行”，《邶风·雄雉》：“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按：zhì，凶狠）不求，何用不臧（按：善）！”女子因丈夫久役在外而谴责无数官员乃至王公大人“不知德行”，而她的丈夫是“知德行”者，他不嫉妒伤害他人，不对人求全责备，何用为不善而独使远征不归？可知彼之时代以不嫉害，不求备为公德，人当知之。又如“知命”，《邶风·蟋蟀》：“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原文指婚姻之事，当知父母之命。《诗经》里有天命、帝命、王命等组合，此处是人的命使。《唐风·扬之水》：“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按毛传和郑笺，这里的“命”是政命。《小雅·十月之交》：“天命不彻，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按郑笺和孔疏，这里的“天命”也是王命。可见《诗经》里“命”是人的命令居多。《诗》说到底是民间歌谣，“命”没那么复杂，少置于冥冥之中，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于是，可以说，《邶风·蟋蟀》之“知命”，乃至全《诗》说知晓之命，以“人之命”居多，可见，列为“知”的对象，是人间被称为某种必然性的事，与西方久已有之的“绝对命令”是两回事。又如“不知其秩”、“不知其邮”，即“知常规、礼仪”，“不知度制”而过分。《小雅·宾之初筵》批评喝醉了“不知其秩”、“不知其邮”。《毛传》：“秩，常也。”《孔疏》：“不自知其常礼，言其昏乱礼无次也。”《郑笺》：“邮，过，侧倾也。”^①这是结合实际生活讲的，言知常礼，知度而不过分，知己过，成为《诗经》里“知”的又一重要内容。又如“知政情治事”、“知某种信念”。《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天帝，实际上指文王自己，是文王告诫自己。《郑

① 邮，通尤。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邮，假借为犹。”犹，同“尤”，过失。《尔雅·释言》：“邮，过也。”郝懿行义疏：“过，谓失误。凡非议人及罪责人亦为过也。邮者，古本作尤……通作尤。”过失，超过限度而犯错误之谓。

笺》：“不长诸夏以变更王法者，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不识古不知今”，实际上是“既识古又知今”，依“天之道”而实行之。《大雅·荡》：“民之靡盬，谁夙知而莫成。”莫，暮。按《郑笺》，卫武公责备周厉王于政事无知，哪有早知民情治事而暮成的？将应有所知的政情民情，治事之宜视为一种政治信仰奉为“天之道”而须知之，是那个时代的认识风尚和习惯。责厉王无知，又反映那个时代在认识领域内的民主精神。实际上，在“知”字的平台上，“知人”最多，尤其是以“我”为对象的“知我”。“知我”，就是要别人来了解我，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性的呼唤。《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窶且贫，莫知我艰。”是一名小官员抱怨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活的艰辛和内心的痛苦。《卫风·芄兰》：“虽则佩觿，能不知我？”知我内心之情思。《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宗周颠覆之哀，犹言知我亡国之痛。《魏风·园有桃》：“心之忧也，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抱怨不知我忧患之心。《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没有人知我征战之苦。《小雅·何人斯》：“及尔如贯，谅不知我，出此三物，以诅（zǔ，盟誓）尔斯。”不知我的政治态度如何。《小雅·雨无正》：“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yì，劳苦）。”毛传：“无复知我民之见罢劳也。”不再有人知道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苦难。《小雅·苕之华》：“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按郑笺的说法，我，我王。知我王的政治如此，生不如死。由以上看来，涉及“我”的内心世界的诸多方面，从“我”的情思到“我”的亡国之痛，从“我”的日常生活的艰辛到“我”的征战之苦，无不在内。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我”的主观世界的丰富性。最后两例，已由“我”个人转指“我百姓”、“我王”，正说明“我”的实际所指在语言使用中的变化，这也是复杂的实际生活的反映。又如“知而作”。《大雅·桑柔》：“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不知实情而作诗，就会如鸟儿那样，有时被人射中。得其反是务知实情而作

诗。又如“不知其故”，即知道某事的原因。《大雅·云汉》：“胡宁瘼（按：diān，困苦）我以旱，憯（按：cǎn，竟然）不知其故。”不知大旱灾的原因。又如“不知其玷”，即不知道自己的污点。《大雅·召旻》：“皋皋訚訚（按：叽叽咕咕，訚，读 zǐ），不知其玷。”从上面的举证看，《诗经》47 个“知”字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认知所及和认识水平，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强调认识中的“度”和自我反思，即要认识自己。

在读《诗》的过程中，我们还无例外地发现了篇章的格式化、语义的格式化。例如《齐风·东方之日》首章：“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第二章：“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按：tà，内房）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只有两两相对的八个近义或类义字不同，且两章的意义基本相同。从篇章结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看，当然是相同的，结构同，意义同，两者有了太多的同一性。这种现象的发生，是诗歌情感作用的结果，否则不可能出现。这就告诉我们，情感的格式与理性的格式是不同的。不同的情感格式固然可以多项存在下去，但相类同的情感格式也可以多项存在下去，而理性格式只有相异才能存在下去。《诗经》的这种格式化，无疑是人类心灵的流露，当然也是对人类心理世界的全面的揭示。我们甚至可以去分析每一首诗的情感格式的类别，作用，重复本身的同一性和差异度。例如《齐风·卢令》，全诗赞美猎人，共三章，分别以猎狗的不同颈环为情感格式类别标记：颈环响铃铃、颈环环套环、颈环套双环，作用是使情感借以从猎狗转移到猎人，全诗同一性在赞美猎人，差异在首章赞“美且仁”（外表美，品质好），二章赞“美且鬻（按：读 quán，郑玄释为勇壮）”（又美又勇敢），三章赞“美且偲（按：读 cāi，毛传：‘偲，才也。’）”（外表美，有才华）。如果把每首诗都分析过了，也不是不可以画出《诗经》情感格式类别谱系图，借以窥见公元前 500 年左右华夏族人的感情大貌。当然，并非每首诗各章都是同一的，有的诗篇各章既有同一点，又有相异点。例如《唐风·葛生》一、二章同一，与三章，特别是与四章、五章相异，从同一转入相异

的关节点是：一、二章写妻子失去丈夫后的凄痛悲凉，四、五章写夏日冬夜难熬岁月。情感上从同一转入相异的关节点的整理，自然会看到远古先民情感生活依时依境的变化方式和一般走向，这一般走向是古今无大别的。《诗》的研究简直是人类情感生活的实验基地。

主要参考文献

陈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文光图书公司印行，1971 年版。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金生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论《三礼》主体名式和类旨^①

《三礼》难读,特别是《周礼》和《仪礼》,佶屈聱牙,繁文缛礼,巨文琐细,有何办法举其要而统其类吗?有的。可先把握其纲类及其内在逻辑而读之。

《三礼》之中,《周礼》、《仪礼》为经,《礼记》固然是经,但写作体裁为记,为解释之言,如《王制》记制度,《冠义》释仪文,《中庸》说学术,《学记》演绎学习论和教学论,《檀弓》有“哲人”,《玉藻》论尊卑,《坊记》即“防记”言“度”,《缙衣》可知古代道德观念的固化,如此等等。但解经之言亦为经,历来合称为“三礼”,将经文与解释文字合而观之,正好是语言哲学的做法。

什么是“礼”?从语言文字看,《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豊,行礼之器,从豆象形。”“礼”字是形声兼会意,声旁“豊”字又是个象形字,可见“礼”字是会意表意,形声表意。是汉字为表意文字体系中的典型一员。什么是“礼”?从后代文献对它的阐释看,它恰恰是语言哲学范畴中的理数、度制、制约规范。《荀子礼论》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它的产生皆有所本,但加工而最后形成“礼”,不能不说,认识上正是由所本之意象而走向概念之“礼”的。故《荀子礼论》又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按:性)之本也,先祖者,类(按:族类,血缘关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天地、先祖、君师,都很具体,可成象,而性、类、

① 本文原载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十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治则抽象成概念,皆为礼的内容。

一、《周礼》六官正名系统

“礼”既为度制,制约规范,《周礼》当然三代之周的制度,最重要的制度是治事官吏制度,《周礼》原名“周官”,名称反映本意,不是偶然的。故研《周礼》者可从官吏制度讲起,这实在是抓住了关键。

六 官	长(卿)	贰(大夫)	职 掌	与明清官制对比
天官	冢宰(大宰)	小宰	治典	吏部
地官	大司徒	小司徒	教典	户部
春官	大宗伯	小宗伯	礼典	礼部
夏官	大司马	小司马	政典	兵部
秋官	大司寇	小司寇	刑典	刑部
冬官	(大司空)	(小司空)	(事典)	工部

从孔子“必也,正名乎!”和“吾从周”的抱负看,《周礼》六官、卿、大夫及其职掌,应当是他的向往所在。上古职官的研究,实在是以治事职责为主要内容的正名研究,原书中六官分职,卿、大夫之职等的具体化、明确化,本身就成了名分系统结构。《周礼》,说到底是构想中的西周中央政府体制结构系统图表。

《周礼》五官(《冬官》早佚,西汉时河间献王、景帝子刘德以《考工记》补之)的内部结构相同。以《天官》为例,卷一《天官冢宰》有经文(按:实际上是《天官》的总的经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紧接着讲天官的“治官之属”从“大宰卿一人”到“徒四人”,据笔者统计,共 3 960 人。如果说“天官冢宰”可拟比宰相,宰相领导下的中央政府部门,如减去徒 2 204 人,奚 672 人,工、贾、竖奄、女奴、晨阍 219

人,共3 095人,至少也得有865人组成。^①卷二讲“大宰之职”:

一有“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这六典就是上表内的“六典”,大宰都要过问。治典的职责是: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教典的职责是: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郑玄注:扰,犹驯也。礼典的职责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政典的职责是: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刑典的职责是:以诂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事典的职责是: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总目标是掌六典,治国家。从以上看,治理的对象在邦国,治理办法有:经、安、和、平、诂、富。治理的对象在官府(百官),治理办法有:治、教、统、正、刑、任。治理的对象在万民,治理办法有:纪、扰、谐、均、纠、生。可谓治理对象有三,治理办法有十八。形成了大宰“掌邦六典,佐王治国”的名理系统。从治理对象、范围、内容看,天官冢宰治官之属的大宰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国君。大宰即冢宰,卷一“治官之属大宰卿”郑玄注:“变冢言大,进退异名也。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列职于王则称大。冢,大之上也。”《尔雅·释诂上》:“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论语·宪问》:“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冢宰即大宰,由郑注、语言文字学而决之。或谓冢宰职衔,大宰职位。从其所掌六典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要管。

二有“以八法治官府”,“八法”指“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这八种治理方法都有各自的目标:官属“以举邦治”,官职“以辨邦治”,官联“以会邦治”,官常“以听官治”,官成“以经邦治”,官法“以正邦治”,官刑“以纠邦治”,官计“以弊(按:裁断)邦治”。总目标是治官府。

三有“以八则治都鄙(按: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家子弟的食邑)”,“八

① 孙诒让说:“大凡可计者,总三千九百八十人。”又说:“凡正官自卿至庶人,总三千三十三人。”其中卿至胥763人。参见《周礼正义》第一册第57页。

则”指“祭祀、法则、废置、禄位、赋贡、礼俗、刑赏、田役（按：打猎征集徒役）”，分别用来节制或驾驭神、官、吏、讲学道艺之士、财用、百姓、威势、民众。总目标是治都鄙。

四有“以八柄诏（按：告知，佐助）王驭（按：统制）群臣”，“八柄”指“爵、禄、予（按：赐予）、置、生、夺、废、诛”，分别使用可以使群臣尊贵、使其富有、使其得到赐予、使其得到重用、使其死罪得免、使其家产抄没、使其削职为民、使其死罪难逃。总之，可以助王驾驭群臣。

五有“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八统”指“亲亲、敬故、进贤、使能、保庸（按：指抚慰有功者）尊贵、达吏（按：考察举荐官吏）、礼宾（按：礼遇宾客诸侯）”，具体职责未详说，但由其名义，因汉语的构词特点，已大略可明，概念、事实意义上的职责已存在于词组意义之内，无需赘说。总目标是助王驾驭万民。

六有“以九职任万民”，“九职”指“三农、园圃、虞衡（按：指山林川泽的劳动者）、薮牧、百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分别用来引导万民就业，使各尽其力，生产九谷、“毓草木”（按：培育瓜果蔬菜）、生产山货木材水产、从事畜牧业、造作器物、经商使货源不匮乏、女工治丝麻、厮役奴婢采集野杂果品、傭工随时受雇用。总目标是“任万民”。

七有“以九赋敛财贿”，“九赋”指“邦中之赋（按：国中的地税）、四郊之赋（按：为距国都百里，四郊六乡之地税）、邦甸之赋（按：为距国都一百里至二百里之内的地税）、家削之赋（按：为距国都二百里至三百里，国君直辖地之公邑及卿大夫的采邑之地税）、邦县之赋（按：为距国都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地税）、邦都之赋（按：为距国都四百里至五百里之地税）、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弊余之赋（按：公用之余财）”。具体目标未详说。总目标是，以九种赋税为国家积累财用。

八有“以九式均节财用”，郑玄注：“式谓用财之节度。”“九式”指“祭祀之式、宾客之式、丧荒之式、羞服（按：王者之膳羞衣服）之式、工事之

式、币帛之式(按:谓聘问幣齎财用法度)、刍秣之式(按:谓养牛马之禾谷所需财用法度)、匪颁之式(按:谓分赐群臣所需财用法度)、好用(按:恩赏)之式。具体目标未详说。总目标是,以九种用财的法度来全面调节财用。

九有“以九贡致邦国之用”,贡,贡献,捐赠。“九贡”指“祀贡、宾(按:通宾,宾客)贡、器贡、幣贡、材贡、货贡(按:献金玉龟贝之属)、服贡、旂贡(按:同游,林尹说,献玩好之物)、物贡(按:捐赠土特产)”。具体目标未详说。总目标是,以九种捐赠法来取得国家的特需用品。

十有“以九两系邦国之民”,郑玄注:“两,犹耦也,所以协耦万民。”“九两”指“牧、长、师、儒、宗、主、吏、友、薮”分别如何与民协调关系:邦国之君以土地协万民,官长以尊贵的爵位赢得万民尊重,师长以贤德得到人民的尊敬,儒士以才干信服于民,大宗子以敦睦宗族以万民,宾寓之所的老板以贷利协民,官吏以治协民,朋友以诚信榜样协民,管理泽薮者以富民得民。总目标是,以九种团结人的办法协万民。值得注意的是,九种团结人的好办法都很实在。

冢宰如何将以上付之实施?一是择吉公布法典,并选贤任能,设置机构,务必循治典治邦国,治则治都鄙,治法治官府,“官成”治万民,礼义待宾客五大项。二是祭祀、朝觐会同、大丧等大事,要立足于赞王命,戒百官,不失礼。三是“凡邦小治,则冢宰听之,待四方之宾客之小治”。四是年终考核,“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五是每三年,“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以上详述《周礼》最大的官员大宰十职五实施。其十职,如以“冢宰十职”为一级,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为二级,以治典……事典、官属……官计、祭祀……田役、爵……诛、亲亲……礼宾、三农……闲民、邦中之赋……弊余之赋、祭祀之式……好用之式、祀贡……物贡、牧……薮十组词语为三级,实在形成了一个

大的语义系统。其内部的含义如前所述,是政治学的,组织学的,社会学的。不能不说这是个语言哲学图景。

其余,如《天官冢宰》里的小宰之职、宰夫之职也都是这样的构成。地官等其余四官的设计,内容不同,但构造一如《天官冢宰》。《周礼》是一个庞大的官僚制度正名体系。当时并没有实施,所以说孔子的向往也是盲目的,至明清竟然实施了,何以如此前瞻!

二、《仪礼》八大纲及其系统名义

《仪礼》西汉时只称《礼》,如《史记》、刘向《别录》,或称《士礼》,或称《经》。东汉并无《仪礼》之名,《汉书》里的《艺文志》、《儒林传》也只称《士礼》,或称《经》。《仪礼》这一名称,今可见于郑玄注,《十三经注疏》首篇“仪礼,郑氏注”即此。但《仪礼》书名不是郑玄所加。清代学者黄以周说:“《礼》注大题《仪礼》,当是东晋人所加,东晋人盛称《仪礼》”^①周公制礼,是历史的共识,故古文家把《仪礼》说成周公所作。今文家把《仪礼》的作者说成孔子,也找到了证据。^②西汉高堂生传授今文十七篇,名为《士礼》;《礼记·礼运》记孔子答子游问,言《士礼》之八大纲^③,

① [清]黄以周《礼书通故》,中华书局2007年版,王文锦点校本第一册,第4页。一说东汉王充《论衡谢短》篇已见《仪礼》书名,不确。《论衡谢短》篇:“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佚《礼》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何在?而复定仪礼,见在十六篇,秦火之余也。”黄晖校曰:“此作‘仪礼’,字误倒也。或以‘仪礼’为《礼经》,失之。……且《礼经》有《仪礼》之名,始自《后汉书郑玄传》,(吴承仕《释文序录讲疏》谓始自《晋书荀崧传》。)仲仁未及称也。”(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60—562页)

② 《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为孔子作《仪礼士丧礼》之证。

③ 《礼记·礼运》记孔子答言偃(子游)问,云:礼必“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蒋伯潜《经学纂要》据邵懿辰《礼经通论》改“御”字为“乡”字,见该书岳麓书社版1990年12月第1版第22页。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三礼》第九条称:“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见该书。又《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可比照两处之说作内校,亦知孔子已先明彼之《士礼》八大纲。孔子能越出繁琐,揭举八大纲,甚可贵。今仍之。

正合今《仪礼》十七篇之纲,但西汉和河间献王得《古礼经》五十六篇,有吉、凶、宾、军、嘉五礼,今《十三经注疏》本无军礼,可见《仪礼》不止十七篇,但古礼早佚,也很难证《仪礼》有五十六篇。今古文的区分,最早只是用字上的区别,按钱穆的说法,“战国以前,旧籍相传,皆古文也。战国以下,百家新兴,皆今文也”。^①东汉刘歆经学始有今古文之争,这是另一回事了。十分重要的是,注释大家郑玄合今古文,细分八大纲之十七篇为五十卷五十一篇,当为可信之定本。《周礼》是政府体制之正名系统,《仪礼》是社会礼规仪文之名义范道。《周礼》正名之散,聚于六典、八法等九式,《仪礼》名义之散,聚于礼之八大纲四大类。人说礼书难读,繁文缛节,君不知,提挈全书纲目,繁琐也变绕地星月,有其中枢。现以八大纲分类序目如下:

八大纲 四大类	篇 名	刘向别 录本次序	戴德本次序	戴圣本次序
冠纲、昏 (婚)纲类	士冠礼	一	一	一
	士昏(婚)礼	二	二	二
	士相见礼(附)	三	三	三
乡纲、射纲类	乡饮酒礼	四	十	四
(续上)	乡射礼	五	十一	五
	燕礼	六	十二	六
	大射	七	十三	七
朝纲、聘纲类	聘礼	八	十四	十五
	公食大夫礼	九	十五	十六
	觐礼	十	十六	十七

① 参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0页。

(续表)

八大纲 四大类	篇 名	刘向别 录本次序	戴德本次序	戴圣本次序
丧纲、祭纲类	丧服	十一	十七	九
	士丧礼	十二	四	十三
	既夕礼	十三	五	十四
	士虞礼	十四	六	八
	特牲馈食礼	十五	七	十
	少牢馈食礼	十六	八	十一
	有司彻	十七	九	十二

今《十三经注疏》本、《士礼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0998、0999号)《仪礼》均按刘向《别录》本次序。由上表可知,戴德本分作三大块,戴圣本分作六块,戴圣本次序最乱。

《仪礼》四类八纲十七目,纲、目亦类,本身就是语言哲学范畴的分层组合。不仅如此,全书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四篇之外,其余十三篇都有“记”附在本文后,均以“记”字为标志。如卷第一《士冠礼》“记:冠义,始冠,缁布之冠也”以下(《丛书集成初编》本9页),卷第二《士昏礼》“记: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以下(丛18页),卷第三无,卷第四《乡饮酒礼》“记:乡朝服而谋宾介”以下(丛39页),卷第五《乡射礼》“记:大夫与,则公士为宾,使能,不宿劫”以下(丛65页),卷第十五《特牲馈食礼》“记:特牲馈食,其服皆朝服”以下(丛232页)今文家以经文为孔子所著,“记”当然就是教弟子时弟子的记录的经文的解释语了。经、记合一,犹如《易》将卦爻辞经文字与彖传、象传、文言合——样,是经与经注合一例。但经与记的区分仅是写作体裁上的,它们都是经,“附经之‘记’本来就是经文的组成部分”。^①《仪礼》

① 参见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的经、记合一早在西汉时已然,但传之附于经、记,据元代敖继公的研究,肇始于郑玄《仪礼注》。现在来看看八大纲的内容:

冠纲,仅《士冠礼》一篇。讲古代士之子的成丁礼。男子二十岁成人在祖庙内举行,参加者有冠者本人,冠者父兄,有司之政教命告者佐主人问筮,有司之筮祝者卜吉凶而答。是伴有祭祖、问卜等仪规的礼仪。它表明“童言无忌”的年代已经过去,开始进入礼仪系统,故它是行礼的开始,仪式十分庄重。《礼记·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又说:“重礼,所以为国本也。”已冠,命以字,除了君父以外,谁也不能直呼其名,而称其字。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也很繁琐,如有意演绎上古成丁礼,可以此为脚本,恐怕导演也会深厌其烦的。我国成丁礼几失传,但它很有教育、文化意义。

婚纲,有两篇,实际上也只有一篇。《士昏礼》叙述了士子从求婚的成婚的全过程。分六个正式的过程,又叫“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之前已有个“下达”,就是央求媒氏通达求婚之言,待女方同意后再“使人纳其采择之礼”。纳采时用雁为贄,“取其顺阴阳往来”之意。问名是问女方姓名,归卜于庙问吉凶。纳吉也用雁,告知问卜吉祥,初定婚事。纳征,征,成也,纳礼品以订婚。请期是男方卜定日期,由媒氏往告女方,请求对方同意。亲迎是到了婚期父命新郎迎妇,归而合卺。《士相见礼》附于此。古代经人介绍正式相见,礼节也挺多的。

乡纲,乡里敬老示孝,寿越高,礼越尊。《礼记·乡饮酒义》:“民知尊长养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社会活动,自我教育,敬老示孝,王道化育,但那一主一宾,一举杯,一投箸,可谓点点滴滴,无不讲究,无不使束缚于礼,近乎摧残个性,实际上

也就把行孝的内容给过分的形式化而被消磨完了，当然也就很难实行下去。

射纲，射，古代以君臣、长幼、礼法等礼仪规范内容为游戏规则的射发、竞赛活动，竞争游艺。宋范仲淹《阳礼教让赋》：“睹射饮之斯在，知政教之所由。”可知这项活动的真正含义。古代先饮后必射。《礼记·射义》：“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既然是竞赛活动，竞争游艺，当然就有吸引力，实际上是寓教于乐的设计。从“教”的方面说，《论语·八佾》：“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射义》：“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要是射不中而失败了呢？《礼记·中庸》：“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按：zhēng hú，箭靶的中心），反求诸其身。”“教”作为游戏规则来设计，当然就更详细了。

朝纲、聘纲类，聘问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互派大夫到对方去聘问，它是诸侯国之间的一种外交礼节，《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不仅如此，天子有下聘诸侯之礼，诸侯也有上聘天子之礼。《仪礼·聘礼》：“聘礼，君与卿图事。”这个“君”字，可以是诸侯国君，也可以是天子，或春秋早中期多指天子，中后期多指诸侯国君。《礼记》仅《聘义》一短文解释聘礼，但古代典籍和注释中还有不少。清黄以周《礼书通故》第二十八归纳《周礼·秋官·小行人》：“朝、覲、宗、遇、会、同，为诸侯事君之礼，存、覯、省、聘、问，为天子报臣之礼。”还指出《公羊传·隐公七年》“天王使凡伯来聘”何休注：“古者诸侯有较德殊风异行，天子聘问之，当北面称臣，受之于大（太）庙，所以尊王命，归美先君，不敢以己当之。”^①天子称臣，归美先君，自我谦卑，也算是件好事，

① [清]黄以周《礼书通故》，第三册第1195页。《小行人》文字可参见艺文印书馆本《十三经注疏》《周礼》第567页下栏。《公羊传》何休注文可参见艺文印书馆本《十三经注疏》第38页。

是彼之时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反映。觐见是诸侯国朝见天子的礼节。到战国时期,聘礼、觐礼几废。

丧纲、祭纲类,表内前四篇是丧礼,后三篇是祭礼。《易传》云:“古者丧期无数。”《仪礼·丧服》规定丧期一般均为三年,这一规定按对象讲了各自的种种繁琐理由,但规定为三年,是一历史的进步,《礼记·三年问》又改成“二十五月而毕”,时间太长了影响生产和生活。古代丧制甚严格,但严中有真意,反倒透露出一些奴隶制民主思想。如在朝为官,居丧不为吉服。胡培翬说:“(士)若在王朝遭丧,亦当如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丧冠’,而岂遂吉服乎!”^①意即父母之丧高于君王政事,后代丁忧挂冠屏居服丧,与此同为仪规。《礼记·中庸》说:“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丧祭涉及鬼神,到底有没有鬼神?儒家对此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视的,重视的是它的实际价值,《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可以说,儒家的丧祭,是以对人的尊重,亦即所谓终极关怀为起点,以社会治事为目标的一整套的设计,具体设计的做法后代逐渐淡化以至于不实行了,但理念事实上一直延续。丧礼四篇中,前三篇是丧礼的仪式,后一篇是丧礼的制度。

《仪礼》是西周时代的礼,从人伦日常生活看,即使在当时,也是严细求备的理想化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礼仪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仪礼》书成了上古文化、上古社会生活的镜像,不是繁琐的表述内容,而是那些名物词语,可以凸显且因内容的挤压必然凸显出来的当下说礼的名物词语,成了上古社会的另一种图景。这一图景比起繁琐的表述来,更具有科学性和现代研究价值。后代“‘三礼’名物词”的研究由此而逸出。研究名物词的目标仍可指向《仪礼》的文化内核,如要研究《仪礼》

① [清]胡培翬著《仪礼正义》,段熙仲点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二十四,第二册第1523页。

盥洗说,则可由研究一组盥洗器物的词语而切入之,如“洗、盥、料、槃、匱、箠巾、盆”等。^①从繁琐表述到名物词系统的改作,最早的可推郑玄《三礼注》。如将繁琐的文字表述凿空,剩下的名物系统就成了《仪礼》的主要层面,这时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仪礼》的名义系统吗?上文以内在于《仪礼》的八纲四类研书全书,也是一种名义系统。

三、《礼记》八大类义例要旨

《礼记》共 49 篇,是西汉戴圣(小戴)纂辑所见散篇而成。“纂辑”本也是语文学的构成方式。从“记”字看,可知它是注释体裁,书中若干篇目,如“丧服类”十二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可看作《丧大记》的下篇)、《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祭祀类”四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可直接用于解释《仪礼》丧纲、祭纲类。“吉事类”七篇:《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可直接用于解释《仪礼》乡纲、射纲类。^②《仪礼》也有戴圣本,两书呼应相足,遂成必然。除以上 23 篇外,篇名明显用注释体裁而成者还有:《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坊记》、《表記》、《乐记》,有 7 篇。注释体可计 30 篇,占全书 61%。注释体,正是语言哲学的重要表征。

49 篇的分类,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在各篇的篇目下引东汉注释家郑玄《目录》概述各篇思想内容,并云“此于《别录》属某某”。这是西汉刘向校书时作出的分类,今可看作校勘家刘向和注释家郑玄的共同分类。循此绌绎,可得刘、郑八大类:

① 参见张光裕《仪礼盥洗说》。载《三礼研究论集》,李日刚等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② 一般认为,专释《仪礼》者有八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祭义》、《丧服四制》。

“制度”类五篇:《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

“通论”类十六篇:《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
《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記》《缙衣》《儒行》
《大学》

“明堂阴阳”类二篇:《月令》《明堂位》

“丧服”类十二篇:已见上文。

“子法”类二篇:《文王世子》《内则》

“吉事”类七篇:已见上文。

“祭祀”类四篇:已见上文。

“乐记”类一篇:《乐记》

我们认为,从思想内容上看,八大类可加合并成三大门类:一类是概述礼意要旨,由“通论”类 16 篇和“乐记”类 1 篇组成。一类是古代礼仪制度,由“制度”类 5 篇和“子法”类 2 篇组成。一类是古代文化史,由用于解释《仪礼》的“丧服”类、“吉事”类、“祭祀”类和上古“明堂阴阳”共 25 篇组成。第一门类的内容最丰富。

著名的《礼运》孔子大同思想,曾是康有为维新思想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武库。“小康”一词,仍为今天所常用。文中以“礼运”看作“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转旋之道”,而“大同”就是理想中的目标,十分重要的是,“大同”是一个和谐社会的模式,“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在彼之“众以为殃”的“小康”时代,“礼”的作用是什么?当子游“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时,孔子阐述了一系列的礼治思想。主要有:一是礼的实质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依据是《诗·邶风·相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亦足见《诗》的理念价值和解释作用。二是对夏礼、殷礼的评述,可补《论语·八佾》言夏礼、殷礼之不足。三是讲礼对人类的规范作用,从饮食、祭祀到夫妇,从茹毛饮血到当下。四是痛陈周道之衰,张扬礼的“治世”和认识作用:“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

俟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最后还讲了一段类似《论语·子路》说“正名”的排句：“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背）、小臣窃，刑肃（按：严峻）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又说：“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这里，政、君位、刑、法、礼，当然是十分现实的，但无妨作为概念范畴来看，其间的排比、递进、相承关系十分明确，因而是名义、名理在现实中的反映和阐述。如此看来，《礼运》乃至《礼记》全书孔子思想的阐述，比《论语》要深刻而激荡得多，竟出现了大同、小康、礼为君柄，道为君固，乃至以《诗》释礼等名学思想。历来研究孔子的学者，大都抓着了《论语》，而对《礼记》中大量的孔子言论还未引起重视。

《大学》、《中庸》被朱熹合《论语》、《孟子》为“四书”，明清科举以“四书文”（八股文）取士，久成士子弦诵之书。《中庸》据《史记·孔子世家》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大学》被朱熹看作曾子所作。这样，“四书”被看作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以贯之的儒家道统，且《大学》言心，《中庸》言性，正合宋儒理学“心性”之说。以上可说是二书的存在价值，现在来看看《礼记》原典中的二书本来意义。

《大学》，即大学问、博学之意。实可分五个层面：一是内心之诚；二是行为之德；三是德学相承一致，以德为学；四是格物致知，日日求新；五是明德博学治国。一说如提出了“道德、学问、修养”循环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诚其意。”即士之九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二说如“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康诰》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三说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所先后则近道也”。四说如“致知在格物”。“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五说如三说和二说所例。此五说可谓以“诚”为起点,展开道德、学问和治世。“致知在格物”一语,明谓知识论,本体的认识是“诚”和德。心性之诚,道德文章,格物致知,儒学之本体论、道德论、知识论,形成“大学”即大学问的三大支柱。

《论语》里的中庸,主要从“‘怎么做’才叫中庸”去讲的,《雍也》“中庸之谓德也”,“民鲜久矣”,《先进》“过犹不及”等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礼记·中庸》则讲了性命道本、中庸之道实行论、忠恕一贯之说与中庸、礼智仁勇等与中庸、至诚之生生不息之道与中庸、至圣之德与中庸、君子之道与中庸等。可见从本体论、实行论、方法论、道德论、合乎《易》理的辩证运动论等方面阐述了中庸。从性命道本说中庸,如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实行论,如说:“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忠恕一贯之说与中庸,如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庸(郑注:犹常也)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按郑注,此句话是说圣人之行有过人之处,但不强加于人,按常礼办事),言顾行,行顾言。”礼智仁勇等与中庸,如说:“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jié,绊倒),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至诚之生生不息之道与中庸,如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至圣之德与中庸,如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审察,足以有别也。”君子之道与中庸,如说:“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十分重要的是,较《论

语》不同,《礼记》提成了“时中”,“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即按当时实情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取其合理的内核,则应当是把握住矛盾的双方,用同一性原理来把握对象的实质。中庸,说到底就是寻找一定的“度”,而“度”正是语言哲学的范畴。

《学记》是古代的一篇学习(也是一种实践)和教学(更是一种实践)论文。提出了若干至今仍有价值的见解。一是治天下“教学为先”:“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二是“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一命题是经过学、教、知、心而提出的,并非泛泛。三是学习的一般规律和流程:“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其中“离经辨志”,“知类通达”,都是语言哲学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四是教的目标就是要“喻”(说明白、让人真懂):“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以使教学收到和(平和)、易(轻松)、思(思索)的效果,“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这句话也是有丰富的语言哲学意蕴的。五要做到使学生继承师志:“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犹言简约明达,精微而善,设譬必晓,皆可说为语言哲学。六是提倡尊师重道:“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君王之于师,“当其师则弗臣也”,师可与君平起平坐(“无北面”),此“所以尊师也”,可谓至高无上了。七是关于“进学之道”,以善学者、善问者、善待问者与非如此者相对照,以言其道,如说“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郑注:功也,有功于己)之”,成为重要的“学习论”评价方法。八是学什么?要学道,学治事方法。“记问之学(按:恒订杂说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而“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等,察此可谓“有志于学”,郑注:“仍读先王之道,则为来事不惑。”可见,学在道,学在方法。九是善比况推比。云:“古之学者比物醜类。”郑注:“以此相况而为之,醜,犹比也。”又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

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按:丧服)弗得,不亲。”本体:鼓、水、学、师,喻体:五声、五色、无官、五服,喻意:和、章、治、亲。成象:五声之和、五色之章、五官之治、五服之亲。名义:和、章、治、亲。如进一步分析,还可以鼓、水为喻体,以学、师为本体。形成鼓之象、水之象,来说明学、师二名义。

此外,又如《檀弓》,据郑注为鲁人檀弓善礼,著人名名篇以显之。引人注目的是有“哲人”一说:“孔子蚤(按:通早)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颓乎?”郑注:“哲人亦众人所仰放(仿)也,以上二句喻之。”意思是以泰山、顶梁柱比喻哲人。这里的“哲人”怎么说也跟今天的“哲人”、“哲学家”一词相接近。

“玉藻”指天子冕旒,《玉藻》全篇主要讲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尊卑之异,且“随文为义,无复总科”(见“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孔疏),可谓各为正名而于日用起居显现之,亦语言哲学之内核。

《大传》据郑注为“记祖宗人亲之大义,故以‘大传’为篇”。文中以“治亲、报功、举贤、使能、存爱”为“圣人南面”之“五先”,并认为此“五先”就是治天下之“人道”,还以“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七事为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而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事为“不可与民变革者也”。“五先”十一事,既是实行的规范,也是正名系统。其中道、度、别异分类等皆明显的语言哲学范畴。

《经解》从教化和民风解经,如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等等。从为人和人品解经,如说为人“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等等。从社会作用和得失之效应后果解《仪礼》,如说“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背叛)、侵陵之败起矣”等等。

《哀公问》记鲁哀公问孔子，共问了六个问题：什么是“大礼”？今之君子为何不实行礼？人道哪个最大？如何从政？何谓“敬身”（敬重自身）、“成亲”（犹言为父母增光）？君子为何以天道为贵？孔子的回答是层层深入的，以答第五题为例：君子不说过头话，不作过分的举动，这是“敬身”，民亦因此“敬身”，“成亲”；紧接着以“正名”说回答“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紧接着，孔子提出为政之最在“爱人”，说之以四个递进逻辑排比句，不“爱人”则不能保其身，不能保其身则不能“安土”（安居），不能“安土”则不能乐天，不能乐天则不能“成其身”。紧接着，说“成身”为“不过乎物”，孔疏释为“万事得中，不有过误”。犹言以中庸莅万事，行动不要越过事理。

《仲尼燕居》，燕居，退朝而处。通篇与子张、子贡、子游纵论礼。最值得注意的是：说礼的普遍性；以“中庸”、中庸合“仁”说礼。前者有云：“使女（汝）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孔疏：“恒以礼，周旋流转，无不遍于天下。”这种普遍性的证明是通过日常人伦说的：“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①，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后者有云：“夫礼，所以制中也。”“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领，治；好，善。“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乡射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飧之礼，所以仁宾客也。’”

《孔子闲居》，使子夏侍，为之说《诗》。因《诗·大雅·洞酌》“凯弟（按：和悦）君子”句说何谓“民之父母”，以“达于礼乐之原”，实行“五至”“三无”于天下为“民之父母”。说“五至”之名，指“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说“三无”之名，指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并指以

① 给：《集韵》极入切，群纽缉韵开口三等字，今当读 jì，孔疏注释为“捷给，便僻足恭而不合礼”，敏捷巧言，心存目的。

《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夙夜其命宥密”是“无声之乐”、《邶风·柏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是“无体之礼”、《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是“无服之丧”。说《诗·大雅·洞酌》有“五起”之义，“五起”大体上是将“五至”和“三无”结合在一起讲的，如：“无声之乐（三无），气志（五至）不违”；“无服之丧（三无），内恕孔悲（哀至，五至）”；“无礼之体（三无），上下和同（礼至，五至）”，等等。说“三无私”，指“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并指以《诗·商颂·长发》“帝命不违……帝命式于九围”讲商汤之德是之。说“四时”，指春夏秋冬，并指《诗·大雅·嵩高》首章歌颂周宣王之舅申伯之德，犹圣人效仿之“四时”。全篇是子夏设名，孔子命名，或有名、名相配，或有指《诗》句为证据。从这些“名”本身看，正是《诗》中的一些网格和逻辑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沪博简第二册《民之父母》同于今本《孔子闲居》部分内容。^①如将《孔子闲居》的“五起”划分为五层，则“五起”的内在逻辑顺序为：内心世界→施及外部世界四方之地→蓄养外部世界天下万邦之民→自身道德修养→子孙。《民之父母》的内在逻辑顺序为：内心世界→自身道德修养→子孙→施及外部世界四方之地→蓄养外部世界天下万邦之民。将今本与沪简所指认的原本（古本）相对照，不仅知道原本的逻辑顺序，而且知道原本的逻辑顺序更合理。今本为汉代人改编本，改动的印记甚深。

《坊记》即“防记”。开头即说：“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如何设防？这恐怕是

① 沪简和今本《礼记》内容相同者涉及“五至”、“三无”、“五起”，无“三无私”等。沪简《民之父母》共14简，3至5简讲“五至”，5至7简讲“三无”，10至14简讲“五起”。如将今本《孔子闲居》中的“五起”依次序分为五个层次：一层“无声之乐……内恕孔悲”，二层“无声之乐……施及四国”，三层“无声之乐……以畜万邦”，四层“无声之乐……纯德孔明”，五层“无声之乐……施于孙子”，以上述五层为参照，则沪简五层为一、四、五、二、三。有关“五起”五层的划分，参见王文锦《礼记译解》下册第751、752页。有关今本《孔子闲居》与沪简《民之父母》较全面的比较，可参见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45页。

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感兴趣而又头疼的问题。孔子的办法是礼和“节文”两方面：“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郑注：“节文者，谓农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级。”规定以差别等级之条文制度，说到底是个“度”的问题。“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按：约束，受压），贵不慊（按：怨恨，不满）于上”。礼本身就有正名位、定规范的问题。“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乃至举《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因楚、越僭越称王。又说：“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意即对诸侯国君不称天，以避天子之名，对大夫不称君，以避诸侯之名，这样做都是唯恐“名”把民心搞乱。文中还多处讲到“言”“民言”的重要性。如：“君子约言，小人先言（先说大话）。”“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郑注：“酌，犹取也。取众民之言以为政教，则得民心，得民心则恩泽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

《表記》，郑注称“以其记君子之德见于仪表者也”。既显现于仪表，就会形成很多可掬、可摄之“象”。例如，因君子“三不失”，不失足、失色、失口于人，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君子庄敬日强，（小人）安肆日偷（按：苟且）”。“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以仁和义为天下之规范和制式。行仁者等的模样，“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在仁和道和义的具象比较中各见其本质，“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中国古代道德哲学形象多多，是不同于西方说教之所在，今言道德，“表記”而出之，具象必多。又称：“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憺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孔颖达疏：“仁有数者，行仁之道有度数多少也。”“言仁有数，则义亦有数，义言长短大小，则仁亦有长短大小，互言之也。”仁和义都有数、度数，正是语言哲学之说。

《缙衣》，按郑注的说法，“善其好贤者之厚，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也”。《缙衣》是《诗》中赞美郑武公好贤的诗，武公能供给贤者以朝服、馆舍、美饭。不是“爱屋及乌”，而是“赞贤及诗”，全文的立足点在此。全文的构成：“子言之曰”、“子曰”共 25 条，引《诗》22 条，引《尚书》14 条，引《易》1 条。其价值有二：一是多处涉及言和行的关系。二是多处引《诗》和古文《尚书》，可资考信。关于前者，完全是孔子自己的阐述。例如，关于“言不危行，行不危言”：“子曰：……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关于“言信”“行类”：“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并涉及“格、名、行、度”说：“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郑玄注：“类谓比式。行有格，同比式。比方法式。师、庶皆众也。虞，度也。”最后一句是说，政教当由你一套班子内的人共谋度，众言同，乃实行之。政令教化当一致。可以说，言、行的实质和被阐述的框架都是语言哲学的。关于引《诗》和古文《尚书》一事，今有郭店楚简《缙衣》和沪博简《缙衣》，可就引文作对照研究，还可就今本“子曰”部分的文字作对照，看出很多问题。现与沪博简对照如下：

今本《礼记·缙衣》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沪博简《缙衣》第二、三简 子曰：“为上可𡗗而𡗗(知)也，为下可𡗗而𡗗(志)也。则君不𡗗(疑)𡗗(其)臣，𡗗(臣)不或(惑)于君。”告(诗)员(云)：“𡗗(淑)人𡗗(君子)，𡗗(其)义(仪)不𡗗。”《尹𡗗(诰)》员(云)：“𡗗(惟)尹𡗗及康(汤)，𡗗(咸)又(有)一𡗗(德)。”■

郭店简《缙衣》第二、三、四简 子曰：“为上可𡗗(望)而𡗗(知)也，为下可𡗗(述)而𡗗(志)也，则君不𡗗(疑)其臣，臣不惑于君。”《寺

(诗)》员(云):“霁(淑)人君子,其义(仪)不弋(忒)。”《尹(诰)》员(云):“隹(惟)尹(伊)躬(尹)及汤,咸又(有)一惠(德)。”■

除了文字系统本身的不同外,沪博简和郭店简一样都是战国早中期简,当是《缙衣》原文。今本《礼记》是西汉人加工过的,对照后可逐一知其加工之处。这里加工的目的首先还是文字的润色,还谈不上要篡改思想内容。《尹诰》是当时《尚书》的篇名,今本伪古文《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商代前期伊尹教太甲的文字。有“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可见王肃和梅賾当年作伪时,还有点依据,并非每句话都是伪的。从内容上讲,实际上讲了三个“一”,君臣一致,咸有壹德,执义如一。“《诗》云”句的毛传:“忒,疑也。”孔疏:“执义如一,无疑贰之心。”从简本到今本三个“一”又始终不变如一,正说明上古道德概念的稳固性。道德概念的固化,这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

《儒行》,按郑注的说法,“记有道德之所行”。儒是优、和,能安人,能服人之义。孔颖达疏用声训:儒,柔。儒,濡。“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全文中心意思是“儒行数不清,因地制宜”,文中以“儒有……”式列举儒行 16 条:儒有通过“夙夜强学”以待问、待聘、待举、待取的措施;儒有言谈举止不简慢,不过谦若无能;儒有整肃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儒有不宝金玉而以忠信、仁义、多文为宝贵富有;儒有不积私财、浸渍乐善、见利思义、死不更守等品格;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杀而不可辱;儒有忠信仁义高于一切,暴政不能改其自立;儒有居室简易,不疑上谄仕;儒有身危不夺志,忧思不忘百姓之病;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儒有闻善以相告,见善以相示;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按:yù,结党),异弗非;儒有不臣不仕,分以邦土也视同锱铢,只是博学以知,据论前贤,砥砺廉隅;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不搞内耗;儒有不失志于贫贱,不失节于富贵。实际上都是实际生活中如何行仁的具体答案,故文中强调“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还有仁之作、仁之能、仁之

貌、仁之文、仁之和、仁之施，共八项对仁的理解和描写，似仁的内涵和外延皆尽。他处未见到如此论仁。故《儒行》尽论“仁”之名义。

《乐记》，郑注称“记乐之义”，可谓“论音乐”。理论要点，上篇有：音起于人心，乐为人心感于物而音比之，礼、乐、刑、政，说到底是一个意思，皆用来“同民心而出治道”；声音之道与政通，宫、商、角、徵、羽为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乱，则无敝败之音，五者乱则国亡无日；音乐通伦理，先王制礼乐是“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人性、人欲与音乐治世的关系，如人欲无节，则作乱之事频至，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乐、礼同异及其正名作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乐、礼中庸，“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中出故静，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大乐大礼为天地之象，“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乐者异文和爱；知、识、述、作之于礼、乐，“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以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说礼、乐，“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以义类聚群分说礼、乐，“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中篇还有：乐观其深，音乐“本先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度数、制式、序次、象形，无不合于语言哲学之理，“观其深”一系于此，令人深思；以音乐之象识好坏、优劣，以分类比较知取向，姦声“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从而“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由音乐象、数构成说其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作用，音乐能“著万物之理”，正声之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姦，百度得数而有常，小

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能使人伦廓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以诗、歌、舞皆“本于心”说“乐不可以为伪”；以音乐之道“备举”、“不私”，“情见义立，乐终德尊”，说“生民之道乐为大”；从“乐统同礼辨异”等乐、礼辩说，说“穷本知变为乐之情，著诚去伪礼之经”；子夏说古乐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下篇还有：子夏答魏文侯论古乐为德，为正声和音；宾牟贾侍坐，言及乐，与孔子问答 7 个“何也”，尤其是最后一问：周乐《武》击鼓警众已久，但迟迟不见收尾，何也？孔子阐述《武》乐的作用，用于灭商定鼎天下，臣服诸侯，教王族子弟等，所谓“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武》之迟久，不亦宜乎”；乐以治心，礼讲外报，乐讲内返，其义一也；音乐无论在宗庙、乡里、闺门，均能“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商代之遗声能“临事而屡断”为勇，三代之遗声能使“见利而让”为义。

以上 22 条理论要点，无非说乐的本质之道，乐的成象及其理数构成，乐的静心、定鼎、教化等现实作用。最后仍归结为言语：“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音乐，歌唱，离不开语言，离不开“言”的种种状态。22 条音乐理念，始于人心，结于言语。说其为语言哲学系统，可也。

主要参考文献

《周礼》、《仪礼》、《礼记》，《十三经注疏》第 3、4、5 册，重刊宋本，艺文印书馆印。

《仪礼》，[汉]郑玄注、[清]黄丕烈校，《丛书集成初编》第 0998、0999 册。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香港第 1 版。

李白刚等著《三礼研究论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林尹《周礼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清]皮锡瑞撰《经学通论》，河图洛书出版社 1974 年影印版。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文史出版社 1973 年版。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全二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王文锦《礼记译解》（全二册），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春秋经》和《左氏传》的若干 名例和思想^①

孔子著《春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正名实践，左丘明传《春秋》，是注释体裁，《春秋》和《左传》，可谓始于正名而结于解释之名。从二书的关系看，有对应条目，即所谓经有传有，如隐公元年经春王正月/传春王周正月，有不对应条目，经有传无，如隐公元年经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传无，经无传有，如经无/隐公元年传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第四种情况，虽经有传有，但传大段补缀，周详密致，如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传未明标五月，但紧接四月后，有“初，郑武公娶于申”长篇文章。这第四种情况，文辞富赡，藻丽华饰，是先秦史传文学作品。隐公三年的“周郑交质”，隐公五年的“臧僖伯谏观鱼”，直至哀公二十年“晋赵孟存问吴王”等皆是，共约 138 篇之多。^②有如《易》之经传相附，《春秋》亦经传相附，始于晋杜预《左传注》，杜注《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分附的目标，分附的过程和做法，都是“比其义类”，使传之于经“各随而解之”，即合语言研究体例的。

孔子著《春秋》，在周游列国回到鲁之后，周游无果，并不见用，乃退而著书。皮锡瑞认为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③《春秋》有其社会政治背景，《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有人文历史背景。《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

① 本文原载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第 15 辑，2008 年 2 月。

② 参见秦同培注译，宋晶如增订《左传精华》，广汉语译本，台湾世界书局印行。韩国外国语大学藏书号：181. 121. C55J. 18704。

③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部分。台湾河图洛书出版社 1974 年影印版，第 1 页。

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之矣。”最后一句，赵岐注：“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有邪说，以正名之说正之；有史志，特别是有鲁之《春秋》，重新编纂之，但以为素王，“其义窃之”，隐匿其中的编纂思想、逻辑指向是不同的，即有所谓“微言大义”，得以改史为经。如此看来，一部《春秋》，正名、“以为素王”而编纂、隐匿其中的名义，是其主要做法和内容。故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春秋》，就是一部充满古代语言哲学逻辑的书。

一、《春秋经》和《左氏传》经注五大名式

《春秋经传》如何读？当然是一字一句地读，如何把握其中的思想内容，当然是一段一段地过而掬取之，但若总体把握，乃至个别深入，非从属于总规则的义例入手不可，足见研究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实乃学术之途辙。晋代杜预对“如何读”作了概述，首先，孔子改史为经是有法式可循的：“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而对本经之经传义例则又具体言之。称：“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传体有三指发凡、正例、新意，不包括变例在内，而紧密结合内容而言之的五例有：

一曰微而显，意即辞微而义显，表现为“文见于此而义见于彼”，并举例说：“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绿陵之类是也。”《成公十四年传》是为叔孙侨如写的，经文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按：迎也）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据孔疏：“叔孙”是家族名，上句称“叔孙侨如”是“褒赏称其族”，因为他奉鲁成公命出使齐国，故举鲁“叔孙”之荣名以尊君命；下句回国与成公夫人姜氏俱还，属于“贬责去其氏（按：指族名叔孙）”，“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又说：“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这是“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的“微而显”

例,意即见之于文的称叔孙,舍弃不称叔孙,分别“义起于”彼之尊鲁成公命和尊成公夫人。又例:《僖公十九年经》“梁亡”,传:“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实际上是秦灭亡梁。经文杜注:“以自亡为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恶梁。”《僖公十四年经》:“春,诸侯城绿陵。”杜注:“绿陵,杞邑。避淮夷,迁都于绿陵。”《左传》:“春,诸侯城绿陵而迁杞焉,不书其人,有阙也。”杜预以“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绿陵”,是“文见于此城绿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以上三例,皆是辞微而义显例。

二曰志而晦,意即记事隐晦轻微,表现为“约言示制,推以制例”,并举例说:“‘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桓公二年经》:“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左传》则概括其例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按:三)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孔疏引杜注认为,“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以致《宣公七年经》称:“夏,公会齐侯伐莱。”《左传》:“‘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故孔疏综经传后认为:“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这一字就在于用“及”还是用“会”。《桓公二年经》用地名,避让、回避其事,实际上已用了“及”字,《宣公七年经》因“不与谋”只能用“会”字。这种情况就属于“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这种“约言示制”,可“推以制例”的名言逻辑存在于《春秋》经传本身,可谓其本身即由如此等类的名言逻辑构成。

三曰婉而成章。意即婉曲其辞,有所回避。目的是“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而成章,并举例说:“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僖公十六年经》冬十二月鲁僖公会齐侯、宋公等诸侯于淮,被执未归。《僖公十七

年传》称：“（鲁）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杜注：“内讳执皆言止。”至十七年九月获释始归，《左传》：“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杜注：“耻见执，故托讳以告庙。”像这一类事，就是“讳避”之事。又如诸侯有大功者，京师受之邑，以备将朝而宿，为“朝宿之邑”，为从巡狩而备热水共沐浴，为“汤沐之邑”。鲁因周公受朝邑于京师，名许田，郑因武公受汤邑于鲁境泰山脚下，名祊（bēng）田，周德既衰，天子不巡狩，鲁亦不朝周，郑人以祊易许，因祊薄加璧易之，加璧，这还表明某一诸侯不能专易天子之田，故《桓公元年经》“郑伯以璧假许田”，进璧借田，以示并非久易，“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于后”。以上二事，皆婉曲避忌，硬使文字合乎仁义。而实际上是僖公被执，郑伯设法永久占有京师的许田。

四是尽而不汙（wū）。意即全部讲清事实，无有汙曲垢藏。要求做到“直书其事，具文见意”，并举例说：“丹楹刻桷（jué 方形椽子），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按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漆，桷不镂刻。但《庄公二十三年经》：“秋，丹桓宫楹。”桓宫，指桓公庙。楹，柱。《庄公二十四年经》：“刻桓公桷。”按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但《桓公十五年经》：“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按礼，诸侯之间不相互遣返战俘，但《庄公三十一年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以上四事，虽违礼而尽书直言，以见讥刺之意。

五是惩恶而劝善。使恶人“求名而亡，欲盖而彰（彰）”。并举例说：“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昭公二十年经》：“秋，盗杀卫侯之兄挚。”杜注称，卫司寇、守嗣大夫“齐豹作此事而不义，故书曰盗，所谓求名而不得”。本欲求不畏强暴之名，《春秋》贬抑之。《襄公二十一年经》：“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庶其是邾的大夫，叛国。《昭公五年经》：“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公三十一年经》：“冬，黑肱以濫来奔。”黑肱是邾的大夫，濫，当时的东海昌虑县。牟娄、防兹亦地名。庶其、牟夷、黑肱皆小国之臣，书之不合经例，窃地求奔，本为求食，己亦不

欲书其名,但《春秋》故书其名,使其恶名不灭。

以上五条,既是著《春秋》所遵循的隐性规则,因而是形上性质的。也是有独立的具体意义的,五条分别是说^①:辞微义显、叙事隐晦微妙、婉辞避忌、澄清事实、惩恶劝善,特别是后两条,有明确的道德和政治目的。作为内在之形上和意义具体、丰富之形下双重性质的条例,杜预认为做到了“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二、《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文例、义例的双重性

内在文例作用和外显达意示正作用都非常明显。实际上,作为文例和义例的双重条例,还可继续发掘,以进一步揭示《春秋经》和《左传》的语言哲学。例如:

诸侯元年即位(含摄行君事)朝庙告朔和非元年告朔朝正的区分例。《隐公元年经》:“经,元年春,王正月。”“经”字为杜预作注时所加,以区别于“左传”文,(有“传”字)这是说隐公始年,即公元前722年之事。元年,杜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王正月,周王之正月,用周代历法。隐公虽不即位,但摄行君事,故朝庙告朔,犹即位。此例又如庄公、闵公、僖公元年,皆言“经,元年春,王正月”七字,为某诸侯元年即位例。而另有非元年的告朔朝正例,《襄公二十九年经》:“经,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隐公元年传》:“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杜注:“言周以别殷、夏。”非摄行君事,直接书“即位”例,《桓公元年经》:“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以上经文

① 对此,《左传·成公十四年》有一完整表述:“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wū),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是《左传》自述其例,也是最重要的。而明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举证古来研究《春秋》之例者四五十家。条例研究,本质上都是经条例而深化文本意义,都是对古代语言哲学的研究。

的表述,用“元年”不用“一年”、用周历不用殷历或夏历、直书“即位”和不书“即位”、元年摄行君事犹即位朝庙告朔和非元年告朔朝正的区别,均应予注意。如果要再深入一步,为什么当书“即位”而不书“即位”,其中必有原因,如庄公元年不书“即位”,《左传庄公元年》:“传,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由杜注,可知“文姜出”之故实及导致不书“即位”缘由。其余:非元年非告朔朝正则叙其事,例《隐公二年经》:“经二年春,公会于潜。”《隐公三年经》:“经,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是说这一天有日食。等等。由以上可知,经文某年某月开头的叙事之法,并非仅仅是记时,而与事件本身的内容密切相关,事已融于时,也可说空间已深度地融入了时间,这是古人记时中的时空结合观。

“郑伯克段于鄢”讨臣用“如二君”,但不称君以国讨例,言“克”例;“母弟”例。《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据《左传》和经文杜注,不称国讨而言郑伯,讥失教也;虽失教而段凶逆,实为君讨臣,但用“如二君”例,因段强大,据大都以与国抗衡,故曰“克”,但不称“国讨”。同例,《庄公二十二年经》:“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左传》:“陈人杀其大子(太子)御寇。”经文杜注:“陈人恶其杀太子之名,故不称君父以国讨公子高,”《庄公十一年经》:“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鄢。”左传:“凡师敌未陈曰败,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僇曰克。”杜注:“谓若大叔段之比。有二君之难,而实非二君,克而胜之,则不言彼败绩,但书所克之名。”孔疏概括了此例的意义,称:“《春秋》称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既非敌国相伐,又非君之讨臣,而于战陈之例别立此名。彼传复云:‘如二君,故曰克。’故具迹叔段之事以充之。凡例乃是旧典,非独为段发,故云叔段之比,释例与此尽同。”也就是说,名例,释例,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郑庄公与共叔段同母姜氏,是兄弟关系。有云:“况君之宠弟乎?”《宣公十七年经》:“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杜注:“传例曰公母弟。”意即宣公之同母兄弟。《宣公十七年传》:“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杜注

强调说：“此策书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称公弟而母弟，或称公子。释例论之备矣。”明明是叛臣，却用“如二君”，不称君以国讨例而言“克”，明明是敌人，却强调“笃亲亲之恩，崇友于之好”。可见言“克”和“母弟”二例，意义深远，实为中庸之道和孝悌之义的逻辑化。

“书陈鱼以示非礼，书棠以讥远地”例。《隐公五年经》：“经，五年春，公矢鱼于棠。”矢，陈，陈列。棠，地名，今山东境内。杜注以此句“书陈鱼以示非礼也，书棠讥远地也”。《隐公五年传》：“传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认为到外地去观鱼，是非礼的，观鱼这件事，当属“君不举”之类。并进一步悟出行政、治天下的道理。且这一道理的阐述，以度量、规范为指向。“君将纳民于轨（按：规范，规则）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按：彰显）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此条经、传下文字，犹言具体粗物无价值，知物之理度规制，且“取材以章物采”，犹言既懂对象之理路，又备文采之形式，方可与言治政。

“称侯不书名为未结盟”例，凡例傍于经书说。《隐公七年经》：“滕后卒。”杜注据左氏传称：“传例曰：不书名，未同盟也。”《左传·隐公七年》：“春，滕后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杜注称：“告终”为告亡者之终，称嗣位之注，当奉而不亡，方可继好和亲，让百姓休养生息，而“谓之礼经”云云，“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①足见凡例之大，大至为经书自身抽绎。《左传·隐公十一年》：“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不书于策”一句，明礼经皆当书于策，杜注：“仲尼修《春秋》，皆承策为经，丘明之传，博采众记，故始开凡例，特显此二句，

① 对此，皮锡瑞从今文经的观点出发，否定了这种看法。《经学通论》，《春秋》部分有“杜宇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驳之甚明”条。

他皆仿此。”“二句”指“谓之礼经”和“不书于策”。杜注之意，即《春秋》和《左传》的凡例，溯其源皆由上古经典引出。凡例傍于古经，能不重视吗？

“诸侯来朝”例及合言、别言例。《隐公十一年经》：“春，滕侯、薛侯来朝。”杜注：“诸侯相朝礼，在文十五年。”《文公十五年经》：“夏，曹伯来朝。”《左传·文公十五年》：“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桓公七年经》：“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杜注：“不总称朝者，各自行朝礼也。”而《隐公十一年经》是总称来朝的，故同时行朝礼，谁是长者在先，故争。《左传·隐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

称“人”（官名）而又称字例，恶“入”例。《庄公六年经》：“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杜注：“王人，王之微官也。虽官卑而见授以大事，故称人而又称字。”孔疏称《公羊传·僖公八年》有“王人，微者”语，知此王人亦微者。而春秋之世，二字连用，有“子”字在上者，为称字标志。以卑官率少量军队救卫，不能遂民意而制止卫侯入卫，是无功也。无功而又称“人”称字，是责齐、宋、陈、蔡等诸侯逆王命，而尊王命、贵王人。“卫侯朔入于卫”句杜注：“朔为诸侯所纳，不称归，而以国逆（按：指诸侯逆周王命）为文，朔惧失众心，以国逆告也。”用“归”还是用“入”，《成公十八年经》：“夏，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杜注：“传例曰：以恶‘入’也。”

为“总众国之辞”，而《经》称“人”而《传》称“诸侯”例。《庄公十四年经》：“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左传庄公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杜注称，齐欲崇天子而请陈、曹，假借王命以伐宋，以示大顺。但《经》称人而《传》称诸侯，“诸侯”成了“总众国之辞”，犹言“诸侯们”。孔疏指出：一般认为齐人、曹人、陈人本诸侯国，故改称之。非是。为了贬诸侯而称诸侯例，可举《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卫侯毁灭邢，同姓也。故名。”此例为贱卫侯灭同姓。又例《桓公七年经》“夏，谷伯绥来

朝，邓侯吾离来朝”，《左传》称“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意思是说经书称“伯”，称“侯”时同时出现其名“绥”“吾离”是轻贱谷伯和邓侯的，此亦贱诸侯例。《左传·成公二年》：“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这里强调名位的无比重要，但原意主要是说贬诸侯，而《左传》例不称人，称“诸侯”就有多种用意。另一种是称“人”，并不是为了贬诸侯而去爵称“人”，而是“为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谓”，例《襄公三十年经》：“晋人、齐人、宋人、卫人……会于澶渊，宋灾故。”此为“澶渊大夫之会”例，非正等差之谓。

以国大小为次序例和征伐以主兵为先例。《庄公十六年经》：“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杜注：“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国大小为次，征伐则以主兵为先，春秋之常也。”《隐公五年经》：“邾人、郑人伐宋。”亦以主兵为先。孔疏引《礼记祭义》云：“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齿，年齿。并说：“而春秋序会，不先同姓，而大国在上者，孔子修《春秋》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故也。”

大都名通不系国例。《庄公三十二年经》：“春，城小谷。”杜注：“小谷，齐邑，济地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则不系国。”孔疏以“吴灭州来（见昭公十三年，州来在楚），晋灭夏阳（见僖公二年，夏阳即下阳，虢邑），如此之类，皆不系国，知大都以名通者皆不系国。”而“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见昭公二十一年）非大都，则不得以名通，故系之宋。

《僖公三十二年经》：“冬，晋侯重耳卒。”此为结盟称侯称名例，杜注：“同盟。”同年《左传》：“冬，晋文公卒。”栢有声如牛，命使击秦军。接着延续了蹇叔哭师之事。“师之所为，郑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尔何知，中寿”，都是“知道”、“已知”之意，下文“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必死其间”，是推知。这种推知是完全

可靠的,有客观依据的。

以上例大都是表达性的体例,或称语言表达逻辑例。它对内容表达是有制约作用的。如元年朝庙告朔和非元年告朔朝正之例、讨臣用“如二君”、“陈鱼示非礼”等自不必说,即使是“总众国之辞”例、次序例、名通不系国例,似为纯粹表达,也都各有内容所指,催人悟其理。无论何种,总系于战国时变,新名、恶名迭出,孔子恪守周之典礼,协调两存,或稍改不易,或否定出新,皆苦心孤诣,一字褒贬。下面寻绎思想内容方面的定格表达。

三、《春秋经》和《左氏传》的内容定格表达

《闵公元年经》:“冬,齐仲孙来。”杜注:“经但书仲孙之来,而传寻仲孙之志。”同年《左传》称齐大夫仲孙来鲁国省难,回国后告齐侯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齐侯问:该怎么办?答曰:“难不已,将自毙。”你等着吧!齐侯问:可攻取鲁国吗?仲孙答:“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还教给齐侯面对这种情况的“霸王之器”。齐仲孙可谓孔子“克己复礼”在齐国的忠实实践者。

《僖公十一年经》:“春,晋杀其大夫丕郑父。”《左传》记晋侯使者来告此事。周襄王召内使过复命晋使,但晋使接受玉瑞时懒洋洋地无所谓,内史过归告襄王曰:“晋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僖公十四年传》补经文同年冬未及:“冬,秦饥。”派人向晋国购粮,“晋人弗与”。晋大夫庆郑说:“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晋惠公舅驂鞞射不同意。说:“皮(喻所许予秦之城)之不存,毛(喻柴粮给秦)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

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虢射说不赍粮“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说：“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讎之，况怨敌乎。”不听。庆郑退曰：“君其悔是哉！”这实际上讲了外交斗争的策略，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讲究诚信，要考虑对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僖公二十二年经》：“冬，宋公与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左传》详其始末，开战时，宋襄公因“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貌似仁义的愚蠢想法，不听司马子鱼的进谏，以致失去战机。子鱼阐述战争的本质及打法云：“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不忍重创敌人，则不如不要打，若怜爱对方头发斑白者，则不如跪下服从。“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儦(chán 杂乱不整)可也”。批评了宋襄公蠢猪式的错误的战争思想。

僖公三十年经文无，《左传》同年补“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郑伯请烛之武退秦师之后，秦师在归途中晋将子犯反过来请击秦军，晋侯说，不可以，要不是秦穆公的力量我们不能到这一步（历史上曾修秦晋之好），“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按：yù，结盟，友好），不知（智）；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晋）亦去之”。“以乱易整”句杜预注：“秦晋和整，而还相攻，更为乱也。”这实际上阐述了军事行动中的仁、智、威武问题。

《文公二年经》：“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同年《左传》补述相关内容：孔子曾评述鲁重臣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知柳下惠贤而使在下位，塞关、阳关等六关地对末商无所禁约而伤害了农民，家人织蒲贩席，与民争利，为三不仁。居蔡山而用天子庙饰，纵逆祀，听任夏父跻身僖公，将海鸟爰居当作神鸟来祭祀，为三不知（智）。可见仁、智标准是用不用贤人，讲不讲民生。

《文公四年经》：“夏，逆（迎）妇姜于齐。”杜注以此为略贱之文。同

年《左传》以礼衡之：“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杜注：“礼，诸侯有故，则使卿迎。”《左传》：“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按：信）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言诚信、获信之重要。又《左传·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杜注：“出姜也，嫌于有罪，出者，异故。”

《文公七年经》：“冬，徐伐莒。”同年《左传》引《虞夏书大禹谟》：“《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左传》引文当为真古文《尚书》，“《夏书》曰”下杜注：“逸书。”可见杜预亦无关梅氏伪古文《尚书》。作为摄入《左传》的文字，左氏意在用礼立名，九歌、九功、六府、三事之名，皆古礼之演绎。最后一句，更见礼、乐对安国定邦的巨大作用。

《文公十八年经》：“冬，莒弑其君庶其。”同年《左传》针对莒乱，引《周礼》以说“事君”之礼，引三代以远用说名义。“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实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按：财富）为盗，盗器为姦，主藏之名，赖姦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器，杜注：“国用也。”以上“则、观、德、度、器、名、用”，特别是“则、度、名”，与语言哲学密切相关。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他们“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他们“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而昔黄帝有不才之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按：yín，愚顽）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嗥有不才之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譖（按：安于说坏话诬陷，譖，读 zèn）庸回（按：用邪），菑愿（按：tè，邪恶）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颡项有不才之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语，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天下之民谓之“桀杌”；黄帝的官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

冒于货贿，浸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食，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十六族”及其相反之丑类，从其几近标准化的摄像和定格表达的内容中，可见其古礼典范和违礼肇障。

《宣公二年经》：“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同年《左传》传述晋灵公夷皋不像国君的丑行。因赵盾多次进谏，灵公派鉏麇贼杀赵盾，晨往，房门开着，“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忠君，今天看这里完全是愚忠思想起支配作用，中庸成了考虑问题的方法。后来赵穿攻杀灵公，赵盾未出境而复，因史家“书法”而蒙受“赵盾弑其君”的恶名。孔子的评论是，董狐是古之良史，赵盾是古之良大夫，“越境”方可不承担君臣之义而“免之”。应该说，史家书法和孔子评论，都是中庸二元论色彩的。

《成公二年经》：“六月癸酉，齐师败绩。”同年《左传》详述这齐晋鞌之战的经过，成为《左传》如何写战争的一个名例。最后，齐侯车右逢丑父被俘，晋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齐侯忠君，晋郤献子以为是，但这是忠齐侯，而非忠晋侯，君王在两军相争中也已成了超越国家的符号。忠君，高于一切，成了最高道德标准。

《成公十三年经》：“三月，公如京师。”同年《左传》详述一要：成公及诸侯朝周天子后，与刘康公、成肃公作伐秦前的出兵祭社，成肃公大不敬，刘批评之涉及礼义本源性问题，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治国之要，在祀与戎。”从民秉受天地以生息，动作以礼义，到实施礼在勤，在敬，在养神守业，在执治国之要，本源与实际作用特成一系。战争中如何实行礼义？《左传·成公十六年》在传述著名的晋楚郟

陵之战时说：“德、刑、详（按：一种占卜祀神法）、义、礼、信，战之器（杜注：器，犹用也）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义利和礼，成了有某种自然法则的东西，顺应时节就是礼。只要“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德”，就会“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把礼、义、诚信看作战争之“器”，只要顺应自然，民生富厚，战时就会前赴后继，获取胜利。诚然，这是理念化的，但要说的是“礼”为操胜券之道。

《襄公二年经》：“夏，五月庚寅，（成公）夫人（齐）姜氏薨。”同年《左传》叙其事，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自备的葬具用品来葬齐姜，众以为非，“礼无所逆，妇养姑（按：婆母）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季孙于是为不哲矣”。“德之行”后杜注：“《诗·大雅》。（按：《大雅抑》可见）哲，知（按：智）也；话，善也；言知者行事无不顺。”“不哲”，杜注：“言逆德。”引《诗》十二字，哲、言、智、德，尽在一定式表达内。重要的是，哲人知善言，按德办事，善言、德，无非礼义。

《襄公三年经》：“夏，四月，公至自晋。”同年《左传》补叙了祁奚向晋侯荐贤之事。先是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最后推荐了僚属羊舌赤和自己的儿子祁午，既不为谄媚，又不为朋比结党。是“建一官职而三件事都办成了”的好事。史家以为“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善，言道德；类，虽然这里是“同类”之意，但“同类”、“类”终究是言辩说。有善德与言辩说之“类”相系，亦道德之于逻辑理性之说。

《襄公二十四年》：“春，叔孙豹如晋。”同年《左传》叙穆叔（叔孙豹）至晋国，范宣子问“死而不朽”事。宣子以远古陶唐氏传至御龙氏，而豕韦氏，而唐杜氏，而范氏为不朽。穆叔答道：“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宣子又以鲁先大夫臧文仲“既没言立”为不朽。穆叔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那“保姓受氏”，以守宗庙，虽“世不绝祀”，但无功德于国家者，都不能说

“不朽”。此“三不朽”之格言，可谓激越千古，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

四、《春秋经》和《左氏传》相关范畴表达

言。《襄公二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同年《左传》：“（郑）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日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这里，讲了言语和志趣，文采和言辞，言辞和功利之间的关系。对照沪博简《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诗亡（无）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亡（无）吝”即“足”，改言之，似为“诗以足志，乐以足情，文以足言”。与《左传》里的话庶几可近。

乐。《襄公二十九年》：“夏，吴子使札来聘。”同年《左传》详述鲁卿请吴季札观周乐，季札一一发表评论。歌《周南》、《召南》，认为王风之基，但未尽善，“然勤而不怨矣”；歌《邶》《鄘》《卫》风，叹为“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深遭宣公淫乱，懿公灭亡，而民秉义而不困；歌《王风·黍离》，虽忧思于宗周陨灭，但并不惧怕；歌《郑风》，知郑政烦琐，民不堪命，将率先灭亡；歌《齐风》，乃泱泱大风，为“东海大公”之表式；歌《豳风》，知荡然而不淫，乃周公东征三年，平管蔡之乱，得以成就成王王业。歌《秦风》，可说季札以非凡的胆识，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看到了秦国的文化学脉和潜在实力；歌《魏风》，以为中庸之声，大而婉约，俭而易行，以德辅政，惜其国小而无明主；歌《唐风》，认为忧思深远，有陶唐氏之遗风，是唐尧令德之后的赓续之音。其余则“自郅以下”，不复具论。歌《小雅》，思文武之德而不贰叛，怨而不言，歌有哀音，周德虽衰，但先王之遗民犹在；歌《大雅》，广大熙和，盛德形容，其声曲直有体，乃文王之德。以上从诗歌音乐听觉形象到言语评品之名，完成了从象到名的思维活动过程，合乎欣赏的一般心理规则，

而名之具体切实,多合历史变迁故实,似诗歌之名象原委历史之积淀,则又实在令人惊叹。

为季札歌《颂》,认为“至矣哉!”,一切都很完美。做到了“直而不倨(率直而不傲慢),曲而不屈(曲折而不屈从),迩而不逼(接近而不进逼),远而不携(远离而不怀贰心),迁而不淫(迁流而不过分),复而不厌(重复而不让人生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是以中庸二元观看待《颂》诗。对《颂》诗内在美的名理定格表述是切中肌髓的。对《颂》诗的总的看法是:“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杜注:“八音克谐,节有度也;无相夺伦,守有序也。”节、度、伦、序,无不体现语言哲学特征。

为季札舞文王之乐,说其“美哉!犹有憾”。见舞武王之乐,说其“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武汤乐,说其“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憾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禹之乐,说其“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舜乐,赞为“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帟(dào,覆盖)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以上是视觉形象下的评论,以舜乐为最高。评论的办法是寻找舞蹈语汇和儒家道德之间的联结。

季札吴人,出使鲁国能欣赏周乐,这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六月的事,说明当时南北文化交流已达相当程度,否则吴季札乍到鲁国,无法欣赏周乐,更无法发表独到而切实的评论意见。就周、鲁间而言,还有东、西文化,中央和地方文化的交流问题,总之,华夏文化的交流至此已蔚为大观。透过吴季札观周乐,正可见此当下文化背景。吴季札后来还聘于齐国说晏婴,聘于郑说子产,聘于卫国说遽伯玉,聘于晋说叔向,皆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除了个人的才干以外,不能不说与南北文化的认同大有关系。此外,如将吴季札的评论与沪博简《孔子诗论》对比,可见小同而大异,除了共时评说视角不同外,

也不能不说南人和北人对《诗》的欣赏和理解并不相同,并不一元,恰恰是多元的。

度制。《昭公三年经》:“春,滕子原卒。”同年《左传》另补传述齐晏婴奉齐侯命请继室于晋。“既成婚,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在宴会上,两位哲人谈起各自的国家,都说已处末世。晏婴说齐处末世的理由,是齐君弃民不恤,而归于田陈氏,而田陈氏任意改变齐量度制,小斗出,大斗进,“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鱼盐积如山海,百姓备受盘剥,“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人民多受刖足之刑以致“履贱踊贵”。叔向说晋处末世的理由,更多定式表达,是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如: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无列长;庶民罢敝(疲弊)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功臣名将,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quān,悔改),以乐慆(tāo,通韬,隐藏)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不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一派末世图景,是历史真实的写照。度制奇变和定式写照,是晏婴和叔向论战国末世的方法,透过此法,见到的是历史的真实。上述表达,都是研究战国史的至理名言,与事者无不征引之。

数。《昭公二十年经》至“冬,十一月”,同年《左传》补“十二月齐侯田(按:打猎)于沛”,打猎回来时,晏婴在等候,梁丘据也奔过来了,齐侯说,只有梁丘据跟我“和”,晏婴说,不过是“同”,说不上“和”,阐述了“和”“同”之别。宰夫烹鱼肉羹汁为和,食之平其心。君臣亦然,君谓可而有否,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谓否而有可,臣献其可而去其否,总之,是唱点反调,有利于造成“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的局面。先王烹制五味,调和五声,是为“平其心,成其政”。而文、武体裁之“二体”,风、雅、颂之“三类”,杂物以成器之“四物”,宫、商、角、徵、羽之“五声”,黄钟、大吕之“六律”,“五声”加变宫、变徵之“七音”,来自八方之“八风”,歌九功之德之“九歌”,以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以相成”,“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使“君子听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方可称之为“和”。可见，缀以数字并加“体、类、物、声、律、音、风、歌”构成的数字化名目，二元对待而内部充满辩证特色的条目，构成了“和”。简言之，“和”需要缀以数字的数字化名目，需要辩证对待的条目，两者都使“和”打上了语言哲学的烙印。

名位。《成公二年经》：“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同年《左传》记蔡侯、许男在作战时乘楚君车，成了楚君左右，“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按：懈）于位，民之攸暨（按：yōu，所，xì，息）。”这里讲的是官位，职位，名位。名是名号，名义，位是名的实际体现，是实际的名。按这里的说法，官位为民而设。名位实际作用的发挥，在于“天下有道”，《成公十二年传》：“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孔疏：制其己腹心，不侵犯他国也），乱则反之。”

名器。《成公二年经》：“春，齐侯伐我北鄙。”同年《左传》补叙中涉及名和器的重要性。齐伐鲁，归途中与卫相遇而战，卫“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卫将），桓子于是以奚”。事后卫人用地赏于奚。于奚推辞，请求赏给他“曲县”之乐，马饰“繁缨”等“以朝诸侯之礼”，“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杜注：器：车服，名，爵号），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杜注：车服所以表尊卑），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这里的“器”，虽是具体的车服，但实质是象征国家权力的名器。意思是说，名和象征国家权力的器，关及国家的兴衰成败。而“新筑人仲叔于奚”，是一重要的表达例式，杜注：“于奚守新筑，大夫。”孔疏：“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为某人。孔子父邹邑大夫，传称邹人纥，《论语》谓孔子邹人之子，即此类也。”

主要参考文献

《左传》，《十三经注疏》第6册，艺文印书馆印本。

《诗经》，《十三经注疏》第2册，艺文印书馆印本。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文光图书公司印行，1971年版。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中国文化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皮锡瑞撰《经学通论》，河图洛书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

中国传统语学和思维中的名和象^①

一、名和正名

名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重要范畴。名指思维领域内的概念本身，也指事物的名称，它们反映在语言文字领域内就是一个个的词或字。名既指概念，又指名称。古代有名辩，有名学，研究概念之名；古代有训诂、辨名，有名书，解释和收罗事物之名和文字。正像思维与语言不可分，概念和名称很难分一样，名辩和训诂、辨名在具体操作时事实上也是交错难分。先秦哲学很重要的一块是名辩哲学，不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法家等，都有名辩之学，都有丰富的形名思想。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要说话，要思维，就要有意无意地用上辨名和名辩。名辩和辨名，是先秦哲学的重要特色，过去我们重视唯物和唯心，本体道论、仁论和道德仁论，却对名辩和辨名，辩说和训诂，名学和语言文字的名书重视不够，而它们恰恰就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

儒家重视实际应用，正像很少谈论“仁是什么”，却大谈“仁怎么办”，即怎样做才能达到“仁”一样，很少谈论名辩、形名本身，而谈论“名辩怎么办”，即名辩、形名的应用问题，这就是儒家的正名说。《论语·子路》的“正名”就包含了概念之名和语言文字之名的双重含义，甚至后者更多些，或者说，先从第一层次就是名称之名入手，然后再解释为名分名义等概念意义的。

当子路问孔子从政之急务时，孔子回答第一要务是“正名”。因为

① 本文原载在韩中国教师联谊会《汉语教学与研究》(第8辑)，首尔出版社2007年版。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言”的范围里谈“名”，“名”只能是语言文字，杨伯峻《论语译注》以“名分上的用词不当”释“名不正”，中心意思是以“用词不当”释“名不正”；接下来，在“事”理范围内，“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名当然是指名分、名义、事理概念之名；最后，孔子仍归结为语文之“名”和语言之“言”，“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正名说”很大程度上讲的是语文之“名”，百科之“名”，即名称。朱熹的学生胡炳文《论语通》以礼、乐释名，目的是以“名”就“理”，但在方法上，是沿着“名”字层层讲下去的：“名正言顺，即下文礼乐之本名，名正，礼也，言顺，乐也。”^①

孔子“正名”说之“名”的解释，归纳注释家们的解释，大体分六种：

第一种把“名”说成语言文字的：南朝梁代的皇侃《论语义疏》引东汉郑玄注云：“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谓名，今世曰字。”这基本上是合乎孔子原意的。

第二种解释是名分、名义。晚近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旧注称：“（东汉）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并考《祭法》：“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名，指事物的名称。

第三种是朱熹解释为名实之名。《论语集注》：“是时……名实素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

第四种看法是古代名辩，即名言逻辑之名，但不可直接联系上古名家。《集释》引《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对直接名家这一点，程氏认为“浸寻（逐渐）失真”。

第五种看法，把以上二至四种看法综合在一起，程树德云：“按：

① [宋]胡炳文《论语通》，载《通志堂经解》，徐乾学辑，台湾汉京事业文化有限公司印行，第37册，第21504页，上栏。

‘名’字，马、郑、朱三说互异，当以马注为正，即今所谓论理学也。朱注根据《史记》，指名分言，说可并存。”意思是，名即名分、名义、名实之名、古代名言逻辑，但不是名家之名。

以马融为正，有古史为据。《左传·成公二年》：“仲尼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礼器，名，名称，进而解释为名义，名分。《论语》的名与这里的名是一致的。《论语·雍也》有“觚不觚”之叹，觚不像觚，盛酒器不能发挥盛酒器的作用，有其名而无其实。《雍也》还记载孔子回答齐景公的“问政”，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正是正名，要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会“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闹到连齐景公也吃不上饭的地步。《韩诗外传》卷五还记载孔子陪坐季孙氏的一段对话，季孙氏的家臣请示季孙氏说，国君派人来借马，要借给他吗？孔子曰：“吾闻：君取于人曰取，不曰假。”季孙氏明白了，告知家臣说：“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高兴地说：“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这里明白点出了正名的实际意义。以上四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可用其他场合下孔子的有关说法来证《子路》篇的正名，所谓发掘内证、本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二是正名说本来就有命名、定名等初阶的逻辑认识作用，它是古代的名言逻辑说，它首先是认知的，也是认识范畴的，依孔子说正名方可发挥酒器的作用；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使国家得到治理而人人有饭吃；正名可使“君臣之义定矣”等说法看，孔子正名说又是价值论的。这与他的儒家道德说的价值论是一致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句，按前述杨伯峻的看法，只能解释为：名分上的用词不当就会说话不顺畅。孔子要纠正的，正是礼制上、名分上的用词不当，而不是一般的用词不当。一般的用词不当，是语法修辞问题，礼制上、名分上的用词不当，是伦理问题、政治问题。名，本来的意义是名称、命名的意思。《说文》：“名，自命也。”意思是说，名是父亲给起的名字。《论语·阳货》：“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名指物的名称。可

见名的本来的意义是指语言上的名、名称。孔子用在与子路谈政治的特定的场合,名成了名义、名分,成了伦理、政治概念。从名称之名到名分之名,从语言之名到伦理、政治百科之名,以及伦理、政治之“名”本身,都体现了孔子正名说的语言哲学性质。作为初阶之语文之名,作为百科之名,作为礼制、伦理、政治之名分、名义上的“名”,都是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

名的意义首先是语言上的命称(起名)、名称,再到礼制上的名义、名分,再转化为礼乐、刑罚等民治手段的实行,这是一个从语言世界转向客观世界的不断实现的过程。《论语·子路》“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一语,应理解为用词、立名一定要有根据而能说得出,说得出来的顺理成章的话也一定要行得通而付之实施。从语言之名入手,名之言之而实行之,名实一贯,言行一致,正可体现孔子思想中的道德本体论、认识论与践行说、价值观的一致。正像《左传·成公二年》孔子将名与器同列而语其“不可假人”那样,名也是一种器,语言之名正是作为交际工具的器。在多数情况下,名是器之名,器是名之实。正名和用器本身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实行道。《易传》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名(特别是语言之名)、器形下,道为形上。王夫之曾说“无其器即无其道”,儒家道德哲学将名实、言行包含其中,即道德论中有名实之理性体认、名实之本体属性、名实之认识范畴,道德论中有践行实施、存在过程和价值体现,这不能不说由“名”而讨源,可知儒学道德论的深邃,可知人类早期的道德理性对知识的包含,更可知人类早期的道德理性的自觉。此外,《论语·子路》名一言一行,或推衍之,从儒家的名、器观到道德论,处处系着人这一根本性主体,名和言是人的语词和言语,器是人的劳作和产品,行是人的行为,道德是人的行为的准绳,总之,无论是从求真的名言逻辑观去理解,还是从名、器实用的价值观去理解,孔子由名、器而道德语言哲学观,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基本元素名、言、器也都离不开人。

现在来看看儒家其他典籍中提到的一些“名”，也大部分指语言文字之“名”，渐入百科之名，名分、名义之名。

名，写的字，书写，记载。《左传·桓公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杜预注：“鄙陋小国，贱之，礼不足，故书名以‘春’来。夏乃行朝礼，故经书‘夏’。”孔颖达疏：“谷、邓是南方诸侯，近楚小国。”如何书写记载，一名一字之立，均大有讲究，正谓春秋笔法。

名，语词，名称，起名字，呼名字。《礼记·曲礼上》：“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父前子名，君前臣名。”讲的是给孩子起名和排名问题，按郑注和孔疏，可知实际上已涉及上古礼仪规范中的名讳。《礼记·玉藻》：“与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即对士可直呼其名，大夫要称字。呼名称字须循礼仪。

名，称说，名实一致，知行一贯。《书·大禹谟》：“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孔传：“名言此事，必在此义，信出此心，亦在此义。”《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也有与此完全相同的文字，杜预注强调践履实行的一面：“名此事言此事，亦当令可施于此；允，信也，信出于此则善亦在此。言帝念功则功成也。”首句亦《论语·子路》“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句意。可见，“名一言一行”是上古逻辑一贯，由名而实，由名实而知行，是逻辑发展之必然。

名，物名，名与实、质相对，按质论价，而不从名定价，物名与物价不伦类。《周礼·地官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财物），名相近者相违也，实相近者相尔（近）也，而平正之。”这与《孟子·许行》批判“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阐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精神完全相同。

名，道德概念、形象、物名、类概念，不同领域内有不同性质的名。《左传·桓公六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借），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名，事物的性质，概念。《孟子·尽心下》：“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以比喻和借代之修辞手法实说

名为事物特有的性质。很显然,这种独有性质之名,是在尝试、体会和经验中认识到的。

名,人名,在一定条件下它的极端重要性。《穀梁传·庄公十四年》:“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字亦名。名及名的不同层次的使用为春秋笔法之要义。《公羊传·庄公十四年》记载和评价这一年秋九月,南方的蛮夷之楚打败了中原的蔡国一事:称荆不称楚,“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爵位名。蔡侯失败后被俘获,被迫献舞而归,“蔡侯献舞何以名,绝!何为绝之?获也。曷(何)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与,称赞。

名,名声,不当自取其辱,当以道德自律。《易·系辞下》:“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

名,名声,社会责任。《左传·昭公二十年》:“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仁而往,知(智)也;知死不辟(避),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文中“父不可弃”即“奔死免父”之为孝;其余即“名不可废”,名与仁、智、勇紧相关,名不啻是名声,名誉,更是应尽的社会责任。名实际上是道德的价值和逻辑的概括。

名,名声。是工具和手段,用名惩治不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

名,名誉。名实并称,指名誉和事功;对待名誉和事功的态度可以有不同,但都要合乎仁。即以仁莅名,以仁莅实。《孟子·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固如此乎?孟子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名,名声,名誉。《礼记·乐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名声与功绩的相随一致是建设和谐社会

会之必需。

名，恶名。《左传·襄公二十年》：“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名声与国君相关。

名，“名誉”连用，名声和美誉。《穀梁传·昭公十九年》：“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名誉需传扬和获有司认可。

名，名义。名与物对。名与号对，大号而本名。名从所属者，名的针对性更强。《穀梁传·桓公二年》：“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鄆大鼎也。”《穀梁传·襄公五年》：“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范宁注：“夷狄所号地名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人名当从其本俗言。”号，也是名，物类名，地名，国名，用于规范化教育。号和名在民族（种族）的认异和认同中都有重要作用。

名，名位，爵位，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功能之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左传·成公二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名，名位，名分。《左传·哀公十六年》：“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愆，过失，罪过。可见，礼是名的实质，名是礼的范式。所，指具体的事或场合。名作为范式，有很强的实践性。

名，名位，社会地位。施行礼，实践礼的参照。《左传·庄公十八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名，与姓相对，为非血缘关系，当为以礼治国的规范和准则。《礼记·大传》：“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论语》是公认的道德“仁”论哲学书，而其中主要之点“正名”却是更多的指文字之名，这本身就说明，不将语言文字之“名”、百科之名、名

分、名义作为哲学问题考虑是不符合原典原意的。儒家其他典籍中提到的一些“名”，也大部分指这一类“名”。正因为如此，讲先秦名辩时往往绕过儒家，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名辩和辨名、正名，都应当在语言哲学领域内得到研究。

以上 18 言名，有关名的含意，不外乎写的字、语词、名称、名物、道德概念、概念、名声、名誉、名分、名位、姓名之名等；有关名的性质、作用、价值，则有春秋笔法、礼仪规范、名实一贯和知行一贯、不从名论价、特性在经验中认识、道德自律、社会责任、工具手段、仁、和谐社会之需、功能之器、礼的范式、实践礼的参照等。含义和性质两大块处于一种逻辑配置的多元对应状态，这正说明名的含义的丰富性和价值功能的多维性。语言、逻辑、概念之名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可供研究。例如，名为“非血缘关系”一说，在诸多名“是什么”的论述中显得很特别，“非”随“是”后，逻辑上的排除法，“否定例证”，对确立名“是什么”意义重大。

从孔子正名，旁及他经的 18 言名看，名的学理性在于它的语言表达的切割无罅隙，思维进程的基本单位，逻辑构架的实体及所据；名的社会实践性在于间接施于社会的作用和效果，直接用于具体人和事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效果。名是古代世界中的主体世界或称心理世界，语言文字世界中的大件，用于称说，用于思维。名的两属（语言和思维），双功能（交际和思维），反映了古人对两者的统一性的看法。

二、名理和名辩

儒家的“正名”以语言文字之名为起点，重在“名”的实用。道家等的名辩以思维哲理之概念为起点，重在“名”的论理阐释。

道家的名，以《老子》第一章最为著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从语言文字入手，可作平实的解释：凡是道，可以称说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凡是名，可以用语言称说

的名,就不是永恒的名。没有名称的(对象物),是天地的开始;有名称的(对象物),是万物赖以产生的根本。^①可见,道₁、名₁是泛指的道₂、名₂都是言说、命称的意思,道₃、名₃是常住永恒的本体。名₄、名₅都是指称对象物的名称。这几句话,除道₃、名₃以外,并无神秘之处。第5、6、7、8句话,王弼认为是“玄之又玄”之所在。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有限宇宙有其开始和结束之时,有限宇宙内的万物也有其开始和结束之时,无限宇宙是另一回事,但宇宙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的多样性,有限宇宙也是如此,故不可能开始于某一对象物。考虑到古代的科学水平,说老子说及有限宇宙,已很不错了,故第5、6、7、8句说有限宇宙有开始,是对的,说开始于某一物,那就错了。

现在来说老子的名。名₁、名₂没有问题,好懂。道₃、名₃是常住永恒的本体,名₃是永恒本体道₃之名,如前所说,宇宙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的多样性,常住永恒的本体道₃、名₃都不存在。名₄、名₅是值得研究的,如指统一对象物的名称,那应该说不存在的,如指作为宇宙统一性的具体多样对象物的名称,那就是对的。还可以再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早就有元气论,《孟子》已将浩然之气发挥到了极致,《老子》五十五章有“心使气曰强”,也很难说元气“不是作为宇宙统一性的具体多样对象物”,如果是这样,老子的名₄、名₅就是有积极意义的了。

归结起来说:名₁是泛指的道,名₂命称的意思,名₃是常住永恒的本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名₄、名₅可以作为“宇宙统一性的具体多样对象物”的名称,说到底,老子的“名”主要还是作为事物的名称来理解,其余各章出现的“名”也都是作“名称”、“名声”讲^②,这与孔子的“正名”之

① 这个解释,大体符合王弼注。王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常道)不可道,(常名)不可名。”“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② 如《老子》第十四章、二十章、二十五章、三十二章、三十四章、三十七章、四十一章、四十四章、四十七章等。老子之“名”与孔子之“名”近同,正可说明老子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而与战国中期的庄子之“名”不同。

“名”并没有多少区别。儒、道之“名”有共同之处，共同点首先在于语言文字领域内。

《庄子》内篇之“名”，固然也有名称义，如《逍遥游》“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之“名”。但名实、名辩之“名”已见显然。《逍遥游》引许由曰：“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这里的名是名声、名位、地位的意思，它与实的关系得到确认和指明，那就是名处宾位，实处主位。到了晚清，处宾之“名”竟至于成了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手中的思想武器。龚写有《宾宾》一文，主题是处宾者的权力都要用到争取自由上去。^①名，宾位，成了自由思想的代称。

名实关系，正确的理解，名是概念，实是客观实际。名是客观实际的代称，名反映客观实际，两者有同一性，但又是不同的二物，客观实际总是具体的，而概念总是概括的。至于不同的名，更是有不同的含义，不能混为一谈。但《庄子》将名与实关系，名与名的关系都拖进了无区界可言的相对主义。《逍遥游》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按：泯灭是非）故曰：莫若以明（按：不如用无是非说来弄明白）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按：指，符号，指称，名，一般概念，如马，指所有的马。非指，个别概念，如一匹白马。喻，说明）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是说个别的白马与一般全体概念的马不同，明确个别与一般的区分，这本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庄子要用“无是非”说来说明它，得出“天地只有一个无差别的指号，万物只要用一个一般概念的马来说明就够了”的结论。庄子的“名辩”实际上是“名灭”。

庄子把“无是非”，“绝对的同一”看作道家的圣人境界。“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天钧”就是“绝对的同一”境界。在庄子看来，“绝对的同一”存在于天地未判分，宇宙未开始，“未始有物”。二是

① 龚自珍《宾宾》，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有了物,但没有区别它们,“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三是有区别,但还没有是非,“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最糟糕的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那怎么办呢?那就千方百计地泯灭是非,做到“物我两忘”,不加区分,努力回到“未始有是非”“未始有封”那里去。“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类的区分,或者说只有一类,与上文所说的“一指”“一马”完全一致。《逍遥游》乃至整个内篇的主题,就是天下一类、“一指”、“一马”,无是非。

《庄子·天下》篇概括天下的学术,从远古至于当下,有神人、至人、圣人,而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等,皆横行天下,“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而墨家显学,陈高自苦,自称“非禹之道不足谓墨”,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但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这伙后墨“以坚白同异之词相訾(按:互相指责),以觭偶(按:独倡与对辩)不侔(按:违逆)之辞相应”,以最能辩的“巨子”为圣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有志于做“以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救世之士”,宋钘、尹文是这样的人,彭蒙、田骈、慎到也是这样的人。

如此看来,尹文是后墨一支的信徒,又是善为“坚白同异”之辩的公孙龙的学生。从他今存的文献《大道》看,他是战国名辩之主将。最重要的,他在理论上阐述形名关系,可称之为形名说。形名说就是他要说的“大道”。他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有名,则名不可差。”名与器相连,名与形,亦即外形相接。名以正形,不是名以证实,形正才有命名,方能“名不可差”,亦即名不离实等同于名不离形。外形、形相、象、实在,大体都统一在“形”,形与名不可分,故称“形名”。如果说,公孙龙的辩说重在实体如何如何,后墨则重在名、概念之辨析,尹文“形名说”大体把两者调和在一起,他的身世,决定他会走到这条路上来。他认为孔子的“正名说”就应当作形名之学的理解,“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名之于言说之形的关系,“言不顺则事不成”是名之于实

事、事体的关系。道家之“大道”，既无形，又不见实，以道说“名”，却引来了无数的“众名”，道实际上并没有起作用。《尹文子》所说的“大道”“道”，实际上以“形名”为依归。

形名与事理的关系，成为《尹文子》形名治天下的理论依据。他说：“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这就是说，形、名必须同在，有形无名，还可以，但名的作用非常大，可用来区别事物（检其差），验核形体（检形），确定是否某事物，继续对某事物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事以检名），考察其所以如此的道理，这样，形名的作用，就能使事物就无法隐其理。法、术、势之用，“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术、势方有极大的针对性。《尹文子大道》的主题，无非说形名不可分，名称分辨和概念辨析对于认识事理至关重要，治天下不可须臾离开。

现在来看看尹文的老师公孙龙的辩说。《庄子·天下》篇述惠施历物十事后说：“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接着又述辩者学说二十一事，称：“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这二十一事，冯友兰将它们分成两组，一组是“合同异”，一组是“离坚白”。^①如此看来，以二十一事与惠施相呼应者，正是公孙龙。“合同异”本属于惠施的观点，如历物十事中就有“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之说，故称公孙龙与惠施呼应之。现在来看属于公孙龙的“坚白论”。《庄子·秋水》称之为“离坚白”，“离坚白”者，就是要把对象物内部的两种性质“坚”（属于手感）和“白”（属于目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05、206页。属于“合同异”者，有：卵有毛、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山出口、龟长于蛇、白狗黑。属于“离坚白”者，有：鸡三足、火不热、轮不辗地、目不见、指不至、物不绝、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治):一从对象物内部分离出来,二把它们看做互不相关的两种性质,或称对象物的两个共相。《公孙龙子·坚白论》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这是感觉论,是说不可能以手感得石之坚、石之白和石,也不可能以目治得石之白、石之坚和石。故下文云:“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为什么要分离石之坚和石之白呢?“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见与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一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总是一前一后地得到的两种不同的感觉,总是相“离”,二是两种体验物(相)互不相足,相长,相涉,故分离。感知所得能分离,与本体物和物性的潜藏一起是密切相关的。公孙龙这样看问题有价值吗?它启示我们:可以将二相、三相等从本体中分别游离出来,使本来就是性质之类的相、形式之类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形式,以便于更深入地研究;还告诉我们,不同的相,不同的形式之间是可以隔离的,这同样有利于深入研究。相的分离,隔裂,直接导源于古代的语言哲学中的数、象征形式、理数等观念。

三、象和具象思维

象,象形,象征;像,像某物,像似。“任何词都已经是概括”(列宁语),但象比像有更多一点的概括性。《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孔颖达疏:“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天象、星象、万象、悬象,都不是定指哪一颗星,是泛指,概括而言之。王肃《书·说命上》:“乃审厥(其)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这里的“象”字似乎是肖像了,但只是形象大概,伪孔传:“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

“像”的含义有所不同,最典型的说法,《淮南子·主术》:“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影之像形。”《广韵·养韵》:“像,似也。”是最贴切的说法。诚然,像和象的意义是有交错的。《说文·人部》:“像,象也。”正说明二字的交错。但这里的意思主要是说,像,象某个具体物。《易·系

辞下》“象也者，像此物者也”孔颖达疏：“言象此物之形状也。”意思是说，像，那是象征某个具体事物的形状。

由上可见，象为象征一般，像为像似，象征个别形态，一涉及个别，就成了具体的像似了。像似与象征个别是通的。有了这个区分，下面这些话就比较好理解了。《今文尚书·尧典》：“静言庸违，象恭涛天。”参照伪孔传：“言起用行事而违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这里的“象”，“貌象”都可理解为“显得”，“显得恭敬”，“外表显得恭敬”；也可把“象”理解为“像”，“象征个别”之“像”，从上下文义看，潜藏的主语确实是指个别人的，而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若干人的。

象、像之别对理解下面这句话更有用。《易·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里的“象”是象征一般，“像”是物像，或象征个别之“像”。这样就好理解了，全句是说《易》理之“象”来源于具体的物像，来源于象征个别之“像”。孔颖达疏正是作了这样的解释：“谓卦为万物象者（象征，一般），法像万物（像个别存在形态的外物），犹乾卦之象（一般，抽象）法像（取法，像，具体或个别地象征着）于天也。”

一言以蔽之，从语言哲学的本质上看，“象”为抽象，但并不高级，是抽象与形象相结合，“像”为法像，为具体像某物，象征某物的像似。

“名”用于正名、辨名和名辩，“象”用于象形和象数，最突出的表现是卦象和文字。

要说“象”，一部《周易》充满着“象”。“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孔颖达语）八卦成象，六爻说明作用。“象”源自何处？源自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既有存在，也有运动。王弼注：“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悬象运转，以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矣。”有客观世界，有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况”，有自然界变化运动之根源的说明：天象运转和“山泽通气”。人类要认识客观世界，就必须设法使它进入某一逻辑系统，这既是常识，也是认识论。正是在这里，本体对象说和认识论间

永远是一致的(但不是一回事)。远古华夏族先民的这一逻辑系统,正是八卦之象形和六爻之象数,统起来说,就是“象”。“象”之于《易》,巨大而深博。

传为古圣贤伏羲氏制作《周易》的办法就是“观象”而“况”之,“况”之而画写之,成了《周易》象形和象数大系统。《易·系辞上》:“圣人设卦观象。”孔颖达正义:“谓圣人设画其卦之时,莫不瞻观物象,法其物象,然后设之卦象,则有吉有凶。”不过,古人的“观象”是细致的,深刻的,决非仅仅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了事的。《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赜,深理。拟诸其形容,正是比况,古今都用的隐喻一类的思想方法。物宜,物体,物理,适合阴阳变化之理。典礼,王弼注:“适时之所用。”象,就是将天下的深理经比况而成象,它是图像,也是逻辑系统。

《易·系辞上》另有定义句式的相同的话,更凸显“象”是什么:“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由象而爻,或者说象的内在构成,是在圣人考察运动,会通之,践行于“适时之所用”,配以文辞,用来断吉凶的那些线条称为“爻”,“爻”线正是卦象的构成。由象而辞,卦象的依据是“赜”,说明卦象的辞,即卦辞,亦即爻辞的依据是“天下之动”,“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综合使用卦象及其逻辑构成爻辞、爻数,能找到变、通、人、德四个对象物:“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诚)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即要求使用《易》卦的人做到“化/裁、推/行、神/明、默/成(诚)”,“神/明”即思考、吸收、修养之意。这正是从图像而具象,而卦象之辞,而爻辞爻数,而认识四大对象物的此岸性表达,完成了从具象论、象数论到认识论,最终到达道德论的全过程。始于具象(犹感性),达于认识、认知(犹知性),终于道德(犹理性),以道德

理性为最高,这又很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

《易》的构成体制,可谓:以传为伏羲垂赐的八卦和文王演为六十四卦的卦象为基本解释对象(甚至可以说八卦、六十四卦的卦象解释天地自然),亦传为文王演绎的经说文字(卦辞、爻辞)解释卦象,传为孔子所作的《十翼》解释经说文字^①,是“伏羲释自然,文王释伏羲,孔子释文王”的三级解释系统构成的中国古代语言解释哲学。卦象为象,卦辞、爻辞、翼辞为名,《易》的构成就是“名象交融”的。

以卦象为解释对象,以“名”辞为解释内容,解释内容的“名”中有象吗?答案是肯定的。以乾卦为例,爻辞中提到的紧系于象数的“初九/潜龙、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九五/飞龙、上九/亢龙,孔疏‘亢’字为至大而极盛、用九/见群龙无首”等;彖辞中提到的“大哉乾元、乘六龙以御天”等;象辞中提到的“天行健、潜龙、飞龙、亢龙、盈”等;文言中提到的“龙德而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天下文明、云行雨施,天下平也”等,其余七翼中的象,虽不能一一分梳于六十四卦下,但具象多多,既有以象言《易》理,又有以形象作比言某事某物,前者除上文引述过的以外,还有许多,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同上)、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止息,同上)、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同上)、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系辞下)、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序卦传),等等。后者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鸣子和,喻修诚事应。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气味,气息)如兰(同上)、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系辞下)、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同上)、乾为马,坤为牛……(说卦传)、乾为天,为圆,为君,为

① 有一种看法,卦爻辞作于周初,《易传》作于春秋战国间,经、传作者均非一人,当是经过多人多时加工编纂而成。参见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推介这种说法是“较有影响的看法”,见该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2页。今本《周易》将乾卦至离卦共三十卦为上经,将咸卦至未济卦共三十四卦为下经。彖辞、象辞、系辞都随经文分上下,外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种解释文字,称为“十翼”。

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同上),等等。如此看来,一部《易经》,是以“象”为解释对象之底层,为解释方法之一途辙,为思想方法之一,为解释辞所表达包含的那个无处不在的具象、形象意义上的“象”的巨大构成。

不仅《易经》无处不“象”,《诗经》中也到处有“象”。《毛诗序》言诗有六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可分两目:赋、比、兴为诗歌创作的体制,风、雅、颂是《诗》内容。赋,铺陈其辞,直陈其事而非拟比,是“名”的范畴,比、兴则为“象”的范畴。比与兴的区别,按朱熹的说法,兴:由他物起兴,引出咏叹之辞;比:由他物作比,引出所比之此物。《诗·周南·关雎》首章朱熹集传:“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周南·螽斯》首章朱熹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一般还认为,区别在于比显而兴隐。比和兴的共同点呢?那都是比方于物,取譬成象而喻某事、某物、某心理活动。按汉代学者郑众(司农)的解释:“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而兴,则是“托事于物,”引起兴致,“取譬引类,起发己心”,并说:“诗文诸举草木野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①可谓异中见同:比方、取譬,方物、引类,泛指万物、草木野兽,比、兴,其实两两为一。如此看来,《诗经》体制,赋、比、兴,可以“名”“象”二类括之,比、兴所成之“象”在《诗》中到处可见。

实际上,在释诗时,比和兴有时也是很难分开的。《诗·召南·摽有梅》首章:“摽有梅,其实七兮。”这当然是起兴,毛传:“兴也。”郑笺则认为有比喻意义:“兴者,梅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谓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则衰。”首章二句:“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庶,众,迨,及。郑笺将两句联在一起解释,云:“求女之当嫁者之众士,宜及其善时,善时谓年二十,虽夏未大衰。”看来,兴为象中一般,比为象中个别。兴为“取譬引类”,当它“起发己心”而及于具体的人和事时,就起到作比的作用

① 见《毛诗大序》“《诗》有六义”孔颖达疏引郑司农。

了。又如《诗·邶风·柏舟》首章：“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毛传：“兴也。”郑笺则认为“兴者，喻仁人之不见用，而与群小人并列。”实际上已将“兴”看作了“比”。朱熹《诗集传》则直接标为“比也”，并说：“妇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为舟，坚致牢实，而不以乘载，无所依薄，但汎然于水中而已。”按照朱熹的解释，其自身的逻辑，也是比而成象，象而后言，即象而后名、后辞。名象紧随难分。即使比、兴之象与赋之名辞，有时也名象交融而变得难解难分，前举《召南·摽有梅》首章毛传认为是兴，而朱熹集传则认为是赋。总之，比与兴成象，与赋之名言、名辞相配，名与象，是赋、比、兴的底层，而名与象，即赋、比、兴，又构成了风、雅、颂的内容。《诗经》的思维体式，或言其内在学理如此。赋、比、兴，风、雅、颂，其中有象，无处不在。有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①，《诗经》的语言表达是永远不能“尽意”的，惟有象，才是全信息的。唯其名与象的结合，使中国古代学术理、趣兼备，言文而行远。

主要参考文献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唐]孔颖达《诗经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① 见《周易·系辞上》。

焦循注疏赵岐《孟子题辞》研究^①

焦循(1763—1820)疏证《孟子》，目的和方法与戴震(1724—1777)完全不同。焦循是经史小学总纂，戴震是新理学义理演绎。嘉庆七年(壬戌，1802)焦循应礼部会试后不第，闭门注《易》，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易学三书》(即《易图略》八卷，《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附《易话》三卷)著成。认为古代学者“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岐)氏。”^②然赵氏后注疏《孟子》之书不下数十种，其中以宋孙奭《孟子音义》二卷(内容大都已融进今本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最有影响，但问题也最多。《四库全书总目》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缺《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783)《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其序文前半，与世传奭《孟子正义》序同，盖《正义》伪序，即录此序而点窜也。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③这对一位尊崇赵氏的严肃的学者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对于孙氏《孟子音义》一类的书，“惜伪疏杂驳乖谬，文义鄙俚，未能发明其一，思作《正义》一书”，于是“博采经史传注以及本朝通人之书。凡有关于《孟子》者，一一纂出”，先编成长编十四帙，“逐日稽考，殚精研虑”，从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起稿，至二十四年七月撰成《孟子正义》三十卷。“又复讨论群书，删烦补缺”，至二十五年(1820)春“修改乃定”。这六十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从属稿到定稿，不过一年时间，“自言用思太猛”，遂一病不起，誉清未半而亡。

① 本文原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② 焦循《〈孟子正义〉识语》，见中华书局1987年版《清人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正义》目录页第7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91页下栏。

将焦循《孟子正义》与赵岐《孟子注》相比较,可以知见赵氏注疏的方法与成就。仅就《孟子题辞》而言,焦疏有而赵注无者之 20 余例,为研究古代传注家书序题材和古代逻辑思想及晚明后新见提供了理据,对俗字、通假字、词组、名物词的训释平实而不妄牵,体现了宗汉之说的汉学特征。

细检全书,围绕词语训释,将焦循正义与赵岐注比较,可列几个大的类别:赵无而焦有,赵弱而焦强(含赵略而焦详),赵误而焦正(准)。此外,不排除赵正而焦误一类。三大类中,以第一类“赵无而焦有”最为上乘,而焦循对赵岐《孟子题辞》的注疏,是“无赵岐注,仅焦循疏”的注释著作^①,是最能说明“赵无而焦有”的一些典例。今缕述如下:

1. “孟子题辞”之“题辞”一语:焦引宋孙奭所引张镒之说:“即序也。赵注尚异,故不谓之序,而谓之题辞也。”(页 1)唐宋人释“题辞”为“序文”,焦氏未予置评。而在“孟子题辞者,所以题号孟子之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之下,焦氏引汉刘熙《释名》、《周礼·春官·司常》及郑注、《仪礼·士丧礼》、《左传·襄公十年》文,焦循说:“赵氏自释题辞之义,称述孟子氏名事实之本末,所以著书之指义,以表其文辞,犹徽识题号之在旌常,故谓之题辞也。”(页 3)焦循以先秦两汉之说解读“题辞”之语,光说“题辞”是“序文”是不够的,还必须说出作为“序文”一类文章体裁“题辞”,它的主要之点是什么,焦氏显比唐宋人大大深入一步。近人张舜徽称:“序书之体,古有四科:《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此作者之序也;《易》之序卦,《书》、《诗》之篇序,此述者之序也;刘向校理群书,率有叙录,此校讎家之序也;若夫郑玄遍注群经,皆为条别源流,厘析篇目,则传注家之序也。”^②赵岐的《题辞》是“传注家之序”。焦循对“题辞”一语的解释,可为后人研究传注家书序体参酌。

① 赵岐《孟子题辞》全文注疏“正义”中的文字,无疑都是赵无而焦有的。

② 张舜徽,《广校讎略》,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52 页。

2.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焦疏“淑，善也。夙，早也。”（页7）按：此条为焦氏紧扣用词作的训释，不另笔墨，文义遂通。

3. “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焦疏引《汉书·艺文志》“（道家）及放者为之。”颜注：“放，荡也。”又引《广雅·释詁》、《吕氏春秋·审分篇》、《论语·阳货》集释，释“放”为“妄”（页10）。按：放，恣纵不拘，与“荡”、“妄”义皆近，焦循从上下文语境考虑，强调释“放”为“妄”，释“放荡”为虚妄无据，甚确。

4. “孟子闵悼……将遂湮微”，焦疏引《说文》释湮为“没”，又引《小尔雅·广詁》“没，灭也。”（页10）按：将解释词近义连续而解，释“湮”为沉没、湮灭，不误。但未将“湮微”作双音节词解释之，《汉语大词典》具引《陈书·高祖纪上》等四例释“湮微”为“没落衰微”。

5. “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焦疏引《左传·昭公元年》“勿使有所壅蔽湮底”，杜预注“底，滞也。”陆德明《释文》引服虔“底，止也。”焦氏指出“底，止”是《尔雅·释詁》的文字，并认为杜注、陆引服虔，两者的解释一致，焦循说：“止而不行故为滞。”（页10）按：焦疏释“底”甚确，底，停滞、止塞。但未能将“壅底”看作一词语。“壅底”为同义连用，阻塞。正涂壅底：正道阻塞。

6. “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焦疏引《尔雅·释詁》：“宪，法也。”并称：宪言，犹法言也。（页11）《法言》为汉扬雄著作名称，焦氏以汉人的提法、名称、概念解读赵氏之说。

7. “包罗天地，揆叙万类……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焦疏：“命世，即名世也。亚，次也。命世亚圣，即所谓名世次圣也。”又概括语段旨意：“‘包罗天地’至‘曲而不屈’，皆发明所以名世之实。”（页13）按：从体例上说，焦疏证词组，并概括语段旨意。

8. “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焦疏：“拟圣，即所谓述仲尼之意也。”按：焦氏明用词上下文所指。

9. “《论语》者，《五经》之鎔鑄，《六艺》之喉衿也。”焦疏引戴震《考

工记·释车》、《诗经·邶风》、《小雅》、《淮南子》后说：“盖车之转运在轴轂，而辖如环约於轂，辖如筭约於轴，非此则轴与轂不可以运。《五经》非《论语》则无以运行，故为《五经》之辖辖也。”（页14）焦氏说：“衿与襟通。”并引任大椿《深衣释例》之详考，称：“然则衿为交领交衽之通名。此与喉并言，则正以为领人之一身，内则辖之以喉，外则键之以领，谓《论语》为《六艺》之总领也。”（页14）按：焦说比任大椿说更明确。

10. “孟子之书，则而象之。”焦疏引《易·系辞》：“象也者，像也。”后称：“像之言似也。谓以孔子为法则，而似续其道也。”按：焦氏在解释关键性词语“象”之后阐释了句意，以《孟子》之书继承并阐释孔子。

11. “余生西京，世寻丕祚，有自来矣。”焦疏引《说文·寸部》云：“寻，绎理也。”又引《文选》注引《国语》贾逵注：“祚，位也。”焦氏说：“赵世之先为列卿诸侯王。溯其始原，出帝颡项，故寻绎其丕祚，有自来也。”按：世寻丕祚，世系寻求赵氏高位。为解释文义，或可说解释“寻”、“祚”两词义，焦循遂举证《史记·赵世家》、《潜夫论·志氏姓》以说赵氏高位渊源有自。

12. “知命之际，婴戚於天，邁屯离蹇，诡姓遁身，经营八紘之内，十有余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焦疏：“邁，遇也。离，丽也。屯蹇，皆谓难也。”关于“勤”字，孙奭《音义》云：“勤，子小切，绝也。”焦循引《说文》、《夏书》、《左传》、曹宪《博雅音》后批评说：“此云心勤，乃从力之勤，当训劳，谓心劳也。《音义》训绝，则是从刀之劓为剝字矣。心不可言绝也，失之矣。”至于“瘵”字，焦氏引《尔雅·释詁》、《诗·大雅·瞻印》和郑笺，云：“勤、瘵义皆为劳，故以勤字总承之。”按：“邁（姤）屯离蹇”可作为《易经》四卦看待，“姤”象征相遇，“离”象征附丽，“屯”象征初生，“蹇”象征行走艰难。焦氏接上下文为赵岐自述其“知命之际……”，“遭遇艰难困苦”，不作强生索隐别解，而平实训释，是很可取的。对孙奭的批评，于古有征，于理有据。心劳力瘵，形貌病态，皆状劳苦，故言“何勤（劳苦、勤苦）如焉！”字义训释贴切而得文句的解，此为焦循训释的求真求

实的风格。

13. “睠我皓首”焦疏引《说文·目部》作“眷”：“顾也。《诗》曰：‘乃眷西顾’”（页25）按：“睠”为“眷”的异体字。《汉语大字典》引《玉篇·目部》：“睠”，同“眷”。并举证《诗·小雅·大东》“睠言顾之”毛传：“睠，反顾也。”陆德明《释文》“睠，本又作眷。”焦氏主要从辨“睠”字字义入手释之，训释也是正确的。

14. “聊欲系志於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也。”焦疏引孙奭《音义》释“乱”为“治”，思，忧思。焦说：“著书明道，则可治其忧思。”又引《说文》、《礼记·乡饮酒义》和郑玄注，释“遗”为忘记，并认为全句与《论语·述而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意合。（页25）按：焦氏由字义而句义，句义则重视发掘深层次的蕴含，阐发《孟子》与《论语》的联系。

15. “惟六籍之学，先觉之士，释之辩之者既已详矣。”焦疏：“备见《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页25）按：提供参考文献为焦氏《正义》内容，亦为全书条例。为“帮助理解而提供参考文献”例，全书可见。

16. “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缁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焦疏引《礼记·月令》和郑注，明“闳与宏通”，又引《周礼·考工记·梓人》和郑注，云“闳、宏通借字”。引《汉书·扬雄传》、《儒林·张山拊传》和颜注，明“妙与眇同”以释文字，又引《方言》“眇，小也。”并说：“盖言其大闳而且远，言其小微而且妙。”进而解释了“眇（妙）”的字义连同句义。引《礼记·玉藻》和郑注，《尔雅·释宫》以说“缁奥”，“缁在袍之里，奥在室之内，故不易见。”释“条理”一词，焦云：“条理见《万章》下篇。”又引《说文·木部》说“条”之义，叙实情并说其引申之序：“《说文·木部》云：‘条，小枝也。’自根发而为干，自干分而为枝，枝又分而为条。（按：以上叙实情）故条之义为分，分则畅达，故义又为畅为达。（按：以上说字义引申之序）”又引《韩非子·解老》、《荀子·儒效》和杨倞注、《广雅·释

言》说“条理”为“科等”：“盖当时著书之法，各有科等。”进而说《孟子》“宜在条理之科”的缘由：“《孟子》之意旨，既缊奥难见，则宜条分缕析，使之井井著明，故宜在条理之科，如下所云是也。”“如下所云”指赵岐下文所说：“於是乃述已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页 25、26）按：此条可见焦循释通假字例，证明用“通”、“通借”术语，略早于焦循的戴震氏尚未用此类术语说假借字，文字与字义解释俱备。据物情而析字义引申，说“条理”为“科等”、“科”，含述题、引证、用释、分类等方面，总特点是“条分缕析”、“井井著明”。可知焦循说“条理”先引《说文》而讲物情，正所谓“名与象在哲学思维中的共存共用”问题。^①

综上所述，在“赵无注而焦疏有”这个前提下，焦循疏证《孟子题辞》为研究古代传注家书序体裁、为研究古代逻辑思想及晚明后新见提供了理据，对俗字、通假字、词组、名物词的训释平实而不妄牵，体现了宗汉之说的汉学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洪诚《训诂学》，《洪诚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焦循《孟子正义》，《清人十三经注疏》本，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① 参见刘文英《中国传统哲学的名家》，载《哲学研究》1999 年第 1 期。

中国古代的语言反思^①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解读

《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中的《语丛》一至四,是今人据竹简本身“语录丛钞式的”内容特色而加以命名的。全文由 265 枚简组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儒、道哲学概念范畴的解释,语言文字的解释,相关学理的说明等,可谓以后学作者主体心智来开辟先儒学术领地,参照时代要求作出的一系列从属于主体世界的语言诠释。从今天研究者的角度看,自然还会看到原作的解释方法,与训诂的联系,作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内容的一部分,对相关学理说明的反思,中国古代语言学与哲学、逻辑的若干联结,与古代同类丰富内容的比较,对同类内容的抽象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既从原典客体出发,也从学术研究主体考虑,一言以蔽之曰: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可也。

语言哲学主要有两种术语名: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philosophy。前者是指研究语言的普遍性质,如指称、意义、真假等,后者主要是指语言学哲学,与普通语言学相近,此名看来可以不用,但它还“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研究。举例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罗素的特称描述语理论、莱尔关于心灵概念的著作,都在这类研究的范围之内”。前者还指“可以留下来称呼语言哲学原初领域剩余的那些部分,包括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或多或少具有哲学性质的论著。沃尔夫的《语言、思想和现实》,也许还有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②综

① 本文为首届大陆、香港、台湾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6. 10. 13—16)论文,刊于周宪、徐兴无主编会议论文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与变革》,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 页。

合起来说,语言哲学是以语言为对象作哲学反思,包括对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作结构和功能的描写,及其在描写基础上的哲学思考,以及研究语言的带有哲学性质的学术论著和对它的综合性评述和阐释。

以语言为对象作哲学反思,西方以赫拉克利特第一个提出逻各斯(logos,含言谈、思考和理性规则等)为起点。中国古代对语言的哲学反思也很多,《老子》首章道、名说,《论语·子路》正名说,《墨子·经上》把名区分成“达、类、私”三大类,《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说,先秦名书《尔雅》十九类分说和条目解释法,西汉扬雄《方言》含历时解释“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和共时载记“别国方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用《易·系辞》认知原理推究汉字起源说,东汉刘熙《释名》集古代声训之大成和名物解释法种种,萌芽于公元前549年晋叔向说《诗·昊天有成命》的中国古代语言解释学(hermeneutics),即训诂学对整个语言文字世界的巨大开发,等等。内容极为丰富而深刻,中国古代如同古希腊一样,既有语言学,更有语言哲学。《语丛》用语录体诠释诸多道德范畴,正可用语言哲学说之。中国古代语言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史的开拓,至今未涉及的中国古代语言哲学是一巨大的领地。

一、逻辑起点“望”和概念定义

任何哲学都有它的逻辑起点,这一起点往往也是它对所能理解的世界的本源问题的回答,儒家始祖孔丘以“仁”为伦理学的根本,为社会道德世界的本源。《论语·里仁》:“里仁为美。”“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知识,当然需要经语言来表达,也包括语言知识本身。道家始祖老子以“道”为道家哲学的根本,为天地万物,也是语言世界的本源。《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名:名称,概念,语言、文字单位。儒道的本体都没有离开语

言,正如蒯因所说:“任何程度的概念化都离不开语言。”^①兼融儒道的《语丛》以“望”为其逻辑起点和本源:“凡物由望生。”(1.1 表《语丛》第一简,下同类推。又 1.104)这个“望”字简文作^𠄎,隶定为望,形声字。《说文》:“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可见“望”是心理的。《说文》徐灏注笺:“盖即古瞻望之望,从壬,亡声。壬者,跂而望之之义也。”“望”的过程含心理,“望”的结果是事物之外形,形象,形相,不可能是事物的本质。又说:“有天有命,有物有名。”(1.2)“有物有容,有家有名。”(1.13)“有命有文有名。”(1.4)“有天有命,有地有形。”(1.12)“有物有形有尽,而后有厚。”(1.6)“望”的结果是天地间有限世界(“有尽”“有厚”)的“形”,心中首先想到的也无非是“名”。由《语丛》“望”为万物所由产生之根本,“望”的心理特征,“望”到的是“形”,最初想到的是“名”。这四大要点,可断言《语丛》的基本立足点是上古语言哲学而无疑。

《语丛》语言哲学的内容之一是为儒家伦理概念及其他相关概念下定义。概念本身是离不开语言的,定义概念的方法是用先秦一般判断句“……所以……也”、“……之谓……”、“……,……者也”、“……,……也”等式。被定义的概念多达 26 个,其中有的是语词性质的。它们是:《易》(1.36)、《诗》(1.38)、《春秋》(1.40)、礼(1.42、3.36)、乐(1.43、3.54)、容色、声(1.50)、嗅、味(1.51)、气、志(1.52)、教(1.61)、信(1.65)、父子(1.69)、兄弟(1.70)、仁(1.92)、圣(1.94)、丧(1.98、3.35)、求(1.99)、器(1.107)、友、长悌(3.6)、义(3.24、25、35、36)、爱(3.35)、忠(3.63)。有的虽非用判断句,而用说明、描写法,来指称对象的来源、本质属性,也有定义的性质。例如:“礼,因人情而为之。”(1.31)“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由中出者,仁、忠、信。”(1.18—21)“知礼然后知型。”(1.63)型,规范,范式。“与为义

① [美]Dwight Bolinger 著《语言要略》,方立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5 页引蒯因(1960)《词与物体》。

者游,益。与庄者处,益。起习文章,益。与褻者处,损。与不好学者游,损。”(3.9—12)“得者乐,失者哀。”(3.59)以上“立条目而释义”及释义的判断法和说明法,与成书于先秦的语言学著作《尔雅》是一致的。《尔雅·释训》:“暴虎,徒搏也。冯河,徒涉也。”《尔雅·释宫》:“宫谓之室。”这可旁证《语丛》的语言类性质,而条目本身道德论内容,当然本证了全书的哲学性质。《语丛》的可判断性定义和描写、说明性指称,都是对研究对象的属性、状态的揭示,这一句型能指与句型所指之间的关系,从先秦古汉语到现代汉语都没有大变。而句型所指:定义、界说本身,却有思维史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界说”“定义”一词,是明代徐光启、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时引进的(1607),至《马氏文通》(1898)被大量应用于语言研究。但先秦对下定义这一逻辑方法,已有明确的交代,《墨子·小取》:“论求群言之必,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孙诒让《间诂》:“辩者抒意,通指明其所谓。”可见《小取》这句话一是讲提出概念(名),二是讲判断。《墨子·大取》有《语经》,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孙诒让《间诂》:“三物即指故、理、类言之,谓辞之所由生也。”意即能作逻辑推理者方能成立判断。可见《郭店简语丛》的一系列判断法是有逻辑史、思维史的依据的,《语丛》与《小取》、《语经》可比,一为应用,一为理据,而应用总是可以成为理据的一个要素。

二、思维规则和概念间的逻辑联系

事实上,《语丛》本身就有不少关于思维规则的内容。就思维一般而言,有“思亡(无)彊(疆),思亡其(期),思亡邪,思无不由我者”。(3.49)李零引陈伟先生指出:《诗·鲁颂·駟》共四章各有一个三字句:思无疆(深谋远虑)、思无期(周致无遗)、思无斁(不倦探索)、思无邪(思考循正),《郭店简》取其第一、二、四。李零先生将简文“我”字读为“义”字,今谓不烦改字,《郭店简》旧作“𠄎(我)”字,此字与下文的“我”字

(3. 53)字形相同,与“义”字“𠄎”(3. 24、25、35、36)不同,可见不改读是对的。又《駟》诗全诗为主人公鲁僖公自述如何养好骏马,加强国防,无不出自主人公“我”的思考。简文讲思无边限,思无先期,思无邪僻,思无不由“我”之主体而生,与其出处《駟》诗完全一致。简文作为一般思考的第一人称“我”,强调思维的主体性,正是语言哲学的特点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战国时代自由思维品格。由思维规则而及于思想方法、实践规则的内容还有:“凡同者通。”(1. 102)“礼不同,不害不妨。”(1. 103)“物各止于其所,我行。”(1. 105)“毋意,毋固,毋我。”(3. 64)等等。

重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先后的辨析,乃至相互间的逻辑生成关系,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重要内容。本来,重视词(字)与词(字)之间的意义先后,是古代语言学书的特色,清代学者段玉裁、近代学者黄侃都曾指出过《说文解字》的意义顺序。《说文·玉部》共收 124 字,段氏说:“自璠已下皆玉名也,璚者,用玉之等级也,瑛,玉光也,璠已下五文记玉之恶与美也……灵谓能用玉之巫也。”并强调说:“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①《郭店简语丛》讲儒道概念义序,既是语言学的,更是哲学的。十分重要的是,《语丛》概念义序往往是由概念事物的逻辑生成关系来说明的,概念义序与逻辑生成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形成某种逻辑存有链。在表达上,义序和生成多用先秦带“有”字的一般存有句式,带“生于”“生”的逻辑生成句式,带“知某而后知某”的认知句式,修辞上有时用顶针句式。例:

以“有”为特征的从天到伦序的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有天有喻(命),有物有名。”(1. 2)“有命有𠄎(慶,文)有名,而后有𧈧。”(1. 4、5)喻,从口,命称,起名,不是天命、命运字,4 号简的“命”字同此义。4 号

①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影印版,第 19 页下。又: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 页。

简第4字从倒写的“民”字，李零释为“文”字，可信从。民，上古明纽真部，文，上古明纽文部，上古真、文为韵是常见的，真、文不分甚夥。原句意为：有语言名称就有文字，就有概念之名，而后有伦序。这正是语言世界中的空间序列问题。鲙，裘锡圭先生释为伦，可从。鲙，上古见纽文部，伦，上古来纽文部。从2号简看，命称、名称与天有关，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

以“有”为特征的从天到名的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有天命，有地有形，有物有容，有家有名。”(1.13)这里的“命”字仍可理解为命称、命名之意。

以“有”为特征的从仁到善的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有仁有智，有义有礼，有圣有善。”(1.16、17)

以“生于”为特征的从人到义的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仁生于人，义生于道。”(1.23)

以“生于”为特征的从性到忠的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爱生于性，亲生于爱，忠生于亲。”(2.8、9)

以“生”为特征的从德到型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生德，德生礼，礼生乐，由乐知型。”(1.25)

以“知”为特征的从己到行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知己而后知人，知人而后知礼，知礼而后知行。”(1.28)从天到命概念义序、存有、生成链：“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1.30)

以上这些链，内部要素似乎有必然性因果关系，如说“有物必然有容”，“因有物而有容”。实际并非如此，仅仅是一些语言符号世界内的生成，确切与否，仍要受到可观外部现实世界的检验，或者说，都是一些语言世界内的摹状词表达。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认为，摹状词并不是概念指称的表达式，它们并不需要指称什么东西以便有意义，摹状词是一些“不完全符号”，它只有在包含它的句子中才有意义，即所谓“语境意

义”。《语丛》中的一些链的摹状词意义,更凸现的是它的语言哲学性质,而若干“语境意义”链缺乏现实的同一性。语言世界语境义与客观世界概念事实意义本来是应该一致的。语境论和本体论的一致性,是现代分析哲学的追求目标和取得的成就。郭店简两种意义的脱离,反映了人类早期认识的局限,但存有链大量出现和展示,反映了古代先民的可贵的探索精神,若干探索内容给我们有益的启发,对研究先秦诸子有重要价值。

三、名数、象数、名象,名数的主体生成系统

《语丛》的逻辑生成,包括前面所讲的摹状词语境义生成,本质上是象数的生成。《语丛》二有“名,数也”一语,并以此与“𩺰(伦,伦序)”有关(2.44)。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句话与前面已引用的《语丛》一的那句话(1.2、4、5)十分相关。如连缀起来看,则是:“天生命,有物有名,有命有文有名,名,数也,有名有数有伦序。”数的起源,归根到底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并将认知的结果归纳、巩固在数字形态中。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学与丈量土地,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制造器皿密切相关。^①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起源于数,反过来,认识世界时也用数来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概述这一派的观点说:“这些人显然把数目看作是存在着的事物的本原,看作事物的质料,或事物的属性,或事物的状况。”^②中国古代对数的看法与毕达哥拉斯有所不同,不是看作存在物的质料因,而是从存在物经人脑的作用抽象出来的一种属性和关系,数是主体世界对客体世界的映现,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实物必须是主体”,它当然更有理由被语言世界所关

①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5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七册第40页。

注。《周易》象数之象，八卦的爻和象，是对外物的模仿，是效法天地形象的产物，当然是主体世界的。形象经高度抽象后成为阴阳二爻，它是一切事物相反相成的符号。数与象紧密相联，高度抽象的象就成了数，《周易》“参天两地而倚数”，就是用象征并存在于天地万物的二爻作为基本的象，更是基本的数，作为立八个基本卦的依据。八卦皆有自己的象和数：乾(☰)111、兑(☱)011、离(☲)101、震(☳)001、坤(☷)000、艮(☶)100、坎(☵)010、巽(☴)110，如果八卦各与本卦及其他七卦重叠，即产生每卦六爻的六十四卦，当然也各有卦象和卦数。八卦和六十四卦，无非象数语言，也是一种数理语言符号系统，本质上也是语言哲学的内容。中国的传统，历来注重“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强调实用是任何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易》象数的应用，“极数知来谓之占”（《系辞》上），卜知吉凶是主要用途。与占卜有关且比占卜更高的，是编织天地万物人世生成链，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大极即太极，两仪即天地，四象即四时，八卦象征的分别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类的自然万物，“八卦相荡”（《系辞》上）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象数背景的生成，形成或用来说明大自然和人事的变化：“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章，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汉书·律历志》）世界由象数而逻辑生成，世界的变化由象数的逻辑组合得到说明，八卦即象数，象数即八卦。《易》的作用在于它“极深而研几”，唯其深，“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其几，“故能成天下之务”（《系辞》上），“几”，精微而至于象数化、数学化。《易》的全部做法是将客观世界转化为主体逻辑世界、数学世界来说明。

《语丛》二的名数即象数，《语丛》一的“物由望生”即“物由象生”，“有物有名”即“有象有名”。名象交融，名即象，都是主体世界的产物。但有点区别，区别在于名比象更主体化，也更抽象，名与语言中的词、汉字、逻辑中的概念，往往是一事，而象则为像，为形象，始终保持着与实

物的联系。《周易》象数学,《语丛》名数学,《周易》象数生八卦,生六十四卦,《语丛》二名数生 60 生成链,语言表达上用“某 1 生于某 2”(见此即视为一个生成链),实际上其逻辑含义是“某 2 生某 1”,例如:“情生于性”,逻辑含义为“性生情”。60 个生成链被李零先生系成了 18 组^①,其中“某生于性”的 11 组,“某生于欲”的 4 组,可见“生于性”和“生于欲”是两个基本链。60 链内名语要素共 58 个,它们是:情、性、礼、严、敬、望、耻、愁(憾恨,一曰怠)、廉、欲、虑、倍(背)、争、党、爱、亲、忠、子、易、肆、容、喜、乐、悲、恶、怒、胜、基(忌恨)、贼、慍、忧、哀、惧、慊、智、覿(待考)、悦、好、从、强、立、断、弱、疑、北(背)、贪、负、彘(待考)、喧、哗、慌、侵、恧、逃、𨾏(待考)、急、文、博、大。这 58 个要素几乎全部是人的心理活动、纯主体世界的构成要素。这与八卦象数所代表的自然界的存在和运动要素类“天、地、雷、山、火、水、泽、风”相比,则一为主体、主观,一为客体、客观,十分明显,可见,《语丛》是阐述主体世界的哲学,《周易》是探究客体世界的哲学。有谓:《周易》是占卜的书,说大自然和社会构成及其运动的书,管历法的书,以象数言客观世界运动的书,时下又有《语丛》则是论人性、人欲的人论书、人性论书,以名数言主观世界静态特性及其运动的书。而名数、名和数,与语言世界中的语词、文字、表达规则、语言逻辑等密切相关,不同于象数、象和数表征的客观世界中的图像、形象、事物概念,《语丛》是属于语言世界的哲学,即语言哲学的,而《周易》是属于外部世界的本体哲学的。

四、言说之理的深入和治国之道的破解

《语丛》的内容,除了讲语言哲学的起点和儒道概念界说、思维规则和概念联系次序、名数学及其逻辑生成系统三大块以外,还有一块就是

^①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9 页。

讲言说之道的，它实际上是在当时七国争雄的背景下对语言世界的开拓。既为言说，无非语言，故亦是语言哲学对转型时代的哲理化反思和概括。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语丛》四，李零先生针对其内容特点，径改称《说之道》，并与《老子》甲、乙、丙组，《太一生水》同编为道家哲学组。^①

《语丛》四开头七支简，写了十句话，可谓句句不离“言”字。其中第六句无“言”字，承上文“言之善，足以终世”，可补成“[言之不善，]三世之富，不足以出亡”(4. 3)。其中第十句无“言”字，按文义可将旧本、李零本“彼邦亡将，流泽而行”校理成“彼邦亡，将，流泽而行”(4. 6. 7)，“将”后补成“将[无言]”。句句不离“言”，当然是探讨言语的规则，这一规则不是词法，不是句法，而是一般性理则，谓之语言哲学，几无往而不可。这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一般性理则”有：

言和情的时点、时间对比：“言以司(始)，情以旧(久)。”(4. 1)语言世界之“言”慎其时点之“始”，主体情感世界之“情”贵其时间之“久”。《文心雕龙·原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又《情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并以此为“立文之本源”，是其后来的发展。

善言和善德皆必有反响：“非言不酬，非德亡(无)复。”(4. 1)李零先生已指出，语出《诗·大雅·抑》六章：“无言不讎，无德不报。”毛传：“讎，用也。”郑笺：“教令之出如卖物，物善则其售。”言为善言。

不负责的言论会有后果：“言而徇(苟)，墙又(有)耳。”(4. 2)言语苟且，连墙壁都会长出耳朵来听到。

恶言恶语会自食其果：“往言伤人，来言伤己。”(4. 2)一来一往，唇枪舌剑，其后果可知。“恶言覆己而死无日”(4. 4)。

善言恶言之对比，作用、评价之对比：“言之善，足以终世；[言之不善，]三世之富，不足以出亡。”(4. 3)有云：富贵不过三代。此已极言之。

①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以上说法,都暗含一个前例:个人、我、自我主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处于复杂的战国社会的自我保护哲学,从消极的方面说,照此办理,人人都会变成明哲保身的君子。我们认为,前者是主要的。其哲学抽象是儒家的道德善在语言世界中的反映和实施,《论语》有42处提到“善”,而今又演绎成“言语善”的“自我保护”哲学,这是耐人寻味的。

正如前述名数、象数哲学强调应用一样,“言语一般规则”即“说之道”更能强调应用,从而出现战国游说规则的若干说法:

游说当急务为先:“凡说之道,急者为首。”(4.5)这当然是人人都懂的简单道理,但临事多乱,忘记主要矛盾的事是常见的,《语丛》特表之,犹“手册ABC”。

急务急言,须言必及义,打中要害:“既得其急言,必有及之。”(4.5)

如客观情势不再允许你及义中的,应设法保护自己,逃遁隐匿自我:“及之而不可,必文以过,毋令知我。”(4.6)《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游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终未允,“蒯通说不听,已佯狂为巫”。可谓适例。

游说进言当察知时势,善识大体,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彼邦亡,将[无言],流泽而行。”(4.6、7)屈原(约前340—约前278),“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只得“行吟泽畔”。发愤抒情。此条亦为推证《郭店简》年代的重要材料。

游说进言之道,由后二例看,言语之通例实在也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哲理反映历史,历史沉积成哲理。

《语丛》四的语言哲学,自然不只是言及言语之理,游说之道,对同时代文献的引用构成语言哲学的应有内容。节引《庄子·外篇·胠箧》“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4.9),比较郭庆藩辑本“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简文口语性强,未经汉代人避刘邦讳改字,三句话的论元全是“人”:窃钩者、窃国者、义士,当为古本语。有人以中哲史文献为视角,以《郭店简语丛》录

《庄子·外篇》，推断认为郭店楚墓一号墓下葬的年代在公元前 284 年以后，《郭店楚简》抄写的年代，不会早于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即在拔郢之后，齐襄王末年以前，为前 278 至前 265 之间。^①此外，简文“车辙之醯醢(酱油水)，不见江湖之水”(4. 10)，用《庄子·杂篇·外物》“涸辙之鲋”典故。如将引用文字与原典文字的完整叙述比较，又可找到很多可供思考的线索。简文“邦有巨雄，必先举之以为朋”(4. 14)一语，用《管子·轻重丁》“蚊虻巨雄，翡翠小鸟”之说，巨雄，大鸟，朋，鹏鸟。举大鸟以为鹏，正用《庄子·逍遥游》鹏鸟“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典，以喻执掌国柄者当为杰出人物。从整段文字看：“虽难之而弗恶，必尽其故。尽之而疑，必……其举如将有败雄，是为割。”(4. 14)实为道家政治哲学之一隅。又文中以“殃行”与“迷惑”对，“自欺”与“重欺”对，突出正举贤才的重要，和错举人才的祸害(4. 12、13)。至于勇力不如材质，金玉不如智谋，强手多不如抓住时机(4. 24、25)，皆战国时代经验绌绎而入于主体的智者之论。

末了，我们要说，经学，经史子集的注释小学，小学书本身，皆有非语言文字学的哲理可观，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而归之，可便于研究，亦便于与中哲史接壤。举《郭店简语丛》而言之，特例亦显例也。

主要参考文献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文光图书公司印行，1971 年版。

杜维明等《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雷颐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① 王葆玟《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时代》，《哲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先秦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记录^①

——读《郭店楚墓竹简》

先秦和古希腊一样,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成长转型(turned type, switch to another stage)是不断发生的。由于铁器农耕的出现,从春秋(前 770—前 476)到战国(前 475—前 221)成了我国最有代表性的上古社会转型时期。郭店楚墓一号墓下葬的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 300 年。由一号墓整理而出的《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抄写的年代应再早些,简文著作和流播的年代当然会更早。李学勤认为,就儒学来说,这是孔门七十弟子及其再传时期,位于孔孟之间(孔丘:前 551—前 479,孟轲:约前 372—前 289);就道家来说,相当于老子后学弟子时期,位于老庄(庄子:约前 369—前 286)之间。^②如此看来,郭店简反映的正是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三世纪的儒道思想文化的转型状态。就通史而言,对应于战国早、中期而有郭店简文撰著和传播。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它是德国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1883—1969)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最富轴力的时期。雅氏说:“历史的中轴似乎被发现处于公元前 500 年左右,在公元前 800 到前 200 年间发生的精神历程之中。正是在那一时期我们遇到了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在那时形成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简称为‘轴心时代’。”(1949,《论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郭店简所反映的思想文化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认识的转型。

①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② 李学勤:《郭沂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序》,载该书,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学界还有另一种看法,认为郭店楚墓一号墓下葬的年代在公元前 284 年以后,《郭店楚简》抄写的年代,不会早于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即在拔郢之后,齐襄王末年以前,为前 278 至前 265 之间。见王葆玹:《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时代》,载《哲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一、道家从抽象“人”的规定走向个别人

道家的作品,集中在《老子》甲、乙、丙组,《太一生水》和《说之道》(即《语丛》四)五篇。^①学术界认为郭店《老子》更接近春秋战国之交的原本《老子》^②,唯此,才更富有转型时期的特征,不存在非转型期《老子》和转型期《老子》的比较问题。围绕“人”,郭店道家组文献讲了些什么?

一是人在自然和社会总体观照中的地位,而非人仅仅在自然界的位置。从《太一生水》纵横家式的行文修辞风格看,本质上反映战国道家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苏格拉底的修辞学老师高尔吉亚曾认为,修辞学使用的话语主题只能是“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事物”。^③修辞风格诠释着“人”,反映着时代。《太一生水》重在宇宙生成论,全篇少有“人”字,但实际第10、11、12简即论人:“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文中的“其”字即指太一。上文有“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有生水、生天、生地,但没有生人。人只是按先验超越于人之外的存在或规则“太一”办事,方可“事成而身长”,“功成而身不伤”。对“人”来说,可以把“太一”理解为一种悬设和虚拟,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而“人”归根到底属于现实中的人,人际关系中的人。因人生莅事和“功成”紧连着自然宇宙的本体“太一”,如不能完全说明在现实人际关系中观照“人”,至少也能说明在自然和社会总体观照中说明“人”,而非仅仅在自然界的地位,或者说“人”不具备本体论的宇宙生成论的地

① 李零根据字体将郭店简18篇分成五大类,并认为竹简类的图录应“按形制、字体编排,内容分类只是参考,应该另外编排,附在书后”。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据李零的分类作相关内容的叙述,必要时作某些调整。

② 参见拙作《从郭店楚简竹简本〈老子〉看春秋战国之际的道家》,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③ 参见《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卷第324页。

位,恰恰只有道德论的地位。

二是在认识论上对“人”作出的一系列负面的否定性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绝三弃”。道家的“人”,是理念化(无疑也是一种异化)了的人,并非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故道家提出的一些人生哲理多为常人(实际上已不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上)难以理解,可一言以蔽之谓“负面的否定性规定”言论。《郭店简·老子甲》:“绝智(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从字面上看,是对知识、言语、技术、利益、作为、思考的拒绝和抛弃,即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拒绝和抛弃。以此“否定/肯定:非知识、非言语、非技术、无作为、不深思/知识、言语、技术、作为、深思”为逻辑起点,进一步在具体化的层次上对“人”的否定/肯定模式还有:私/欲/素、朴。先为百浴(谷)王/先为百浴(谷)下。圣人在民后/圣人在民前。不争/甚欲。不知足/知足、恒足。以道佐人主者、不谷(欲)兵强、不以取强、弗伐、弗骄、弗矜/兵强、取强。不善为士者/善为士者、微溺玄达、深不可知、以为之容。不尚盈/尚盈。圣人无为而无败、无执古而无失/有为有败、有执有失。圣人不欲、不贵难得之货、不教/圣人欲、贵难得之货、教、复众之所过。弗能为/能辅万物之自然。道恒无为/万物将自化。无名之朴/镇之以化而欲变的万物。不知足、不知静、不自定/知足、知静、自定。无为、无事、无味/为、事、味。无难/难之。恶(醜)/知美之为美。不善/善。弗始、弗恃、弗居、弗去/万物作、有所为、功成。无名、微/道、朴。不屈/虚。弗言、弗知/智者、言之者。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玄同。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无事、我无为、我好静、我不欲/民自富、民自化、民自正、民自朴。不辱、不殆/知足、知止。功成身退/天之道。等等。以上两两对待的说法,语言上的否定说法,是概念上的肯定态度,是针对理念化的“人”的。语言上的肯定说法,在逻辑上也是针对抽象的“人”的,但可直接转换为针对具体的、个

体的,多半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是概念上的否定态度或肯定态度不一,需具体分析。总的可表达成: $L\bar{p} \wedge R\bar{q}$, $L\bar{p} \wedge Rq$ 。这里,我们看到了最深刻的哲学问题:语言上的否定表达是事实概念上的肯定,语言上的肯定表达也是事实上的否定或肯定,更重要的是,抽象“人”的否定,在具体个别层面上表现为肯定或否定,这是人类思想方法上的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一次相反对待,与康德在先验设置后必然出现的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二律背反”很相像。需要指出的是,“二律背反”是人类思想方法上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后来融入了辩证法。出现在以上两两对待中,有两个问题最值得深究,一是为什么要设置理念化的“人”?二是理念和现实,“人”和非“人”,否定和否定或肯定之间存在何种转化关系?

从柏拉图的理念(idea)、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到康德的先验知性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到胡塞尔现象学先验“构成性的”本质域“艾多斯”(eidos),到现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形式化、数字化,无一不是悬设理念、超越于经验事物之外的概念以为思维手段,而谓经验事物本身是无法认识的。对人的认识也是这样,哲学史告诉我们,提出理念化了的“人”,大写的、抽象的“人”以作认识人的范畴是常识范围的事,我国两千多年以前的老子也不例外,只是我国崇尚“名象交融”的思维方式^①,造汉字(象形文字)的那种重经验观察的,捕捉事物形象的直观的具象思维占了上风,老子的名理(概念)思维方式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老子对理念“人”的规定,用否定性语言的表达,完全是理性化,名理化,概念化的,直至使用“拒绝和抛弃文明和进步”的话来确认理念“人”,是不奇怪的,从理念“人”走向现实个别人,需要一个有力度的转换,逻辑上完全可能是对“人”的提法的否定之否定。有人在解释《郭店简·老子甲》开头那段否定性的负面提法的“三绝三弃”的话,说成肯定

① 参见刘文英:《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象交融》,《哲学研究》1999年第2期。

性的正面提法“三继三弃”，“弃”的内容与“三绝三弃”之“弃”的内容相反。即“继智弃偏，民利百倍；继巧弃利，盗贼无有；继仁弃诈，民复季子。”^①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们看来，这固然可以从语言文字上加以考订立说，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从抽象“人”的否定说法“三绝三弃”转换为具体人的肯定说法“三继三弃”，是逻辑的必然。我们注意到，《郭店·老子》已删除了许多负面的否定性说法，而作正面的肯定说法。这不能不说与社会转向纷争的现实有关，是思想文化转型的表现。例如：今本《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郭店·老子甲》删，仅有“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欤？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今本《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整段否定性说法，《郭店·老子》全无。逻辑和文本内容的全删，表明转向顾及现实的立场；表明从抽象“人”的认识论转向具体、现实人的道德关系论；表明道家本体论与儒家伦理说的融合，表明道家对儒家的吸收。这无疑是思想文化上的转型。它的深刻的历史启示是：时代变了，思想文化须与时俱进。如由逻辑顺序推导文本的存在之真，应该说，打上那个转型时代烙印的文本更接近反映彼之时代存在自身的文本之真，从这个意义上说，打上转型时代烙印的《郭店简·老子》更接近原本《老子》。

二、儒家君臣民“缁衣”价值标准、道德实践说和“公利”理性

儒家的作品，按李零“字体分类”的说法，从《缁衣》到《语丛》三，共十三篇，当分四类。为叙述的方便，将二、三类合并，四、五类合并，这样也正好涵盖了今通行本《郭店简》按内容排序的次第相异的篇目。二、

① 邓球柏：《内圣外王之道：〈郭简·老子〉的主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三类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有：

一是《缙衣》就君、臣、民的儒家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作了系统阐述，总的精神是“君示民、赖民、长民、臣忠君怀民、民顺从君臣不得有危害性言行”，俨然是一幅儒家理想国图景。正如“好美如好《缙衣》”那样的普遍性标准，如何做好君、臣、民，也理应有其道德的普遍性，有“君缙衣”、“臣缙衣”、“民缙衣”，“缙衣”几成了儒家理想道德普遍性的代名词，成了一种符号。

关于“君缙衣”，为君的价值系统，文中以周文王为典范，引《诗》赞其榜样的价值在于获信天下百姓，使天下百姓都能讲诚信：“仪型文王，万邦作孚。”引孔子的话，统治者当善恶分明，方可引领百姓懂得该做什么：“又（有）国者章好章恶，以视民厚。”章，彰显。君依赖民，君民关系应当是心脏和身体的关系（后人又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法，君以民芒（亡）。”民可“欲”（希望，拥护）好君，亦可“亡”（灭亡，消灭）坏君，这显然是孔门后学的观点。如何做好君？“不自为贞，卒劳百姓”，这样的坏君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尽的痛苦。要做好君，那就要从自身的修养做起。“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至（致）行己以悦上。”并说，只要国君有高尚的德行，就会“四方思（顺）之”，禹立三年，百姓就完全实行仁，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诗·大雅·下武》才说：“成王之孚。下土之弋（式）。”孚，诚信之美德。要做好君，就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上好此物也，下必又（有）甚安（焉）者矣。古（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标也”，要做到身教重于言教，须知上行下效是普遍规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要信任百姓，懂得“卑贱者聪明”的道理。“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教此以失，民以此变”。甚至对国君的服饰仪容外表也作了规范。“长民者衣备（服）不改，雅容有常”。在礼教和法治的关系上，主张“教之以德，齐之以礼”，“教之以政，齐之以刑”；要是“政之不行，教

之不成”，那就“刑罚不足耻，而爵不足劝”，在这种情形下，“上不可以褻刑而轻爵”，重要的是“敬明乃罚”，“播刑之迪”，几乎是礼教和法治并重。

关于“臣缙衣”，要求处君亲近、忠诚、敬畏。引《尚书·君陈》“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迪，蹈行。弗迪，不能完全实行，正有敬畏之意。“子曰：大臣之不亲也，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邦家之不宁也，则大臣不治，而褻臣托也”。大臣不可不敬，“民之莪也”，莪，表率。因君、臣相系，“君缙衣”的若干内容也就是“臣缙衣”的内容。李零认为与《缙衣》同字体、同类编的《鲁穆公问子思》引孔子的孙子子思的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当是“臣缙衣”的重要内容。至于“民缙衣”，有两句典型的话，“民言不危行，不危言”，“民慎于言，而谨于行”，亦即所谓“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可见“民缙衣”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如回到“好美如好缙衣”这句话，由“三缙衣”构成的儒家理想国是美好的，不过，我们要考问，它是乌托邦的吗？不是！战国虎雄争锋决无产生乌托邦的土壤。上述“三缙衣”价值观念系统后来不断付之实践，实践的结果是长时期的封建社会，没有乌托邦。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儒家道德实践观。

二是有关儒家道德观、价值观的实施，有系统的实施理论，著名的《五行》篇即是，《郭店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都收了《五行》。《郭店简》开篇即有“五行”二字，“五行”是战国时人语，即《荀子·非十二子》指责孔子的孙子子思“唱之”而孟轲“和之”，“甚僻违而无类”的“五行”，含仁、义、礼、智、圣。^①五大道德观念被说成五项实施的行动，正体现了儒家道德观念本体论和道德实践论的一致。《郭店简·五行》开头便说：“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智形于内谓

① 参见《二十二子》，第297页中栏。又见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页。

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圣:正是“内圣外王之圣”,否则不好理解。这里,既有“形于内的”主体内部修养实践,又有“不形于内”,而“形于外”的主体以外的外部实践。由儒家伦理的本体构成要素引出它的实践范畴,内部实践和外部实践的区分,在逻辑上都是儒家伦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与社会历史的转型相联系,正是战国以还,子思、孟轲一派以“仁、义、礼、智、圣”概括为五种德行,以为王公大人的道德规范和实施检测项目。儒家伦理实践观的提出,内部修身和外部施行的区分,都是“内圣外王”说。这与《礼记·大学》的“内圣外王”说以“修身、养性、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为内圣,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相比,仍属早期的“宏大叙事”阶段,也更带理论色彩。不用说,如仔细从中抽绎,还可分析出儒家伦理实践观的具体内容。如“和、善、德”的关系,“忧、智、悦、安、乐、德”的关系,讲究自身修养的“君子”和有志于实行君道的“志士”,道德之“仁”和思维之“清”,“仁之思”与“智之思”之间的关系,等等。中心意思是实践过程中要摆对各种道德范畴之间的关系。在“智之思”问题上,特别提到识取贤才:“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作为“智之思”识取贤才的补充,那就是成才靠机遇。《穷达有时》说,傅说板筑遇殷高宗武丁而佐天子,吕尚行年七十屠牛于朝歌,遇文王举为天子师,后佐武王灭商。但是机遇偶然,实有必然。“又(有)天又(有)人,天人又(有)分,察天人之分,而智(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知识和道德是主宰。战国尤需人才,这种见解不能不说是彼之转型时期清醒的人才观。

三是提出历史政治的评价标准“公利”和“义”。上古三代尧舜禹的禅让,在古代社会中一直被视为典范,受到广泛的赞扬。《郭店简唐虞之道》的评价标准是公利和私利之别,传统的儒家道德“仁义孝悌”都在文中围绕公利和“义”出新意。这一做法,新的时代烙印非常明显。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五蠹》的根本标准就是个“公利”,云:“公私之相背

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唐虞之道》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前一个“利”是公利,后一个“利”是私利。“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公利”是客观外部标准,“圣”是“内圣”主体标准。前一个标准,“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即讲公利而不讲私利,是最高的仁。这里的“仁”和孔子时代相比有明显不同,《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后一个标准“圣”是主体的,但离不开客体的“利”和“公利”之“仁”,简文云:“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十分明显,意即上古的贤人、仁人、圣人,都是要讲公利、至仁的。而如前所说,至仁也就是“公利”。文云:“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处境困难也不贪,至死不谋私利,才算完完全全地做到了仁。仁与公利紧联。简文云:“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即内圣外王,公利至仁,方称得上“圣道齐备”。主体的“圣”始终离不开客体的仁和公利。诚然,公利即利他行为,在古代缺乏物质支撑的情况下,公利行为事实上缺乏普世性。《郭店简·唐虞之道》体现的是仁和义,义和利的两两同一,其结果是战国时代的仁—义—利的统一。简文中说:“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这里,爱亲和尊贤,仁和义,甚至说是“养性命之政”和治“天下之政”,是一致的。仁、义并提,且有自己的特色,是从孔子的“仁”到孟轲的“仁义”(《论语》无“仁义”连用的说法)的中介,颇值得注意。

三、逻辑背景下的人性论、教育观和儒家道德 范畴间逻辑关系说

《郭店简》的四、五类讲的主要内容,一是以“二十凡”为逻辑构架,对人的主体世界的核心“性”,含天性、人性、理性等诸多方面,作出迄今仅见的完整而系统的探讨。凡,举凡,大凡,有限定范围、明确论题的意

义,是古代类逻辑的一种表示法。一凡^①讲性与心(思想)的不同,性虽存在于人,但性与天接,心与物接。“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而“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二凡讲性总要有外在表现,性犹金石之声,不扣不鸣,不扣不出。三凡讲心志,动物无思想,心志即性,“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而人的心志不同,“人而学或使之也”,经学习而得。四凡讲物性各各不同,而人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心志不同,“其用心各异,教使之然也”。文字与《荀子·劝学》说极似,战国中后期烙印明显。五凡讲性的运动方式和运动状态,有七种:动、逆、交、厉、继、养、长。六凡讲七种性运动的文化意义,如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长性者,道也。等等。七凡对七种文化意义作具体说明,如“凡见者谓之物,快于己者之谓悦”,“道者,群物之道”。八凡讲道以心术为主,道又主要指人道,唯心术与人道才能一致。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四者的区别:诗是“有为为之”,书是“有为言之”,礼乐是“有为举之”。四者的制作和实施,“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也离不开人之道,“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九凡讲声出于情,只要这种感情是真实的,就会感人至深,没有例外。十凡论古乐龙心,皆为教龙的传人。十一凡讲至乐必悲,哀与乐,性相近而互含互接。十二凡讲不同的思产生不同的感情,可谓情思种种,如忧思、乐思、悲叹之思……。十三凡讲学者求其心为难,当“从其所为”而求之,“不过十举,其心必在焉”,“察其见者,情焉失哉”?十四凡讲用心、用智、用情、用身、用力之甚的相应结果,并对“不难为之死”,“巧言利辞”两种性格和行为作连续分析。十五凡对伪善、谨慎、反映迅速作对比分析。十六凡讲人情可悦,用让步句、“未…,…者也”、“…,…(者)也”、紧缩句等句式,对主体情性和相应客体行为共 25 对作

① 有关“二十凡”的内容,文本依据李零《性(性自命出)》,载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第105—108页。

出判断和说明。十七凡讲“悦人勿吝”(待人真诚)和言事“明举之而毋伪”。十八凡说交友勿烈,必使有终,有交淡若水,交淡以久之意。十九凡讲善于乐群,尤须“习父兄之所乐”。二十凡讲任忧患而后乐事。主体情性范畴身、虑、行、貌、心、喜、乐、忧、怒、进、退、欲等的内在要求和运动界定。如:身欲静而勿羨,虑欲渊而毋伪,行欲勇而必至,等等。综观二十凡,是包括道德、认识、逻辑、教育、诗书礼乐论等在内的广义人性论。性理性命之说,为孔子所罕言,一部《论语》只有两处提到“性”,一处是《阳货》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处是《公冶长》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郭店简·性自命出》通篇谈性,正是社会转型期新的思想文化课题,若干内容的具体深刻,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变动的广阔场景引起对社会主体人的剖析的深化;诸多内容的广泛、广义,正反映越出传统儒家而有自由探讨,自主深入的倾向和要求。

二是提出了以人性为本的社会教育观,以人性言教化,可称“人性化教育”。逻辑上已有类于《荀子·劝学》以性恶言后天之教,但与《劝学》不同。《成之闻之》^①立足于君子之教和激发民善之教,可谓之以性善言教。君子之教须身教重于言教,否则收不到效果,“君子之求诸己也深,不求诸本而攻诸末,弗得矣”;君子之教须穷源返本,教人以道,“穷源反本者之贵”,“不反其本,虽强之弗入矣”;君子教民贵在知“民可敬导”,“与民有同”;君子教民的内容在于天常人伦,特别讲到中人之性,只要下功夫教,也可变得“博长而厚大”,以至“圣人不可由与墀之”,这实在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且“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慕也”,这实在已是在说民皆有“善道”善性,经过教育和激发,可变得为圣人不可仰慕企及,从人性上讲了“民贵君轻”,尤为深刻。

三是对传统道德范畴和各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及其生成作了具体界

① 文中引用《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语丛》和《忠信之道》的文字,参照了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

定。对范畴认识的深化与相应时代的映射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映射(反映)往往比原事物更为真实和美好,这正如《老残游记》第二回写大明湖里千佛山的倒影,“比上头的千佛山还要好看”。《六德》区分了“立身大法三”:夫、父、君,即后来说的“三纲”。“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六位”:夫、妇,父、子,君、臣。“六职”:率人者、从人者、使人者、事人者、教者、学者。上述情况以上位范畴涵盖下位范畴,各上位范畴间的生成关系是:“凡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绎之也六(指“六德”或“六位”),其衍十又二(指“六德”加“六职”,更多的是说“六位”加“六职”)。”至于它们的实践价值,文中说:“三者”(指立身大法、六位或六德、衍十二)通,言行皆通。三者不通,非言行也。三者皆通,然后是也。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敝也。”应予注意的是,实践的主体不能不说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尤其是最后一句,要求实践个体为实施“三者”鞠躬尽瘁。实践主体的个别性,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提升。这一点从孔子在“厩焚”以后问人“不问马”(《论语·乡党》)就可看出,《郭店简》只是进一步汇集而成系统,也更带上了理论色彩。《尊德义》进一步把“六德”及其实践范畴“学、教”等统称之为“尊德义”。教和学的内容就是要围绕“六德”,以体现“尊德义”,文中说:“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又说:“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尊德义》通篇讲义,但也提到“善者民必富”。《语丛》三第39简竟然还说了这样的话:“物不备,不成仁。”即所谓物质财富不齐备就成不了仁。这些与孔子时代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相比,则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富未必和”,财富多了社会未必和谐,“不和不安,不安不乐”,那怎么办?文中说:“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先”指什么?“先之以德,则民进善焉。”即先行的急要之务是进行最根本的道德教育。如说成主张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一起抓,且认为精神文明更重要,亦几不曲为之解。这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的对道德和财富关系的看法。逻辑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为思想的

异化打开方便之门。《郭店简·忠信之道》规定忠和信的逻辑的度：“不诌不孚(孵化)，忠之至也。不欺弗知，信之至也。”“太久而不渝，忠之至也。陶而睹常，信之至也。”有关忠、信的量的变化：“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有量变，有极限，会作质的推究或呼唤异质，紧接着以道家说忠、信：“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忠人无诌，信人不倍(背)。君子如此，故不忘生，不倍(背)死也。”“大忠不说，大信不期。不说而足养者，地也。不期而可遇者，天也。似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忠信让人不忘生，不背死，忠信犹天地自然，正援道入儒。《郭店简·语丛》一至三，实际上也可理解为以逻辑生成说阐述传统道德范畴，《语丛》一以“物由望生”为主题，《语丛》二以“名数”开篇，诸多范畴依次生成，《语丛》三以比喻为修辞认知，探究各道德范畴间的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唯此逻辑生成，援道、援名入儒也处处可见。凡此，都打上了先秦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先秦儒家语言思想论^①



先秦对中国文化的奠基和清代对此文化始源的诠释,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部分。奠基立足于本体性的学理,诠释围绕时空演进中的史脉。本体和发展是互动的,但各有其对象内容。奠基的辉煌来源于颇富民间自由思想的先秦诸子,奠基的工具无非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形下之器,也是被反思的形上之体。说先秦有语言思想,这没有争议,何谓“语”?何谓“言”?这就是语言思想了。说先秦有语言学思想,还会有争议,但先秦对语言的研究还是有的。先秦名书《尔雅》,不就是研究性质的书吗?语言文字是人类的后天存在,因而是经验性质的,它的研究是经验的研究,研究的方法是经验的方法。本文立足于儒家,试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说其语言本体说,言语评鹭中形成的普遍性标准及其语言形上说,以及如何从儒学范畴去发现儒家丰富的语言思想。

一、先秦儒家知行工夫和正名视域中的语言本体观

本体的回答,离不开逻辑是“是什么”的提问。正像儒家很少或几乎不回答“仁是什么”,只是回答“仁怎么样”,“怎么做才算是仁”,但这仍然是对儒家道德仁论的本体回答。关于“本体”概念,西方的理解和我国不一样,西方重在实体的回答,且往往被规定为某种“终极基质”,中国的本体,主要被理解为知行工夫的出发点及根据。^②语言无疑是知

① 本文为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先秦语言思想研讨会(2008.10.10—10.12 北京)论文,后刊于《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0 期。

② 参见杨国荣《论人性能力》,载《哲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61 页脚注。

行的逻辑起点,也是知行的根据之一,从知行工夫说,汉语言本身就是本体,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本体。先秦既有“语”,也有“言”,《诗·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论语·乡党》:“食不语,寝不言。”朱熹集注:“答述曰语,自言曰言。”这里的“语”和“言”都表现为“怎么办”、“怎样做”,都是某种具体的“知而行之”。在更高一级的语义抽象上,作为“语言”的信息焦点的“语”和作为“言语”的信息焦点的“言”也没有区别,都是“说话”这一动作行为,或指“说出来的话”这一存在实体。甲骨文中的“言”字,金文中的“语”字从“言”,都少不了舌伸出口外这一动作。由以上可知,先秦“语”和“言”都在“怎么样”逻辑中认识之,在知行实践中(哪怕是最简单的)把捉之,语言自身的本体,与语言的使用分不开,是语言实践工夫、知行工夫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这不是语言本体的外延,恰恰是语言本体的内涵。

先秦循“怎么样”逻辑和知行实践本体对语言本质的探讨,内容极为丰富。

《论语·子路》的正名,“名”可注释为一个词,“言”是言语、说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用词不当就说话不顺,说话不顺就办事不成。继而推及无法治理天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用一个词一定要有根据,方可说得出口,说出口来一定要做得到;君子对自己说的话,一定要做到无所苟且马虎。从客观实践作用看,以用一个词、说话为起点,以治理天下为终端;从主观人文修养看,要言之有据,言必信实,无所苟且,以客观求实、心性谨正为追求。言语的社会效用,言语的人文性得以揭示。

荀子《正名》进一步推进孔子的“名正言顺”,荀子的“名”,仍是语言中的名称,但大大地丰富了“名”的内涵。最大的丰富是提出了“约定俗成”,即名称和概念、名称和事物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名称不反映事物的本质。既不代表概念,不反映本质,就只能说明或接近说明名称是个符号系统。荀子还研究了“制名之枢要”在于“所缘以同异”,在于“稽实定

数”，数，数字，符号，“稽实”二字，已表明数的客观性，数是抽象的客观性。制名所根据的是对象的不同，对象的形相的不同，对象质料因（元素）的不同，但名称不反映、说明对象事物的本质，而是为了称说不同（本质的）事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是惯例派、约定派，斯多葛派是自然派、必然派。但亚里士多德将形式和实质相对照，甚至在《形而上学》中这样说：“我用形式是指每件事物的本质及其第一本体。”可见符号形式是被允许扣住反映事物本质的结构体的。荀子的“约定俗成”和“稽实定数”，亚里士多德的惯例、约定和反映事物本质的结构体，形式因和质料因，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约定俗成”是说名称与概念、事物本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不等于说名称与名称之间没有联系。三代的成名（旧名）与成名之间，成名与当下新名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名与名之间的联系成为求同源词的理论依据。《正名》篇强调通语的重要性，开头即说：“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具体的物名则依从中原地区华夏诸侯国已形成的习俗与各方面的共同约定，边远地区就靠这些名称来进行交流。与此并联的是，《正名》还强调“散名之在人者”，不光是讲人身、人性的各种名称，重要的是体现和传导人身、人性的，和人身、人性同在。《正名》篇还对“名”进行逻辑分类，分成大共名（如动物）、大别名即共名或兼名（如鸟兽）、别名即散名（如某种鸟兽）。《正名》篇还用大量的篇幅涉及名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孔子“正名”说的直接延伸，如说“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统治长久，功业建成，是政治的最高境界，这是谨守名分、名义的结果。

如果说，《正名》是“正名”语言论和“正名”逻辑论，《荀子·解蔽》则是“解除蒙蔽”，讲认识论的。全文除人生主体须“虚壹而静”，方可认识自然规律和治国之道以解蔽外，还举出“蔽”端，其中有“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其结果，墨子“尽利矣”，惠施“由辞谓之道，尽论矣”，不知文辞只讲功利，只讲言辞辩说就沦为尽说空话。去

蔽之法是要像孔子那样仁德明智,多方学习,不断进行人性的调摄,就可“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言辞辩说存在于去蔽认识之途,正名是认识的方法之一,去言辞辩说之蔽而正名是认识的一个终极目标,知识、语言的学习摄入,均为人性完善所不可或缺者。使用语言是人类的本性,语境是人性完善的场所。语言与人性的关系在先秦屡屡被强调。

《孟子》以逻辑上的“无类比附”,心理上的投契引胜,表达上的恣肆旁注,造成言语上的“辩”,孟轲是言语之辩的艺术大师。书中“善辩”的例证举不胜举。

理性的思考,《孟子》知行出发点和根据,则有涉及“言”与“心”与“气”的关系。《公孙丑上》载:告子曾认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轲则认为,说不能在思想上获胜,便不必求助于意气(即公孙丑说的第二句),是对的;说不能在言语上获胜,就不求助于思想(即第一句),是不对的。也就是说,思想认识不正确,就不要再讲什么意气风发;要是言语欠缺,就得继续思考。人要做到“持其志,无暴其气”,即坚持正确的思维、思路,不要滥用情感意气。孟轲的批评,隐约透露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关于“心志”(包含思维在内的)和“气”的关系,孟轲有高于告子的认识,“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并进一步提出了“知言”与“养浩然之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关于“知言”,是在通识的基础上“知”,在心知、践行的范畴中论诸“言”之“害”:
“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言辞有偏颇、过头、邪僻、逃避之分,人知其害有蒙蔽人、陷溺人、离散人、困窘人。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的回答是“难言也”,从它“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看,它归根到底还是“思”、思想的问题。“知言”与养气,仍然包含言语与“思”的关系问题,两者密不可分,只是在人生修养、道德论范畴中讲的。即使是“知言”中的“四辞二害”,也没离开思维。按照

黑格尔的说法,“逻辑的必然性就在于事物的存在即是它的概念这一性质里”,逻辑的必然性就是客观事实“内容的知识”。^①如此看来,上述知行,“知言”,知识是一“客观事实”,且其本身就体现逻辑必然性。

以“心”、“气”之思成“言”,以人、世之情释言,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以解诗书。《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知人、论世”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诵诗、读书以释言语。如果我们把“言、心、气、人、世”既看作对象,又看作概念,则“言”是它们的起点。它们各有其自身,又各各相通。我们总是在综合相通中寻找“言”的定位。这首先是由中国古代学术的融通特点所决定的,并非所谓“没有专门论述语言”所致,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我们去剥离。

二、言语评鹭的普遍化和语言形上地位

近年来的出土文物中,儒家文献占绝大部分。郭店楚简共收 16 篇,除《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以外,14 篇是儒家作品。上博楚简第一册 3 篇《孔子诗论》、《缙衣》、《性情论》全是儒家作品,其余已出版的二至六册,绝大部分也都是儒家作品。今以郭店简儒家和上博简第一册看儒家的语言思想。

沪简《孔子诗论》是论《诗》的,少不了论《诗》的思想内容,但也不乏论《诗》的语言。第 1 简:“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是说写诗、歌乐、为文不要吝惜不畅,应开怀尽志,畅所欲言。最后一句是说“文”与言语表达之间的关系是“文不要吝惜言语表达”。先秦儒家涉及语、言等字眼时都立足于此岸世界、此在时空中说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儒家尤其如此。所以,要想在儒家的

①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版,上卷第 38 页。

文献中寻找索绪尔“语言”和“言语”区分论,肯定会失望的。“文亡吝言”,文与言成了一对范畴,一个讲现实的言语作品(从与诗、乐对举看,“文”指文章之类),或指文采(甲文中的“文”即“纹”字)。一个讲现实的言语表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与此 1 简意甚近,文字上亦近同。还与《今文尚书·尧典》“诗言志”切近。那三个“亡吝”的功利目标是“王”(动词 wàng),称王,实行王道化育,实行仁义。襄公二十五年《传》还说:“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其行不远。”“言”是为了表达志趣,上述“化育仁义”也是一种“志趣”。这里有两个层次,一是功利目的层次,一是撰文作言语表达的层次。如前所说,中国古代的知行论、功利论就是本体论,知行论是包括“知言”的,第 25 简评《大田》末章“智(知)言而又(有)礼”。第 28 简评某逸诗“不知言”,同理可推,言语表达论就是根本之理语言论,甚至也可归之为功利本体论之中,儒家语言论无有彼岸抽象的纯形式化的语言、言语区分论。先秦是“不分论”、表达论、服务人仁论。但这种此岸论的语言论并不妨碍我们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抽象。

美言声善的追求。《孔子诗论》第 3 简评论《国风》“容纳万物,溥观人俗,广采民风”,言语表达上的评语是:“其言文,其圣(声)善。”文,文采,美。以美、善为言语评价标准。先秦儒家不言“真”字,几将美、善当“真”。善本来接近真,美,法国思想家布瓦罗以美与真同义。美、善本是道德标准,评言语和评道德的价值标准一致,反映了彼之时代人们对言语世界和道德世界的认知是统一的。

言语本身就成了个评价标准。为便于掌握分寸,还对“言”作了类别性表述。或反过来说,在熟练的言语评价中认知言语类别。第 8 简有“諛(piǎn,欺骗)言”,评《小雅·十月》“善諛(諛)言”;有王公之耻言,评《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有“言不中志”的“疑言”,评《小雅·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惩戒之言,评《小宛》“其言不亚(恶),少又怎安(焉)”。怎,惩。年,上古泥纽真部;徵,上古端纽

蒸部；惩，上古定纽蒸部。端、泥纽，定、泥纽为旁转。真部和蒸部上古偶有音转。例胜（蒸部）通伸（真部），《墨子·备高临》：“有诎胜，可上下。”孙诒让问诂：“诎、屈字通，胜、伸亦一声之转。”又例佞（蒸部）通信（真部），《左传·定公十三年》：“韩不信。”《史记·赵世家》作“韩不佞”。又上古真部字“旬”用蒸部字“亘”作谐声偏旁，写作“旬”，《说文》：“旬，古文作旬。”惩，《玉篇·心部》：“惩，戒也。”戴震《诗经考小雅三》：“《小宛》，戒王也。”不以《小宛》如《毛诗小序》所言为“大夫刺幽王”之诗。巧言，评《小弁》“考（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戴震《诗经考小雅三》引吕祖谦说《小弁》“盖推本乱之所由生，言语以为阶也”，混乱是由信谗言引起的。第23简有“乐词”（快乐的言语），评《鹿鸣》“以乐词而会”。

除言语标准外，《孔子诗论》的批评标准还有儒家伦理标准和情性标准。儒家伦理是儒家道德本体论，第1简要求诗文节制于“王”，正是这一根本标准。志：道德理想，情：情感，情性，言：言语。这三大批评标准都统制于化育天下而“王”的仁。仁是人与人的关系准则，天和命、天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天命含情性，是个体与身内自然的关系的反映，有如王夫之所说，有血有肉的人是“天地之心”。儒家道德论包括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可见命与仁有本体意义上的同一性，故“罕言”。道德律令从来就是最受哲人关注的标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把“心中的道德定律”看作和“头上的星空”一样，是自己终身敬畏的对象，关注和研究它们成了终身的追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前二畏都是对道德律令的敬畏，最后既是对道德，也是对言语表达的敬畏。以道德评诗的有：第2简总评《诗》是“文王受（授）命”。《颂》诗是“坪（平）德”，《大雅》是“盛德”。第5简评《周颂·清庙》是“王德”，“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文王）之德”，以为其根本大业。礼与仁，也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背景上具有同一性。文王之德与文王之王是一回事，祭祖之礼为本，执文王之德为根。第7简评《大

雅·皇矣》是“明德”，也是天命。情性标准，如第10简评《国风》“《甘棠》之保(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第17简“《采葛》之爱妇”，等等。情性与道德标准的结合，最典型的说法，是第10简“《关雎》以色喻于礼”。喻：晓喻，明白，懂得。还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评价标准，谓之外部世界可也。由上面可知，道德标准的各种“德”也是类化了的，情性标准也都有简明的概念、范畴化了的说法。这种情形与言语标准的类化是一样的，它说明《诗》的评鹭的成熟和深化。

如把《孔子诗论》和《毛诗小序》对照，可知前者远无后者那么多的美和刺，后者评诗几乎每篇都有无法考求的针对性，有极强的功利性，评点得很“实”，“实指”的内容恐是汉代人的猜测。前者则从评价标准入手，少有“实指”，虽并不“空灵”，但可谓“入于诗而出于诗”，几可自由入化。说诗评诗是先秦主流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据研究，《左传》引诗赋诗达153次，以“君子”名义评诗35次。^①其中最壮观的是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风、雅、颂无不置评，大意为为鲁政立正，指示当齐于周。《左传》记载的先秦的普遍引《诗》赋诗，事在孔子评诗之前。从《左传》所记到《孔子诗论》，经历了从实践理性向思维理性的转化，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孔子评诗的主体理性价值标准(道德、情性、言语表达)是对先代实践理性的继承和发展。实践理性的应用是那样的熟练，恰到好处，它是在一定语境下的言语活动的实践，思维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否则会不知所措，也不知所云。主体理性的类化、深化、范畴化，更离不开言语的作用。总之，言语表达在实践理性和思维理性都有重要地位。但这样说，理论上还不够。

我们认为，西方的理念论者从逻各斯，从思维过程，从概念范畴去发现真，存在论者则从知识对象，从语言，从语言与知识对象几乎是无限多的、存在着的联结的“澄明”中，或知识理性升华中获得真，语言成

① 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第167页。

了存在论者的发现真理的“超越论”的“语言形而上学”，古希腊时代，前者有柏拉图，后者有巴门尼德。后学绵绵，既争论不休，也各造辉煌。继承巴门尼德学说的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后来又把“诗、言、思”紧密结合，语言超越其传统工具论范围，而获得本体论（存在论）的地位，视言为原诗，而非一般的交际工具了。^①从吴季札评诗到孔子论诗，言语评鹭至关重要，从言语评鹭去发现大美和至善，体现在引诗评诗的全过程，成了有类化意义、程式意义、普遍意义的“普遍语言”（Universal characteristic），言语表达，言语活动，“普遍语言”的言语品评是发现大美和至善的“语言形而上学”。与诗紧密结合的“普遍语言”评点，包括编纂孔子言论的《论语》中的“语”，都是原思、原诗，是儒家的言语形上论和本体说。

《孔子诗论》中常有“多言”二字，例如第2简“《讼》（颂）坪（平）德也，多言，（文王、武王）后”，“《大雅》盛德也，多言”。第3简“多言，（《小雅·四牡》《常棣》等）难而惛怱者也”。意思是：大多这么说。是言语格式，常用于论段的开头。言语的格式、程式是有普遍意义的。以“言”为中心词的言语格式，正好体现了言语作为类型化，普遍化的对象来理解。黑格尔说：“规定性仍然是普遍性，属于元素和本原。”^②“多言”这一带有“规定性”的格式是儒家“语言形上说”的又一个旁证。

格式以外有格言。上博简《紂（缙）衣》共存24简，“子曰”出现次，“子曰”后面的话几乎全是意义深远的诠释、规律性的概括或可予遵循的格言。例第1简：“子曰：好美如好紂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服而不剋（被试法）。”又“子曰：有国者章（彰）好章（彰）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弋（代，替换）。”言语表达成了行为和表达的范式，表达普遍性，形上化可知。道家的语言普遍化升华为“道”，道和数、象等都成了先秦语

① 参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学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版，第416页。

言哲学的范畴。儒家的语言普遍化并没有形成相当于“道”的范畴。只是与儒家道德、情性范畴等共存。黑格尔曾认为“语言是纯粹的精神存在物，这东西一被听到就返回精神本身”，还认为“圣言”之“言”，语言，犹逻各斯：“logos 这个希腊字比德文的 wort 更确切，它有很好的双重意义，既有道理的意思，又有语言的意思。”^①上博简《絺衣》第 19 简有一段圣人之言融于道德、情性、志趣、知行的话：“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格，此以生不可夺志，死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齐而守之，多志，齐而亲之，精知格而行之。”这种兼容并包的“言”，说之为儒家之理的融合体，之礼，之仁，之逻各斯，并无不可。这与从存在论视角考量之属异曲同工。

三、儒学学理中的言语之踪

儒家的思想，涉及天地自然，道德情性，知行思虑，言语说物等方面，与言语直接相关的有：心性，心思，思言，言辞。心（脑）之官则思，但情性外化需经过思虑，心、思难分，心、性也难分，思而出言，言而成辞。

儒家的性命说，情性说，心性说，上博简《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讲得较集中。心，指大脑。儒家认为性、情关系最近，情由性生出，《性情论》2 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郭店简《性自命出》1、2 简同此。可谓“天→命→性→情→道”。《荀子·正名》：“情者，性之质也。”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心与性、情的关系，性、情的发出当然要通过心理活动，通过思维。《性情论》1 简：“凡人虽有性，心亡（无）正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作、行、奠”的主语是“心”，它们都要通过“心”才能实行、完成。这其中，情性、行为、心之思考、实施，言语就没有作用吗？J. Aitchison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版，第 4 卷第 46 页。

说：“心理语言学的一般目的都是要找到人类说话能力、语言理解能力的底层结构和进程。”^①人类的情性正是语言的底层。心理、行为、思维，无一不语言。儒家心性说，还认为性同而心不同。《性自命出》8简：“四海之内，其性式（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荀子·劝学》也说过同样的话。自然之天性同，而后天的教与学造成“心各异”，心，既指思想，也指个性，正是语言的作用使“心各异”。儒家情性、心性说，是直接包括语言在内的，《性情论》14简：“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拔人之心也厚。闻笑声则馨如也思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前面说“道始于情”，这一条恰恰是说“言出于情”的。事实上，言与情性的关系，被用来评说《诗》、《书》等经典，《性情论》中多见（第8、9、15、17简），这本身就是一枚硬币（情）的两面（道、言）。

关于心和思。儒家以心为思的器官，思为心的产物。《性情论》35简有“用心之躁者，思为甚”之说，这与《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可互为因果推理。与《荀子劝学》蟹寄住蛇洞为“用心躁也”相一致。16简：“兼（永、长）思而动心，喟如〔斯叹〕也。”理同前。思与言的关系总是直接的，不仅普遍的思，乃至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思理，都会产生言语。郭店简《缁衣》6简：“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词其所能，则君不劳。”《六德》33简：“男女卡（？大概是互相信任相从之意）生言，父子亲生言，君臣义生言。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

至于思和言，儒家懂得归纳成类以名物、名理的重要。《性情论》34简有对诚爱、感知、厌恶三种主体心理世界分类，殊不易，示深度。云：“情出于性，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性爱”，真诚之爱的意思。爱类七：指敬老、尊老、乐施、亲贤、好德、恶贪、廉让。以此七类归纳说大爱，《孔子家语》把它放进《王言》篇，既明称王者当言如是，说为王家格言可

① 《会说话的哺乳动物：心理语言学入门》，外研社《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本，2000年版，第1页。

也,又明七类大爱的价值、地位、作用和归属:“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为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王言》中的这些话,大体亦见于郭店简《唐虞之道》。可见流传之广。³⁴简又云:“智(知)类五,唯义道为近忠。”五类感知,《今文尚书·洪范》有说:“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这里,“言”可为知觉,《汉书·五行志》注有“言正曰从”之说,是意识、认识范围内的事。《洪范》“九畴”把“言”列入第二大范畴“五事”中的一项,并提出“言要正”的要求,综观之,可说为:知觉之言语,是“洪”大的九大范畴中的一下位范畴,“言”及于心理意识和认知、认识之理。范畴亦即类,以《洪范》九畴说“智(知)类五”之五类,最为剀切。³⁴简又云:“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一般多对客体作分类,此对主体作分类,反映认识水平。分类为思,以类说事为言。类认识的深化,折射着先秦语言理论的深化。类是先秦语言哲学的重要范畴。

言而成辞,本是无需证明,自然形成的。郭店简《成之闻之》:“是故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未流者之贵,穷源反(返)本者之贵。”“言”即言辞。说及道德与言辞选择问题。郭店简《语丛》四:“言以词(辞),情以旧。非言不酬,非德亡复。言而苟,墙有耳。往言伤人,来言伤己。言之善,足以终世。”首句明“言”即言辞,最为显白。还涉及言辞与道德,言辞与人生的关系。

总之,从西周礼到战国早中期儒学,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理性认识悄悄地加进的若干新的内容,从西周礼的必然象数到孔丘儒学道德“仁”论的人伦自由,激发人性,转换天命,相应的道德、情性、心志范畴,无不打上主体感性活动的烙印,形成儒家极富于人类自身感性活动的系统,这种感性活动实际上是生命的存在和生生不息的历程,而“语言是‘最纯粹’的有机的符号系统……它完全是

借助身体产生出来的”^①，从儒家关及人类自身的任何一种感性活动的理念，任何一个生命历程唤出言语角色，自然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感性活动、生命历程始终包括言语在内，感性活动，生命历程，语言使用，都是人类的本性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论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孟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左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荀子集解》，《诸子集成》二，中华书局 1954 年版。

《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星衍撰，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①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9 页。

战国简儒家“仁”论元语言的蜕变^①

——学习《郭店楚简》和《沪博楚简》(第一、二册)

孔、孟是儒家的创始人和代表,但从孔丘(前 551—前 479)到孟轲(约前 372—前 289),经历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的社会变革,约 180 年左右,几乎跨越了整个战国时期(前 476—前 221)。《郭店楚简》和《沪博楚简》都是战国简,战国简儒学处于从孔子到孟子的过渡时代,新时代的“仁论”、“人论”打上战国烙印是必然的。战国社会变革的渊源来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且主要是农、工、商业的发展。农业,春秋中期已有铁制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美金(青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鉏(除草、翻土器)、夷、斤、斲(锄),试诸壤土。”铸铁少不了鼓风机,那时叫“囊籥”,《老子》五章把“天地之间”比作“囊籥”,并非空想作比。手工业,《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釜甑、铁犁皆需工匠制作。又《国语·晋语》称“工商食(sì,供食,养活)官”。商业的发展,成书于孔丘至秦汉之际多人之手的《易·系传》言神农氏时期就已“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据《沪简二册·容成氏》神农氏为远古第六代帝王,《潜夫论·五德志》说他是尧的祖父,农、商都是他开创的,可见商业很早就有了,且规模大,早已成为天下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史记·货殖列传》采先秦故实云:小孔丘三十一岁,被孔子视作“宗庙里祭祀用的盛物器皿”(见《论语·公冶长》)、“不受命而货殖”(见《论语·先进》)的孔门弟子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幣,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最有意思的是,《穀梁传·成公元年》说:“古者有士民,有商

①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年第 4 期。

民,有农民,有工民。”商民居其二,可见一时之盛。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谋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公元前 476 年韩赵魏三家瓜分势不能存的弱晋是一典型事件,从此奠定战国七雄格局。七国以何种策略各谋自保或兼并他国,应之而有百家争鸣局面。从儒家奠基人孔丘儒学到参与争鸣的儒学,经历了从“仁”本论到多元“仁”论的发展。语云:“战国曾嫌天下小,登封常见圣人来。”这里的“圣人”已非孔子,而是孔门后学或后学之后学了。

元语言(meta-language)是用来研究和解释对象语言的语言。《论语》、战国简里凡讲解“仁”这个道德实践本体对象的语言都可叫做“仁”论元语言。孔丘“仁”论的代表性元语言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是抑制自己,二是归向、恢复周礼,三是进一步强调实行仁全在自我,不要先去考量别人。战国简新“仁”论的代表性元语言是“治民复礼”。《郭店简·尊德义》22 简“君民者,治民复礼,民余宪智”^①,25 简“治民非还生而已也”。这个“礼”恐怕也不再是周礼。《郭店简·语丛二》1 简:“礼,生于情。”《沪简一册·性情论》10、11 简:“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则义道也,或舍为之节则取也。”面对现实,寻找规律,这就是“礼”,按当下规律“治民”,这就是“仁”。

一、从孔丘“仁”本论到战国新“仁”论

孔丘的“仁”论之学有个最重要的特色:是继承周代礼乐而用于当

① 《郭店简·尊德义》第 23 简:“民余宪智。”原注:“疑读为害。”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今拟读为“宪智”字。李守奎《楚文字编》“害、𡵓”形近,见该书 459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且“害,上古匣纽月部,宪,上古晓纽元部”,晓、匣旁纽,元、月对转。二字上古音近可转。

下实际生活。《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什么要“从周”呢？虽然周代的礼乐以夏商二代为依据制定的，但夏商文化光凭夏的后代杞国、商的后代宋国的传承则“不足征”，而周礼是夏商文化的发展，隆盛多彩，郁郁乎文，值得继承。不过，东周后期还处于社会变动前期，仍然是世袭贵族统治，这是它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周礼较之夏、商文化，因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视人的价值，这又是它进步的一面。“仁”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论语》有 109 个“仁”字，“仁”的语境都是在“做什么”时该“怎么做”，如《论语》第一个“仁”字在《学而》：“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实行孝、悌是仁的根本，已把“仁”的内涵限定在实行事体层面上；最后一个“仁”字在《尧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把仁德与不贪求财物相联系。可见“仁”的语境很具体，由此而产生的“仁”的内涵也很实际，实践性极强，不推向形上本体，而是道德实践本体。古希腊的“至善”（highest good）是个形上本体，柏拉图的“至善”就是“用尽善尽美的本性进行工作”，它也是一个“生成的宇宙”，是“由神的旨意赋予灵魂和理智”的“至善”者^①；“神把神性赋予每个人的灵魂中那个最崇高的部分”^②，“至善”就是“众理之理”（the idea of ideas），就是客观的精神实体。这与孔丘的“仁”很不一样。一说那第一个“仁”字即“人”字，更能说孔子“仁论”即“人论”。“仁”也好，“人”也好，“仁论”也好，“人论”也好，打上存在的烙印是必然的，若深究其存在自身，那“尚未变动”、“仍趋保守”的时代是其内核，相信这与更为深广的思辨之说不会有矛盾。

战国新“仁”论，扩大了“仁”的使用范围。春秋时代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论语·里仁》也说：“小人怀土”、“小人喻于利”，董仲舒把这里的“小人”解释为“庶人”。可见“仁”与“庶人”、“小人”无

① [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 3，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1 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 3，第 343 页。

缘。儒家作品《郭店简·缙衣》10、11简：“子曰：上好悫（仁）则下之为悫（仁）也争先。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己以悦上。”仍用孔子的口吻说话，只不过是依靠先代权威之意，“仁”的内容已新。尽管“民”、“百姓”未必是底层奴隶，但伸向社会的中下层是肯定的。责求最高统治者自身率先实行仁德，其中不乏奴隶制社会的民主批判精神。“仁”字改成“从身从心”的会意字，而不作“二人为仁”的形声兼会意字，反映时人对“仁”的理解：须从自身做起，在自身内心修养上下功夫。最高统治者、中下层百姓、自身、我心，成了《郭店简·缙衣》新“仁论”的四大主题词。

借仁治政是新的时代主题。《沪简一册·缙衣》13简画了一幅主以仁德治天下的立轴：“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昱（郭店本解作欢，今本作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今本作邈、遁）心，故慈子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怀（不倍/不背），恭以立（莅）之，则民有恙心（今本作孙心/逊心）。”从负面讲，《郭店简·缙衣》20、21简：“大臣之不亲也，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邦家之不宁也，则大臣不治，衰臣恇（託）也。”文献中屡见把“亲”“孝”与“仁”紧连，“富贵”句《沪简一册·缙衣》第11简可解作“富贵遥过”。“仁”的实践范围变得更广阔，也更深邃。《沪简一册·性情论》25简讲到“闻道反己”之“修身近至悫（仁）”，需“上交近事君，下交得众，近从政”，修养“仁”论成了政治“仁”论。与此相联系的是，强调普通百姓的修养，作为以仁治政的基础。一个明显的对比是，《论语·学而》只讲到“君子”（在位者、有德者）个人要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而《沪简一册·缙衣》第17简则强调百姓都要如此，“民慎于言而谨于行”，人人都要注重“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蔽”。甚至可以说，借仁治政的“仁”已被多元构成所超越。《沪简一册·性情论》第12简称治天下的“君子”当“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后来《孟子·尽心上》也有“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之说。

把“仁、义、礼、智、圣”看作“五行”(五大践行),把“仁”与思、思想方法联系起来。《论语·雍也》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之方”是实行仁的方法,并非把“仁”本身作为思想方法而莅他事。战国时期的仁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学理上的原因是受到道家的影响。《郭店简·五行》把“仁”与思、心理活动联系起来,使“五行”之“仁”出现如“道”那样的本体化倾向,《论语》中绝无此类。《郭店简·五行》1简说:“慧(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这里区分了主体世界的身内之“德之行”和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践行。《郭店简·五行》文字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五行》篇之经部文字大体相同。帛书整理者指出,此“五行”说即《荀子·非十二子》指斥的子思、孟轲的“五行”,可旁证“五行”之“仁”与《论语》之“仁”大不同。《郭店简》进而认为主体心理世界的“德之行”即“仁”,是与“思”密不可分的。《五行》9、10简说:“不慧(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慧(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惓惓;既见君子,心不能悦。”惓,读 chuò,心慌气短貌。“不仁”的心理后果是自处不能忧患世事,见君子也不能愉悦,近于麻木无思虑,语云:麻木不仁,殆亦此谓。12简又说:“慧(仁)之思也清。”由此带来的心理和体态有“安、温、悦、戚、亲、爱、玉色”,心理当然紧贴着思维,这七种表征是普通人都会有的,亦是战国“仁”的平民化之证据。“玉色则形,形则仁”。仿佛《论语》的“仁”就是这里的“形则仁”之“仁”,外在表现之“仁”,而《郭店简·五行》沾染了道的“仁”,联系了“思”、“智”,本体化倾向甚明。正如黑格尔的本体论“绝对理念”服务于当时的市民社会一样,战国简“仁”的本体化倾向服务于当时的商品经济和社会竞争。

上述“仁”与心智、思维的关系,是从负面讲的,“不仁”则“思不清”,则“不智”。此外,《沪简一册·孔子诗论》第28简评某逸诗“慎(缜)密而不知言”,理想的诗应是既“慎(缜)密而又知言”,慎(缜)密可为玉器之“严璅”(细密,严密)状,仁德则比喻为玉器之品质。《礼记·聘义》:

“君子比德于玉焉，温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以《礼记》之隐喻释评诗之“慎（缜）密”，可知仁、智表里。

战国简已触及到“仁”与“利”的关系，但强调公利。《郭店简·唐虞之道》：“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后一个利指私利。有的则已谈到私利可予包容。《沪简一册·缙衣》22简：“轻鬻（绝）贫贱，而厚鬻（绝）富贵，则好悬（仁）不坚，而恶恶不鬻（著）也。人佳（惟）曰不利，吾弗信之矣。”意思是说，不甘贫穷而图富贵的人实行仁不坚决，也不能做到绝恶如仇。但一个劲儿说不要利，令人不信。

二、“义”从孔丘古典“仁义”之理到战国 多元道德实践

《论语》中的“义”，多有“合乎道理”之意。《公冶长》评论郑相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恭、敬、惠、义，且说“其使民也义”，这里的“义”即“道理”之意，“义”围绕孔子的仁、仁义而展开；这里的“道理”，又是排斥“利”的。《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连《宪问》“见利思义”也是义、利对立的。“义”围绕仁义而展开，还表现为：义为信守约言，《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即信守约言就是义，说的话能兑现。《学而》的这一说法有很古老的来源，《沪简二册·容成氏》9简说尧治天下即以“笃义与信”为标准录用人才。但真要用“义”而实行仁，也是很难的，《阳货》“君子以义为上”，以“义”为最尊贵，《季氏》说没见过真能“行义以达其道”的人。

春秋时期的儒家对“道”的理解近乎“仁”，《左传·桓公六年》：“所谓道者，忠于民而信于神也。”战国简继承春秋儒“道”，但“仁”“道”存在人我己身而与神无关，且“道”是义的来源。《郭店简·语丛一》20简：“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由中出者，悬（仁）、忠、信。”23简又说：“悬（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

于外。”《郭店简·语丛三》24、25简：“义，德之尽也。义，善之方也。”《郭店简·尊德义》中的“义”已有变化，1简“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德义”并提，并将“德”和“义”系于公众伦理，是新时代的产物。3、4简又说：“悝（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以仁、义、忠、学、教为一系，教和学的内容正为德义、民伦：“教非改道也，教之也；学非改伦也，学己也。”《郭店简·六德》1简则以“圣、智（知）、悝（仁）、义、忠、信”为“六德”序次。《沪简一册·孔子诗论》25简评《诗·大雅·大田》末章强调“知言而有礼”。战国简强调智（知）、学、教与仁、忠、义、礼并观，亦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微妙变化。“知言”之说，与战国后期《孟子·公孙丑上》“知言”论遥契。前述德义、民伦已具时代之变，《尊德义》通篇强调“德行”之“教”与强制性学习，6简有“先以德，则民进善”之说，也是基于战国对人性的认识，直至发展到战国后期荀子“教使之然也”的“性恶论”。《尊德义》3简以“义”和“忠”在同一系，一为可尊重，一为可信用，几为一事，故历来“忠义”并称或连用。《郭店简》说“忠信”的时代性特别明显。《六德》4、5简说：“聚人民，赁地，足此民尔生死之用，非忠信者莫之能也。”已说到商业行为中的“忠信”。《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问及“何谓忠臣”，子思回答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鲁穆公不高兴，又问成孙弋，成回答说，子思说得对，因君之故为君而死，见过，那是“效禄、爵者也”，是一种交易，为君效力；恒称君之恶，没见过，那是“义而远禄爵”。并说，要不是子思，根本听不到这样的话。这里的评价，不仅忠、义紧接，且对忠、即对义，作了特别的解释。战国简既有“知言”，又有“知人”，后者实际强调是对人的尊重，“知人、爱人、敬人”一脉相承：《郭店简·成之闻之》19、20简“反诸己而可以知人，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当然这又是《孟子·万章下》“知人论世”的先声。

三、从“命”系神性而安命到“命”系人道而践行

性命之说,在孔子那里是一个被回避的话题,这也好理解。天道性命,本来就是个存于六合之外的命题,道德实践本体“仁”尚且罕言,何况是六合之外的命题?《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性”字只出现了2次,一次是《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次是《公冶长》“夫子之言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两个“性”字都是说人的天性,人的自然属性。《论语》“命”字出现了21次,有10次是“命运”的意思,其余都是具体的“命”,如寿命、生命、政令、命令等义项。传统语义学的摹状词理论认为,语词反映某种理念,意义决定指称,这里无论哪种“命”的表述,都指有一定的神性。可以说《论语》的“性”是人性,“命”是神性,人置于“性”“命”之中,人处于被动受制状态。周予同谓儒家之“命”为“安命说”。^①

战国“性”字,从字面上讲,或者说仅从语句观察,仍是“天性”“人性”的意思,但若问及这字面背后的概念所指,或者说客体中的主体间性,与《论语》有明显差异,它无不可系于当下时代情景。《沪简一册·孔子诗论》(有人说是孔子弟子战国时人卜商的诗论,是“卜子诗论”)第20简:“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幣帛,泛指礼品。《沪简一册·性情论》13简:“幣帛,所以为信与登(徵)也,其治宜(义)道也。”幣帛之用已入守信、义道,意在寻求商业行为中的人性、民情与道德规范的一致。这在逻辑上与《沪简一册·孔子诗论》10简“《关雎》以色喻于礼”是一致的,不过一讲人情世故,一讲情色。一讲人的社会性一面,一讲人的自然性。

战国“性”“命”置于人的生命之中,是生命存在系列的一个组成部

^① 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文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2页。

分,它们是可以被认识的,人开始获得主动践行的权利。《郭店简·尊德义》8、9简:“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而“道”是“人道”,“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沪简一册·性情论》第2简则更进一步:“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道”一开始就在人的情感之中。第6简则说:“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道”存在于助长性的过程中。性、命系人道,至少是彼“命”之神性的淡化。

战国性情论,着意于性的外化(物化)显现,《沪简一册·性情论》第1简说人虽有心性,但“心无正志”,性也只能“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智而后奠(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战国简已提到“性恶”。《沪简一册·性情论》第3简说:“恶,性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人性是在后天改变的,第5简说:“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人性可以扰动、违逆、交往、磨砺、越出。“故”,有所为。以上,显然是荀子“性恶论”的先声。战国简过分地强调情的重要,也是出人意表的。第21、22简说:“凡人情为可悦,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人情几与善性等同。

战国简已提到“慎独”,显然是说置身商品社会之中,要强调特殊的修养内容。《沪简一册·性情论》第23简说:“独居而乐,有内动者也。恶之而不可非者,谓于义者也,非之而不可恶者,笃于悝(仁)者也。”义和仁正是“独居而乐”的“内动者”。

以上说明,战国的社会更迭和文化演进引起了儒家核心理论“仁”论元语言的蜕变,蜕变主要表现在从孔丘“仁”本论到新“仁”论,从孔丘古典仁义到多元道德实践观,从“命”系神性到人性,情性,习性,乃至社会性。

主要参考文献

《论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版。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2002 年版。

新时代的经学“轴心时代” 文化史的考问^①

——读黄丽丽新著《左传新论》^②

一、对“轴心时代”文化史的把握是全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贯穿

经学，曾经是有清一代、民国年间津津乐道的大学问。一提到“学问”二字，几乎专指经学。后来有了新哲学、新史学，旧经学似乎被蒸发了。清代以上古音研究为上乘，带动经学研究。清初顾炎武提倡“经学即理学”，这里的经学，主要是以语言文字考订、章旨段意缀述和文史考辨为主要内容的。顾炎武本人花去“几三十年”的功夫著《音学五书》，既是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之作，也是经学研究的范型。历来视小学（后来的语言文字学）为经学的附庸，实际上，顾炎武既谓舍弃经学即无理学，同样，舍弃小学即无经学。清代四大学，义理、考据、词章、经济，无不以考据为其本。小学考据为清代主流学术经学的基本方法，一定程度上说是“小学即经学”。延安时期，范文澜在当时语境中曾说“五四”后“经学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止能跟着封建残余势力的消灭而同归于尽”，但他仍然肯定清人“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从“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有很

① 本文原载郑州大学主办《语文知识》2009年第2期；缩改本又刊于《河北日报》2009年4月17日第11版。

② 黄丽丽著《左传新论》，黄山书社2008年版。

高的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①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听了这场讲演。^②

新时期以来,文化学研究大盛。究其原因,思想解放本来就与文化史的自觉相表里,学术的开禁更与文化的回归和文化认同相激荡,科研的繁荣须与文化本源的追寻相涵育。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曾把社会科学一般,乃至世界观,都归结为“文化科学”,他说:“倘若人们要把这些从文化意义的角度考察人们社会生活事件的学科叫作‘文化科学’,那么我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也属于这个范畴。”作为有“世界观”意义的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围绕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社会文化生活”是现实个别形态的,也是普遍的,且总是伸向“社会文化状况发源的生成之中”,直至“原始民族”年代的经济文化状况。^③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必然性逻辑告诉我们,久违的传统经学会在新时代的文化的大潮中找回失却的自我,熔文、史、哲于一炉的新时代的经学,应有与文、史、哲相并列的学科地位。黄著《左传新论》正是应此必然性而作,虽然作者不标榜她的著作是新经学,但综观全书而知其学术插架当如此。

经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十三经。十三经发生的年代,正是德国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所说的人类的“轴心时代”(Axialage)。这一说法以公元前 800 年至前 200 年间为人类“精神历程之中”存在“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的时代,尤以公元前 500 年左右为这一时代轴力最强的中轴线。这一时代相当于我国的西周中后期、春秋到战国后期,正是《春秋经传》产生的时代。故《左传新论》开宗明义就说:“试图以《左传》为切入点,探讨前‘轴心时代’华夏族的文化形态,‘轴心时代’华夏文化质的飞跃过程及其特有模式。”一是

① 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6、299 页。

② 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 360 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24 页。

“轴心时代”，一是文化史，成了贯穿黄著全书的内在逻辑线索。而作这样的逻辑设定，是要“把《左传》放入世界文化史的坐标系之中，观察它描述和表现的华夏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独特性，了解它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代序》p. 17）。总之，是要将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寻求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和谐一致。黄著是全球化时代当如何研究古学的新尝试，全书直接和间接引用国外学术思想和成果多达 46 处。

如何实施“经‘两贯穿’而达于‘双一致’”这一学术诉求呢？黄著在三大维度中展示《左传》学：一是《左传》与有周官学的联结，二是《左传》与先秦诸子的联结，三是《左传》以《春秋》为参照。章学诚《文史通义》谓“六经皆史”，有周官学、先秦诸子、《春秋》经义则无一不可为文化史背景。

二、“有周官学”名义及其《左传》学视角

《左传》学当然应视为新时代经学之一种，它与“有周官学”同以“学”名之，足见两者首先应是学术文化上的连通。“官学”与“官话”不同，官话与方言相对举，官话是指共通语、共同语，犹言某时代的“普通话”，如说明清官话即彼之时代的“普通话”。官学与民间私学对举，官学即官方之学。书中考先秦文献“官”字 8 例，以说“官”既可泛指各级官吏，也可专指天子、诸侯和他们的属官（pp. 22—23）。考得“王官”及相关说法 10 例，以说“王官”为周王室成员、周天子属官、内外诸侯及外诸侯兼周王上卿者（pp. 24—25）。考得“官学”及相关说法 9 例，以说官学“包括官制、官方和职能”，周官之学即“周王室及诸侯列国职官系统的职责、职规和业务技能系统及在此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学术”（pp. 25—26）。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官学是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巫术文化是三代官学中的一部分，李学勤提出的东周列国七大文化圈可从，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黄著强调官学政治性质，但论据仍然是文化学的，

如说“有周官学为奴隶主阶级及其专政服务”时,举证了王家膳食文化、青铜钟鼎文化、青铜宝剑文化、礼乐舞曲、乐器文化、墓葬文化等(pp. 74—77);在说“有周官学是奴隶主阶级垄断之学”时,举证了西周铭文、巫祝、文化教育、手工业技术等(pp. 77—80)。都没有作抽象的说教,这并不淡化政治,而是为政治提供最切实的证词。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罗尔斯说,政治与文化的结合,尤其是他的“政治自由主义认定民主文化之理性多元论的事实”,目的是要“揭示一种对根本性政治问题之证明的合乎理性的公共基础之可能性条件”。^①作者提出“有周官学”概念并对其自身作文化学的指认,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在奴隶社会中,其官学从百行百业的技术到上层建筑,均为奴隶主贵族所控制和垄断。”(p. 80)这就为《左传》学研究铺设了一个饱含政治理性的偌大的文化背景。《左传》学与这些文化背景中的联结,在这些文化背景中的展示,就成了显示作者功力之处。显然,学术背景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结,并非对号入座,或作某些名目术语间的对应,而是须就研究对象本体开展创新研究。

军事是国家大事,军事学有最明显的官学性质。黄著以《左传》中的军事学为有周官学的第一精粹。莫道“书生言兵掉舌”,作者却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目光,谙知原典,洞达底蕴,归纳出《左传》军事思想要点 12 条,战略战术 9 则和军事训练的相关内容。案往旧说,有所谓“春秋无义战”一说,《左传》记载春秋时期 490 余次大小战争,难道是“无正义”可说的吗?其实,足兵尚武本是先秦主流政治。《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史记·孔子世家》:“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上古寓兵于民,兵士是临时征集来的。《今文尚书·汤誓》:“汝曰:‘我后不恤我,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穡事,农事。荒废农事征集我们去征伐夏国。临时征民为兵,《左传》本身就有记载,“僖公二十

①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时，楚帅子玉的兵一部分来自“若敖之六卒”，即子玉的先祖若敖之族的宗族人士六百人。卒，车制，据杜预注：一卒百人。此说正同《尚书》。先秦军旅生活是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亦民亦军。如此看来，黄著 21 条及其相关内容的归纳，是贴近先秦军事和社会生活本真的，有重大历史意义。

又如《左传》对周代礼制的载记和阐说，因有《周礼》一书的专学，历来重视不够。后人研究“三礼”，多崇郑玄注，清代黄以周著《礼书通故》时，少有直接引用或缀述《左传》以“通故”的。今黄著对《左传》涉及周礼的内容作专题研究，凸显《左传》周礼，引人注目。黄著引《左传》4 例以说《左传》能“透辟说明周礼的性质”，直接引用和缀述《左传》52 例以说《左传》“娓娓讲解各种礼制”。书中还因《左传》释礼术语“解经语”、“解传语”、“君子曰”等，古礼深邃，选择性强，何为合礼，何为不合礼，绝非后人可知，从而批驳了“刘歆伪造”说(p. 103)。

黄著还涉及《左传》卜筮例，从关及周革殷命、揭橥卜筮性质、记春秋先民不甚迷信卜筮、记春秋贵族通晓《易》理、传记卜筮官员等方面说《左传》能精彩地传卜筮文化，与常见的说某卦某爻之示何等祸福吉祥不同，而能升华成理念，酝酿成学理。至于《左传》保存古天文，昭公十七年有最早的日食纪事，文公十四年有最早的哈雷彗星的记载，庄公七年有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纪事(p. 118)；两分(春分、秋分)两至(夏至、冬至)的确定(pp. 119—120)，公元前 5000 年可能有过的大火星纪时历法(p. 123)，等等，给读者带来的不啻是新奇之感，更有天地之大美的愉悦和自然史、天体史的认识。在说《左传》是“一部生动的上古乐书”时，引襄公十九年“晋季札观乐”名篇，自然是压倒群芳，但出人意料的是书中引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简《孔子诗论》比照之，认为借此“就可知季札论诗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p. 124)。其实这是作者信奉的一个著名的研究方法：王国维 1925(一说 1915)年提出的主张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据笔者研究，全书以出土文物、甲金文、竹

简帛书证《左传》者共 175 处。透过这些二重或三重材料的比较,可看到作者的学术追求和思致。我国“九五”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一系列数据,也是以传世文献,其中尤以《左传》为重要依据,并出土文物、天上的星象的观测记录、现代实验科学的测定,用的正是“二重”或“多重”证据法。由此可知,黄著在研究传世文献本身时,力图使自己的研究站到学科前沿的旨趣。这从黄著由诸子入手研究《左传》的做法看得或许更清楚。

三、以出土文物诸子为背景和《左传》心仪诸子种种

六艺(六经)与诸子,虽是《汉书·艺文志》作出的区分,但两者确实是先秦古书的不同流别,要说两者的联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诸子是六经的分支与末流,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故从诸子入手来研究《左传》,学理上不是没有困难的。再说,历来研究先秦诸子的做法,因汉魏以来有大量的诸子学的研究而形成“他意”,盖过了诸子有限的文献的“本意”,故后人的研究多从“他意”出发,而少有考问“本意”。黄著以诸子为学术坐标或视角来研究经书《左传》,使新时代的经学得以成立,那就既要克服学理上的困难,又要突破汉魏以来研究诸子的传统做法。黄著的办法,正是紧紧抓住出土文物不放。今人所看到的传世文献,许多是经过后人整理的,而出土文物大多著于秦汉之前,如郭店楚竹简约为公元前 300 年左右,郭店本《老子》被誉为最接近真老子思想的最好的本子。黄著说:“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出土文献,特别是以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为代表的两次出土浪潮中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是《左传》成书时代的学术文化盛景的缩影。”(p. 170)接着,黄著归纳出“近三十年出土的儒家古书”7 种,道家古书 3 种,法家古书 2 种(pp. 170—172)。从一定意义上说,黄著《左传》学以诸子为学术背景实

质是力主以出土文物诸子为背景,虽非一一对号入座而考问之,但在指导思想上亦足以割断纷扰的“他意”,直接扞及出土文物诸子“本意”与《左传》的联结,这是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上的重要创新。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的创新,一是有新材料的发现,二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黄著是在密切关注新材料的基础上作研究思路上的创新的。

在研究过程中,黄著提出了这样的思路:在理论层面上,从《左传》这一头看,左氏对诸子有过“严密的关注和深切的理解”;从诸子这一头看,诸子援史入“道”促进了春秋学的发展。在学史层面上,黄著关注《左传》作者与儒学的关系,并认为此项“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具体到先秦时代实际上正是“诸子学的突破”)催生了《左传》的史学。在理论和学史的总体观照层面上,则又认为《左传》映射了我国“轴心时代”的涵盖经、史、子的全面的“哲学突破”,即所谓“文史哲兵法数术等的整体性突破”。现在来具体地看一看在理论层面上,《左传》如何关注诸子:

一是对法家代表人物“救世”的理解与敬慕。郑国的子产是左氏最为“心折之第一人”。郑国政治家子产的三次改革,襄公三十年《传》详述其改革措施,最初遭唾骂和最终获一片喝彩声的戏剧性过程,不仅称扬了子产,还表明了左氏的历史价值观念。昭公四年《传》极其赞赏其相关军赋改革措施,极其赞赏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大无畏改革精神。昭公六年《传》赞许子产“吾以救世也”的良苦用心和百折不回的毅力。

二是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记载和评述。襄公二十七年《传》对五行即“五材”亦即五元素说的记载,并说“民并用之,废一不可”,文公七年《传》把五行与谷物排在一起称“六府”,可见五行的唯物论性质,并无迷信之嫌。昭公六年《传》引秦国医和的话,把阴阳说作为医学的根本理据。昭公二十九年《传》引史墨的话,说春秋晚期流行五行神,五行被溯源为原始宗教性质。昭公三十一年和哀公九年《传》均载以五行占详,

是战国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先导。黄著简直是利用《左传》揭出了五行发展史线索。

三是《左传》对纵横家先驱的欣赏。哀公七年《传》载鲁哀公的外交使者,孔子的弟子子贡驳倒吴国的太宰伯嚭。哀公七年《传》载,吴齐艾陵之战,吴王夫差竟赐同盟国鲁国卿士叔孙州仇死,子贡为之解难而屈吴王。哀公十二年《传》载,吴王要鲁君重温旧时盟约,子贡直言“温旧”无益,捍卫了鲁国的尊严。同年又载,吴王欲结盟卫君,征卫君会盟,卫君来却又包围了卫君馆舍,子贡言于伯嚭,卫君前来,必有支持与吴国结盟者,也有反对者,今执卫君是打击支持者,声援反对者,卫君得以解围。哀公十五年《传》载,子贡游说齐大夫陈成子归还鲁国孟孙氏的采地成邑。

四是《左传》对兵家的载记和欣赏。《左传》昭公二十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十一年,都记载了伍子胥为吴谋楚,为吴忧世而力主讨越,终不见用而被吴王夫差赐死事,处处体现出左氏对伍子胥的敬仰、欣赏和同情。刚直的伍子胥不仅是政治家,还是军事家。《汉书·艺文志》载“《伍子胥》十篇,图一卷”,李零推测其内容是讲战船和水战之法的,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六有伍子胥《水战法》三条,更重要的是,张家山汉简《盖庐》是与伍子胥有关的兵书。(p. 188)《左传》多处记载伍子胥,而不明载伍的吴国同事孙武的事迹。个中原因,黄著说:“在吴楚战争中,伍子胥比孙武起的作用更大,吴国是采用了他的战略战术取胜的;而在吴越争霸过程中,吴王夫差也是由于不听他的谏诤而亡国身死的。”“左氏是从历史的大处落墨的”。(p. 188)今天的研究者,还可以将《左传》、《盖庐》(即吴王公子光阖庐,取阖庐与申胥即伍子胥的对话形式)、银雀山汉简《吴孙子兵法》互相发明之。李零认为后者成书于战国孙臆,果如是说,则是《左传》记载伍员而不载孙武的最好解释。

书中附论《孔子与春秋学》一章,考论《春秋》经非孔子所修而多含

诸家之说,《左传》“孔子曰”均符合孔子思想,“孔子曰”皆非伪造,等等,则又进一步拉近了《左传》与诸子的距离。附论合于主旨,亦全书体制名例。

四、《春秋》是《左传》系事成史的骨架

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与《春秋》无关,经、传并无联系,古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与《春秋》声息相关,经、传密切联系。黄著还归纳学术界至今仍有的《左传》性质四说:一解经(刘歆、杜预、蒋伯潜、赵生群)、二史书(皮锡瑞、赵光贤、胡念贻)、三半传半史书(马伯乐)、四文学(常森)(p. 17)。黄著与这“四种不同的观点”“都不同”(p. 277)。黄著深入反思《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认为两者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传与经的关系,而是长编之类的春秋事、语以经文为纲要,为参照,联缀而成《左传》,《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是内容与纲要,成书与参照系,史事系传与内在逻辑骨架的关系,《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存在于《左传》自身的时空之内,质言之,《春秋》是《左传》的逻各斯。黄著说:“我们认为《左传》不是《春秋》之传注,它是史籍,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的编年体史书,它是以鲁史《春秋》为系事之大纲,以《春秋》记载的鲁君之世系纪年为时间坐标轴,把一段段列国的‘语’和史料系联整合起来的尚具原始形态的拙朴的史籍。”(p. 277)黄著说的“史籍”与上述今文家、史学家说的“史书”显然不同。中国“史籍”,特别是由事“语”和史料系联整合起来的“史籍”,具有历史形态学意义,具有思维史、语言史、理性工具史、逻辑史意义,谓之“史例”可也。《左传·隐公七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唐孔颖达疏:“丘明采合旧语以发明史例。”“采合旧语”正谓“事‘语’史料的整合”之类。“史例”,史家之体制名例、名理。

我们要问,黄著作这样的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设定有何价值呢?一是“史籍”“史例”是文化史、逻辑史,而非通史,这与黄著紧扣文化史

和原典学理研覈《左传》的做法相一致。二是使《左传》获得相对于《春秋》经的某种离散倾向,这种离散性、独立性对《左传》作驰骋纵横的文化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三是因“史例”亦即修史的名例体制,存在于《左传》本身,故可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左传》,如说《左传》也是饱含学理史论,饱含古人思想方法的书,是以史书面貌出现的逻辑书,等等。黄著论《左传》是“百科知识的万宝全书”(p. 125),逻辑机理上殆出于此。

十分重要的是,黄著对《左传》性质的论定,获得了《左传》本体的内质是“史籍”“史例”,研究方法是文化史、学理入手,即本体论与研究方法的一致。下面我们来看看《春秋》骨架和《左传》史籍、史例性质论定的作用:

一是在学术史的演进中审视今古文之争,认为战国从官学到诸子私学是“中华文化的第一个伟大嬗变”,从今古文之争到融合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伟大嬗变”。今古文之争的焦点始终围绕《左传》展开。(p. 268, p. 274)

二是张扬《左传》“依经以比事”的基本做法。黄著稽考司马迁的说法:“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是说凭借《春秋》,将手中掌握的事语史料统统都编次起来(p. 278)。依经比事是《春秋》骨架和《左传》史例的具体实施过程,是说有了参照系和自己的名例体制以后怎么办。

三是从经学发展史审视《左传》本体内容与《春秋》无关。在提挈学界通常说的经、传关系时,指出《春秋》彼时未尊经,而先秦称经之书不一而足,如《墨经》、荀况引《道经》等,《春秋》低位的陟升系于孔门后学、孟子,直至董仲舒升为圣典宝帙。

四是窥测《左传》之传与儒学传、记、说等体裁形式的平行发展过程。体裁为著书大例,故此窥测平行发展是条例比较研究,非及内容本身之比较,抽象性、科学性也就更强。

五是发明《春秋》义例为编年史，“始作者为圣”，犹言“第一个”总是天才。兼载人文史和自然史，自然史含灾害史。书中说先秦早期的时空观念，引人注目（p. 314, p. 315）。时间和空间是运动存在的方式。作为学术研究的参照系，它又是任何课题所必须的。故该项实际上是最大的工具理性的研究和应用。

六是以一元线性的时间轴为框架来系联事件写万类。黄著说：“《左传》作者想出了一个绝好的解决办法，即以鲁君的世系和纪年为时间的坐标轴，以鲁《春秋》为系事的参照大纲，把筛选甄别加工过的史料、事语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排列，完完整整地安置在时间的坐标上。”（p. 320）这是在刺取《左传》最深层次的思想方法和内在底蕴的逻辑。这一方法的获得，黄著认为取决于“左氏之职官”（p. 321），“史官的职业特点”（p. 322）。这一研究是否涉及华夏族先民的思想方法亦未可知，因汉语的句子也是线性一元的时间坐标设置和排列。

七是显明《左传》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立性。谓《春秋》为国史书法，《左传》为私著自由体式（p. 325）。如不以年代为断，则《左传》全书有一则一则完整的故事。追求叙事完整，形成有类后代突破编年体而成纪事本末体，纪传体（p. 328）。

八是洞达《左传》叙事嵌入《春秋》之言。“解经语”是凸显史事、评论史事的一种方式。

如要反思一下黄著自身的体式，则完整系统之外，甚求议论针对切实，短韵奇俊，不乏《管锥编》式的哲思随笔体。从这里的分析看，黄著的重点在体制、名式、史例的分析和逻辑解读，并不涉及《左传》内容故实，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研究中的形态学思路，无疑是追索对象本真的科学思路。或许正是过分重于《左传》的学理分析，逻辑分析，对以内容为标识的丰富的民主思想没有涉及，是一缺憾。《左传》难道不是奴隶制民主制时代的民主思想萃编吗？由于杂有随笔体（或为先行发表的短文），与鸿篇巨制显得不协调，似“嵌入”处有之。

综上所述,《左传新论》的学术定位是新时代的经学,它通过对先秦“轴心时代”文化史的考问,全面揭示《左传》这一历史文化名著的内涵。它的学术视角是:从有周官学、诸子学、《春秋》逻辑参照看《左传》。它充分运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非常重视出土文物对《左传》的研究价值;它重视科学的抽象,重在研究对象内部的逻辑机理的揭示,不拘囿于具体故实的演说和词句的考辨,是现代科学研究中的形态学思路。由它的居高的学术成就,可推知它的不凡的社会文化价值。黄著立足对象本体,研究视野开阔,兼综古今中外,可谓无书不窥,知识性极强,弥缝群论,经理创新,几使后之治《左传》者,可以无作。书中史料翔实,闳中肆外,尤其是思路新颖,哲理深邃,极像其本师周钟灵(1918—1993)当年既治哲学,又治语学时的做法,于是知黄著能克绍师裘,青蓝胜出,殊可慰先师于九泉。黄著是精品之作,其社会文化价值显然应由其居高的学术价值来决定,黄著丰富而新颖的内容,是会被学界所青睐,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而其内在科研逻辑思路,带给人们的启发或许更大些。

主要参考文献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中国语言学史几种研究法^①

——兼谈围绕规范化研究语言学史

一、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分期的共识和分歧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62、1981)说到其中“语言学”一词采用了“最广泛的意义”,而狭义的提法,“严格地说,应该称为汉语言研究史”。书中还提出两种写法:一种是“单刀直入地叙述一个学术部门的历史”,一种是“介绍一下那些著作的体例及其主要内容”,而及学派、学术渊源、影响等。王力是“中国语言学史”这一门类科学的奠基人,他实际上已确立了该学科的地位。^②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成果表明,该学科的研究法,主要是两个结合:按广义与狭义相结合,“单刀直入”和“介绍一下”而及学派等项的做法相结合进行的。王先生自己的书,是广义的和“单刀直入”的。值得注意的是,四种研究法和两个结合,都是纵向聚合式的,而非横向组合式的。唯其纵向聚合,方能显出层次、差异,乃至笔底波澜。

中国语言学史的历史分期就是纵向聚合式的。王先生的分期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训诂为主的时期(从先秦讲到许慎、刘熙)、韵书为主的时期(从三国魏孙炎讲到明代,乃至清代陈澧)、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时期(清代)、西学东渐时期(从《马氏文通》到王力自己)。这已经是德

① 本文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② 按照目前“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史”的层次划分,“中国语言学史”无论作为“最广泛的意义”的一般理论,还是作为汉语史的史论,都应该是与汉语史平行的理论课。许多高校在招收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时主考两门:汉语史和汉语学术研究史,就表明了“汉语史/中国语言学史”的这种平行地位。

国哲学家文德尔班(1848—1915)在其《哲学史教程》提出的问题意识研究法了,它显然是一种聚合式分类。以通史朝代的捆绑形成学术史分期,这也是一种聚合。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5. 9、1995. 9、2000. 6)分六个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现代则另有《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995. 9、2005. 4)述之:从历史的渐进过程看,可分两个阶段:清末至北洋军阀时期,20年代末至1949年。因时间短,或缺乏统一的标志,故不以分期论,而以现代语文运动、语法学、音韵学等专题聚合纵观论之。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2000. 5.)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代、五四到八十年代;与何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何以宋代属上,赵以宋代属下。属下的理由是宋、元、明都有共同的理学背景,“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研究不再是前代那种以研究经学、墨守陈说为主流,而是对经书故训敢于提出异议”,以至华夏学术包括汉语研究,“造极于赵宋之世”。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1987. 10, 2002. 8)、胡奇光《中国小学史》(1987. 11)、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2000. 3)、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2003),都采用了“属下”说。但濮著以“南北朝至明代”并提,以“宋代的韵书”单列,至等韵学和上古音研究方以“宋元”和“宋明”叙之,总的说,濮著为宋代“属下”说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胡著以宋元明时代为“小学的转折”时代,但主要原因不在理学,北宋大小徐校订《说文》,增订《切韵》而成《广韵》;南宋理学盛行只能导致雅学中断(实际上北宋周敦颐及其学生二程的理学已影响不菲);元曲和明代小说给小学研究带来新的刺激。所有这些,似乎不足以说明宋元明何以一体为“小学的转折”时代。作者并没有看到宋明理学对于传统经学的反动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李建国的“属下”说比赵还要早一些,历来“唐宋”并提,李说可谓语言学界较早的、真正的宋代“属下”说。李建国提出“属下”说的理由是“宋儒理学和书院教育”,且归根到底也是理学,书中说,理学带来的变化“表现在学风上是疑古

轻经,标新立异”;“适应理学自由发挥、创立新说的需要”,以至“民间私家讲学大盛,书院教育兴起”。^①宗何先生“属上”说的有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邓文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2002)、王功龙《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2004)。宋代“属下”和“属上”相比较,以“属下”较为合理。一个时代的学术与该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极有关系,但两者有不平衡性,学术有独立性,李唐盛世,但学术却平平,倒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指导思想和学术精神对各门类的学术都有引领作用、促进作用和制约作用。魏晋南北朝处于乱世,生产力遭到破坏,但汉末两晋思想解放,加之佛教异质文化的引进,学术上却有不少新的建树,南北经学,晋吕忱《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南朝陈陆德明《经典释文》,早期韵书直至隋初《切韵》问世,等等,无不独树一帜。所以说,抓住一个时代的学术指导思想的转移,来划分不同发展时期和演绎学术变化的做法,是可取的。

二、有关成果特色的内容评介

从诸家著述的内容看,都有各自的特点。一般认为,对同一门类学科内容的总体阐述,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也对,但这是就其对象本体的基本内容而言的。在深层次的开掘方面,则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若干提法上,也会各自出新。王先生的书筌路蓝缕,有奠基开创之功,立足于古代语文学而非古代语言学,也很难说这就是错的。但书中将荀子的一些说法看作是语言学的,认为荀子提出了三个“语言学原理”:语言的社会性、民族性、稳固性,以及与语言研究有密切关系的逻辑思维问题。^②书中以秦汉的声训接引古希腊的真诂学即语源学(etymology),并

① 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②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说刘熙的《释名》“纯然从语言学观点去探求词的真正意义”。^①王先生对人类“轴心时代”(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语,指古希腊和中国的诸子百家争鸣时代)的语言学定位是很明确的。从孙炎创反切到清代等韵学,固然以韵书为主,即使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清代,“不但研究古音的人直接受到等韵的影响;即以研究训诂的人而论,清儒如王念孙父子等之所以能不受字形的拘束,直接从声音方面去研究词义,也未尝不是受了这个时期的音韵学的影响”^②。很显然,王先生把音韵学看作贯穿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一根主线,而这本身就是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因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书中对清代古音学的概括堪称古音学最简史,认为江有诰《谐声表》价值超过段玉裁的《古十七部谐声表》,可谓卓识。由于王先生采用“问题类聚”法分章,为各章都能提及清代提供体例保证,王著的内容重心和逻辑指向始终引及清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何著立足于中国古代有语言学,而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有”一“独立”,是贯穿全书的内在逻辑。关于“有”,主张一不准以现代语言学标准律古,二不该拿西方语言学硬套,而是从学术史的事实出发:东汉末已用二分法分析汉语音节,魏晋以后就能很好地分析声、韵、调,继此陆续产生大量反映实际语音系统的韵书,更加声、韵、调配合的等韵图,明清又有历史语音学古音学等。词汇研究《方言》、《释名》均以口头词汇为对象。应该说,一“有”主要是以语音学、音韵学为视角来观察问题的。关于“独立”,何著从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③,一句话,以有没有学术个性衡定之。衡定的结果,何认为“从汉代开始,语言学已经算是一门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43页。

②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108页。

③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独立的学科了”^①。一“有”一“独立”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可谓处处体现在具体论述中,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同质性。“有”和“独立”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观念,既是学术史的概括,也是主体设定,是主客体相统一的实践性命题,命题的应用表现为对史实的语言学眼光的观照和对现实的语言科学关怀。例如何著阐述《说文》时,强调许慎的“先进的学术观点和科学的治学方法”^②,并从四个方面具体说之:讲发展、讲系统、重材料、重证据。在作历史评价时,强调许慎“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并认为他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有五大贡献:创学科、通百科、存古篆、达神旨、存古音。在涉及许慎尊孔,主张“文字者经艺之本”时,何著认为,这“正好说明他已经是把语言文字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如此看来,一“有”一“独立”在论证具体对象时,可谓无处不在,贯彻得很彻底,而且,都有很强的时代质感,亦即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全书令人注目处还有:何著沿用王国维(1923,一说 1915)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发掘《尔雅》原著内证,并以 1978 年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像文字资料与《尔雅》星名相对照,考出《尔雅》成书于战国末,作者是齐鲁儒生。学术界久有《尔雅》抄毛传还是毛传抄《尔雅》之争,何先生提出《尔雅》成书于先秦,可谓天上、地下、传统文献三合一。持《尔雅》成书于先秦说者有濮之珍、赵振铎、邓文彬、李恕豪、王功龙等。倾向于成书西汉的有王力、胡奇光等。

何著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论证是又一特色。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历来就有单一音系说(高本汉、马伯乐、王显、邵荣芬)、综合音系说(罗常培、周祖谟)和杂凑音系说(江永、章炳麟)三种。何著论定杂凑音系有两段阐释很值得注意,一段是:“我们说《切韵》音系具有杂凑性的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 4 页。

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2 页。

特点,这个结论的全部含义在于说明《切韵》非单一性的音系而已,而不能理解为《切韵》音系与当时的实际语音没有任何的一致性。应该承认:一致性是主要的。只不过它不是跟个别方音一致,而是跟大多数方言区的人都基本上能听得懂、能理解得了的“雅音”一致。这恰恰说明,有关《切韵》音系的性质的主体抽象与当时的实际语音是一致的,研究方法上如前所说,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同质性。还有一段话:“一部韵书作为书本上的体系可以是严密的,若拿这个体系与某一特定的活方言对比则又是‘杂凑’的,在逐个韵书史上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如明代的《洪武正韵》……我们在考察中国古代的某些韵书,若不懂得书本体系和活语系之间既相联系又相脱节这一重要特点,就难免不失之于臆断。”^①这说明,主体音系与客体实存的语音状况有不一致的地方,思想方法上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的非同一性,相异性。更深入一步说:《切韵》音系的“杂凑”性质主要依赖于思想方法上的非同一性、相异性发现的,这一点是明显的,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什么是“杂凑”?“杂凑”就是异质性的构成,我们说,《切韵》音系是“杂凑”性质的,实际上就是讲《切韵》音系是异质性音系,而非同质性音系。^②至此,我们可以说,何著中有关《切韵》音系的异质性质是有赖于研究方法上的非同一性和异质性发现的。对象的本体性质与研究方法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除何著以外,在涉及“主体音系与实际语音关系”这一关节点上,与何著接近或一致者有:濮著(223页)、李开著(95页)、李建国著(111页)、邓著(82页)、王功龙著(168页);与何著有较大差别者有:王力著(洛阳话为基础,67页);未表态的有:赵著(仅言主体:中古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219页)、李恕豪著(同赵著,147页)。此外,综合诸家,研究《切韵》音系的方法是多途径的,大体有:从早期韵书论《切韵》,从《切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② 李开《试论历史语言研究中的异质语言理论问题》,《语言科学》2005年第4期。

韵》序长安论韵论《切韵》，从陆法言身世论《切韵》，从史实论《切韵》，从《广韵》本论论《切韵》，从敦煌残卷切一（S2683）、切二（S2055）、切三（S2071）论《切韵》，从敦煌残卷王一（P2011）、故宫藏项跋本王二、宋濂跋本王三论《切韵》，从孙愐《唐韵》开元本、天宝本论《切韵》，从《切韵》系其他韵书论《切韵》，从比照秦音系韵书元廷坚《韵英》、特别是慧琳《一切经音义》音系论《切韵》，等等。

如果说王力著以问题为纲、以语音研究为贯穿是其特色，何著有古代有语言学、《尔雅》成书于先秦、《切韵》音系杂凑说、提出断代语言学研究、写语言学家评传、《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也以问题为纲等个性，那么濮著从人类学切入引向先秦，全书对文献的阐说并附录；赵著除前面说及的宋元明一体以外，书中强调传注里的语言学和笔记文里的语言学，把辞书编纂放到重要位置；邓著仅分上古、中古、近古，上古以字书的阐释为构架，中古和近古以门类学科音韵文字训诂修辞语法为导引；王功龙著六大分期中专题性很强，且先秦提出注解语法，两汉切入经学，并提出音韵学萌芽，从魏晋至清代，或专书，或专题，皆有深度可观；李建国著独树一帜的是围绕历史上的规范化要求研究语言学的发展史。

三、围绕规范化的研究

读过诸家的语言学史之后，可谓语言研究史的绎述，这种绎述是正面的，也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基本构架大体是历史分期中展现该时期的方方面面的专题。还有其他思路否？何著提出的断代史研究，撰著人物评传，赵著提出的传注语言学研究，笔记文语言学研究，世界语言学背景比照研究等都是好的创新思路。李著提出的围绕规范化的语言学史研究，恰恰是一个宏大叙事的问题意识的可取视角。可与之比拟的或许还有围绕方言的研究，但写出的只能是中国方言学史；或许还有

围绕语言文化交流的研究,但写出的只能是语言融合史或民族认同史。历史上的规范途径,李著讲了三条:一是由国家制定规范标准,用行政力量向社会推行规范。二是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带动社会语文规范。三是编纂语文辞书,贯彻和传播规范。这三种,无论是推行、带动还是贯彻和传播,都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实际上书中还有一种主体间性的规范化的必然途径:那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有一种忠君爱国,正统扶正,为护一尊,规范铁律,修身用敬,处世谨正的信条。“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一句最常见的自律箴。可以说,规范,它不仅是本体认识的科学化箴规,也是中国伦理学道德说的型范,认识和伦理的双重作用,使规范意识渗入知识者的肌髓。语言文字的规范是儒士们终身的劳作、事业和信念。李著写规范史,可谓找到了准信度高的最贴近语言文字本真的另一个坐标点。现在看看李著如何贯彻规范化的?

一是在六大历史时期内寻找三大规范路径,全书成了时间与空间,六与三的耦合的函项的总和。例如,先秦时期属于国家规制的有西周语言文字规范,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其中就有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度”。辘轳使调查民间歌谣、方言俗语后奏上,供有司“制订出新的语言规范”,还“利用国家行政力量进行语文规范的培训工作”。秦代书同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制定新的文教政策,内含规范,郡乡设教,此亦新制,唯专习今文经,闹得小学不修,直至西汉中期后将文字的规范要求写上了“汉律”。隋唐科举与语文规范关系密切。明代文教制度的变迁,关系到语言文字的规范。官修《康熙字典》,“是清政府管理和规范语言文字的成果”。^①学校教育,代有实例。最显者汉代的识字教育,隋至清代的国子监教育。编纂字书,唐以前个人修撰而经官方颁行,自唐代起多官修。三大规范路径可谓“官制、

① 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52、161、181页。

官学、官修”，打上了以官方为主的烙印，但这不是李著规范史的全部。

二是重视文化在规范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周礼文化和语言文字”，可见一斑。而后，汉代的经学文化，魏晋的书法文化，隋唐的科举文化、佛学文化，宋元“印刷术的文化观照”，以至于明清字书和群雅文化，无不贯串于规范史，无不对规范化有重要意义。其实，研究历史，学术史也一样，应当是多视角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形态，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社会形态，技术或生产力构成的技术社会形态，文化史构成的文化社会形态，都是研究历史的切入点和视角。语言学史展示的研究形态应当更多，文化形态应当更显重要。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提出把世界的历史看作文化发展的历史。语言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形态的关系应当更密切。不同的文化形态，例如学术文化形态，应当是语言学史的不同参照。李著从文化史入手研究规范史，是正确的。

三是重视私学对规范化的作用。宋代的书院教育主要倾向是民间私学性质的。书院教育提倡理学，书中肯定其积极的一面，重视个人的品质气质修养。中国古代历来是道德文章并提，且互相渗透，故气节高昂中正之于学术的规范是有直接意义的。这里涉及道德论和知识论的关系，可予深入研究。朱熹本人是理学家，也是书院教育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其规范扶正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以他的《诗集传》为例，历来认为其中的叶音是随便乱叶的。经研究，他的叶音说在于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定异读，书中选定的那一读就是上古音。^①这正是规范思想起作用的结果。

四是重视儒士们正统扶正观念引起的自觉规范意识及其成果。这

① 参见刘晓南《论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及其价值》，《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朱熹叶音本字考》，《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样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尔雅》为“近正”,是先秦齐鲁儒生所为,没有哪个官方机构来组织;许慎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100—121)著《说文》,是有感于今文经学派中的俗儒随意说经,不合古意而自觉发愤为之的。《切韵》序则记录了隋开皇初年一群文人在“夜永酒阑”之际,“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自觉挑起规范化重担。只有《洪武正韵》和《康熙字典》才是官方组织的,但整个实施过程依然处处渗透着文人的自觉。如此等等。

由以上可见,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法是纵向聚合式的。有关语言学史的分期,学术界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唯“隋唐宋”之宋代属上说和“宋元明”之宋代属下说有分歧,属下说是可取的。有关成果的特色,王力以问题为纲,以语音研究为贯穿是其特色;何著以古代有语言学、《尔雅》成书于先秦,《切韵》音系杂凑说等是其特色。围绕规范化问题研究语言学史,是一个宏大叙事中的问题意识的可取视角,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已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中国语言学史的著述并非经验材料的二次纂集,而是需要经史胆、史识而抽绎出史论,亦即作为一门学术史的发展规律。规律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且体现在方方面面,需要下苦功去发现。与共勉之矣!

主要参考文献

- 邓文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巴蜀书社 2002 年版。
-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语文出版社 2000 年版。
- 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 刘晓南《论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及其价值》,《古汉语研究》2003 年第 4 期。
- 刘晓南《朱熹叶音本字考》,《古汉语研究》2003 年第 3 期。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功龙《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辽海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故训资料的纂集和上古汉语词汇研究^①

——兼论《故训汇纂》对章黄学派的新开拓

古代汉语的重中之重是上古汉语词汇研究,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引起重大关注,但它们的源头仍在上古汉语(东汉中期以前)。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物的研究工作,更凸显了上古词汇研究的重要性。“故训”主要是历代经学家和小学家对上古原典的训释。《故训汇纂》(商务2003)列出引用书目228种,其中上古原典和后人直接针对上古原典的训释文献共164种,占72%,可见一斑。

古代汉语已有大量复音词,《古代汉语词典》(商务2005)收列复音词2.4万余条,《故训汇纂》收复音词10万条左右。^②既收复音词,可见该书既以单音节(字或词)为单位,也以复音节(词、词组,乃至小句)为单位。^③《故训汇纂》一书各字头下的罗列的次序,综合考虑了原典和注释者的时代,力求做到语义逻辑和历史先后的一致,体现了现代学术的风貌。^④

-
- ① 本文原载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8年版。
- ② 《故训汇纂》1至10页收复音节词语728条,中间1327至1336页收230条,最后10页收171条。30页共收1129条,平均每页37.6条,全书共2654页。得99790条,故谓10万条左右。《现代汉语词典》(2005,第5版)总条目6.5万条扣除单音节词的字头约1.3万条,得复音词语约5.2万条,另有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182条。连同陈复华主编的《古代汉语词典》,三书相比,可见《故训汇纂》收列复音词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 ③ 从语义结构看,“故训”以“横向组合”(索绪尔语)即线性组合为单位,且有一定的任意性。“汇纂”应列尽列,不避重复。每个字头下形式上也以“纵向聚合”的面目出现,但远不如词典“以字头带词条”(字典也是如此)那么整一;无论是对单音节还是对复音节的训释都不作词义项那样的概括性加工,即如实、如数罗列,做到应列尽列,不避重复。
- ④ 粗线条地说,如“悠”字条以《诗经》、《庄子》、《尔雅》、《文选》、《文选》六臣注、李善注、《尔雅》郝疏等为综合次序。不像《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那样主要以原典书证时代先后为序,一般不考虑注疏者的时代先后。语义上贯彻“义近逐渐引次”的原则,同《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且尽可能把综合时序与语义引序结合起来。《故训汇纂》的排序突出了“故训”二字的地位。

一、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作用

故训资料的纂集似乎未作词典义项那样的概括,还能对上古词汇研究起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为”字,收列 240 项解释,其中 1 至 157 项是单字“为”(wéi)的种种用法和解释。几乎条条都直接引据针对上古语料的故训,即使是后代的训释或字书,事实上也是针对上古语料的。例如第 6 项“为,谓为造国家器物也”,引据孔颖达疏。“为造”连读,意即“制造国家所需之器物”。或谓“做制造国家器物的事”。由本项即可知,孔疏针对郑注,郑注针对《礼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郑注云:“通三十年之率,当有九年之蓄,出谓所当给为。”第 19 项“为,瘡也。《广雅·释詁一》。”似无先秦的依据,王念孙《广雅疏证》也只是指出,为,已也,瘡,疾病可已,即癒字,并引《汉书·高帝纪》和颜注证“瘡”即“癒”字,并无“为”释“瘡”和“癒”的例证。《荀子·哀公》:“所谓庸人者……不知选贤人善士托其身焉,以为己忧。”第 20 项即引俞樾《诸子平议荀子四》指出,“以为己忧”中的“为”字就有“瘡”的意义,亦当为“癒”。又如第 114 项引据中古而无上古:“为作则。《文选郭璞〈游仙诗〉》‘退为触藩羝’旧校:‘五臣作则字。’可是《管子·君臣》:‘夫民,别而听之为愚,合而听之则圣。’”“为”、“则”相对成文,“为”训“则”甚明,第 113 项已引据《经词衍释》卷二明之。可见,只要将条目内各项通观之,一般均可获知后代字书的条目有上古汉语的证据,乃至仅引中古书证、中古训释的条目,除据上下文可知其缘由外,亦皆有上古汉语的证据可查。如此看来,《故训汇纂》一书的历史语义的总体内在逻辑指向归于上古。《故训汇纂》本身就是研究上古汉语词汇的直接导入和好材料。它有以下作用: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研究上古的词义义项。仍以“为”字为例。

为(wéi):

① 作,改作。《仪礼燕礼》:“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阍人为大烛于门外。”郑玄注:“为,作也。作大烛以俟宾客出。”①《国语鲁语下》:“季武子为三军,叔孙穆子曰:‘不可。’”按:鲁国是个中等的诸侯国,按规定只能建立二军,鲁儒季武子为专权欲改建三军。

② 治,治理。《左传文公六年》:“何以为民?”陆德明释文:“为民,治也。”《国语越语下》:“令大夫种为之。”韦昭注:“为,治国也。”

③ 撰写。《战国策魏策二》:“因弛期而更为日。”鲍彪注:“为,犹撰。”

④ 已;愈,痊愈。前举《荀子哀公》例即是书证。又《山海经中山经》:“可以为腹病。”郭璞注:“为,一作已。”

⑤ 化,变化,变动。《说文爪部》“为”字下段注:“凡有所变化云为。”《庄子庚桑楚》:“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

⑥ 成,助成;长成。《诗大雅鳧鸞》:“福祿来为。”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四》:“为,犹成也。”《国语晋语四》:“黍不为黍,不能蕃庠。”韦昭注:“为,成也。”

⑦ 行。《论语卫灵公》:“子贡问为仁。”刘宝楠正义:“为,犹行也。”《国语晋语七》:“诸侯之为,日在君侧。”韦昭注:“为,犹行也。”

⑧ 学习,修习,修教化。《论语述而》:“抑为之不厌。”皇侃疏:“为,犹学也。”《大戴礼记千乘》:“以为无命,则民不偷。”王聘珍解诂:“为,脩为也,谓脩其教也。”

⑨ 用。《左传宣公二年》:“弃人用犬,虽猛何为?”《仪礼士相见礼》:“君无为兴,臣不敢辞。”《礼记檀弓下》:“敝帷不弃,为埋马也。”《经词衍释》卷二以此二“为”字并训“用”。

⑩ 施,敷设。《礼记曲礼上》:“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郑

① 《故训汇纂》在编纂体例上为突出“故训”二字的地位,引作《仪礼燕礼》“阍人为大烛于门外”郑玄注,《国语鲁语下》“季武子为三军”韦昭注。与《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引书体例完全不同。全书皆然,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本文已重新标点过。

注：“为，犹敷也。”《吕氏春秋长利》：“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高诱注：“为，施也。”《慧琳音义》卷二十“我当为”注引《玉篇》：“为，敷施也。”

⑪ 择取，取。《周礼天官世妇》：“帅女宫而濯概，为盥盛。”郑注：“为，犹差择。”《逸周书周祝》：“欲彼天下是生为。”朱右曾集训校释：“为，取也。”

⑫ 谋。《战国策东周策》：“因以因徐为之东，则有合矣。”鲍彪注：“为，犹谋也。”

⑬ 种，栽种。《战国策东周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鲍彪注：“为，犹种之。”

⑭ 摩。《诗大雅抑》：“斯言之玷，不可为也。”马瑞辰传笺通释：“为，亦摩也。”

⑮ 置。《后汉书袁谭传》：“[公孙度]越海收东莱诸县，为营州刺史。”李贤注：“为，犹置也。”

⑯ 属，归属。《战国策秦策一》：“代、上党不战而已为秦矣。”高诱注：“为，犹属也。”

⑰ 解说。《孟子告子下》：“固哉，高叟之为诗也。”焦循正义：“丁云：为，犹解说也。”

⑱ 演奏。《论语述而》：“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皇侃疏：“为，犹作奏也。”

⑲ 葬。《穀梁传成公九年》：“夫无逆出妻之丧而为之也。”杨士勋疏引徐邈云：“为，犹葬也。”

⑳ 献，献酌，献酒。《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宾客，则摄而载果。”汉郑玄注：“载，为也。果读为裸，代王裸宾客以鬯。君无酌臣之礼，言为者，摄酌献耳。”

㉑ 报恩求福。《礼记祭统》：“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郑注：“为，谓福佑为己之报。”

②② 前。《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陆德明释文：“为，犹前也。”郭庆藩集释：“为薪，犹前薪也。”

②③ 相。《韩非子内储说下》：“犀首与张寿为怨。”王先慎集解：“为，犹相也。”

②④ 猕猴。《说文爪部》：“为，母猴也。”

②⑤ 有。《易夬》：“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俞樾《群经平议周易一》：“为咎，犹有咎也。”《孟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赵岐注：“为，有也。”

②⑥ 使。《易井》：“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王弼注：“为，犹使也。”《逸周书武纪》：“为之以其时。”朱右曾集训校释：“为，使也。”

②⑦ 是，算是。《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论语微子》：“子为谁？为仲由。”《孟子梁惠王上》：“不为不多矣。”刘淇《助字辨略》举此三例后称：“为，犹是也。”

②⑧ 比，如同，好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官大邑……其为美锦，不亦多乎！”《经词衍释》卷二于此例下云：“言其比美锦不且重乎也。”并云：“为训如，如之义同比，故为亦得作比训。”《左传》杜注“言官邑之重多于美锦”亦可证为“比”义。《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是为冯妇也。”《经词衍释》卷二于此例云：“言是如也。”

②⑨ 思维，思。《左传成公二年》：“晋公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孟子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经词衍释》卷二于此例云：“谓思可传，思可继也。”

③⑩ 介词。(1)于，对于。《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为，读曰于。”《战国策秦策四》：“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晋语：称为前世。韦注曰：言见称誉于前世。是为即于也。”(2)於，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念孙读书杂志：“为其来，於其来也。古者或谓於曰为。”(3)与。《经传释词》卷二：“为，犹与也。”

《管子戒第》：“中妇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为，犹与也。”《史记孟子列传》：“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王念孙读书杂志：“与、为一声之转，故谓与曰为。”⁽⁴⁾被。《汉书高帝纪》：“赵武王臣为其将所杀。”刘淇《助字辨略》：“此为字，犹云被也。”

③① 副词。(1)乃，就是。《左传襄公十四年》：“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经词衍释》卷二举此两例称：“上两为字，则也；下为字，乃也。”(2)惟，只有；任随。《左传襄公四年》：“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史记王翦列传》：“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经词衍释》卷二据此两例称：“为皆惟义，祇词也，任词也。”(3)唯，仅。《孟子告子下》：“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经词衍释》卷二据此两例称：“两为字并同唯也。”

③② 连词。(1)则。《左传襄公十四年》例。《国语晋语》：“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经词衍释》卷二举此两例等云：“为，并则义。”(2)若，如，假如。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为，犹如也。假设之词也。”《韩非子内储说下》：“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为近王，必掩口。”王先慎集解：“为，当作若。”《战国策韩策一》：“纵韩为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又：“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三韩》据此二例云：“两为字并与如字同义。”(3)而。《孟子公孙丑下》：“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朱熹集注：“或曰：为当作而。”《吴越春秋》：“吴王知范蠡不可得为臣。”《经词衍释》卷二：“谓不可得而臣也。”又云：“为训曰如，如与而通，故为又可作而训。”

③③ 句末语气词。《楚辞渔父》：“何故怀瑾握瑜，而令见放为？”《助字辨略》卷一以此“为”字为“语辞”。《论语颜渊》：“何以文为？”刘宝楠正义：“为，语助辞。”

③④ 然。《诗小雅正月》：“今兹之正，胡为厉矣！”《经词衍释》卷二：“旧本作胡为，后人改作胡然，盖不知为与然同一义。”《吕氏春秋先识》：

“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毕沅校正：“《说苑》作‘多不当，曰：是何能然’。”

以上义项，《汉语大词典》未收者有：④⑦⑫⑭⑰⑱⑲⑳㉑㉒㉓㉔①③①(1)(2)(3)③②(3)③④。即使是《汉语大词典》已收义项，由《故训汇纂》概括出的义项往往仍有自己的特色。例：《故训》①作，改作/《汉大》②造作，制作。无“改作”义位。《故训》⑧学习，修习，修教化/《汉大》⑧学习，研究。无“修教化”义位。《故训》⑳比，如同，好像/《汉大》㉔如同，好像。无“比”义位，整个义项的重心也不同。更不用说书证的不同了，特别是用故训本身作书证概括义项，如第㉔项“献，献酌，献酒”纯以《周礼》郑注为据。唯其如此，可由《故训汇纂》窥见更多的上古义项，而《汉语大词典》从体例上是排斥以故训为书证来建立义项的。

此外《故训汇纂》还收列双音节词语“为×”26条，倒序双音节词语10条（加括号者为《汉语大词典》未收）：为人、为力、（为己）、（为仁1）、（为仁2）、（为主1）、（为主2）、（为禾）、（为邦）、为命、（为咎）、为政1、（为政2）、为政3、（为后）、（为都1）、（为都2）、（为闲1）、（为闲2）、为间1、为间2、为期、为寿、（为谋）、为学、为薪。（不为1）、（不为2）、以为、何为、（其为）、（孰为）、无为、（众为）、（伪为）、（不可为数）

以上共36条，《汉语大词典》未收者共15+7条。

为(wèi)

① 帮助。《书皋陶谟》：“予欲宣力四方，女为。”刘逢禄《今古文集解》引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为，读如相为之为。为，助也。言助君宣力于四方也。”《战国策东周》：“君若欲为太子，因令人谓相国……”鲍彪注：“为，犹助也。”

② 介词。（1）给，替；与，心向着。《论语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助字辨略》卷四：“此为字，犹与也。凡心向其人曰与。”《汉书高后纪》：“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军皆左袒。”（2）以。《左传隐公三年》：“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谓赋《硕人》也。”

《经词衍释》卷二：“为，以也。”又《僖公二十八年》：“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经词衍释》卷二：“言以其所得者棺而出之也。”汉东方朔《答客难》：“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③ 副词。将。《孟子梁惠王下》“君为来见也”焦循正义：“将、欲、为三字转注互训。”《诗豳风七月》：“曰为改岁，入此室处。”《经词衍释》卷二以上句为“言聿将改也。”

④ 连词。(1)因，因为。《孟子梁惠王上》：“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史记李斯列传》：“臣欲谏，为位贱。”《助字辨略》卷二据此二例云：“为，犹因也。”(2)故，所以。《淮南子时则》：“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坚致为上。”高注：“为，故也；上，盛也。”

⑤ 通“伪”。(1)诈伪，欺骗。《诗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苟亦无信。”陈奂传疏：“为，读作伪。”《礼记月令》：“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郑注：“为，诈伪。”《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使之为夫人则否。”王聘珍解诂：“为，读曰伪。”(2)人为。《诗王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为。”毛传：“尚无成人也为。”郑笺：“谓军役之事也。”陈奂传疏：“为即伪，凡成于人为谓之伪。”

⑥ 通“讹”。《说文爪部》“为”朱骏声通训定声：“假借为譌。”《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俞樾平议：“为，当读为譌。”

⑦ 通“化”。《诗小雅天保》：“群黎百姓，徧为尔德。”马瑞辰传笺通释：“‘徧为尔德’犹言徧为化尔德。为与化，古皆读若讹，故为、讹、化古并通用。”

以上义项，《汉语大词典》未收者有②(2)③④(2)⑤(2)⑦。同前面讲的一样，有的条目即使与《汉语大词典》同，但仍有特色，例：《故训》②介词。(1)给，替；与，心向着。/《汉大》②介词。(1)给，替。(2)对，向。《故训汇纂》的“心向着”义位已近乎实义动词。

此外，还收有双音节词语“为×”5条，倒序双音节词语“×为”6条。(加括号者为《汉语大词典》未收)：为言、为我、为诈、(不为之[不以

为])、(人之为言[民之讹言])、(女为[你翼助])、何为、所为、胡为、(曷为)、(奚为)

以上共 11 条,《汉语大词典》未收者共 2+3 条。

综上所述,由《故训汇纂》提供的语料抽绎出的义项,我们可用来补《汉语大词典》不足。从“为”字例看,还不在少数。书证亦可补,而且范围更广。以训诂语料为建立义项的依据,事实上还是第一次。

以上是说利用《故训汇纂》可增加上古单音节词的义项,还可增加复音词。要是建立上古词语的语义场,无疑更有可观。义项增加了当然丰富了语义场构成,即便不是义项,仅是义位或义素,也即可丰富语义场。语义场的构成是由词的理性意义经比较而得的语义成分构成的,所谓语义成分(semantic components),又称义素(emes, sememes)^①,语义成分,亦即义素才是词的理性意义的区别性特征。故训恰恰就是直接分析到义素的。仍以“为(wéi)”为例,固然可前面建立的 34 个义项为分析单位,但《故训汇纂》“为(wéi)”下列了 157 个义素项,它们都应该成为“为(wéi)”字语义场的分析单位,以义项⑦“行”为例,有书中第 32 项的“(诸侯或其他人经过学习)有能力行”(+)、第 33 项实行“仁”的伦理观念(+)、第 34 项心理上的“行”,称心如意(+)、第 35 项“做很大的坏事”之“行”(+)、第 36 项“效行”(+)。此外,往上位方面考虑,“为”还可以与同义词“做”“作”“办”等形成语义场。总之,无论往上位的宏观同义系联,还是往下位的义项,尤其是义素分析的深层次开掘,对丰富语义场,拓展语义分析,都是极有意义的。

二、对章黄学说的新开拓

《故训汇纂》的编纂出版,是继承黄侃遗愿,成就章黄功业的大事。

① 参见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73 页。

20 世纪初黄侃在给学生讲课中提出重编清阮元《经籍纂诂》的构想,他对阮著的批评很值得注意:一是缺乏内在的语义逻辑性,“载字先后毫无意义”。二是材料不足,“至其蒐辑,亦有不备者”。出路有两条:一是在体例上下功夫,用现代“字典编制法编之”,二是在材料上下功夫,“补其遗阙”。^①强调字书内部的语义逻辑性,是黄侃一贯的语学哲理。在论及《说文解字》体例时,特别赞扬段玉裁借颜之推的话论其“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原”,以为“至精至确”。认为许书列部之次例,可分“以形相近为次”、“以义为次”等。而列字之次例,“大氏先名后事,如玉部,自璫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还有以声音为次,以意义同异为次。^②唯其如此,《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然,好像一篇文章”。^③段玉裁说:“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④段氏所说的“条理次第”,正是字书构成中语义相引为次的内在语义逻辑问题。它显然是先秦正名思想、名辩逻辑的继续和深化,不乏思辨和研究方法的含义。从段玉裁“条理次第”说到黄侃“次第类别”说,是一脉相承的。强调语义名辩逻辑,不能不说是章黄学术精神的一项内容。^⑤《故训汇纂》于此而何?作为现代辞书的编纂,通行的做法,字头的排列按部首/笔画/笔顺,字头下所带的复音词语按笔画/笔顺排列,这些一般常规,《故训汇纂》都是严格遵循的,合乎黄侃用现代“字典编制法编之”的要求。各字头下的单音节字或词的意义项的排列,就大有讲究,各显身手。现仍以“为”字为例,揭橥该书语义逻辑“条理次第”和“次第类别”的做法,这实际上是在调动多种手段寻找语义节点(semantic point of

① 参见《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述,黄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 页。

② 参见《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 页。

③ 参见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第 200 页。

④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影印版,第 19 页下。

⑤ 从更弘廓的方面讲,章黄学术精神还有“继绝学,明宪章,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等,即主张继承中华传统,明白古学精神和规范,保存国粹,弘扬民族文化,自强不息,抵御外侮。这些话语的问世,与前述重修阮著,并责其缺乏内在语义逻辑庶几同时,都在 20 世纪初。参见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 页。

distinction):

一是近同义之故训按本训义、近训义排列。例“为”字条 1 至 4 项皆“作”义。排列:1 作也、2 亦作也、3 犹作也、4 盖改作之。近训义相同者按故训术语相异相引为次。例“为”字条 9 至 22 项皆“治”义。排列:9 至 10 治也、11 亦治、12 犹治也、13 训治也、14 当训治、15 犹之治、16 治国也、17 治理、18 治护、19 至 21 治愈、22 完全治愈。

二是同项内书证以原典先后为次。例“为”字条“1 作也”项内书证次序:《仪礼》《周礼》《国语·鲁语》《国语·楚语》《论语·述而》《论语·先进》《论语·宪问》《列子》(序次有误)《孟子》《荀子》《吕览·贵生》《吕览·知接》《史记》《大戴礼记》《礼记·乐记》《礼记·祭法》……同义各项之先后亦尽可能考虑书证先后而定次序。例“为”字条 12 引《易》为首,15 引《论语》。19 引字书《广雅》、20 引《荀子》、21 引王念孙《广雅疏证》实引《汉书》。19 至 21 排序服从语义。

三是不同语义项(语义板块)之间的排列以意义相引为参照,尽可能体现语义逻辑顺序。例“为”1 至 193 项的语义项(语义板块)次序:

1 至 8 作(中心语义,下同)——9 至 22 治——23 至 26 化——27 至 28 动——29 至 30 成——31 合——32 至 36 行——37 学——38 修教化——39 至 42 用——43 至 45 施設——46 至 48 取,选取——49 谋——50 事——51 摩——52 种——53 置——54 属——55 解说——56 奏——57 葬——58 献——59 图报——60 至 61 做鲁莽不理智的事——62 前——63 相——64 猴——65 至 70 有——71 至 85 谓(有误,当移“为 wèi”下)——86 至 87 曰——88 至 89 使——90 至 101 介词为主——102 至 127 连词为主——128 至 137 语气副词惟、唯——138 至 140 代词为主——141 至 153 语助词为主——154 至 157 通假字——158 至 193 复音词。

语义相引分析:板块内语义联结甚紧;有语义相引的中断,可说“行”后断,未断处可说为:一般之“作”而具体之“作”即“治”,治而化,化

而动,动而成,成而合,合而行。“用”后断,未断处可说为:学而修习,学和习皆至于“用”。43至89语义联结松散,但亦有可说:谋即谋取,谋为事谋,曰说多为命使。90至193为虚词等语义板块。

四是复音节词语的排序:按第二个音节的笔画。事实上,第三点单音节按语素义顺序排序实施起来很难,转而复音节按笔画,以汉字形态化特征胜处汉字语义。

综上四条,既考虑书证历史先后,又尽可能地注意语义逻辑联结(这本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谓主体概念分析是最难之事),与当今其他历史语言大词典一样,是努力寻求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的。既考虑笔画、笔顺为序,又考虑意义为序,显然是将汉字形态与汉字字义相结合的做法,可谓追求形态学与语义逻辑学的结合。以上不能不说是黄侃在上世纪初提出的不能使纂集“载字先后毫无意义”,“用字典编制法编之”的两点构想的实施、丰富和开拓。至于黄侃提出的材料蒐辑要“几于全备”,《故训汇纂》所作的巨大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书中充分利用故训资料,提供的语义义素层层叠叠,密密匝匝,为细辨语义距离(semantic distance, semantic distinctive feature)提供了实证材料和细辨范本,这对研究先秦词语的语义相似性(semantic affinity),乃至现代语义相似的普遍性原理,都是有益的。^①既然《故训汇纂》在“载字先后”的意义上下了那么多的功夫,把它看作隐性的逻辑语义词典可也。

三、对出土战国文字字义的解释力例举

正因为材料丰富,带来的效用就是解释力强,这显然是对原典文献和故训文献同时开拓,使之“几于全备”的结果。试用来解释《郭店楚简》释文中的一些问题。

^① 可参见吴云芳《并列成分中心语语义相似性考察》,载《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4期。

(1)《郭店简老子甲本》：“𠂔(绝)智(知)弃𠂔(辯),民利百(倍);𠂔(𠂔)巧(巧)弃利,𠂔(盜)惻(賊)亡又(有);𠂔(绝)𠂔(偽)弃(詐),民复(復)季(孝)子(慈)。”

按:王本《老子》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帛书甲本《老子道经》:“绝声(圣)弃知(智),民利百负(倍);绝仁弃义,民复畜(孝)兹(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三句话的关键是如何读“𠂔”字,今谓不烦改字,郭店本“𠂔”当如其字形读“继”。《故训汇纂》引《庄子·至乐》:“种有幾,得水则为𧈧,得水土之际则为𧈧之衣。”从上下文看,必为“继”字。陆德明释文:“司马本作繼,云:万物虽有兆朕,得水土气乃相继而生也。”郭庆藩集释引卢文弨曰:“古绝字当作繼,此𧈧乃继字。”如字读“继”后,下文文义咋办?𠂔:郭店简整理者原注:“后面《老子》丙第八号简也有此字,读为偏。”第三句字为“伪”字,裘锡圭先生将此句释为“绝𠂔(伪)弃𠂔(詐)”,并云:“𠂔从且声,与詐音近。”且,上古清声鱼部,詐,上古庄声铎部。清、庄准双声,鱼、铎对转。王本《老子》十八章有“大伪”一说,与“仁义”“孝慈”“忠臣”对举,王本十九章此句作“绝仁弃义”,(伪)字对应“仁”字。邓球柏将这三句话校读为“继智弃偏,民利百倍;继巧弃利,盗贼亡有;继仁弃詐,民复季子”,是可信从的。^①

(2)《郭店老子甲本》:“𧈧(罪)莫厚𧈧(乎)甚欲,咎莫金(慥)𧈧(乎)谷(欲)得,化(禍)莫大𧈧(乎)不智(知)足。”

按:王本《老子》四十六章有后两句:“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帛书本:“罪莫大于可欲,𧈧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慥于欲得。”甚,郭店简注:“或应读为淫。”李零读为贪。今谓隶定为“甚”不误。贪、淫当无别。《故训汇纂》引《老子》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河上公注:“甚,谓贪淫声色。”应如字诠释为“剧,过分”。《故训汇纂》至少引了5例明

① 参见邓球柏《内圣外王之道:〈郭简·老子〉的主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此表程度的性质,如引《广韵·寝韵》:“甚,剧过也。”第二句以“金”为“慤”,纯以帛书本推得。今谓如字作“超过,多”解释。《故训汇纂》引了5例明“金”有“多、过”义,如引《方言》卷一:“硕、巨,大也。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人语而过谓之祸,或曰金。”可见“大、多、金”为同义词。这三句话为对文,厚重,表程度;金,过,超过,表限度;第三句“大”表等级范围。如按王本、帛书本将此三句对文系联在一起,也可说都用了一个“大”字。三句对文在逻辑上也是一体的。不必另出个“慤”字损害三句对文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视“金”如字,则与“大”义近。释“化”为“祸”,固参王本和帛书本,《故训汇纂》引《说文·七部》“化”字朱骏声通训定声:“化,假借为祸。《周礼·春官·大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郑司农注:‘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可为补证。故这三句对文可理解成:罪莫重于过分的欲望,灾咎莫过于贪婪,祸殃莫大于不知足。

(3)《郭店老子甲本》:“攻(功)述(遂)身退,天之道也。”

按:王本《老子》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帛书本《老子道经》:“功述(遂)身芮(退),天[之道也]。”《故训汇纂》引“攻”“功”互用共8例。如引《说文支部》“攻,击也”桂馥义证:“顾炎武曰:峯山刻石:功战日作。当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齐侯罇钟铭:肇敏于戎功。作攻。”郭店简以“攻”“𢇛”为“功”字共4例^①,今以《故训汇纂》引8例观之,以“攻”为“功”字并非随意为之,恰恰合乎上古用字规范。述,《故训汇纂》引《管子·君臣下》“大臣乱曰称述”集校引丁士涵云:“述、遂,古字通。”又引《诗·邶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毛传“山川能说”陆德明释文引郑志曰:“或曰述……述读如遂事不谏之遂。”可见郭店本、帛书本“述”通“遂”,用通假字。

(4)《郭店简·缁衣》:“子曰:‘侏(长)民者衣備(服)不改,從頌

① 《郭店简》以攻、𢇛为攻字的共4例,见该书第113、121、125、145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容)又(有)常,则民惠(德)式(一)。”

按:今本《礼记·缙衣》:“长民者衣服不貳。”《沪博简·缙衣》:“长民者衣備不改。”郭店简、沪博简“備”字为“服”不误,“衣備”即衣服。《故训汇纂》引《吕氏春秋·先己》“乐備君道”许维遹集释引王念孙曰:“備,读为服。”

郭店简“從頌”沪博简作“從容”,“頌”即“容”字不误。《故训汇纂》:“頌(róng)”收语义项“容貌、容仪”者有19条,例引《管子牧民》“右国頌”尹知章注:“頌,容也。”

(5)《郭店简·缙衣》:“子曰:厶惠不褻(褻)惠(德),君子不自(留)女[安(焉)]。”

按:今本《礼记·缙衣》:“子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沪博简·缙衣》第二十一简:“子曰:厶(私)惠不褻(懷)惠(德),君子不自(留)安(焉)。”沪博简隶定不误。沪博简与今本《礼记》义近,褻有归义。《故训汇纂》“褻”字引《广韵·皆韵》:“褻,归也。”余迺永校注本“褻”出又切:“灰韵,公回切。”即读“褻”近“归”声。“归”亦“怀”也。《故训汇纂》“归”字引《礼记·缙衣》“私惠不归德”郑注:“归,或为怀。”又引《说文·止部》“歸”字下朱骏声通训定声:“归,假借为怀。”《郭店简·缙衣》隶定为“褻(褻)”亦不误。褻,包,包扎。《故训汇纂》引《说文衣部》:“褻,以组带马。”谓用宽而薄的丝带包扎、缠绕在马上以为饰品。《故训汇纂》“褻”字引《广韵·皆韵》:“褻,挟也,苞也,归也。”又引《说文·衣部》:“褻,挟也。”“褻”字引《广韵·皆韵》三义即挟带、包扎、怀归。《故训汇纂》“怀”字下引《书尧典》“荡荡怀山襄陵”伪孔传:“怀,包也。”又《汉书·地理志上》“襄山襄陵”颜注:“褻,包也。”由《故训汇纂》可知褻、褻、怀有相同语义要素“包”,褻与褻、怀义近同。《郭店简·缙衣》用“褻(褻)”字与《沪博简》用“褻”字义同。又:自,用。《故训汇纂》引《礼记大传》“自仁率亲”郑注“自,犹用也”等三例。《郭店简·缙衣》全句意为:私惠不包(含有)德,君子不用留记于心头。

至于《故训汇纂》对复音词的解释力度,以《郭店简老子甲本》为例,我们记录到的双音节词(含少量词组)共 74 个,^①已被《故训汇纂》收列的有 30 个,占 40%。被收列者(含训解中明显提及者)有:盗贼、亡又(有)、季子、江海、所以、圣人、四鄰、亡失、慎终、万勿(物)、自然、亡为、多易、天下、音声、先后、甘露、寂寥、蜀(独)立、橐籥、方(旁)作、员员、忌讳、利器、无事、赤子、鸟兽、牝牡、不道、不怠。

人们或许要问,为何《故训汇纂》有此解释力度?该书是以语素义为单位的先秦词义府,且应收尽收,非常丰富,涵盖面之广,之深,就为必然的了。

主要参考文献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相关条目,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至 1993 年版。

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赵振铎《辞书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① 它们中未被《故训汇纂》收列的有:民利、覬侧、视索(素)、保僕(僕)、须(寡)欲、百欲(谷)、甚欲、长古、非(微)溺、玄达、尚盈、为古(故)、亡败、执古(故)、侯王、自化、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和、相堕(随)、自宾、均安、蟲(蚩)成、攸穆、至虚、默(守)中、玄同、期韦、自富、自化、自正、自樸、蛸蠶、捉固、甚爱、大费、厚藏、不辱、长舊(久)、长保、金玉、盈室 共 44 条。

现代语言学专题

伦敦学派的兴起及其流变^①

英国有研究语言学的悠久传统,特别是语音学。从 5 世纪中叶英国民族定居起,英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长足的发展,到 11 世纪英语已成了英格兰的标准语言。早在 15、16 世纪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大陆还普遍使用古拉丁语,拉丁语以外的语言,如英语等民族语言被嘲笑为俗语时,英语研究已在英国本土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正音学、词典学等合乎规范化要求的学问首先发展起来。到 19 世纪末,出现了像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 1845—1912)那样的语音学家,他的《语音学手册》(1877)被誉为“教会了欧洲人语音学,使英国成了语音学这门现代科学的发源地”^②。久负盛名的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 1881—1967)继承了斯威特的工作,成为英语语音学和普通语音学的先驱。

英国理论语言学,即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是与琼斯同时代的弗斯(John Rupert Firth, 1890—1960),因弗斯长期在伦敦大学任教,故以他为首的语言学派被称作“伦敦语言学派”。他培养的学生最著名者有韩礼德(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riday, 1925—)、罗宾斯(R. H. Robins)、莱昂斯(J. Lyons)等。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他的学生辈执掌的学派被称为“新弗斯学派”。

① 本文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②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

一、从人类学走向语言学

20 世纪英语语言学的兴起,与美国的情况很相像,也是开始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原籍波兰,1910 年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人类学,从 1924 年起,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38 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任人类学教授直至去世。其时萨丕尔还在耶鲁主事,萨丕尔是 1931 年到耶鲁任刚刚成立的人类学系主任,1939 年去世。如果说萨丕尔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中发现了语言自身的描写和语言与世界的假设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则发现了语言自身的功能解释和语言与言语情境的关系。萨丕尔开创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时代,而马林诺夫斯基则呼唤了英国功能语言学时代。这是两位学者的不同学术个性,而他们的共性,都是从人类学走向语言学。

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兰德群岛做实地调查,研究当地土著族的原始文化,从而发现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而“功能”是其中的关键。1920 年马氏的论文《基里维纳语的分类小品词》描写了与数词、形容词、指示词有关的小品词以及它们的语法特征,但始终强调语义的重要性。声称语义是解释一切语言现象的基础,语义是语法分析的基础,语义是词汇分类的基础,如此等等。反之,形式标准不是语言解释,语法分析,词汇分类方法基础。这些界定成了英国语言学的传统。他在分析基里维纳语时说:“在研究各种组织成分的语法特性时,我们时刻都要记住它们的意义。证明一个表达方式应该归为名词、动词、副词或名词性指示词时,我们用的是语义学定义,而不是形式上的定义。”^①这是英国传统语言学重意义,不重形式的宣言。据

^① 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 279 页。

马氏自己的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其一,有可能使语法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起来;其二,无须另立形式范畴,而能对任何复杂的语言结构作出分析。西方语言学从索绪尔起,强调语言的形式范畴性质,这与康德以“先验自我”性质的“物自体”为认识的逻辑起点是相通的。马氏恰恰是继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与西方普世思维模式形式化大不一样,强调对象的经验性质,把概念与对象、事物一致起来,又把概念、对象、事物与反映它们情形的语言一致起来。概念、对象、事物本身无须形式化、模式化,反映它们情形的语言也无须形式化、模式化,语言直接概念,语言直接事物,语言直接活动环境,这就是马氏的逻辑。

说到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我们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霍布斯(1588—1679),马克思说他第一次“用人的眼光”,“从理性和经验”,引出关于国家的“自然规律”。在思想方法上,与霍布斯同时代的培根(1561—1626)提出了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经验世界的基本原则,主张用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等的理性方法来整理经验材料,被誉为归纳法的创始人。洛克(1632—1704)则完全继承了霍布斯和培根的经验论思想,提出“知识起源于感觉”,反对天赋观念,认为心灵只是一张白纸,后天获得的经验才是认识的泉源。18世纪的代表性哲学是法国的唯物主义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其渊源也是经验论。19世纪的代表性哲学是德国哲学,康德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现代语言学的许多流派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的影子。19世纪大蠢之外还有旗帜,英国的穆勒(1806—1873)和斯宾塞(1820—1903)的实证主义则是这样的代表。穆勒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实在,斯宾塞把知识对象和科学研究的对象都局限于经验所能及的现象范围之内,他还把任何突破人类主观经验的企图都叫做“形而上学”。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创立的人类学和语言学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都是英国本土的经验论,而与风靡世界的德国哲学无关,与通行的形式化语言学说也迥然有异,酝酿和呼唤以经验论为哲学背景的情景语言学是毫

不奇怪的。

在涉及语言本体问题时,马氏的内在逻辑是,在做研究工作时,语言与外部语言环境密切相关,而与思维的关系不重要,甚至认为与思维无关。马氏1935年发表的最后一部语言学著作《珊瑚园及其魔力》(第二卷)强调“真正的语言事实是在实际语言环境中的话语”,这是对的。但他同时又认为“孤立的词”(它显然是语言的组成部分,是语言的存在内容和存在方式)“实际上不过是臆造的语言事实,不是高级语言分析过程的产物”。“孤立的词”的本体和作为“高级语言分析过程”的对象,两者完全是一致的。更谈不上是“臆造的”。在词义问题上,他把“意义范围”定位在“语言环境”,“意义存在于语音与环境的关系中”,“一切词的意义都来自于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承认词有自己的词汇意义,不运用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就会“变成两个或多个语义上不同的单位”^①。后面这句话是指词典里的静态词义。应该说,运用于一定环境的词的动态意义与作为语言中的词的静态意义,词典意义是不矛盾的。前者应当成为后者的补充。30年代马氏接受了华生(1878—1958)1913年创立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些看法,强调任何人都要受到自身的社会经历,亦即文化的改造,他把文化看作一个社团的全部制度,各种传统的硬性规定,如语言、技术、社交方式等。这对个人来说就是自身的经历。他还说他的文化理论的全部实质就是把涂尔干(1859—1917)的理论社会集体心理学说变成行为主义。我们前面讲到,涂尔干社会集体心理学说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学术背景,华生的行为主义则为布龙菲尔德所信奉。马氏声称他从涂尔干走向华生,实际上主要是接受包含在行为主义中的经验论,强调环境刺激“S…R”部分,大大淡化了语言本身,把语言研究归结为环境制约。布龙菲尔德则强化了语言本身,将环境用来为语言研究服务。

① 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282页。

二、弗斯的语境学说和功能语言学

弗斯有丰富而复杂的经历,当过军人,英语教师,二战期间培养过军需人材,似乎实际需要迫切性,实践过程的必然性要求贯穿他的一生。与此有关的是他的学术领域主要集中在对英语来说实用性特别强的语音学和语义学,学术思想则强调经验事实,实际环境的制约。罗宾斯说他“通常以语言和经验的联系来确定”语义,因而概括成了一个著名等式“语义就是情境中的语言”。语境成了最重要的参照系。把上述等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到语法和语音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扩展了他的语境理论。例如,描述格形式在句法中的作用就是描述它在各种语法环境中的功能;又如,描述音位区别以及英语中[b]和[n]等辅音可能出现的辅音连缀,就是说明它们在各种语音环境以及在语言的音位系统中的功能”^①。至于他立足于经验论吸收共事多年的马氏的人类学的成果,是顺理成章的事。总之,语境是弗斯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科学的语言研究,索绪尔所阐明的语言的抽象性,一般性是基本原理,光讲紧连着言语的“语言经验环境”显然是不够的。语境确立后,摆在弗斯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用建立一个能容纳语言形式分析的平台。罗宾斯说:“至于通常以语言和经验的联系来确定的语义,则通过词汇、短语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功能来分析。弗斯的语境……是一个由语义所指和外延等范畴组成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话语及其成分同外界的特征和事件相联系。弗斯强调内部的、形式的语法和语音环境同外部语境的平行关系,因而,使语义使用范围的本来矛盾的扩展更合乎情理。虽然可以说,弗斯低估了形式分析和

^① 见罗宾斯著,许德宝等译《简明语言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39页。

语义分析之间的基本区别,但是,从过去把语义看作‘所代表’或者所指(要知道很多词语的所指很难找到),到现在把语义理解成功能(词语及其组合的用法),这个转变是非常可贵的。”^①应该说,弗斯框架的制定有其思维史的必然性。从笛卡儿起,认识史开始以人作为主体,以世界作为图像。在近现代的科学视野中,人的参与仅仅在对象的状态中参与,科学理论仅仅在对象的状态中被追查和获取有关状态的真理。对象的状态任何时候都能成为可测量,可计算的可靠对象。^②这样,人的意义就渗透到对象物的研究中。语言是社会人的主干,人的能力的意义,人的语言能力的意义,就会专注于对象状态的测量和操作,对语言来说就是语言环境的研究。如此看来,语境的研究对语言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对状态进行测量和操作的目的是要研究人这个主体,即所谓“由此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主宰”^③,对语言来说,研究语境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研究人之语言本身。此其一。但是,对象状态总要落实在对象自身。可以这么说,一方面是语境,一方面是语言,当语境落实在语言本身之后,语言会遮蔽语境,也可以说语境抽身而退,以语言为其社会本性的人,还有语言自身,又别具一格地再次在语境被遮蔽之后凸显为对象物。在这种情况下,人成了对象物语言和对象状态语境的中心,人成了唯一的主体。语言固然成了对象物,但它与人不可分离。如前所说,对象物只有处于对象状态下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这当然可以用来论证语境的必要性,但在人这个主体面前,语言也好,语境也好,都变成了图像,都变成了设置在人这个根本性主体面前的有结构的统一体。要是在人和语言这个双重主体面前,则语境是图像,是有结构的统一体。此其二。以上两条,决非说可以用语言研究来消解语境,而是说,语言和语境都是受人制约的结构体,或者说语境是

① 见罗宾斯著,许德宝等译《简明语言学史》,第239页。

② 参见李章印《科学的本质与追思》,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③ 参见李章印《科学的本质与追思》。

受人和语言制约的结构体。十分重要的是,语境和语言一样,都是统一结构体,都在结构关系中得到研究。在这里,弗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摆脱了经验论,而返回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不过,结构论,机械论,本质上还都是与经验论有关的,功能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一样,都没有进入生成论和信息论。以上是从思维逻辑来看待弗斯的理论内核的。下面从语言理论本身来考察弗斯的学说。罗宾斯说,因为弗斯没有写过理论语言学的书,有些问题只能根据他的学生韩礼德的介绍和阐述来考察。^①

其一,从韩礼德绘制的既属于韩,又属于弗的描写语言学系统图看,正如罗宾斯所说:“弗斯把语境看作理解语义的途径,把音位系统看作联系语法和语音的途径。”^②

语 音		语 言 学		情境 语言外特征
实体	(…)	形式	(…)	
语音实体	音位系统	语法(封闭系统)	语境	
文字实体	文字系统	词汇(封闭系统)		

其二,正如我们前面作逻辑分析时说到的那样,弗斯会返回到索绪尔的。刘润清在评介弗斯的学说时说:“在索绪尔的影响下,他认为语言包括‘系统’和‘结构’两个要素。结构是语言成分的组合性排列,而系统则是一组聚合单位,这些单位能在结构的一个位置上互相替代。因此,结构是横向的,系统是纵向的。”^③可以说,弗斯横向结构和纵向系统,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的横向句段关系和纵向联想关系,乃至横向共时研究和纵向历时研究,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索绪尔在同一结构系统内说横向和纵向,而弗斯在整个语言中说系统和结构的

① 见罗宾斯著,许德宝等译《简明语言学史》,第234页。

② 见罗宾斯著,许德宝等译《简明语言学史》,第239页。图表亦见该页。

③ 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285页。

关系。仅是参照系的不同,并无实质上的不同。

其三,弗斯不同意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这可是件大事。前面我们说到弗斯深受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影响,故青睐语境,同时又经逻辑分析指出其语言、语境在人这个主体面前有结构统一体,故又折向索绪尔。我们似乎找不到弗斯否认语言和言语区分的理据。应该说这么说,承认结构统一体,承认语言结构,不等于承认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倒是在人,包括语言作为主体,得以展现语境结构体时,言语已成为“人·语言”主体的一部分,再则,“语境结构体”是人使用语言的抽象模型,其中已有言语抽象,弗斯说:“我们用‘语言’泛指许多个人的话语或是社会生活中无数的话语事件。”^①彰显语境具体,就不必言语;而“语境结构体”抽象与言语抽象是同一的。在弗斯那里,言语进入了一定语境下的语言系统。弗斯说:“由于教养的结果,学会了传统的系统或说话的习惯,社会活动使这种系统或习惯保持下来。就是说,语言是系统的。”^②这么说,在弗斯那里就没有言语的位置,甚至可以说,弗斯在一定语境下谈论语言,这一“语言”已经包括了言语,故没有必要区分语言和言语,而不是拒绝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事实正是如此,弗斯把“语言”看作“许多个人的话语”,看作“社会生活中无数的话语事件”,这不仅在逻辑分析意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在贴近语言表达和语言研究的实际,已明确“语言”包括言语。

其四,主张语言研究与社会研究相结合。从重视语境走向与社会研究的结合,是必然的。重要的是,弗斯如何把研究语言的运用环境与研究语言结合起来。一是把语言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二是在前面提到的语言和语境的“统一结构”关系问题上,恰恰认为人类经历的形式决定语言意义的形式,从而把语言研究的目的确定是分析语言中有意义的成分,以便建立起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之间

①② 参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286页。

的对应关系。三是语言研究的方法是分析语言活动的组成成分,说明那些语言活动的组成成分在各个层次上的关系,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语言活动的一系列关系分析中,语言分析被看作包含其中,被看作与语言活动不可分离,所有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篇章的内外关系分析上;最后把语言活动组成及关系的分析与所在环境的人类活动联系起来,指出它们的内在关系。弗斯的逻辑是:语言活动组成成分研究,即包含语言的统一结构关系研究→相关活动环境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和马林诺夫斯基相比,方法上的第二关节更宽,不仅有上下文,而且有人文环境。为防止第二关节过宽而不好把握,弗斯提出了“典型语言环境”加以节制,而确定“典型语言环境”的依据是社会角色。

其五,具体分析“典型语言环境”的要点。除了篇章内的结构成分的组合分析和词汇关系的聚合分析以外,还有篇章与环境间的关系分析。整个分析过程在四个层次上进行:一是语音层,二是词汇词义层,三是语法层,四是语言环境层。^①

弗斯和布龙菲尔德(1887—1949)是同时代的人。有的学者将他们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他们的异同。^②看来他们间的各自的传承不同,弗斯秉承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直接受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并光大之,尤其在语言本体问题上,完全用经验的眼光审视之,直到在逻辑上语言和语境密切相关之后,才以结构的眼光看待语言和语境;而布龙氏更多地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一开始就以结构主义的眼光看待语言。一主功能主义,一主描写语言学,显然有太多的不同。功能重在语义的功能,并首创和专注于多系统的韵律分析,力图将语音学和语法学结合起来;描写重在语法的描写。

① 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289、290页。

② 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290页。

三、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学说,一是在弗斯“典型语言环境”的基础上发展了语境说(context of situation,或译作情景说),并在弗斯由语境而社会的基础上发展成社会符号学;一是在弗斯语境结构关系,实际上是语言、语境统一结构关系的基础上,将“统一结构关系”说发展成“系统语言学”说,提出了统一“系统”中的一系列范畴,从而将弗斯的情景化为范畴。韩礼德的道路是从学生到学者的书斋道路。值得一提的是,他受过罗常培的指导(1947—1949),也受过王力的指导(1949—1950)。后回英国在弗斯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而选题却是汉学研究,题为《〈元朝秘史〉汉译本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1955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韩礼德的系统语言学比弗斯的“统一结构关系”更进一步,就语言本身而言,主张研究语言的性质、语言过程和语言的共同点。韩礼德的理论被称为“新弗斯语言学”,就毫不奇怪了。在语言本体 and 语言应用这个天平上,首先是前者。但在语言本体的内涵上较索绪尔有所拓展,不仅回答了“是什么”的性质,而且回答“怎么样”的过程,“是什么”和“怎么样”兼而有之的若干共同点的说明。具体地说,韩礼德提出了七个直接针对语言的基本要素,即三个阶和四个范畴,被称为“阶和范畴语法”。一般认为,“阶和范畴语法”是吸纳弗斯“结构”和“系统”的表现。一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韩礼德提出了语法的选择性问题,并认为恰恰就是这个选择性才构成语法的最重要的性质。他把语法看作是由一套非常复杂、微妙的选择系统组成的。选择系统的构成有些是有先后的线形排列,有些是同时出现的。在使用它时,也就是遣词造句或学习理解时,须在该选择系统内选择最佳方案。确切地说,该语法应称

作“选择系统语法”。语法为本体研究课题,选择则渗透应用原理。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会迫切地感到需要选择性语法供学生掌握,否则学生不易把握。

如前所说,韩礼德的研究首先是本体的,回答“是什么”的,他把他的“选择系统语法”叫作“选择网络”(networks),并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具备现在这样的“选择网络”形式,之所以能形成现在这样的“选择网络”形式,又是语言在长期演变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如此反复强调“选择”,似乎与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故国学人有关。“选择网络”既已是本体存在的形式,使用它有何准则?韩礼德认为,使用者可以根据一般的人类生活以及各自独特的文化要求来加以运用。韩礼德的这一做法,从研究对象语言的实际状况出发,强调语言形式是一“统一结构体”,由语言形式之“是”或语言事实判断导出实际应用之“应该”,这分明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法如果是光运用于外部世界,曾被称为“休谟法则”。现在被改用于语言,如同我们透析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时所看到的那样,显然也看到了英国古老的经验论传统的影响。韩礼德同弗斯一样,也把自己的理论与马氏的人类学联系在一起,进而声称他的语言学就是要解决“语言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从逻辑上看,“语言为什么”是与“语言是什么”最近的,能直接为本体研究“是什么”服务。以上重在分析韩礼德学说的本体意义和逻辑起点,下面具体讨论其理论要点。

一是韩礼德的阶和范畴语法。1956年发表的《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代表他的理论研究的开始。文中提出语言的三个语法范畴:单位(unit)、成分(element)和类别(class),由单位和成分构成的系统则服从于类别。文中除了用汉语的例子解释三者及其关系以外,还讨论汉语小句“旧”(given)信息和“新”(new)信息的区别,以及“系统”选择中的或然性(probabilistic)问题。这为他的功能理论“选择系统”理论奠定

了基础。^①1961年发表的《语法理论的范畴》是一篇代表性的论文。前面提到的三个阶和四个范畴在该文中得到具体阐述,整个思路是由语言材料抽象出范畴,由范畴构建体系。引人注意的是该文所作出的一系列新的推进:由材料而范畴需经过一个中介“阶”(scales),“阶”包括“级(rank)、说明(exponence)、精密度(delicacy)”,这显然是讲如何从语言材料抽象出范畴的方法;而对语言材料本身的处理,也是对三阶中的第二阶的深化,被认为在不同的“层次”上对语言材料作“说明”,最根本的层次包括形式、实体、语境;十分重要的是,三大基本层次看出韩礼德对索绪尔形式化的继承和发展:实体是声音表现形式或书面表达的形式,形式是将实体排列成有内容意义的格局,语境是把语言形式与使用场合联系起来的描写对象和中间层次(关系形式);将意义形式化,区分“形式意义”和“语境意义”,前者指有关项目与其他项目在形式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后者指一个语言项目与非语篇特征之间的关系^②;与1956年相比,语法范畴由三个变成了四个,即由“单位、成分、类别”变成了单位、结构、类别、系统,这是把“三个”放到弗斯“横向结构、纵向系统”说中的必然结果,因为将语言线性的横向成分作纵向考察,必然会将“成分”变成“结构”,由“结构”形成“系统”,此处由三变四,我们看到了弗斯乃至索绪尔对韩礼德的魅力。

二是韩礼德的系统语法。1966年发表《“深层”语法札记》,将1961年仅为一个语法范畴的“系统”,“单一集”的“系统”发展成系统网络,将1961年的阶范畴语法发展成系统语法。发展的机制是1961年三个“阶”中的第三个阶“精密度”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选择语法思想起了作用。前面已提到“选择网络”,选择已与网络联系在一起。选择意味着发展,意味着重组和联系。选择的标尺是“精密度”,1961年的

① 参见黄国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述评》,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参见黄国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述评》。

“精密度”本来就表示范畴的区别和细化,还可以表示单一系统内的依赖关系。经过“选择”而形成的两个或多个系统网路,可以并存无关,也可相互关联,从而有了充分体现“选择”的韩礼德术语“合取”(both...and...choice)和“析取”(either...or...choice)。1966 年文章还区分语言结构的表层面和深层面。表层面是指横向组合成员间的“序列”关系,深层面是指纵向的,但常常需要从纵向加以考察而得的特定单位中的结构成分间的“顺序”关系。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抽象。1966 年后,韩礼德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系统语法,主要表现在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依存关系,包容关系,并列关系,平行关系,交叉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系统在运动和发展中的共存关系和交互影响的关系,都得到确认和不同程度的说明。从此,语言的系统网络研究几乎成了语言研究的全部和代名词。

三是韩礼德的功能语法。1968 年的论文《关注英语使用中的过渡和主题》进一步强调功能的重要性,其立足点是,功能应该能解释语言的内部结构。于是,功能在语言的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系统内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功能与网络系统紧密结合起来,整个思路就是研发功能在网络中的表现形态。这些表现系统被分成四种:经验的(经验功能)、逻辑的(逻辑功能)、话语的(话语功能)、人际的(人际功能)。既然韩礼德把语言理解为交际工具本身以及使用这种工具的过程,将功能植入系统网络是完全能做得到的。对英国功能派来说,经验始终是起点,不管它是名义上的,还是事实上的,应该说,这还是诚实地作为研究对象上的。后面三种,都在语言“界”内。到了 1970 年论文《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则把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合在一起,统称为概念功能,并作为概念功能的两个组成部分;把话语功能改成“语篇”(textual)功能,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也称为言语功能(speech-functional)。三大功能后来又被称为“纯理功能”。“纯理功能”的提法体现了研究中的形式化。非常明显,这不是个简单的名称改变问题,而是体现韩礼德用

数字化、形式化性质的系统网络改造原本带有经验性功能的指导思想。有的研究者指出,韩礼德的概念功能主要涉及物性、语态和作格性(ergativity),人际功能主要涉及交际者的“角色”,言语功能,语气(mood),情态(modality),语调(key),语篇功能主要涉及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信息结构和衔接手段(cohesion)。^①如此看来,“纯理功能”中的三大功能无不在语言之内,即使涉及物性、角色,也与语言保持着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从韩礼德的理论模式看,他的功能语言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是形式系统语言学,它满足了结构形式系统和实践应用功能两个方面的要求,它受到学术界普遍欢迎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上述 80 年代以前奠定的形式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还是以现代主义“形式服从功能”为骨架,80 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韩礼德的功能主义作出新的调整是题中应有之义。“后现代”一词最早也是由英国的建筑理论家詹克斯提出的,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语言信息研究及其应用显得更加重要。在学术背景上,适应于现代主义的西方逻辑实证主义逐步让位于后现代的逻辑形式主义。形式化和信息化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两大特征。1985 年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1985, 1994)的问世,其内容的调整和理论上的成熟几乎是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同步进行的。一般认为,1985 年的《导论》是阐述功能理论部分的功能的,1995 年马蒂森的《词典语法图景:英语系统》是阐述功能理论部分的系统的。1999 年韩、马二人合著巨著《通过意义解释的体验:认知的语言分析》,通常认为该书代表韩礼德的最新理论创获。三部著作的理论走向以语言符号为认知的中介,尤其是 1999 年巨著最为明显。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一切认知以符号为中介”。“意义解释的体验”不是意义,而是语义的潜势,语义的表征和符号。后现代哲学使哲学的终极性基础,亦即使认识主客观对象的途径和方法

① 黄国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 40 年发展述评》。

得到根本的转换(转换成符号),是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即所谓“语言学转向”,我们不妨说,韩礼德 80 年代后对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推进,是以符号中介论为其深层理论背景的,或者说与“语言学转向”是一致的。仅以对语境的新诠为例:基于对语言的相对性思想的极度重视,韩礼德把话语范围(field)、话语基调(tenor)和话语方式(mode)作为形成语境的三要素。三要素决定交际内容、交际方式、交际内容和方式的预测表征和依据、交际对象能否成功交际的选择进路,等等。可谓无一不贴近“以符号为认知中介”。有的学者认为,“韩礼德的语境三要素决定理论的优势在于它以更抽象、更具理性的方式解释了人类的交际行为模式”^①,是颇中肯的。

主要参考文献

常晨光等《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英]M. A. K. 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胡壮麟导读,《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黄国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 40 年发展述评》,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1 期。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年版。

[英]R. H. 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① 严世清等《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2 期。

认知语言学说略^①

一、认知、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

现在通常说的“认知语言学”，最早的说法应该是“神经认知语言学”(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它是美国语言学家悉尼·兰姆(Sydney Lamb)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立的。^②顾名思义，它与脑神经、脑科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关系极大。到 70 年代中期，时任加州大学教授的 Ronald W. Langacker 致力于创建“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最初称为“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到 1987 年和 1991 年，《认知语法基础》的第一卷(理论前提)和第二卷(描写应用)相继问世，他的认知语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③cognitive 一词，通常译为“认识”，但这是不确切的，“认识”与 recognize、science 相近，而 cognitive 与 aware(意识到的、知道的)、knowing 相近。笛卡儿主张区分认知和认识，认知包含许多粗浅的，不确定的东西，而认识则应当是科学的(science)、理性的(rational)。如此看来，兰姆的 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 和 R. W. Langacker 的 cognitive grammar 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两者基本一致，一致在认知(cognitive/cognition)，而非转入认识(scientific/science)。一致在同为认知心理学所左右。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 不必说，而 cognitive linguistics 也与心理语言学不可割舍。更明确地说，认知就是心理加工信息的过程。

① 本文原载李开等编著《理论语言学哲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参见程琪龙编著《认知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沈家煊《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载《国外语言学》1994 年第 1 期。

据有关权威词典的说法,“认知语言学即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also cognitive psychology),它和四五十年代盛极一时的行为主义看法不同,认为行为只在认知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由大脑发出指令的行为有助于认知的研究,但认知语言学的目标不是研究行为,而是通过分析人类思维、信息贮存、信息理解和语言的生成,来研究认知结构 and 精神结构。^①

认知语言学的科学基础是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但前者不是从后者生长出来的,认知科学也是出现在 70 年代中期,两者几乎是同时形成的。前述认知语言学就是要分析思维,分析大脑信息库,如何分析?历来分析思维有把思维视作脑分子的运动的,如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概括的那样;^②有把思维视作结构式的,如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在涉及思维问题时所作的那样。认知语言学分析思维,则视大脑为连接计算机的网络来分析大脑信息库,如将此独立出来作进一步的一般抽象研究,就成了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思维本质。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 1932—)1996 年曾说:“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精神是:人类进行信息加工。”^③认知科学汇集了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人工智能使计算机模拟人脑,认知科学则将人脑视为计算机信息加工系统,试图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理解人的认知系统。

二、认知心理学和由心理活动组成的发生认识论 是认知语言学的一般解释原理

认知科学不是一个单独的哲学思潮,它涉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

①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外研社 2000 年版,第 80 页。

② 参见《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26 页。

③ 参见《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3 页。

计算机科学等诸多方面。塞尔曾对认知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或作为科学逻辑方法来指导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研究的“认知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故而他从根本上否定有认知哲学、一般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等的存在,而把“认知语言学”仅仅看作信息加工,充其量也只是在信息处理系统的层次上去描述大脑的特性,记录大脑的处理过程。塞尔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它阻止我们如同寻找哲学一般来研究索绪尔,来以并不存在的“认知主义”研究认知语言学。但西方把认知语言学说成即认知心理学的做法启示我们,用作为具体门类科学的认知心理学及其相关的学说,如“发生认识论”(这就是最割切的认知论),来帮助理解认知语言学的若干做法,甚至解释认知语言学的一般原理,该是有益的。

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的现代形态。从中世纪的神灵启示下的个人心理学,到德国启蒙时期的冯特(1832—1920)的实验心理学,到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学术背景的华生(1878—1958)行为主义心理学,到德国的韦特海默尔(1880—1944)格式塔心理学,到皮亚杰(1896—1980)认知心理学,记录了人类心理反思的历程,心理活动,本质上是脑思维活动,故亦是记录了人类对自身的脑思维的反思过程,亦即人类认知史的过程。皮亚杰认知心理学的代表作是《发生认识论原理》,是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的结集,1970年被译成英文本在该大学出版,1972年伦敦也出了该书的英文版,发生认识论得以广为传播。美国版的认知语法的草创和深入研究,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美国的传播是同步的。不用说,在讲演前,皮亚杰对发生认识论早有研究。50年代就已初步建立起该学说,原称为“发生科学认识论”,1950年在欧洲出版《发生科学认识论导论》三卷本,1968年在法国出版的《结构主义》,都是“发生认识论原理”的组成部分。之所以称为“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原因恐怕有两个,一是这种认识论不是某一门类科学的科学逻辑,而是可看作一般科学逻辑的,如说“认识的心理发

生”，“认识的生物发生”，但它“有别于哲学上的本体论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一词即此意)；二是作为它所具备的，无可否认的一般科学逻辑的相关认识，它是认知的，非本体认识的。“发生认识论”谓之“一般科学逻辑认识论”可也。不可本体化，哲学化，认识化，物质化或理念化，宁肯具体化，科学化，认知化，信息化。

发生认识论不同于一般认识论，它注重认识的过程，而过程是由心理活动组成的，后者只注重认识结果。这样，认识的过程就与语言的产生同步，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把语言的本质看作是心理的产物，或是个人心理(德国青年语法学派)，或是民族心理(洪堡特)，或是社会集体心理(索绪尔)，认知语言学当然也不例外，它把语言归结为认知心理，如前所说，“认知语言学即认知心理学”。

发生认识论视认识发生的起点在于有机体个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外部环境的交换，“心理的发生只有在它的机体根源被揭露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这里的有机体实际上已是认识主体，外部环境是认识客体。皮亚杰从遗传学的角度批评拉马克的“经验主义”，“主要缺乏的是关于变异和重新组合的内在能力的概念，以及关于自我调节的主动能力的概念”。批评行为主义心理学“坚持了最严格的拉马克学说的精神”，皮亚杰要把 $S \rightarrow R$ 改成 SR 或 $S(A)R$ ，以表示“刺激向某个反映格局的同化”。^①虽然这里“变异、重组、自我调节”主语是“某个生物个体”，“同化”的主语是某刺激物，但强调的是“内在能力”、“主动能力”、“向某个反映格局的同化”，论证实际内容是：人的认知根源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发挥。皮亚杰是从有机体、生物遗传入手揭示认知根源的。

如前所说，发生认识论重在认识过程，而非认识结果。皮亚杰在专论“认识的心理发生”时，将“发生认识论”定位于“心理发生学”，强调认识的主体性，有以下认识“公设”：“在所有认识水平上，都存在着一个在

①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钊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8、60、61页。

不同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能力(即使这些能力被归结为只是对客体的知觉)的主体;存在着对主体而言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即使这些客体被归结为“现象”)。”“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①进而将认知过程,即主客体的作用划分为五个阶段:前运演思维阶段的第一水平,特征:主客体不分之过渡,无概念之过渡,无语言之过渡,刺激同化作用明显,一到四岁;前运演阶段的第二水平,特征:前概念、前关系的更高平面上出现,能作出有效的量的规定,不会推理,五到六岁;具体运演阶段的第一水平,特征:序列化,开始分类,懂得归类和关系的传递性,空间发展观念的形成,“群集”结构的形成及对其本质的认识,七到八岁;具体运演阶段的第一水平,特征:建构三维空间坐标,认识因果关系,但有欠缺,九到十岁;形式运演,特征:超时间性,纯数学逻辑关系,提出和处理假设,经验被主体同化,主体的内化,十一到十二岁。以上有关认识的主体性、形式运演、经验的同化、主体的内化,最有价值。认知的五个阶段与人的语言的完善和进步是同步的,它应当成为语言研究的参照和方法借鉴。

发生认识论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古典认识论”,实际上只是认识方法的检讨。“逻辑的认识论”,重形式化,从发生学看,形式化是“思维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反身抽象过程的一种扩展”。“数学的认识论”,从发生学看,要对它赋予较数学更强的结构化。“物理学的认识论”,客观性需要逐步接近而最后达到。“建构主义”新认识论,从发生学看,生物在建构要反对在“创新”与“预成”之间作选择。提出“历史—心理发生上的建构”中的新结构。^②以上认识方法学史的评判,对语言学研究的促进在于以史为鉴,走向新的发生学方法。而对建构主义有特别的青睐,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是探讨此题的续作。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1页。

②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72、79、93、96、104页。

三、认知结构、认知心理结构和认知语言结构

皮亚杰的《结构主义》重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结构反思是很明显的。但如果说《发生认识论原理》是一般认知说,《结构主义》(1968)就是认知模型和逻辑方法,故仍注重方法的一般性,涉及数学结构、物理学结构,最后推出结构一般,讲述结构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以及方法论层面上的结构一般:结构主义和哲学。

皮亚杰认为,最早的结构主义不属于语言学和心理学,而是数学。文化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也是直接从普通代数学引出他的结构模式。数学中最早的结构又是数群,如正负整数群,是由许多正负整数构成的集合体、整体。如在它内部可按组合规律进行加法运算得出相关结论,“得出相关结论”就意味着按一定的转换规律(这里即加法运算法则)从等式的左边转换到等式的右边,凡合乎转换规则的运算,都体现理性主义三原则:矛盾律、同一律、目的不因手段而改变。任何对象的研究都可以按一定的数学模型来研究,即形式化研究、控制论模式研究。数学群的基本点的说明几乎包括了结构主义的全部。还有,很重要,基本运算式,乃至任何合规则的运算式,所体现的合规律的认识,从人类幼年时代就开始获得而渐趋完善,这正是发生认识论之所在。

关于逻辑结构,当然是纯形式的,也符合理性三原则,但皮亚杰认为:逻辑不是像以往认为的是全部数学的来源,而只是一种布尔代数学(boolean algebra,研究逻辑学的一种数学方法,英国布尔 1841 年提出),可从自然思想的发展中追溯心理上的起源。这显然是从立足于认识过程的认知心理学看待最严格的逻辑问题。

关于物理结构,从经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都有结构存在。发人深省的问题是,物理因果关系与运算结构密切关联是何原因?如果前

者是人为设计的,这好理解,如果前者完全是客观的,就不好理解了。以心理过程为宗旨的发生认识论的回答是:人在观察或参与物理现象,发现因果关系时,同时发现了原始结构,这就成了运算结构的出发点,等到运算的普遍形式结构形成时,物理转换规律就脱离了时间性。这就造成了“物理的现实和用来描写这种现实的数学工具之间具有永恒的一致”。从另一角度检测这段话,美国数学家库朗(1888—1972)曾说:“经验证据终究不可能确认数学上的存在性——惟有数学的存在性证明才能保证对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把这里的“数学的存在性证明”换成“发生认识论的结构证明”,就活脱脱地成了皮亚杰精神。当然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数学证明同样是发生认识论、认知论的一部分,或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关于心理学结构主义,主客体之间的转换和相符,从基因团起就有刺激和同化而形成的运演过程逐步产生心理结构,是两条重要原理。皮亚杰认为,1912年问世、1921年得以完善的“格式塔”心理学,只是物理场模型,没有历史、发生过程、功能、主体性,总之,不符合上述两项原理,应予否定。按上述两条原理,认知结构的建立是个永恒过程,永不脱离主体活动,在运演中从个别主体结构逐步发展到“认识论上的主体”的水平,逐步形成“一个功能作用的中心”,达到“主体性”的“功能中心”的最高企望“人工智能模式”。同是心理学,一边是格式塔,一边是人工智能模式,分野在此。后来发展起来的认知功能语言学,认知计算语言学,理论渊源在此。

关于语言学结构主义,索绪尔讲了语言的结构对立关系、自主性、符号权宜性,贡献大,但拘于描述、静止,充其量是个体发生语言学。从哈里斯到乔姆斯基,对句法结构作发生学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转换,把生成看作主体思维中的同化。在研究方法上与前人的经验积累法不同,而建立起一套融心理学、普通语言学、数理形式化为一体的结构程序,是巨大的进步,但取用笛卡儿“天赋观念”来解释处于遗传中的语言

先天图景(即语言习得装置 LAD),是“非常笨拙的”。那下面该怎么办?“语言是从部分地有了结构的智力中产生的,而言语也会反过来构成智慧,于是真正的问题从这里开始了”,具体地说,第一,对语言作转换分析,“可以在心理语言学中研究句法”;第二,对语言作运算分析,“可以对逻辑结构的学习进行实验”;此外,第三,综合结构图景形式,“在某些特定的点上,我们已经有可能对上述两类结构关系之间的几种相互关系加以分析,而且还能察觉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在语言结构或逻辑结构之中哪一些似乎导致了别的结构的构成”。^①这正是皮亚杰给出的认知语言研究蓝图。再往下深入,那就要作更具体的门类科学细化研究。

四、普通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的门类学科有好几个,但都离不开“认知语言学一般”。这个“一般”,如上述“发生认识论及其认知心理结构主义”,是超越于该学科之上的一般指导原理。置身于认知语言学之内的内在一般,即普通认知语言学,内容亦是丰富的。大体有:

有关语言信息系统的论述。就一般原理而言,物质、能量、信息三者都是客观世界自身的构成。日本人甚至认为“信息成为比物质或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从物质走进世界,从文艺复兴算起,至少已有四百年;从能量走进世界,从 19 世纪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和科学阐述算起,还不到二百年;从信息走向世界,从语言信息走向语言世界,要是从美国科学家申农(C. E. Shannon)1948 年正式提出信息论算起,只有 60 年,最近 20 年内才获得飞速发展。信息主要是由语言构成的,还有其他符号信息。语言信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涉及现代科学的三论:信息

① 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66 页。

论、系统论、控制论,涉及现代科学的许多门类科学,而更多地置于语言科学之内。认知语言学把语言信息研究看作自己的直接组成部分,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从有针对性的论域说,普通认知语言学要讲语言信息的传递,信息的编码和解码:概念信息源(以语音或文字方式)经大脑编码—听取者信息道(听觉语音或视觉文字)—经大脑编码,概念信息宿(又称信息受者,以语音或文字方式)。^①编码和解码如此重要,且都由语言文字来完成,以至于徐通锵提出了语言的编码职能,成为语言除交际职能、思维职能以外的第三大职能。^②

语言信息内部要区分两种信息,一是概念信息,如词,词组,句子,一是表达信息,它通过语音,构词法,语法来体现,概念信息和表达信息之间的关系是体现关系。^③

这些,都可以举汉语或外语中的例证来说明,比较简单。如果在另外的参照点上看问题,就复杂了。在言语功能背景上看,概念必须表达,两种信息缺一不可;在思维中,概念信息必备,是否一定形成表达信息,可以研究;在计算机使用中,两种信息的存现情况依使用目的而定。区分两种信息,意味着把语言信息化,视语言为信息,以便于作语言信息处理。

两种内部语言信息都具备寄载性,载体是大脑,神经网络对语言信息的处理成了研究的一大项。外部语言的载体是物质语音和文字,作为信息载体的语音和文字的对象研究,应有信息论的特点。

语言信息具有传递性,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传递是接续的。外部传递的媒介物有振动的空气,文字版面,还有光纤、金属导线。通讯线路,包括通讯卫星。内部传递的媒介物则有大脑神经网络。内部传递是神经元网络的激活并传导脑脉冲。语言信息的传递决定语言信

① 参见程琪龙《认知语言学概论》,第18、20页。

② 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③ 参见程琪龙《认知语言学概论》,第20页。

息的共享。

内部语言具有系统性。系统论与信息论密不可分。1978年贝塔朗菲曾用亚里士多德悖论来说系统的整体性：“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①1987年贝塔朗菲阐发生命系统时，提出的是系统的整体观和动态观均与神经系统相关，悖论之所以适用，就是因为神经系统的作用。二者又是与脑神经密不可分。钱学森则把系统论和控制论都看作信息科学，而信息科学包含在思维科学之内。^②内部语言信息系统与脑神经网络，与思维密不可分是题中应有之义。

语言信息系统的自调性。语言信息系统是一个大的结构系统，皮亚杰的结构自调功能体现在语言信息系统（结构）内，就是语言信息系统的自调性。维纳的控制论把信息过程看作控制过程，控制就意味着从外部对输入和输出进行支配，或设计出从内部直接对输入和输出进行支配，支配就意味着调节，内部直接支配就是自调。事实上，“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负反馈的行为。”机械运动需要控制不必说，生物控制亦然，信息系统的控制同样需要“负反馈”，这样才能完成从信息输入到信息输出的全过程。学外语就是个自调过程。输进一个单词的音和义，经强记（支配、控制），记住这个单词了（输出，相对于正输入的负反馈）。这就完成了第一个控制过程，下次在某语境下又遇到这个单词，必须实现第二个控制过程，有第二次输出。从第一控制过程到第二控制过程，从第一次输出到第二次输出，完全是由大脑贮存后的某单词的信息系统的自调来完成的，可见记忆就是自调节，没有自调节就没有记忆，自调节能力差，就意味着记忆力差。临摹书法从面临到背临，也是经自调节来完成的。推而广之，任何学习活动都需要大脑的自调节作用才能实施。大脑的自调节作用，直接意味着信息自调与神经

① 参见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7页。

② 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0页。

认知语言学的很近的通路。

大脑和语言认知,是器官和器官作用的关系,除脑科学的大脑宏观功能区结构、微观神经网络的一般介绍以外,普通认知语言学主要讲大脑对语言信息的产出功能,或称加工机制,可分大脑的语言生成机制、大脑的语言理解机制。在现阶段,大脑的两种语言机制的形成过程、操作过程尚难作微观研究,主要通过失语症的研究来显现,此外,“借助一些无尽性成像手段来观察大脑中的语言认知活动。其中,应用 ERP 和 fMRI 方法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①但不可忽视的是,语言自身的结构分析和认知研究可弥补“尚难作微观研究”的缺憾。从另一角度看,今天脑科学的研究还处在经语言研究而加以揭示的时代,而语言研究揭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

语言研究中的认知取向是重要内容。认知取向的重心在内化语言的心智结构和心理过程,此项研究的困难同上。可喜的是,近年来汉语研究者从汉语的外部表达语言的词汇、语法研究入手,或对汉语的外部表达语言作认知、计算机、心理功能等新项目、新方法的研究,来尝试揭示汉语内化的心智、心理。例如,袁毓林“倡导一种注重可计算性的认知主义,摸索一种基于认知并面向计算的语言研究的途径”。^②彭聃龄则认为“汉字知觉的基本单元、语音在汉语词汇通达中的作用、汉语心理词典的结构、句法分析与语义分析在汉语句子理解中的作用、语境与歧义句的理解、跨语言认知研究的意义等”,都是汉语认知研究。^③ 外部语言研究是认知研究的对象和切入,不唯内部语言之心智,连神经语言学也常常以外部语言研究为切入,这是对语言资源的新理念支配下的新的开发。

① 袁毓林《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0 页。参见罗跃嘉《认知神经科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0 页。

② 袁毓林《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第 2 页。

③ 彭聃龄《汉语认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前言》第 2 页。

五、认知心理语言学

前面讲了认知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可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般指导,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按西方的说法,甚至认知心理学即认知语言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受社会集体心理支配的,和认知心理紧密结合的语言学即认知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一大门类学科,它和普通认知语言学平行。

该学科要阐述语言的认知心理基础。言语交际是从说话者到听话者的传递过程,传递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是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说话人的编码和听话人的解码都要作认知处理,认知就是人的心理,或者说人脑加工信息。例如:①说:(沉思地)奥运会场馆鸟巢回应了中华有巢氏的灵性。这句话的编码要懂得语音、词汇、语法、传统文化、当下语境、表达者自身的心理情感倾向等,内心懂得,经心理认知而作内部语言的编码,认知处理。②发出信号,传递信号。以语音、文字材料或电讯器材为媒介。③听: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意味深长,回味无穷,甚至得到某种启示、感悟而感奋起来,化作某种动力。听话人的解码,同样需要懂得语音、词汇、语法、传统文化当下语境、表达者自身的心理情感倾向等,还需要听者的心理回应,认知处理。④总称①至③为语言产生过程的模式或语言传递。由以上可见,①和③都饱含认知处理,它人在人脑中形成内部语言,由语言分析认知之。人脑内部如何进行,今尚难获知,但今在心理层面上可知,也是通过语言认知而获知的。①

该学科要探讨心理即人脑对语言信息的加工。而今计算机对人脑信息的加工越来越广泛,精密,计算机使用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故本学科与计算机语言信息加工的链接催生出人工智能,与

① 参见桂诗春《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计算机其他使用范围的链接催生出认知医学心理学、认知社会心理学、认知经济决策思维等。袁毓林曾说,该学科与计算机和语言学的配合,“演出了一幕幕揭示人脑处理信息的机制并实现计算机模拟的精彩剧目”。^①总之,本学科因计算机而有了许多新的生长点。

本学科要说明语言认知与其神经基础的关系。以往的语言研究,“还不是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语言理解和产生过程中,人类的大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②对大脑要从不同的角度作研究,如神经医学、神经生理、神经病理、神经心理、神经语言等,都是尖端研究。神经语言学更贴近脑科学,而本学科讲语言与大脑(不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主要说明加工语言信息的神经元细胞的功能,言语中枢,视觉细胞的神经编码等。诚然,根据功能来定位的言语中枢布罗克区(Broca's area),维尔尼克区(Wernicke's area)对本学科有重要意义,但本学科的特质是:大脑中的语言编码的心理过程。当我们说“大脑皮质的左额叶布罗克区管语言”,是神经语言学;说“思维规则是形式逻辑”,是逻辑学也是思维科学;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也是思维的内在踪迹”,是思维科学也是语言学;说“大脑功能,思维机制是对语言信息加工、编码”,是本学科内容。

本学科关及经感觉、知觉而获得知识的认知过程。从认识论上讲,知识的获得须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作为知识信息加工的认知,多限于感觉、知觉获得知识。但心理学上的感觉、知觉获知过程,从属于认识论上的两个认识阶段获知结果。获知中的视觉记忆和听觉记忆,都是可由心理学实验加以复制和验证的,经过专心注意的获知是一信息加工过程,记忆的过程是由外部语言传入内部语言的传导和贮存过程。由于加工、传导、贮存是分类进行的,分类意味着选择,大脑怎

① 袁毓林《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第24页。

② 参见罗跃嘉《认知神经科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么会选择的呢？这是知觉理论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由外部语言分析来回答，而是由心理表象的识别、模块特质分析来完成。实验表明，分门别类的型式识别是由模块匹配来完成的。^①因为知识的原型都是些图形，中国古代的具象思维正是从图形、象出发来认知，故信息识别是多途的，格式塔识别、情景识别、网络型识别应图形、具象而生。以知觉为基础形成的知识表征是图形、象、线条、线性排列等，以意义为基础形成的知识表征是语言、命题、表达性例式。对两种不同的知识表征的习得和提取的方式不一，前者多用记忆和多次陈述，后者多用概念摄取和一次性程序学习而得。

六、认知语用学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要点中除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组合和聚合关系以外，还有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号，所指是概念，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的。语言研究就是研究能指符号自身的结构、语义、共时状况、组合等。语用研究则研究语言符号和使用者主体、使用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研究若干个语言符号后还是该符号，是结构的深化，是 $1+1+1+\cdots+1=1$ ，后者加入了使用之主，会产生能指义以外的意义，是 $1+1+1+\cdots+n\text{个}1=n+1$ ，犹言 $1+1=3$ ，这第二项“1”是主体、环境及对象的认知，内容极丰富。认知语言学对语符本体也强调认知，即所谓语言本身也是知识，它属于 Taylor(2002)所说的小写的 c，更强调非语言的认知，即大写的 C。^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学者就认为认知语言学是排斥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实际上“小写的 c”已是结构认知，认知语用正是属于后

① 参见桂诗春《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第 102—106 页。

② 参见张韧《功能解释与认知句法的根本目标》，载《现代外语》第 28 卷第 1 期，2005 年 2 月。

者“大写的 C”。

认知语用大写 C: 语言的外部意义。在认知语用学中, 语言的外部意义被放大为有语符本体价值的意义。这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已十分明显, 韩“把超音段特征、语气, 甚至言语行为等内容, 都进入了语言选择系统,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语言形式和实体的关系范围, 或者说进一步扩大了叶尔姆斯列夫和兰姆的语符关系”。^①叶尔姆斯列夫是结构语符论者, 兰姆是普通认知语言学学者, 按 Taylor 的说法, 都是要搞“小写的 c”的, 韩礼德的拓展, 正是“认知语用大写 C”。

探寻语言学史, 奥斯汀“表述句”与“施为句”对待中的言语行为理论, 即施为动词造成的大量言语行为, 是“大写 C 论”的理论基础。舍尔的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理论, 犹有话不直接说, 有 A、B 两个角色, A 不直接说, 由 B 推断, 推断有两种, 一是从字面直接推断(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 检测: 大体上原话与加个“请”字后的意思无别, 这一检测是经验标准。一是不能从字面直接推断(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 这时 B 如何推断出 A 的真正的含义, 舍尔提出“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如何推断真意”的十大法则。^②这十大法则是经验性的分析, 存在关系的分析。前者如“B 提供答话的命题内容”、“B 的应答须实施接受、拒绝、建议或有关的任何一种言语行为”, 后者如“因为准备考试和看电影要花时间”。语用和经验存在紧密相连。格莱斯的“说话含义说”把“说话人意义”(1957)区分为自然意义(无意图的)和非自然意义(有意图的); 他的“会话含义理论”(1975)又提出“交际合作原则”中的四个准则: 质准则(说真话)、量准则(不说废话)、关系准则(抓住要害)、方式准则(简明清晰)。^③格莱斯四原则很显然来自康德的四大范畴“质量、数量、关系、方式”。四原则不仅适合于交际, 也适合于翻

① 参见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7 页。

② 参见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 第 43 页。

③ 参见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 第 45、46 页。

译。以上理论的共同特点是：越出语言符号本体，进入语言的使用领域；有语言自身的产生，更有传递至听话者的过程；有使用相对于过去，有使用立足于当下；有从时间说使用，有从空间说使用。较之结构主义的本体分析，这里有更多的认知对象和认知流程。谓之“认知语用”则十分切当。

作为语用的认知对象，语境是一项。语境认知本质上是在场存在空间的认知，自然不是件小事。语言本体是先代知识的积累，本身就有时空要素，在使用中得到激活。例如当读到“名论卓然，可为千古龟鉴”一语时，不明白“龟鉴”一语何意，但凭“龟长寿”、“龟甲文字”、“龟行动迟缓稳妥不冒进”等既定知识印象，以为“龟鉴”为永久性衡鉴之意。其实“龟鉴”即“龟镜”，即“窥镜”，喻供人学习的榜样，或引以为戒的教训。和“龟”字的意义没有多少关系。应该说，联系“龟长寿”、“龟甲文字”等是错误的激活。当下存在的时空语境，可予作心理认知的内容从客体到认知者主体几称无数，西方制定出各种“知识草案”、“心理图式”、“社会心理表征图像”、语篇叙事结构、语篇情景功能范畴等，都是对认知语境中的主、客体范畴的描摹和说明，是深入到语境内部的方案。应予注意的是，认知语用学的语境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景语境有所不同，后者“指的是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immediate environment)”，通常指语场、语旨和语式。^①但在认知功能语言学中，这些说法又作了更为主体化的心灵认知的解释，从而使认知语用学与认知功能语言学出现了更多的重合。

作为语用的认知对象，语篇是一项。语篇其实也是一种语境，因涉及篇章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故以文字(欧洲)或口语(美国)为主而成语篇分析之；又因为还可在一定的语境下研究语篇形式，故语篇与语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语篇分析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评点派点评诗

① 参见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4 页。

文即是。最早提“篇章分析”术语的是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1952年他写了《篇章分析》一文,哈里斯的“篇章”说的是由句子连接成篇的语言体,他的 discourse(篇章)和 text(文本)互用。哈里斯的“篇章分析”主要通过分布和句法转换等手段来分解篇章,找出篇章的基本元素或组成单元及其结构,同时也关心篇章形式与其使用语境之间的联系。^①可见,哈里斯的篇章分析仍是结构主义的,但也触及到语境、语用问题。新兴的“语篇话语分析”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而心灵实证色彩的篇章信息处理和认知模式的提出,是80年代的事。^②把篇章当认知,特别是认知心理语言学、认知语用学、人工智能涉足篇章后,就更多地使用“语篇”这一术语。语篇认知着重在世界知识(记忆)在大脑中的贮存模式,或称先验认知模式,在篇章的生成与理解中的作用。语篇认知的构成有:篇章现象,表现为篇章连贯,我们固然习惯于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篇章连贯。但语篇认知的篇章连贯,应看成是结构和结构层次与功能连贯的结合。结构和结构层次有句子、话论、段落、段落边界标记、语调高低对比、停顿、话队、话串等。功能连贯则因文体不同而表现形态不同。至于篇章现象的规律,表现出一种倾向性规律。这实际上与功能连贯暗合。^③篇章与语用的关系。廖秋忠认为“篇章研究包含了大部分语用学的内容”,而语用学的篇章研究着重在篇章对句法结构形成的制约关系^④,如疑问句对回答句的制约,篇章对句式变体选用的制约,等等。不可忽视的是,认知参照模型(reference-point model),又叫认知参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简称CRP原则),“可解释论题统领性对于实现语篇连贯性的认知基础”,CRP原则“主要具有体验性、主从性、对比性、动态性、心智性等特征”,它“来自对

① 参见《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② 参见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第124页。

③ 参见《廖秋忠文集》,第188—190页。

④ 参见《廖秋忠文集》,第195页。

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识”。^①如此看来,篇章认知原则来自主体之大脑,来自客体之外部世界。

对篇章作认知研究,多把“事实单元”(一句话可能只有一个)作为篇章单位,而不把“原子命题”(一句话有多个)作为篇章单位,现代研究者把主、谓结构称作“篇素”(textme),可与音素、形素、义素相协调,以篇素为操作对象作语篇认知研究。^②办法是:对整个篇章逐步浓缩,提取篇素,画出语义树形图,这对语言学习有实用价值,如进而以篇素为单位形成篇章网络,就可对网络本身及相邻的语境,人脑中的语言贮存等作认知研究和认知对比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德]H. 布斯曼《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程琪龙《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版。

[美]V. 弗罗姆金等《语言导论》(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英]William Crofft, D. Alan Cruse《认知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第 21 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① 文旭、徐安泉《认知语言学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6 页。

② 参见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第 150 页。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黄景欣^①

黄景欣(1935—1965),曾用名黄主权,福建惠安人。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工作。从入学、留校工作到不幸逝世,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度过了12个春秋。主要研究成果收入《黄景欣语言研究论文集》。该论文集由吕叔湘先生题写书名,胡裕树、叶子铭先生作序,书中共收入12篇论文,教材一章,译文两篇,全书共32万字。胡裕树先生的序从6个方面概括黄景欣的著述特色和学术成就。这6个方面是:行文属稿有很强的理论性;强调古今中外各种知识的综合渗透;注重吸收本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最新成就;十分重视和珍惜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成果;在论述任何一个课题时,都能立足于本题本论而作实事求是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十分重视语言科学的应用研究。胡裕树先生总结的6条从宏观方面准确地把握了黄景欣关于语言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特点。

在传统语言学领域内,黄景欣的代表作是《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1958年)。此文之前,有丁声树先生著名论文《释否定词“弗”、“不”》,主要结论是:(1)“弗+外动词(或介词)”后不带宾语。(2)“不+内动词”、“不+外动词(介词)+宾语”二式中只用“不”,不用“弗”。(3)“不+状语(形容词、副词)”式中只用“不”,不用“弗”。(4)“弗”犹“不之”,“不”字则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词。黄景欣在研究甲骨文“弗”、“不”以后,对著名专家的结论提出异议,他认为(1)式不成立,“弗+外动词(或介词)”后能带宾语,“弗执”不带宾语的说法是极少数;(2)式也不能成立,“弗+内动词”、“弗+形容词”、“弗+副词”的用法不乏其例。此外,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弗”、“不”交替互用的例子,这些例

① 原载《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证恰恰说明(4)式不能成立。但这样说,并非“弗”、“不”没有区别,“弗”是一个单纯固定的否定副词,“不”是具有多种词性的、活动性较强的否定词。但“弗”和“不”在作为否定副词方面,两者无严格区别,都可和副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组成各式谓语结构。他还研究了周代金文和汉以前古籍中“弗”、“不”的使用,结论和甲骨文中的情形大体相同。

黄景欣还重视语言学史的研究,认为“我国关于语言学史的研究在目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他对我国古代语言学的基本估价是:从公元前8世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学著作,由于都是抱着一定的实际目的来研究语言,且一贯重视汉语的特征,讲究一定的科学方法,因而解决了语言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我国音韵学的研究,“一向都严格地贯彻着音韵学的原则”,“是很科学的”。针对当时学术界的情况,他指出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前苏联的理论,否则“在实践上就会产生错误,对我国古代语言学成就就会估计不足”。回顾五六十年代我国语言教学研究的状况和教训,可以看到,这一见地是何等深刻!同时,他还指出:“在语言学史中,我国决不能以西洋语言学研究成就作为一切语言研究的最高成就来加以衡量”,要防止对我国的优良传统估计不足,防止“无视我国语言学的杰出贡献”这类事情发生。这一见解,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十分可贵的是,1961年10月,黄景欣应俞铭璜先生的约请,撰著并发表了长论文《论我国语言学遗产的继承问题》,针对当时学术界“轻视传统,盲目批判”的流行做法,明确指出:“继承我国语言学的遗产,是我国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认真总结了我国古代语言学在理论上的重大成就,明确指出语言的社会性以及它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之间联系的约定性;同时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统一,以及客观存在对语言的决定意义;在承认语言的社会性的同

时,还注意到不同社会中语言的不同和方言的分歧,并且对这些不同的语言状况作了科学的解释;注意到社会的统一对语言统一的要求,更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的规范问题;从承认语言的社会性出发,正确地看待语言的历史演变,并指出语言演变和语言规范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认识语言的社会本质时,也注意到了个人言语的特点,并指出这两者的矛盾统一关系。这些论点对深刻把握我国古代语言学的理论建树是非常有益的。与此同时,黄景欣还总结了传统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密切联系语言所依存的社会历史来研究语言的原则;把语言的声音和意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从声音出发来研究语言的原则;历史发展的原则;从活的语言——方言、口语来研究语言的原则;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研究语言的原则。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和理论建树一样,都是引人注目的重大课题,黄景欣对这两大课题的研究涉足较早,其论点对于语言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汉语史、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研究来说,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方法论价值,同时也具有导向作用。

黄景欣在以现代汉语为语料的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独得之见,主要表现在:

词汇,包括汉语词汇也像语言的其他一切构成要素一样,“也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体系内各要素的关系不是“和”(加)的关系,而是“积”的关系。从汉语的实例看,人称代词“我、你、他、我们、咱们……”就是一个体系,每一个词的意义和功能都和其他词处于互相对待、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如果没有“你”、“他”,“我”就失去意义。具体分析词汇体系,主张按“词汇—语法范畴”区分层次,首先是由一系列互相对立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几个最大词类构成词汇体系中最高的一个词汇层,第二词汇层由各词类的词按“词汇—语法意义”标准分成更小的对立单位,例如名词就有生物名词和非生物名词构成名词的第二个词汇层,第三层,例如将生物名词区分成动物名词和植物名词,等等,直到不能再分析为几个对立

单位的那些词为词汇体系的最下层。关于词汇体系研究的性质,他认为是把“每一个构成要素放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来进行研究”,决不是“企图抛弃要素的实质来研究纯粹的关系”。他认为,承认词汇体系,一系列问题都可得到正确解释。例如:词义除概念基础外,还以该词在词汇体系中和其他词的关系作基础,汉语的“党”和俄语的“партия”不能完全等义,就是因为处于不同词汇体系中和其他词的关系不同。又如从词汇体系的分析看,同义词是作为特定的词汇中同一词汇单位的变体,在该词汇层的词汇—语法意义上可以相互替代的词;而反义词则是在同一词汇层中直接对立、在发展中可能互相转化的词汇单位。

黄景欣以朱德熙先生《说“的”》为基础,探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1962年)。在充分肯定朱先生《说“的”》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提出几点商榷意见:关于“的”,朱先生认为单音节形容词(A)重叠式R可分为 R_a 和 R_b ,前者是说R只在“的”字前头出现,后者是说R既可在“的”字前头出现,也可单独出现,从功能上说, R_b 是副词一类,但加上“的”以后,“ R_b 的”不等于“F的”,而等于“ R_a 的”,即都是形容词,故后面的“的”都是“的₂”。黄景欣认为,把 R_b 区分为两种,一种形容词性的 R_b (如“好的”、“大大”、“小小”)等和 R_a 看成一类,它们后面的“的”都是“的₂”,而副词性的 R_b 应和严格的副词“明明”、“暗暗”、“渐渐”、“偏偏”看作一类,这种 R_b 后面的“的”是“的₃”,不是“的₂”。关于“的₃”,则比较复杂,朱先生认为“白的纸”中的“白的”,“白的好”中的“白的”,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名词性结构“A的”,“懂的少、有懂的、懂的人少”是“D的”,“昨天的好、不要昨天的、昨天的报”为“M的”,而D的=M的=A的,且都是的₃,是名词性语法的后附成分,A、D、M统称为S。而“白白的纸”中的“白白的”是形容词性的结构。黄景欣认为“白的”和“白白的”语法性质是同一的。经过一系列的语义语法和逻辑的推导以后,他认为应该把形容词性的“A的”和其他名词性的“S的”区别开来,同时承认前者的“的”是“的₂”,其余的“的”

是“的₃”。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黄景欣、施文涛等协助他们的老师方光焘教授主持语言和言语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对发展我国的理论语言学有重大意义。黄景欣本人在这场讨论中发表了两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就语言研究的精密化趋势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1962)、《再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来源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一问题一直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但语言学界对于“言语”这一术语一直缺乏共同的、严格的科学规定。今天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语言是指语言一般,言语是指语言个别,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一般和个别的区分。如果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两者区分更清楚。来华留学生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时,会因人而异地产生出各种中介语形态、偏误形态,但并不妨碍交际,从功能的角度看是允许存在的,甚至认为可以不加纠正。中介语、偏误是面广量大的言语成分。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言语也是没有阶级性的。没有必要在语言学以外再成立一门言语学。黄景欣说:“我们认为,语言同言语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言语是语言现象中的个别,而语言则是同一现象中的一般。”这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附:黄景欣语言学著述目录

[专著]

《黄景欣语言研究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论文]

《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语言研究》总第3期,1958年。

《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第3期。

《论语言的“内”“外”及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中国语文》1961年第6期。

《论我国语言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文汇报》1961年10月12日、13日。

《读〈说“的”〉并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中国语文》1962 年第 8、9 期。

《再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评高名凯先生的言语观》，《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 年第 8 卷第 1 期。

汉字简化不能走回头路^①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简化汉字议论得较多,我们应阐述己见。

一、文字产生时就有繁、简之别

繁化和简化是一对矛盾,任何时候都会存在。

文字起源于古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文字的产生是黄帝的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书契”即文字,鸟足兽蹄的脚印,内在的“分理”纹路,都是“象”;甚至更早,上溯至《史记·封禅书》引《管子·封禅》佚篇远古最早的帝王之一伏羲氏,他治理天下都是靠观“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制成八卦,“以垂宪象”,文中的“法”、“文”(纹)、“宜”(谊、义、仪,仪式、形态),也无一不是“象”;如果说据“象”制成的八卦也是一种文字初阶,并无大碍,而汉字的深层积淀是“象”。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任何人,对“象”的描摹都是可繁可简的。清代的《说文》学第一大家段玉裁则说得更明白,“象”就是文字:“古人之象,即仓颉古文是也。象形、象事、象声,无非象也,故曰‘古人之象’。”用段氏的话来推论,每个“象”,也就是每个字,都可以有繁、简二式。说造字之初即有繁、简之对待,就完全合乎情理,合乎人类认知。可见,繁化和简化都内化在先民造字的“具象思维”过程中。

裘锡圭先生说汉字是表音兼表意文字。表意有意象,摹象成字时容易繁简并存。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黄侃说“指事亦所以象形”,

① 本文为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约撰稿,已载《寻根》2009年第5期。

这三种造字法都是“其中有象”的,例如日、月之象,上、下指示地平线的上面和下面,合“止、戈”(皆象形字)为“武”字,合“人、言”(皆象形字)为“信”字。形声字的形旁表意义范畴,意象也很明确。“江、河”二字中的“水”表意义范畴,《说文》作形旁用的 540 部首不少是象形字,几乎每个部首字都能说出“其中有象”。例如第 465 号部首字篆文“弦”,本身就是形声字,很难说出其中的“象”了,但许慎说它“象丝轸之形”,段玉裁说它“象古文丝而系于轸。轸者,系弦之处”,显然是从“形声多兼会意”去说其“象”的,甲骨文中的“弦”字,在象形的弓弦处加一指事符号,表弓弦所在。第 474 号部首字“风”字,徐灏笺说它“无形可象”,但据许慎的说法“虫”字象形是它的形旁,“凡”字象形是它的声旁,且甲骨文中多借凤鸟象形字作“风”字,“风”字之“象”甚多。第 490 号偏旁字“金”似乎与“今”有关,也看不出它有象,徐灏笺说它“无可取象”,但许慎说它“象金在土中形”,林义光《文源》说它的古文(篆文)“象金在地中形”。“金”字最早见于金文,《效父簋》写作两平行的粗墨横,是个很典型的摹象简笔字。^①形声字声旁“象声”,声亦“象”。索绪尔曾说语言的声响是“心理印记”、“心理性质理念”的“音响形象”。事实上,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据谐声偏旁归纳出的《古十七部谐声表》收录 1 521 个“某声”声首字。据黄德宽教授的研究,古汉字基本声符仅 501 个,且逐步累进而成,殷商 183 个,西周新增 157 个,春秋战国又新增 161 个,声符的来历,也是从象形字、声同声近的假借字发展而来的。^②无论是段说还是黄说的声符,绝大部分都可说出它所代表的“象”是什么,更何况如索绪尔所说,语言声音本身就是一种“音响形象”,形声字的谐声偏旁是一种“声象”,摹写“声象”虽不如摹写外物“形象”那么直观,那么容易,但也是可以做得到的,甲骨文中形声字已占 60%,就是明证。又德国的洪

① 参见徐复、宋文明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9、376、391 页。

② 黄德宽《汉字理论丛稿》,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12、158 页。

堡特研究了汉字后说,象形文字,包括汉字系统中,“具体字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始终是概念的而不是语音的”,又说,汉民族具有“想象的知性”,“汉民族和汉语的知性倾向超过了对语音交替的爱好,因此,汉字这种字符在更大程度上成了概念的标志而不是语音的标志”。^①既然用“康德—洪堡特”式的“知性”,甚至是“想象的知性”来看待汉字,一个个的形声字当然也只能是“知性—感性”形象,形声字、声旁都有“象”;某个方块字“始终是概念”,当然至少是“意象”,并不缺乏“形象”,凡“象”皆可繁、简并用描摹之。以上说明,繁、简之别内化于汉字造字之法本身,内化于形声造字法本身。

二、古文字、古文献中简化字比比皆是

要研究简化字,先得给它下个定义:“繁体、简体只是相对比较而言,在同一个文字系统内一个字有几个形体时,笔画少的是该系统内的简体字。”如果是现代汉字,还须加上一句话:“简化字须经国家统一颁布后施行。”用这一“笔画多少”来看待甲骨文,甲骨文的简化字不在少数。^②例如:屯字,甲文共 3 字,其中后上一五·一二为简化字。“恒”字,甲文有 2 字,后上九·一〇为简化字。“中”字,甲文有 3 字,甲三九八是简化字,与今“中”字极似,也就是说甲骨文“中”字简化字一直传用到今天,足见简化字的魅力。有一段时间,楷书“中”字写作近似甲骨文中的“中”字繁体,后来不用了。

甲骨卜辞中用简化字是常见现象。例如周原发现的文王时的卜甲,共 20 个字,用了简化字的有:拜字/在甲金文系统内看,此处笔画最

① 洪堡特《论人类的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16、317 页。

② 魏建功先生有《汉字发展史上简体字的地位》,举出甲骨文“羊”字有 6 种写法,金文“羊”字有 4 种写法,笔画最少的为其简化字。见《中国语文》1952 年 10 月号,第 15 页。

少;侑字/此处作“又”字,通假,但笔画少,也可视为简化;大字/读太,大、太古今字,古字“大”笔画少,也可视为简化;甲字/此处用字同后上三·六,笔画少,简化字;斯字/此处作囟字,皆心部字,通假,笔画少,可视为简化字,又此处所作的囟字,较甲五〇七笔画似少,简体;正字/此处用字近同甲三九四〇,笔画最少,简体。受字/甲骨文编著录三个“受”字,此处笔画少,简体;有字/此处用字同粹一三,简体;佑字/此处用了个重文符号同上文“有”字,而“有”字用简体,此处也可视作者欲用简体字。著名的《周原卜甲》20个字用了9个简化字。金文文字大大增加了,简化字也增加了,总的说,青铜器铭文辞用简体字的几率也提高了。

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字使用也比较随意,简化字盛行。据笔者研究,《郭店楚墓竹简·缙衣》47支简,共有1029字,用“笔画少”的简化字有166个,占16.1%。《上海博物馆楚竹书一册·缙衣》24支简,共977字,用“笔画少”的简化字有175个,占17.9%。两楚竹书用简体字比例都高,是汉字在其发展中尚未定型,多半以偏旁代整字(古今字)所致,两相比较后者用简字更高些,故可据此推知沪简《缙衣》不比郭店简《缙衣》迟,差不多同时期,有可能会早些。这里得到的结论与学界的说法近同。可见历史汉字简字还会携带若干可供比较研究的学术信息。

中古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用字讲究,如唐代,科举考试既设有“明经科”,还设有“明字科”,“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用字规范涉及个人命运,就不得不讲究了。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就是为社会提供应用文字范本的。后由元孙侄子大书法家颜真卿写录,刻于石,传播很广。颜氏叔侄提倡用字规范化,要求尽可能用正字,正字后来发展成正楷,一般都是繁体字;允许公众用通字,通字是通行已久,大部分是隶省、隶变,或改易偏旁的字;限制用俗体,俗字一般都是简体字。奇怪的是,有些正字是简化字而非繁体字。例:“回”正、“猿”正、“凰”正、“睹”正、

“岳”正,等等。有些通用字也是简化字,例:“等”通、“走”通、“粮”通、“聪”通、“丛”通、“简”通、“兹”通、“采”通,等等。

宋元以来民间俗体字即简体字用得很多。1930年,刘复、李家瑞著录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出版,共收12种民间刻本中用的简化字6240个,竟然是解放后《简化字总表》简化字(见下文)总数的2.8倍。数量如此之巨,使用如此之广,以致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文字体”条,曾说及明代科举考试不得不分两场,“第一场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书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第二场再“考其文义”,还重申,汉代要“试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吏)”。官方禁止用俗字、简化字,可是,有人研究了明代天启、崇祯两朝427件“兵科抄出”档案,恰恰从这官方文书中找到了415个简体字,有的简字出现频率很高,如“据”字出现304次,“挡”字205次,“实”字279次,“边”字295次,许多简化字与我们今天的法定简化字形体相同,如:宝体灯犹迁窃战几机尔县恋会党。^①

以上说明,历史上尽管封建统治者轻视简化字,扼杀简化字,但它还是破土而出,有的挤进了正体字,有的出现在官方文书……。

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汉字简化到现代 语文改革中的汉字简化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汉字简化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一起蓬勃发展起来。最早提出汉字简化的是教育家陆费逵,1909年他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论文,认为采用俗体字对识字、写字、刻字都有利。1921年又发表题为《整理汉字的意见》的论文(《国语学刊》1卷1期),提出了整理汉字,制定俗体字的具体办

① 蒋希文、邵荣芬《明末“兵科抄出”档案中的简字》,《中国语文》1952年10月号。

法。五四运动后,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对汉字简化作出了新的贡献。1934年钱玄同曾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刊于《国语周刊》第123期),提案通过后,他又主持编订了《简体字谱》(草案),收字2400多个。1936年哈佛燕京学社还出版了容庚的《简体字典》,等等。

全国解放后,汉字简化与推广普通话、用汉语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成为现代语文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目标是语言文字规范化。从1950年教育部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算起,汉字简化已快60年了,如从解放前算起,我国的汉字简化正好经历百年。百年来先贤们艰辛备尝,百年来成果丰硕。今天看,以汉字简化为核心的汉字规范化的最主要成果可以说是五张表。^①

一是《简化字总表》(1986年新版)。该表收录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全部简化字。总表又分三张表,第一表收350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收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了用第二表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1753个。

二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1月发布),共收常用字2500字和次常用字1000字。该表综合了1928年陈鹤琴《语体文应用字汇》(4261字),至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学研究所1985年研制的《汉字频率字表》(4574字),共15项科研成果研制而成。

三是《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3月公布),共收通用字7000字。该表取用的语料范围从1928年至1986年。综合吸收相关科研成果20项研制而成。

四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12月发布,1986年调整后重

① 相关资料据《语言文字规范手册》,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3版重排本。

新发表)。共收 796 组 1 027 个异体字。

五是《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1985 年 12 月发布)。

汉字简化后最直接的效果,苏培成教授指出:“《简化字总表》收繁体字 2 261 个,笔画总数是 36 236 笔,平均每字 16 笔;收简化字 2 235 个,笔画总数是 23 025 笔,平均每字 10.3 笔。两相对照,平均每字减少 6 笔,占 38%。”^①好处是:节省了书写时间,还大大增加了清晰度,便于认读和书写,还便于信息处理。从 1951 年国家公布简化字表以来,简化字深入人心,深受欢迎。

据上面第三项,略作调整后编有收字 7 005 个的《汉语通用字典》(主编:冯瑞生,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又可据此对汉字规范化、汉字简化成果作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外繁体字印刷品的大量涌入,一些人开始热衷于用繁体字,出现了繁简并存的混乱局面,对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5 月重申原有规定:“翻印和整理出版古籍,可以使用繁体字;姓氏用字可以使用被淘汰的异体字。除上述情况及某些特殊需要者外,其他方面应当严格遵循文字规范,不能随便使用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和被淘汰的异体字,也不能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这个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我们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滥用繁体字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现在,又有先生主张取消简化字,一律改用繁体字,据上述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百年来的努力和成就、公布和使用简化字近 60 年的收效看,可乎?

主要参考文献

徐复、宋文明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① 参见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 页苏培成教授撰写部分。

黄德宽《汉字理论丛稿》，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12、158 页。

洪堡特《论人类的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语文出版社 1997 年第 3 版重排本。

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边学边思

晚晴光华铸宝典^①

——论邹酆先生现代辞书学理论研究

邹酆老先生是“辞书学名家”，“为中国辞书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何九盈教授语）。深入研究邹老的辞书学理论，对发展我国辞书学和辞书编纂意义极为重大。对邹老辞书学理论的研究，拟从他的三本著作：《辞书学探索》（以下简称《探索》，2001年12月）、《辞书学丛稿》（以下简称《丛稿》，2004年1月）、《中国辞书学史概略》（以下简称《概略》，2006年6月）切入。都是邹酆先生从湖北大学古籍所离休（1989年）后的著作。我与邹老从未见过面，仅有文字之交。实在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说这“辞书学三书”是晚晴光华，说这“辞书学三书”是学理宝典，皆无可。光是“空间的无限创造”（黑格尔语），说到底，光是物质的微粒，故可以“铸”。谓之“晚晴光华铸宝典”，庶几可括邹老近十数年来的人生价值和学术贡献。

“三书”内容各不相同，综观之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学理（含史论），二是学术史。《探索》中的“辞书原理”、“专著评论”和“学人辞书观”属于学理类，“辞书学史”属于学术史。《丛稿》“辞书思想史和辞书学史”分属学理和学史，其余三节：“训诂方法论、编纂法、辞书评论”皆属于学

① 本文原载《长江学术》2007年第2期。

理类。《概略》一书属于学术史。当然也包括史论,否则不能成其为学术史。

一、学理上的贡献

邹老为建立独立的“辞书学”学科和理论系统而努力探索。值得注意的是,三本书都是以“学”名家的,一贯之称为“辞书学”。《探索》中在具体论述时还称为“词典学”,到了《概略》则无例外地称为“辞书学”。语码的转换,术语的确立,反映了作者的科学认识和学术信念。辞书的范围,显然比词典要广,包容性强,它包括现代词典、字典和百科全书等,也包括古代的字书(含注释)、类书等。以“学”名家,显然是以学理研究型实践为途径,以理论系统的建构为内容,以建立单独的学科理论为目标而不断追求。20世纪90年代,作者提出“词典学学科地位之我见”(《探索》1页),主张将词典学从语言文字学中独立出来。如不独立,“必将成为词典编纂与研究长足发展的重大障碍”。依据有二,一是历史的回顾,二是现状的考察。回顾历史,几经二百年的努力,语言文字学摆脱小学的束缚而独立,结果促进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五四以后先贤们的努力,反映了现代词典学早已“孕育于语言学母胎”。而现状的考察,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词典编纂开始繁荣,理论研究开始深入,文中援例多多。在“从属”与“独立”的论争中,作者果断地选择了后者。此后,作者以极大的热情从现代辞书中抽绎学理,评介一本又一本的辞书学著作,从逻辑上讲,都是为“独立”论觅证的。

主张建立一种理论,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但开风气不为师”,更为可贵的是邹老身体力行,为建设这一理论系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初步形成了现代辞书学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本体构成原论。“三书”的主体:学理和学史,正是邹老所主张的辞书学的本体。具体地说,学理的原论构成有:

一是与语言文字学密切相关,但又有自身特色的独立的现代辞书学。它的形成与现代学术日趋精密密切相关。语言文字学本身也已形成若干独立的学科构成,如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在邹老看来,很有特色的词典学不独立是不能想象的。辞书编纂的繁荣即社会实践的需要催生着新的理论系统,更何况是一个早就躁动于母腹的理论系统。可见现代辞书学的形成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现实事业发展的逻辑的必然。实践性,本身包含着主体性,但邹老的辞书学更强调客观性。例如,他在义项字义问题上说:“无论是古老的甲骨象形文字,还是趋向于概念精密化、多义化的近代汉字的字义,都是对字义所反映的客体对象进行科学概括的结果,都是人类社会集体约定俗成的结果,因而具有鲜明的客观性。”(《探索》53页)从一定意义上说,强调语言的经验事实,强调客观性,是建构现代辞书学原论的基础。

为了深化对现代辞书学的认识,作为学术史的传承,邹老受到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启发,提出中国古代辞书学的概念,认为“古代辞书学早已存在”(《丛稿》1页),从而把我国现代辞书学看作是对古代辞书学的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传承和沿革成了辞书学学科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阐述古代有辞书学,邹老援引何九盈教授论中国古代语言学时提出的四个标准: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丛稿》2页)。绳之以古代学术,古代语言学中有辞书理论,这是没有问题的,能否从古代语言学中独立出来,这是另一层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定位是:“首先,应从辞书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看它是否对辞书概念、性质特征与社会功能有特定的认识,并作出了不断深化其认识的合理论述。”(《丛稿》3页)应该说,这一定位的本身就是现代辞书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它用作检测古代辞书理念品位的高下、优劣。书中认为,历史上有丰富的理论,“历代对辞书社会作用的理论阐发可谓多矣”。归纳出主要的八条:巩固皇权国基(资政作用),统一规范语言文字、方便社会交际(规范

作用),沟通方俚、展现民俗(文化作用),传播名物知识(交际作用),方便语言教学(教学作用),辅助笔耕作用(引用查考作用),振兴民族文化(认同作用),识古垂后、功在永世(传承作用)。这八条,可谓古代辞书学术理念的社会棱镜观照。观照结果对形成独立的古代辞书学起确认作用。因系统性关系到理论本身的存在,对中国古代辞书学有无系统性问题,作者提出:以“综散使聚”的观点看待古代辞书理论的系统性,这实际上已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和把握方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用来考察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方法,特别是关于一件件工具革新驱动科学进步的论述,实际上也是用此方法。邹老归纳出古代辞书学十种散见的形态,作为“综散使聚”的基础,还提出以“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古代辞书理论的系统性。十分重要的是,邹老认为“系统”是个历史的概念,不能以今天的“系统”观念看待古代的“系统”,这是很中肯的说法(《丛稿》15页)。

二是词典的释义理论。释义是词典的灵魂,释义理论是现代辞书学理论的组成部分。邹老的释义理论是与义项概括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的书上将两者分开,释义是指说解的内容和方法;义项概括是指词典义项的确立。邹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表明他的释义学说是以来自西方语义学说的义项理论为基础的。书中提出建立义项的一些基本原则(《探索》45页),包括:排除个别(偶然、临时)因素,抽取一般义;排除词句因素,抽象出构成义项的义素义;排除政治术语因素,抽象出固有义;排除重叠、遗漏因素,抽象出完整义;排除含混因素,抽象出准确义。在论述这些理论原则时,都举了具体实证说明之,可见这些原则都是以语言世界中的客观经验事实为基础的,这就在原生态上保证了义项概括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排除大大小小的主观随意性。

和总结古代辞书理论特色系统一样,邹老总结了古代的释义方法,借以丰富现代释义理论。主要有: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以形析义”,即通常所说的“以形立训”。许慎紧扣形体而释义,故能立于不败之地。

邹老考出如《汉语大字典》那样班列字形的做法,原出于三国魏江式《进〈古今文字〉表》:“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列篆下。”意在“以时序展示汉字不同形体‘各有区别’的变化”,即汉字形体发展史。这文字形体史、形态学的研究,至晚清罗振玉、王国维利用形体构成识别古文字,利用甲金文字考古字古义,形训理论渐趋于科学化和现代化。邹老把以形立训、展列形体、利用形体考古三者结合,完整地看待形训,使之与现代接轨,完成一种释义方法的历史转换,是可贵的。

“因声求义”释义法,常常仅被说成“一声之转”,邹老认为其涵盖声训、声转、假借、谐声见义与音义结合五大内容,尽管有可商之处,但胪举其构成以说一种释义方法,显然是一种理性的科学态度,大有利于促成其向现代科学方法的迈进。

有关释义和义项,书中认为古代辞书的成果丰富。归纳出据上下文字界定字义、初步体察义项的概括、以古代名实观念释义、释义与辨义交互之、文献佐证和目验实证五大成就。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即义项尚初识,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体现出引申义特别丰富。故展示以字义义项为单位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做法十分常见(《丛稿》12页)。

三是辞书编纂法。编纂法有两个层面,一是就工艺流程方面讲的,一是就方法学的理论层面讲的。邹老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后者,且相关理论探索与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密切联系在一起。邹老将编纂方法学归结为六个方面:一是方案与体例的设定。方案是总体设计,体例是编纂规范和内在逻辑。邹老举的实例是黎锦熙为《中国大辞典》草拟全然学术化的总体设计,又为《辞海》制订“编辑大纲”,二者都属于“方案”类,进而体会到编词典“莫难于定体例”。体例为贯彻大纲服务。书中对体例的内容有规定:总例含宗旨、类型、对象等,分例含选词、形义体例、编排等。(《探索》337页)作为编纂方法学,二是注音与析形,如以《广韵》为主切,以国家颁布的一系列规范化法规和标准为准绳等。三是收词立目,其理论表述采用郑奠提出的“以普通话词汇为主”(兼收相

关文言、方言与外来词),以“词”为主(兼收词素、词组、成语)的收词标准。四是义项和释义。因为义项概括和释义是辞书学学理必须阐述的对象,作为编纂法的义项和释义,可以侧重于编纂工艺来讲论义项和释义,以避免重复。书中开拓义项建立的有关理论,厘清义项划分的种种方式,重在原理论,但不难向工艺论转化。五是历时义和共时义的确立和安排。辞书史上刘复和黎锦熙先后提出“依史则”描述“一词多义”,引申方式如因果、时空、同状、同形、礼制习俗等多向多层引申,纵横交错,形成系统的构思和做法(《探索》345页),既是理论的,也是编纂法的。六是扩充词典信息量的途径和词典符号使用规范。由此可见,邹老笔下的词典编纂法的内容是丰富的。原因是,善于总结历史上的相关成果,善于用现代词义学观照编纂法问题。本来,编纂法是一种技术,科学偏重于认知,技术偏重于操作,区别是明显的,而当代则是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邹老立足于方法学理论层面破解编纂法,正是对当代科学精神的把握。

四是将词典批评,或称词典评论作为学理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下见到的几本词典学专著,很少把词典批评作为学理构成,而邹老的辞书学中很强调词典批评的地位,以至辞典批评从理论上得到较系统阐述,摆脱了就事论事,形成针对辞书的批评理论,这是难能可贵的。邹老的批评理论有:确立批评原则,规范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丛稿》276页)。批评的科学性原则,“要求从辞书学的角度,对所评对象进行深挖细析,从中发掘闪光点与不足处,进而提出发扬与改进意见”。可见,批评的科学原则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直至打假批劣。这与泛科学主义完全不同,与西方形上学的形式科学观也不同。它是针对辞书,因而是语言世界内的,求实的、经验的科学观,辞书批评的实用性原则。这实际上是效用原则,它的提出有纠偏作用。以往的批评偏重于编纂的得失,而不重视读者的使用效果。这是批评视角的重大转换。批评的前瞻性原则,是指纸质辞书与电子辞书、在线辞书的比较,三分鼎足,

此消彼长的运动状态的描述和预测。关于批评的创造性原则,直接表现为评估辞书,并发展辞书理论。在批评方法上,邹老从当代批评中提炼出“四结合”方法:剖析现状与提出对策相结合,大处着眼与小处着手相结合,个体剖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置评与立论相结合。“四结合”都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结合,作为批评方法,本质上是辩证方法。方法,本来是很具体的,邹老笔下的方法,不能不说是理论质感很强的方法学。这里,我们自然把握到作者有很强抽绎能力的理论思维形态,这显然是对编纂技术的超越。

二、辞书学史研究的贡献

如前所说,邹老将辞书学史的研究贯穿于理论研究的全过程,理论借学史而深入。辞书学史的研究因理论视野而成完帙,《概略》为完帙,《探索》和《丛稿》多散篇。且“辞书学史”四字,大不同于“辞书史”,本身含学理,是学理史,学术史论。主要成就有:

首次提出了古代辞书学史的分期和现代辞书学史的分期。《概略》将古代辞书学史分为七个时期:中国辞书学的孕育期——先秦,中国辞书学的开创期——两汉,中国辞书学的成长期——魏晋南北朝,中国辞书学的开拓期——隋唐,中国辞书学的扩展期——宋(辽金)元,中国辞书学的成熟期——明清,中国辞书学的转型期——近代。这一提法有类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三百年学术分成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等做法。上述七期不标“古代”二字,以为古今一体,更能体现“中国辞书学”的赓续绵延,前后一贯,总之,是一个整体。中国现代辞书学则分萌芽期(五四时期,1919),生长期(建国前三十年,1919—1949),形成期(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8),系统化时期(改革开放时期,1978—)。古代学史的分期,既没有如通行的做法,把“隋唐宋”合成一个时期,也没有因宋明理学,而使“宋明”合为一期,邹老扩展期的划

分是有见地的。宋辽金代有徐铉、徐锴的《说文》学和《广韵》、《集韵》、《龙龕手鑑》、《改并五韵集韵》等名著,特色显著,元代有周德清《中原音韵》、卢以纬《语助》、戴侗《六书故》等名家名作。以宋辽金元为一期正贴近了辞书学。现代学史尝试分为四个时期,亦颇费推寻,应该说大体可从。

先秦是我国各学术门类的综合奠基时期,辞书学是怎样肇开宏基的,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作者以其深邃的理论眼光抓了四件事:一是抓住先秦经籍训诂。先秦经籍本身涉及的训诂内容,如《易传》、《春秋三传》中的若干解释性文字,是辞书训释的源头。作者除指出单靖公讲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是最早的训诂外,有所推进的是,从先秦典籍中归纳出九种训释方式:形训式、声训式、自训式、同训式、语词对释式、定义式、描述式、反训式、近义辨析式。这些当然是包括概括释义的,还进一步认为,经籍源头乃至《诗》毛传、郑笺中,即使是随文释义,也是我国辞书编纂的最早渊源。邹老说:“创立于两汉的辞书编纂,正是在吸取先秦经籍、传笺注疏的随文释义经验的前提下,根据辞书的性质、个性特征与社会作用,对随文释义方式加以提炼改造,进而提高了字义概括的档次,形成了义项概括的原则,使我国辞书训释逐渐成为区别于随文释义的古文献训诂的高档语文工具书。”(《概略》15页)这不仅是对屡遭诟病的“随文释义”的正确评价,而且为后世概括释义找到了源于上古的经验基础。二是抓住先秦识字课本。认为先秦识字课本是中国辞书“分别部居”与字项解说的雏形。自周宣王太史官著《史籀篇》之后,秦代有一批识字课本问世。从后世所得的少量辑佚文中看,可知《史籀篇》已有字词的解釋文字。《说文叙》段注称:“知《史(籀)篇》不徒载篆形,亦有说解。”说解中有针对单字、复词,也有专对名物词的。说解方法有经籍本身的训诂已使用的形训、声训、互训、反训。东汉许慎《说文叙》说“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其实不必说等到许慎,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凡将篇》,元帝时史游《急就篇》就已明确提出“分别部居不

杂厕”(《概略》16页)。这样就把中国辞书编纂中的部首思想、释义思想的萌芽大大提前了。三是抓住先秦经籍“字本位”训诂惯例。认为后世的字书、字典的基本体制源于此。这里的“字本位”是指编纂中以字为立目单位和被解释单位。至于编纂工艺中为什么要“字本位”。与汉语本身是否“字本位”的关系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邹老强调古汉语中单音节词的地位,以及一个个单音节词与一个个汉字的联结(《概略》18页),并没有涉及汉语语言结构本身是否字本位的问题,这是很有见地的,表明了作者理论界限十分清晰的一面。四是钩沉先秦“实、德、业”训诂传统对辞书编纂的影响。“实、德、业”本是公元前4世纪至前2世纪古代印度胜论学派的哲学范畴。实,指实体对象。德,实体的区别性特征。业,实体的功用。章炳麟曾以“实、德、业”三大认识范畴看待汉语的释义。在“人者,仁也”、“马者,武也”中,“人”“马”是实,“仁”“武”是德。在“金,禁也”、“火,毁也”中,“金”“火”是实,“禁”“毁”是业。这里显然有两个层次:一是区分被释词和解释词,前者是实;二是辨析解释词,解释特征、性质的是德,解释功能、作用的是业。作为语义解释的逻辑贯穿,实、德、业无时、无处不在,邹老举出《公羊传》、早期识字课本、《说文》证实之,并说:“先秦经籍‘实德业三品字训传统,对两千多年来中国辞书编纂的影响是极其深厚、久远的,迄今仍具有强烈、鲜活的生命力。”(《概略》20页)这当是逻辑的必然。

从汉代开始的各个历史时期(古代6,现代4)的研究,以历史背景、概貌特征、理论成果、代表人物为导引,展开其发展史和历史词典学理论的论述。主要成就有:

紧扣古代辞书学展示出全新的有个性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离不开一般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但邹老的可贵之处在于“紧扣”,“有个性”,其背后是锐利的眼光和所下的功夫。如两汉,固然会讲到“独尊儒术”和今、古文的“立学之争”(也是作为达到“紧扣”和“有个性”的引子),但根本立意在于两汉辞书“为解经服务”,且“辞书从一开始就‘离经超

道’,大量收入经籍以外的字词”(《概略》23页)。此外,秦始皇“书同文”的规范化要求,两汉出现解字“巧说邪辞”,亟待董理,《说文》《方言》《释名》三大名辞书顺而产之。他如魏晋南北朝有“言”“意”关系的探究和《文心雕龙·章句》“语助”的研究,唐代小学的长足发展,宋代理学思维对编纂学的启发和新体裁作品中的鲜活词语源泉,清代“近代语言意识的萌发与渗入”促成“由文字转向语言”,等等,都成为“紧扣”和“有个性”之背景。“紧扣”之要秘,在于首先扣住历代的语言文字学和语文学,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学术文化。

抓住规范化和在规范化基础上的多样性来实事求是地描述各历史时期的辞书学的概貌特征。例如,说两汉的五大特征:由识字课本转向正规型辞书、一开始就有《说文叙》那样的理论著作问世以阐述一般编纂原理、解经之传笺注疏之学大兴、经籍训诂和传笺为使解经更有针对性均以“字”为本位、《说文》字书条例在开编之先可见编纂技术的正规化。又如说宋元辞书学的特征,出现了雅书系统类、许书类、辨正字音形义类等类字书、韵书,辞书学理论方面围绕规范化的“六书”理论研究得到加强。

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辞书学理论成果。现将邹老捕捉到的最突出的理论成果缕述如下:认为两汉“据形系联”和“以类求之”的字典编排学说在辞书学史上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魏晋突破《说文》形义结合,创立音义结合的新释义模式;隋唐《切韵》、《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是宝贵的辞书财富;宋辽金元改“以形相从”为“以音相从”,在音训、形训、义训(含本义和引申义)三大释义方法上不断自我完善;明清出现以“字汇”“字典”命名的辞书,清人对“因声求义”的深入阐发最为光彩照人,段玉裁词义训释概括论的“隐括”说和王念孙的“上下文”论验证说,是清代释义理论的精髓;近代八十年(1840—1919)最显者为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考据相结合,在辞书适应新时代、辞书收词立目、从形训入手解甲金文、多义词义项模式、部首调整与排检法等

方面皆有新招;现代萌芽期以辞书繁荣学术,启导思想为本务;现代生长期的研究涉及辞书的应用、类型、收词、注音、义项等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释义历史原则中的“始见书”问题的提出,排检法中的“号码排检法”和笔数法成为讨论的焦点;现代形成期始有“词典学”概念,从字到词的跨越是辞书史上的“一次极大的改革”,加大了词义历史性研究的力度;现代系统化时期对词典家族分类的探讨、词典评论的展开、辞书史的研究、现代编纂技术思想的研究是其特色。以上种种,皆睿智点睛之笔。

以上可见,现代“辞书学名家”邹酆先生在现代辞书学理论研究中的贡献。在学理上有四大构成:独立的现代辞书学、释义理论、辞书编纂法、词典批评。在学史上三大成就:首次提出了古代辞书史和现代辞书史的学史分期,先秦综合奠基期如何肇开辞书学宏基,各历史时期的个性化研究,特别是各历史时期的最突出的辞书学理论成果的提取。

主要参考文献

程荣《字、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年版。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2 版。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第二篇第一章,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李尔钢《现代词典学导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2 年版。

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章炳麟《国故论衡》上《语言缘起说》。1910 年初刊于日本。上海大共和日报馆印本 1912 年版,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邹酆《辞书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邹酆《辞书学丛稿》,崇文书局 2004 年版。

邹酆《中国辞书学史概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一部规范性和知识性并重的字典^①

——读《新华多功能字典》

《新华字典》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字典,到1998年5月修订本问世,已出了第9版。近年来,商务辞书研究中心策划围绕“新华”的新辞书系列,已有《新华写字字典》(2001.1),最近见到的《新华多功能字典》(2005.10一版,以下简称《多功能》),固然是《新华字典》系列的“补充”字典,或称卫星字典,但就其规模、内容、性质而言,称其为一部独立的、崭新的查考型、学习型规范字典,是当之无愧的。

初读《多功能》,耳目为之一新。“新”的秘密正在于“多功能”三字。这是编纂理念的变化。就编纂法而言,不仅用于编辞书,而且用于认识世界。例如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学者德里达把运用编纂法的谱系学作为自我描述,认识自我的一种方法,并认为法国18世纪对其历史来源的认识和对其自身存在的描述就是用此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经过“几个实例印证”而获得“最为广泛的”认识。^②用于编纂辞书,实际上也是认识世界:认识语言世界。不过由于领域的特殊,编纂法本身更多地带上了特殊性,通常所说的义项分析和书证分梳两大项。但辞书编纂法的特殊性并没有离开编纂一般:知识考古和存在状况描写。《多功能》之新,新在理念的更新。可谓义项确立、书证的梳入、文字的知识性考察、字况和语况的描述等,都有大的突破。具体而言之,以下几点是尤堪称道的:

一是它的规范性。该字典是一部规范字典,编纂者有很强的语言

① 本文原载《汉语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文字规范意识。全书作为字头收入正编的通常使用的现代规范汉字 7 575 个。1988 年 3 月国家语委颁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 7 000 个,其中包括《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的 3 500 个常用字(一级字),另有 3 500 个通用字(二级字)。《多功能》收列的这国家标准的 7 000 字的规范性不必细说,现在多出的 575 个字,是“通用字以外的现代汉字”(见《前言》),亦称之为“非通用字(三级字)”(见《凡例》),好在这 575 个字的右上角标有符号“□”,极便与国家标准 7 000 字相对照,这样处理,本身就是一种标准意识,规范意识,应该说,这多出的 575 个字也是规范字。只要看看标有符号“□”的字,便知它们无非现代科技用字,特别是近年来用人工核反应制得的一些新的化学元素的名称,如𨭎、𨭉、𨭊等,还有国外地名用字,国内地名(含港澳台地名)用字,珍稀动植物名,方言用字,译音用字、域外汉语用字等,可见这新增 575 字是与现代社会生活吸引眼球的新拓展极有关系的,亦由此窥见其必要性。既是必要的,进入字典就必须使它成为规范家族中的一员,并认同它的规范性。

《多功能》的规范性不是空的,而是落实到具体的字的。书中有“规范提示”一栏,对汉字使用中常遇到的有关形、音、义的规范化问题作提示。事实证明,作为陪伴着你的“无言的老师”,这些提示都十分必要而及时,因而魅力无穷。例如,提示异形词的规范写法或用法:“按”字下,“按语”也作“案语”,而以“按语”为“推荐形式”,“推荐形式”即编者心目中的规范形式,读者应尽可能采纳。有的提示笔顺,如“噩”字下。有的提示读音,如“酵”字下:“酵在古代和教(jiào)同音,现在读 jiào。有人受偏旁孝的影响误读为 xiào。”恐怕误读者不在少数,甚至误认为是方言读法而原谅了自己。常翻字典,可免笑话,今有“规范提示”,尤为警钟。

二是它的知识性。这在同类辞书中显得非常突出,《前言》介绍《多功能》的特色“主要表现在采用板块结构来安排字典的内容”,板块体现

知识,分七大板块:四种字体板块、汉字属性板块、注音释义板块、词语苑板块、规范提示板块、插图。知识七大板块体现了编纂者的三大指导思想:形态学思想、语言学思想、历史文化学思想。

要说汉字研究,最根本的字形研究,有如许慎《说文解字》以形立训,故能使字义的解释立于不败之地;古文字释读往往从文字形体的离析和重组入手。总之,汉字研究要以形体为切入点,文字学的基点是形态学。再说,现代符号学的解释与字典结下了不解之缘,字典完全在符号学的视野之内,不仅如此,字典和百科全书都被看作“符号化过程的假设”。^①符号化正是形态学的重要内容。以形态学为指导,《多功能》字头下列该字的小篆、隶书、行书、楷书四体,这既是字体发展史,也是书体观照,对读者很有用。四体而后紧接着分析该字的笔画数、部首、结构、字级、四角号码数位,众所周知,具体到某字,这五项都不是很好搞的。例如:一个“望”字,《汉语大字典》在“月”部,《多功能》在“王”部,《现代汉语词典》也在“王”部。“慈”字传统归在心部,今在ㄣ部。“歪”字部首在“止”部,不在“一”部。“丸”字的画数、部首、字级、四角都有点困难。值得注意的是,部首的调整,主要还是以形态学作指导,强调形体构成上的部首,而非意义上的关联定部首。“外”字的四角是2320,不是2322,“指”字的四角是5206,不是5106,而“趾”字的四角是6111,不是6211。如此等等,都费斟酌。书中字级以国颁标准3500一级字为常用、3500二级字为次常用,不用说是严格的规范化、标准化,对某个字的笔画、部首、结构、四角号码一一明确说之,都是在围绕规范化标准化上下细致功夫。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形是形态,音也可看作形态,国外语言学往往将语音并入语法一起研究,都从形态学加以考察。《多功能》将某字的注音列四体、五项之后,词性之前,视注音为汉字形态的一部分,是说得通的。同音字的总音注冠于该组同音字之首,

① 翁·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6、132页。

且拼音文字注音外还括注注音字母的音注,也是考虑到境外读者的需要。

再说编纂者的语言学思想,编字典打上语言学的烙印,这是现代字典与传统字书的最重要的区别。《多功能》最能体现其现代性的,莫过于给词字和语素字加标了语法属性。《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5.6)全面加标词性,《多功能》(2005.12)与之同步,这两件事,标志着我国对现代汉语、汉字的研究和辞书编纂跨上了信息时代的新台阶。《多功能》语法属性的标注,是有它自身的特点的。语法属性标注在每个义项前实施。从语言学的观点看字典,绝大部分字头是单音节词,单音节词的义项一般说都是多义项的,汉语缺乏形态,词性的确定按词在句中的功能和意义,故词性的确定在词典之外,但一旦确定,又必须在词典之内,即与词典的义项相一致,这个一致,本质上是词性与意义的一致。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词性受制于意义,受制于义项,对保证词性标注的正确性有重要价值。反过来说,标注词性也会促进释义更准确,因编纂者会力求释文体现词性。如果释文难以体现词性时,书证又可帮助明确。例:

摸 mō ①动。用手接触:抚~……②动。伸手探取(多指不用眼看):~鱼……③动。试着了解:~底……④动。在黑暗中试探着行动:~黑儿|小分队夜里~进了敌人阵地。

援例可知一般状况:以词性统领义项,以书证证明释义。一看便知,词性与释义是相匹配的。其中第四义项似难以由释义寻绎词性,然书证可予补正其动词性质。书证,不用说,书证是有语料库作基础的,决非临时想出。因为词字是单音节词,释义和书证尽量带出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这当然也是编者语言学眼光的反映。例“命”字下:释义中出现的有“生命、性命、命运、差遣、给予、生存、生活”,书证中出现的有“命案、救命、一命呜呼、寿命、长命百岁、算命、命中注定、听天由命、奉命、遵命、待命、唯命是从、命名、命题、相依为命”,共22个双音节或多

音节词语,编者完全用语言学眼光来考虑字典的编纂,可见一斑。

《多功能》标词性完全是为释义服务的,所标内容仅限于名、动、形、数、量等十二大词类,不再标下位语法范畴。遇有下位语法属性时则用更明确的释义语言表达出来。例:

下 xià (23) 动。用在动词后,有时读轻声。1.(按:不标趋向动词)表示动作由高到低的趋向:坐~|放~|跳~|传~命令。2.(按:不标完成或结果动词)表示动作完成或有结果:打~基础|拿~这个任务|准备~一桌饭菜。

既然词类仅十二类,同一字头下标同一词类但分释多个义项,这就为我们研究某一词类的下位分类提供语义根据。一个“揽”字,五个义项全是动词,一是用胳膊围,如把孩子揽在怀里。二是用绳子捆,如揽材火。三是延揽,如揽事情、人才、责任。四是把持,如揽权。五是采摘,如揽月。仅就“揽”这个动词看,可分对人是施动,对物施动,对对象物、观念物施动,对权力类施动,对大尺度宏观宇宙施动,这自然启发着我们对动词作语义分类的思考。这就是所谓“好的词典的研究价值”之所在。

《多功能》给语素字标语法属性,更是一大创举。过去有所谓名素、动素、形素等说法,如今的做法有二,一是对单音节单语素的语素字直接标语法性质,二是对双音节单语素构成的词标语法性质。例如:

蔼 ǎi ①形。和气;和善:和~|~然可亲。②〈文〉形。繁茂;幽暗:幽~。

腼 miǎn [腼腆(tiǎn)]形。因害羞而神情不自然:她很~,不敢当众说话。

可以说,《多功能》的这一做法,使语素的语法属性问题合法化了。

《多功能》的释义——因为该字典的亮点多,似乎不必谈它的释义了,但我们要说,释义是辞书之本,是不能不说及的。这里我们仅说一点:和有关词典作些比较,看一看《多功能》对义项的新开拓。例“门”字:因有“水门事件”“伊拉克门”“伊朗门”“白水门”等新的说法,指出“门”已演变成后缀,且有了“丑闻”“不光彩的事件”等意义。为慎重起见,现列在知识窗观察。一个最常用的“放”字,因为有“放音乐”“放电影”“放录像”等说法,增加了义项“动、播送”。又因有“放风筝”“放木排”“放荷花灯”等说法,增加了义项“动、使物体随气流飘动或随水漂浮”。不能说义项越多越好,但“放”字下这两个新增的义项,还不能说是多余的。不用说,义项的增列或减少都是艰苦的劳动,生活的观察,语料的积累,理性的挖掘,从概念世界向语言世界的移置,都是必不可少的功夫。

第四板块词语苑板块,是语言学和文化学思想的双重体现。说是语言学的,由语素字构词,分三大类:语词、百科词、新词,示知该语素的构词能力,这三类都列有正序词和逆序词,例如“本”字下,既有“本分、本领”,也有“范本、基本”,既有“成本、资本”,也有“本初子午线”,既有“本真”,也有“文本、考本”,这对揭示构词能力大有益处,也便于实用,有时我们更需要查个逆序词。说是文化学的,词语苑自然是文化镜像(mirror image of culture),照见若干常用的、稳定的词语,照见该语素的能产性,触发对该语素及由它构成的一小批词语的文化联想,乃至照见语言世界与相应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结与转换。

集中体现编纂者的历史文化学思想的,是第六板块知识窗板块。该板块紧扣某字展开高雅文化的诠释,令读者喜闻乐见,令研究者击节叹赏。因“紧扣”,故不枝蔓;因“高雅”,故能以古今中外的知识融入字典而为一典之机构要义。书中这类例证举不胜举。插图体现的文化思想也是明显的。不仅能使字典图文并茂,展示和强化视觉形象,更是汇集古今长物,颇可拓展思路,凝练认识。最多的插了六幅图,如“帽”

字下。

综上所述,辞书编纂是认识语言世界的重要方法。《新华多功能字典》在编纂中坚持收字的国家标准,新增 575 字也应看作规范字,“规范化提示”则更具体地讲述规范化。书中七大板块反映的知识性体现了编纂者的三大学术思想:形态学思想、语言学思想和历史文化学思想。我们以规范性和以形态学、语言学、历史文化学为要义的知识性推许《多功能》。该书也有不足之处。

一是用作元语言的词不见于被释词。例:“窠”字下有“窠臼”一词:“鸟窠和春臼。”书中无“春臼”,仅有“舂米”“舂药”。

二是有些释义尚需再推敲。例:“弦”字下:“我国古代数学指不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事实是: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也叫弦。

三是既是字典,又设“知识窗”提供古今文字知识,涉及不少甲金文字知识,而很有特色的战国文字知识未及。近年来简帛学研究令人瞩目,而《多功能》未予关注,是一缺憾。如“为”字下引甲文释为“模拟人牵象”,甚好,但《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楚竹简》中的“为”字非常有特色,书中未及。

主要参考文献

曹先擢、苏培成《新华多功能字典》,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程荣《字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年版。

黄建华《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李尔纲《现代辞典学导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2 年版。

邹酆《辞书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邹酆《辞书学丛稿》,崇文书局 2004 年版。

邹酆《中国辞书学史概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语言世界中的异同和相反对待之辨^①

——读《同义成语词典》和《反义成语词典》

蒋荫楠教授编著的《同义成语词典》(以下简称《同义》)和《反义成语词典》(以下简称《反义》)不久前作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应用成语词典系列”出了新版(2006.6)。与此前出的几个版本相比^②,新版颇具海派的现代化装帧设计特色,封面的咖啡色背景显得凝练深重中带有几分娴雅华贵,各页标有拼音字母顺序纸印给查检带来现代化的便捷,排版的新颖显豁坐收吸引读者眼球的奇效,如此等等,皆胜意迭出,清新可喜。从内容上看,《同义》增订本 57.9 万字,新版仅 37.1 万字,《反义》增订本 53 万字,新版仅 35.2 万字,可见大大“瘦身”了,“瘦身”意味着求精。从时间上看,从初版到新版,《同义》已历时 19 年,《反义》已历时 18 年。“瘦身”20 万,历时近 20 年,数字背后是精品打造者精益求精的信守,是浮躁世风下卓然不群的岸异。

一、成语文化和《同义》《反义》逻辑体例

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说“守株待兔”,战国后期《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浮现脑海,几分揶揄之情平添心头。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忠恳勤恪,矢志不渝的诸葛武侯的形象立即出现在眼前,而且中国传统道德“忠信之道”的实践规范和价值标准显得十分清晰,它似乎无须教谕,后人每使用一次,词汇的耗散之中却会给它增加新的

① 本文原载《辞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② 《同义》有: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增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反义》有: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一版,1991 年修订本二版,2001 年增订本版。

智慧和力量,以至于愈积愈深,历久弥新,且永无止日。要使语言世界中的成千上万的成语进入“同义成语”和“反义成语”系列,思维运动过程十分复杂,付出的劳动难以想象。

“同义成语”,那是从“同”入手了,然而不,从“异”入手。基本体例是,甲、乙两条共同组成同义成语,用“异”囊括甲条和乙条,最后总结该条的“同”。“同义”比较的过程是从“异”到“同”,因而是“异同”论,而非“同异”论。这一运作过程,是符合一般认识过程的。科学认知规范和技术操作规范是有区别的^①,词典编纂体例无疑是编纂技术的操作规范,但它更是科学认知规范。“异”就是特色,当我们要认识甲、乙两个相同相近事物时,立足于甲,相对于乙,指出甲与乙之比的相异点,以凸显甲的特色;立足于乙,相对于甲,指出乙与甲之比的相异点,以凸显乙的特色。在辨“异”的基础上,进而得出甲、乙双方都具备的相同之处。应予以注意的是,在立足于甲,或立足于乙寻找各自的相异点时,必然会在“异”中求“同”,但这一点往往仅作为一个思考片断存在,在辨“异”大栏目下实际表达时只能被隐去。最后的认“同”,既是甲、乙双方的总体把握和比较的结果,也是对“异”中求“同”中被隐去的内容的包含和再现。《同义》从“异”到“同”,这就是所谓“认同”实际上是“认异”。《同义》用来认识语言世界的方法,编纂的体例,与一般逻辑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它的科学性所在。

《反义》当然应该选相反为义的成语,但从语义学的观点看 $M(+a+b+c)$ 与 $N(-a-b-c)$ 固然是反义, $M(+a+b+c)$ 与 $N(-a-b+c)$, 甚至与 $N(-a+b+c)$ 也是反义(式中 M 、 N 表意义, a 、 b 、 c 表义项或义素)。如此看来,“反义”既是意义互相反对,也是意义互反有通的,即既有对立、对峙,也有对待、对等,亦即所谓相反而相成。客观世界的情况是既有矛盾的斗争性,又有矛盾的同一性,两者都可能成为

① 萧焜焘等著《科学认识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64 页。

主要的,但斗争中总是有同一。矛盾律的使用总是以同一律为前提的,没有被说明对象的共同存在,一体可观,矛盾律就成了无的放矢,形同虚设。亚里士多德曾认为不矛盾律才是思维的基本准则。《反义》条目的设置既有明确无误的对立、对峙强相反,也有对待、对等的弱相反。强相反的条目如:沧海横流—歌舞升平、金枝玉叶—枯枝败叶。弱相反的条目如:白璧微瑕—完美无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走马观花—下马观花。就《反义》的释义体例看,设甲、乙两条目为反义成语,则甲、乙条目下共引同时使用的书证;甲条和乙条下分别释义。其内在逻辑竟是如此简单明晰。值得注意的是,《同义》有辨“异”说“同”的文字,而《反义》却无辨“相反”“相对”的文字。这么说,“反义”何可而见?曰:已存在于各自的释义和书证之中。由本体认识体现反义,是《反义》的最重要特色,与《同义》由本体辨“异”说“同”而直接“同义”所在的做法不同,是由各自本体的释义而间接知双方互“反”的做法。

二、板块结构的切入作用和书证的“批判”价值

新版《同义》和《反义》以条目形成板块,一个条目就是一个大板块,这极便于读者的把握,自然也方便研究者的进入。一个完整的同义板块由“同义甲乙双方条目、注音、共同书证;甲方条目和辨异释义、书证、亦作和亦作书证;乙方条目和认同释义、书证、亦作和亦作书证、指同、辨”十一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反义板块由“反义甲乙双方条目、甲方条目和注音、释义、书证、亦作和亦作书证;乙方条目和注音、释义、书证、亦作和亦作书、辨”十个方面构成。可以说,板块结构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研究价值。

以条目的成立为例,条目当然只能冠之于板块之首,但实际上它处于一板之后,即在占有大量材料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条目都是双向组合式的,双向组合就得有依据,依据就是材料及其研究。

有些组合条目似乎一看便知,无需材料。如《同义》中的“报仇雪耻/报仇雪恨”、“半斤八两/不相上下”,这多半是构成要素多同,或意义浅俗,而对那些构成要素不同,意义较深的,就不是一望即知,而是要围绕辨义下功夫了。例如:不名一钱/阮囊羞涩、瞠乎其后/望尘莫及、一衣带水/盈盈一水、火中取栗/为人作嫁。《反义》中“由正相反对的主要构成要素知其反义”的条目是有的,如“丰衣足食—缺衣少食”、“怒形于色—喜形于色”,相当多的条目是要辨其总体意义的,例如:门当户对—齐大非偶、顺藤摸瓜—缘木求鱼。由此可知,同义和反义条目的成立,都有“辨其总体意义”的操作过程,操作的依据只能是书证。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总体的“整个研究”的整体观视野才是最好的认识途径,只有它才能作出“概念的发现”。^①事实正是如此,经“总体把握”方能“发现”其同义、反义。“总体意义辨”是汉语语义学的重要内容,弄清了词语的意义则大体会用,王力强调古代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主,都是基于汉语的本体特点及其应用途径而言的。

寻觅书证是顾炎武所说的治学的“采铜”功夫。据笔者研究,新版《同义》收词 1 195 条,共引书证 2 727 条(含共同书证 140 条,亦作书证 197, $1\ 195 \times 2 + 140 + 197 = 2\ 727$),较原增订版五千多条书证删削几半。新版《反义》收词 1 165 条,共引书证 2 782 条(含共同书证 178 条,亦作书证 274 条, $1\ 165 \times 2 + 178 + 274 = 2\ 782$),较原增订版五千多条书证亦删削几半。这新版二典 5 509 条书证,或者说原版二典书证数是一万多条,最不容易采集到的是含双向条的书证 318 条(《同义》有 140 条+《反义》178 条),可知作者之勤密和艰辛。由“采铜”而得的书证,本质上是经验的事实,或称经验性质的历史材料,这对历史科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历史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础。事不啻此,经过采集、挑选、思考确认,成为可揭示词义内在规律的书证,已不是一般的材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6 页。

料,而是反映历史变化,说明逻辑构成,形成语义构造的科学知识和评价概念,正是语音史研究的方法论。^①当今英美显学经验派历史哲学被称为“批判历史哲学”,与黑格尔强调一般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大不相同,而与语言解释哲学密切相关。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主张在批判中“取舍材料”,在批判性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建构和历史的批判,他的一句名言是:“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语言史、词典学,都是历史科学,词典书证,本质上是批判的,其作用是批判地建构由义项组成的语义场,使用者获得的是经查检而得的普适性功能,研究者获得的是编纂者的语言学、词典学等的“批判历史哲学”思想。对《同义》和《反义》来说,有:成语形成丰富的同义、反义组合和聚合,不同层次的组合形成相应的逻辑结构,聚合中包含语言史的发展进程,现代成语的书证是历史演进中的截流,截流就是断裂,词典学就是把语言绵延中的断裂缝合在一起,这一功能与批判分析做法是一致的。^②如此等等。

三、释义的“主体性范畴”及其建构

释义是词典的灵魂。同义、反义是条目的本体义,释义则是编纂者的主体思维活动的结果,因而是主体义。连词典的批评原则也是着眼于主体性理论原则。^③凡词典都有词条的本体义和释义者的主体义的分,凡释义都可以主体性范畴研究之。主体性范畴,归根到底是研究者研究实践的结果,受研究实践的制约,完成于研究实践的全过程,最后受研究实践和使用实践的检验,因而主体性不是主观主义的胡来。现在来看看《同义》和《反义》是怎样完成释义的主体性范畴的建构的。

① 齐冲天著,唐作藩审定《汉语史简论》,大象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

② 参见李大强《分析悖论的分析》,《哲学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73 页。

③ 魏向清《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6 页。

一是切入构成成语(词组)的词义,且明确写进释义,在弄清构成词词义的基础上进而把握住成语的本义。即使不必写进释义,也是紧扣构成词词义释本义。紧扣本义,正体现主体性范畴的必须遵循的客观依据。例:

《同义》1 半途而废/2 功亏一篑/3 前功尽弃

[异]1 废:停止,废止。走到半路就停下来了。2 亏:欠少,差。篑:盛土的筐。筑一座九仞高的土山,因为缺少最后一筐土,山就没有筑成。3 以前的努力、功劳或成绩完全废弃或被抹杀。

二是写好修辞义。修辞义不由成语的内部构成要素而得,而由外部而得,更需要发挥主体性思维中的实践能动作用。实践的指向,主要还是从相关书证中提取修辞义。又修辞义的语用性强,特征明显。列入辨异。如上例:

[异]1 比喻做了一半尚未完成就废弃了。有书证二条,皆用比喻义。2 比喻做一件事只差一点未能完成。语义重。有书证二条,皆用比喻义。

三是在辨析结构形式的基础上写好释义,释义体现结构,准确性强。源自西方学术中的“主体性范畴”本来就与西方形上学中的形式化、数字化密切相关。今用“主体性范畴”审视结构分析,结构形式之于“主体性范畴”的作用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例:

《反义》1 百折不挠—2 因噎废食

1 无论受到多少困难曲折,都不屈服退缩。2 吃东西卡住喉咙,因而连饭也不吃了。

这一释义是以编纂者所作的结构分析为基础的,以1为:前半截为“数—动”偏正结构,后半截为“副—动”偏正结构,前后两截之间为偏正关系。以2为:前半截为介词结构,后半截为动宾结构,前后两截之间为偏正关系。1、2的释文正与此相配。像这样的结构形式分析,《同义》、《反义》原版各条俱见,今已删除,但结构分析为“主体性范畴”释义

的基础,释义与结构分析匹配之理念未变,贯彻二典始终。

四是释义中指出成语在句中的功能。这实际上是以结构分析为基础的“主体性范畴”释义完成后,“主体性范畴”向另一种结构形式的回归。例:

《同义》1 不胫而走/2 不翼而飞

[异]1 没有腿却能快跑。2 没有翅膀却飞走了。

[同]都由“不……而……”的格式组成,都可以形容消息传播迅速。

都常作谓语,亦作状语、定语。

《反义》1 格格不入—2 水乳交融

1 常作谓语,亦作定语、宾语。2 常作谓语、定语,亦作补语。

五是语源的研究,对相关成语的来源作出考订和说明。例如:

《同义》1 错综复杂/2 扑朔迷离

2 语本北朝·无名氏《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后以“扑朔迷离”比喻事物错综复杂,不易辨明真相。

《反义》1 高枕而卧—2 枕戈待旦

1 语本《战国策齐策四》……2 语出《晋书刘琨传》……

《同义》1 尔虞我诈/2 钩心斗角

1 语本《左传宣公十五年》……2 语出杜牧《阿房宫赋》……

语源,就汉语成语而言,归根到底还是历史语义的诠释,在现代用例的基础上的释义是现代语义的诠释,从成语的历史语义到现代语义发展,同义或反义的不同语源之间的比较,均有丰富的文化镜像可作主体观照。

由以上可见,《同义成语词典》从“异”入手,用“异”囊括甲条和乙条,最后归结该条的“同”,因而是“异同”论,而非“同异”论;《反义成语词典》之反义存在于各自的释义和书证中,由本体认识体现反义,并没有辨“相反”“相对”的文字。两书以条目形成板块,所有条目的双向组

成都有“辨义”的操作过程,操作的依据只能是书证。文章认为,词典的书证是历史演进的截流,能体现“批判历史哲学”思想。同义、反义是条目的本体义,但释义则是编纂者主体思维的结果,因而又是主体义。我们分析了两书主体性范畴结构的四大途径:把握本义、写好修辞义、辨析结构义、体现功能义。而成语语源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镜像可作主体观照。

主要参考文献

- 巢峰等《辞书的修订与创新》,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蒋荫楠《同义成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
蒋荫楠《反义成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
李尔纲《现代词典学导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2 年版。
林玉山《辞书学概论》,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魏向清《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萧焜焘等《科学认识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一部有解释功力的辞书^①

——读《当代民谚民谣》

辞书编纂专家蒋荫楠教授继《同义成语词典》(1987、2001)和《反义成语词典》(1988、2001)之后,又出版了一部新辞书《当代民谚民谣》^②。据该书的《序》介绍,该书从1986年就开始酝酿,几经二十春秋,于今见书,是值得庆贺的。“谚谣”一说,本是极易误作好事者传散之“谣言”的近义结构“谣谚”的倒序结构。书中《自序》说,仅这个名称就“思前虑后,颇费了一番工夫,至今也仅是差强人意而已”。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起个名称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编纂成书的功夫了。我以为作者的功夫主要凝聚在全书的解释功力上了。谚谣,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政事法规,民生人伦,主流社会,普通百姓,各色人等,乃至三教九流,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引起误解。翻检此书,又使我想起编著者一贯的人品和学品,用一个字说之,那就是个“正”字。这首先是思想方法上的“正”。有了这个“正”、“正派”,就会编出正确、正路的好书来。

一部有解释功力的辞书

375

一、为民立言,为开太平

民谚民谣,俗称顺口溜,这玩意儿能有什么学问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倾心此事二十年,没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强烈的信念的支配是很难想象的。《自序》中说:“民谚民谣是语海中的明珠,艺苑中的瑰宝。”藏在编著者心目中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写的“民”字,为生民立

① 本文原载《辞书研究》2008年第5期。

② 蒋荫楠编著,李忠清校订《当代民谚民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言,为新世纪开太平,正是其纂集民谚民谣的目的。作为学术研究,编著者搜集到古代的民谚民谣著录和著作 8 种,近人的著录和著作 23 种。但总的说谚语多而民谣少,“尤其是建国以来丰富多彩的当代民谚民谣,迄今少见专门、全面的辑集和研究”,为落实心目中深藏的一个“民”字,书中的触角直伸民谚民谣。一提到民谚民谣,就被有些人误解为讽刺讥诮,怨恨不满之类,于是专嗜卑俗,詈骂笑谈,无非俚言市语之类,总以为这样才“够味”,才“过瘾”,以至于以往出的民谚民谣书中,多半是这一类。《自序》认为,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是不足取的。书中强调“新时代”这个大背景,紧紧系连着编著者讴歌赞美之心迹灵动,有了这一正确的立足点,看问题就比较全面,少了许多片面性。书中把新时代的民谚民谣分成五大类。A 颂扬褒奖型、B 批评讽刺型、C 经验总结型、D 片面谬误型、E 其他。以字母 A、B 为例,音序开头的条目共有 118 条, A 类有 15 条,占 12.7%, B 类 54 条,占 45.8%, C 类 37 条,占 31%, D 类 6 条,占 5%, E 类 6 条,占 5%。可见一斑。

所谓歌颂,包括老百姓颂扬自己的生命、生活、生产等。例如:

八十不稀奇,九十多来西,百岁笑咪咪,七十小弟弟,六十还在摇篮里。 蒋注:谓新时代生活幸福安乐,人们健康长寿,六七十岁还正是生命的黄金时代。

白米饭,红炭火,神仙不如我。 蒋注:一年到头吃白米饭,冬天冷了烤炭火,日子过得舒服自在。

包产到了户,家家有干部;男的当队长,女的管财务。 蒋注:反映农民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拥护和喜悦。

山顶戴帽子,山腰缠带子,山下铺毯子。 蒋注:“戴帽子”、“缠带子”,形容封山育林,绿化山岭之景况。“铺毯子”,形容庄稼葱绿丰茂。谓山头植乔木,山腰栽果树,山下种庄稼,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蒋注:吴

桥,河北省吴桥县,在河北省东南部、南运河东岸,素有“杂技之乡”之称。

送礼不要,请吃不到,说情无效。 蒋注:对廉洁奉公的干部的赞扬。

把全书这些条目收在一起,活现出一幅太平盛世福祉图。应该说,这类条目主要还是人类感情、人生向往和现实生活的真切反映,体现人类对生命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对农家乐的陶醉,不能说是粉饰太平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对象的演绎和生活的经验事实是一致的,后者的展现正是前者的生动表述。例如:

摆地摊来跑行商,烧饼油条肉丝汤,鸡鸭鱼肉样样有,五谷杂粮满市场。 蒋注:形容山区小镇集市贸易繁荣兴旺。

摆个小摊,顶个县官;办个小厂,顶个省长。 蒋注:表明某些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可观,经商致富快。

户户加工厂,住屋是车间,人人是工人,到处建仓库。 蒋注:形容乡村企业蓬勃发展情况。

这类条目,既是歌颂,又是现实的文本说明书。在编纂者看来,歌颂作为民谚民谣的一种体式,它同样只是反映生活本真的一种实际手段而已。如此看来,歌颂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评判,更重要的是一种求真手段。马克思曾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①这就是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主体”,而国家是处于被叙述地位的述位。这类歌颂条目的直接对象是“主体”,也就是说它歌颂的对象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它们只能从社会底层间接反映“政治国家”的面貌,但唯其从社会底层的“主体”反映逻辑述位,因而更具真理性,也更有说服力。又因“直接对象”和“间接被述”的区别,使歌颂避免了许多“媚俗”的孱弱“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页。

生相”，显示出健康的格调。

在世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直接改进和改善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向往这第一生产力，或已受惠于这第一生产力的基本群众，不会不发乎心声而纵情歌唱的。例如：

吃粮不用挑，吃水不用吊，煮饭不用草，洗澡不用烧，便桶不用倒，通讯不用跑。

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洗澡不出院，看戏在炕头。 蒋注：谓部分农村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的美好生活。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楼下铺地板，楼上铺地毯。 蒋注：谓某些地区的农民的现代化的居住条件。

电话一响，财神就到。 蒋注：谓商业电信联系大大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加速了经济的发展。

耕翻不用镐，插种不弯腰，灌水不用挑，收割不用刀。 蒋注：八十年代流传于江苏省太仓县。

如把经验总结类的条目也放进去，这类条目就更多。例如：

帮件衣服暖一时，教会技术帮一世。

包产到了户，没有技术难致富。

海有底，山有顶，技术革命无止境。

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到。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尔库塞曾认为，现代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崭新生活，会促进人们与现存制度之间的同一与和谐，减少摩擦与对立。歌颂和正面总结经验当然也就应运而生。本词典歌颂类条目收进了一定数量的与科技进步有关的条目，实在也是时代的必然，较之一些比较老的传统条目（本词典当然也收进去了），如“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注进了科学技术时代的新内容，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民谚民谣的一道亮丽的景观。我们设想，要是反对收“歌颂”等类的条目，与科技进步有关的歌谣也就只能拒之门外，那是多么的不合理！

科技进步条目的收录,无疑使“歌颂”等类的条目跃出新意,书中收录的一些比较传统的歌颂条目,因其明显的时代特征铸就其现代性,读来并不使人感到陈旧,恰恰使人感到重新沐浴历史的阳光,颇为条目中的盎然春意所激奋。例如:

三中全会除了紧箍咒,六中全会吃了定心丸,十二大给咱插上了金翅膀。

三中全会送来责任田,十二大吃下定心丸。有余粮,有存款,文化活动大开展,日子越过越香甜。

二、新时代的忧患意识

关于批评讽刺类条目,本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收集歌谣,起自上古。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学者有采诗说。著《汉书》的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为《公羊传》作注释的何休也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闻于天子。”《诗经》分风、雅、颂三大块,三大块的区分除了有乐律上的原因以外,内容上则雅、颂多歌颂,十五国风除了写民情民性的爱情以外,反映民意民愿的批评讽刺是其主要内容。“闻于天子”为资政,深层理路是“忧患”。岂止是十五国风,清代学者魏源说,一部《十三经》的主题就是写“圣人忧患”。有理由认为,编纂者花十五年的功夫成就其书,其人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所驱使,胸藏“忧患”,书含资政。这正是一位正直学者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念。从数量看,书中批评讽刺类条目是最多的。编纂者以严肃态度赋予这类条目以确定的历史内容,在时间或地区上加以限制,能不泛化的就决不让它泛化,手法就是作注释并含书证的限定作用。例如:

十天半月不露面,群众有事找不见。 蒋注:谓少数村干部撒下

村里工作不干，一心搞发家致富，群众有事难以找到他们。八十年代流传于甘肃酒泉等地。

手拿锄头种种地，哪管舞文弄墨。 蒋注：谓某些农民不重视学习和运用文化科学知识。1978年以前流传于部分农村地区。

亲戚“班子”“驸马团”，小姐太太打字员，王孙公子汽车队，七姑八姨上妇联。 蒋注：谓机关单位中干部间多有裙带关系。一度流传于黑龙江通河县。引《光明日报》1989年2月5日第2版夏欣《无了回避，为了清廉》：“在县级以上机关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家庭裙带关系的渗入更为明显……”

不轻易泛化，把批评讽刺对象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本身是恪守真实性、科学性的一种手段。功能语言学强调“典型语言环境”对话语理解的决定性作用，要是话语范围不明确，话语本身所包含的经验意义就难以正确理解，从而作出歪曲的解释。如果把民谚民谣看作艺术品，艺术的真实离不开典型环境中的概括，而不是泛时化和形式主义的类推。

难以确指的有普遍性的条目，多半是些理念性较强的条目。所举错误观念任何时候都是需要批评的对象，条目本身就有泛时性。例：

思想骄，作风漂。 蒋注：谓骄傲自满的人，作风上也显得轻浮而不踏实。

前半步危险，后半步保险。 蒋注：谓畏葸不前，明哲保身的精神状态。

离离结结离离结，结结离离结结离。 蒋注：讥刺某些人婚恋观不严肃，视结婚、离婚为儿戏。

如果要对全书的批评讽刺型条目作一分类，则有：一是批评和讽刺某些领导机关的腐败。例如：

清水衙门水不清。

二是批评和讽刺某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例如：

绕开有权的,不管拿钱的,专抓种田的。 蒋注:八十年代一度流传于安徽省怀远县。并引书证云:“计划生育为什么在怀远一度推不动?根子在干部身上……”

三是批评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例如:

四化加一化,全靠关系化。 蒋注引《瞭望》1985年第46期伏琛《谣谚和民意》云:“如‘四化加一化,全靠关系化’以及‘三个印章,抵不上一个老乡’,这些谚语是讽刺社会上以亲朋和利益关系而编织起来的层层关系网。”

四是批评群众中的落后现象,起自我教育作用。例如:

儿子结次婚,老子扒层皮;娶亲花费多,日子不好过。 蒋注引《领导科学》(郑州)1989年第4期:“(有)抨击社会上婚事奢办之风的……”

五是反映真实状况,起警戒、教谕作用。例如:

穷山秃岭干河川,广种薄收靠老天,缺肥少水地板瘦。 蒋注:谓风沙肆虐致使土地贫瘠之状况。八十年代中期前流传于内蒙古赤峰市郊城子乡。

三分利,打破头;十分利,不要命。 蒋注引《扬子晚报》1994年2月2日第10版黄建国《烟花爆炸忧思录》。

批评讽刺,源于关爱。从整体的观点看,更可看出这一点。全书五大类内容可谓“两分歌颂四分刺,还有三分各系时”,谚语歌谣是民众文化心理的产物,收集的目的,可谓从古到今,皆作治政之镜,包括民间的自我教育作用。收集者的动机和动力,皆为心系苍生,忧患意识。从当代实践理论的发展看,上述种种类别的批评讽刺,正是以文化、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批判性的自由思想”范畴,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观照及其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中间原理。^①其学术理论意义深刻如此。

① 参见孙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三、语言文字的关注

作为一名语言工作者,收集者对条目予以更多的语言学关注,在各条的解释(犹词典条目的释义)、书证和释义体例术语的统一上,都下了很多功夫,这从前面的举证已可看出。以释义体例术语为例,大体有:“指”,用来解释词语,指说具体的事件和情况。“喻指”,在比喻的基础上指说某事。“形容”,用来描写某种状况。“谓”用来揭示一句话的内涵。“意谓”用来揭示带有比喻性表达条目的内涵。“比喻”用来明确条目中比喻修辞手法所表达的内容。“流传于”,用说流布状况。“颂”指歌颂性条目。用“讥刺”“讥诮(嘲讽)”分别说批评讽刺性条目。加“按”字并加括号考证条目的来历。不以术语直接解释例。例如:

商品大旅游,价格滚雪球。 蒋注:“商品大旅游”,指商品几经转手倒卖。“滚雪球”,喻指商品价格越来越高。谓商品流通环节太多,使价格越来越高。

金山,银山,党的政策是靠山。 蒋注:意谓由于党的政策好,粮棉丰收堆成山。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蒋注:比喻依赖自己所在地方的客观条件而生活。

商场如战场。 蒋注:流传于工商界。

高楼大厦不多,小日子过得不错。 蒋注:颂天津市之发展以人为本,天津市人民生活愈来愈幸福之民谚。

清水衙门水不清。 蒋注:讥刺某些职权小、经费少、福利少的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腐败现象。

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最后全靠领导算计。 蒋注:讥诮向上级部门统计汇报不实求是……

跟着款哥走,拉着买单的手。 蒋注:按,此民谣系仿陈家丽作

词,陈志远作曲的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而作,原歌词头两句为“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术语是解释的规范,理解是解释的目的,而“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①术语的应用显然是为了表达理解,表达编纂者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和评价,前举出的条目都能说明这一问题,如果连同书证一起读,则评价就更清楚了。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主条下带有附条,由以上可见,《当代民谚民谣》的编纂发端于一个“民”字,为生民立言,为新世纪开太平,是纂集民谚民谣的目的。书中分民谚民谣五大类。歌颂类体现人类对生命的热爱,并非粉饰太平。批评讽刺类缘于“忧患”之心,是“批判性自由思想”的反映。文中归纳出该书的释义体例术语种种,术语是解释规范,也是评价手段。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条目的书证出处,未收集流传于口头,而未见之书报,尚无书证的条目。也就是说,作者的操作是书斋活动,而非采风田野作业,因而所收条目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书末是可以附上采风而得的“录以备考条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蒋荫楠《当代民谚民谣》,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赵振铎《辞书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2 页。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序^①

宜志硕士生阶段从师于陈昌仪教授,博士生阶段从师于钱曾怡教授,名师高徒,学有专长。经过较为激烈的竞争后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系2002年度博士后。来系后,在汉语言文字学科导师组引领下,特别是亲炙于著名音韵学家和方言学家鲁国尧教授,商量愈加邃密,培养转致深沉,升华学术,精密理路。我作为工作联系人,目睹其自我锤炼的全过程,甚感其田野作业(方言调查)的辛劳和书斋生活(下文献功夫)的勤劬,竟至于无法推诿其撰序之约,谨赞一二言以表其刻苦自砺的人品和务实求真的学品,或“二品”合一,称其勤奋、谨正可也。

博后出站报告《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从出炉到目下成书,修改已不知凡几。选题本身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江淮方言研究所的研究任务。江淮官话既是官话,当然是官话方言中的一支。就地理位置而言,大体位居北方官话和南方吴语之间,移民史和语言接触史都使江淮官话积淀得异彩纷呈。今检视全书,条达深邃,可观甚多。作者调查了12个代表点,报告其声、韵、调。自然,这是把方言调查作为方音研究的第一步。继而参酌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被研究对象的声、韵、调。这仍然是描写,历史的解释则根据地域特征,按空间维度推演语音史的发展,揭示出相关语音现象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过程。在共时描写和历时解释中,引人注目的是精庄知章组声母的今读问题,归纳出的语音演变公式揭示出与ts组、tʂ组、tɕ组的对应关系,令人一目了然。颇饶趣旨的是,由庄组字的今读看内外转,书中列述学史上有关内外转的种种推测,扑朔迷离,作者认为,从安徽江淮官话看,罗常培的元

① 本文刊于孙宜志教授原著,黄山书社2006年版。

音高低说更合理。余谓：操江淮官话的戴震 1777 年《声类表》以开口内转重声为开口一等，开口外转重声为开口三等，开口内转轻声为开口二等，开口外转轻声为开口四等……不也是元音高低说吗？一等开口度洪大，二等开口度次大，开口度大，元音舌位就低，开口度小，元音舌位就高。开合口在古音研究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侃古韵二十八部全是一等韵和四等韵，正表明他懂得音理。今以宜志表出之江淮方言庄组字观之，尤足徵信。

元音高化是从上古到中古语音发展的普遍性法则，方言也不例外，但为何高化，高化的过程如何，均须具体而微。书中将语音的发展与发音音理相结合，申述“由于三四等韵母介音的影响，导致前元音系列的各元音舌位依次升高”的理由，共有四条，且以合肥话为例作出合乎音理的说明，令人信服。因思致的广袤，书中还揭橥其他汉语方言元音高化的不同情形，这就昭示我们：同是普遍性法则，具体实施时却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可见语言研究之复杂，实证研究之切要。

方言研究，民族语言研究等，都是活语言研究，是“动手动脚”（《史语所集刊》一本一分语）的田野作业的实证研究，与书斋里的文献文本语言的经验研究（当然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不尽相同。在当今国际学术文化大潮中，因对西方实证科学精神的诉求而更多地呼唤前者，证据之一：就连我这个不搞方言的人（惭愧！），书架上竟然也排起了长长的方言书两大排。宜志的旨趣，恐怕是南大中文系给打上的烙印，是将原本非常熟悉的田野作业和文献语言研究，将实证科学研究与经验科学研究相结合，其显著成效，是书中有“从历史文献看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的演变”的专章，考出方以智《切韵声原》“最主要的是反映了明末桐城方音的特点”，几乎画出该项研究的一个新的天地。

记得 2004 年初夏，中文系博后中期考核时，对宜志的一致评价是优秀等级，并认为他的成果已达到国家级水准，理由是他在国家特级刊

物《中国语文》和核心刊物《方言》发表了论文。今又逢他的出站报告出版,为之欣喜不已。克绍陈、钱、鲁诸师裘,前程无量,孙君勉之矣!

是忝为序。

2006 年 2 月

《汉语词语与对外汉语研究》序^①

杨晓黎同志的论文集《汉语词语与对外汉语研究》共收录 1981 年至 2006 年发表的 25 篇论文,分成 3 个板块,可以概括成:汉语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作家作品语言研究;汉语民族特点和言语交际认同。25 年的辛勤耕耘展现出 3 大块 25 篇,不称宏富,却见审慎务实。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在其教学本身,即“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有关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都应围绕“教学”这个中心,许多与教学有关的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电化教学等都为该学科服务;许多与语言教学有关的学科,如汉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语言学教学等,也都为该学科所综采吸收;许多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相平行的学科,如汉语母语研究,外语本体研究,当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等,又都是该学科的借鉴和滋养,特别是汉语母语本体研究,是本学科的最亲密的相邻学科。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两个本体互相促进,互相砥砺。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成果会使汉语研究作换位思维,使之拓宽思路,使之更加深入细密;汉语本体研究又会使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更加贴近语言实际,使之把准汉语文化脉络,使之更加准确科学。杨晓黎同志的“汉语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专题,正是在“两个本体”间寻觅其联结互补,寻觅其必然、自由过程,寻觅其丰富内涵和引申外延的劳作和科研实践。例如,作者对传承语素的研究就是一例。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看,“语素分析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教学实践告诉人们,“利用同义的常用词或语素对应解释词语中某个带有文言色彩的语素,是对外汉语教师经常采用的简

① 本文刊于杨晓黎教授原著,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便易行的词语教学方法”，但要是告诉留学生语素“足”可以相当于常用词“脚”，“赤足”可以同义替换为“光脚”，则留学生就会将“画蛇添足”同义替换为“画蛇添脚”，问题究竟何在？于是展开了十分必要的汉语本体研究来解决这样的错误类推。研究表明：传承语素在现代汉语中的构词多书面语体，故只能说“足迹”“涉足”，却不能说“脚迹”“涉脚”；定了型的成语有稳定的传承语素，故只能说“手舞足蹈”，却不能说“手舞脚蹈”；更普遍的情形是，传承语素在构词时要受相关因素的选择性制约，如熟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类成语）对构词要素各有选择，惯用语“口头禅”“探口风”只能以固有的双音节词“口头”（本无“嘴头”）、“口风”（本无“嘴风”）进入；至于面广量大的非熟语词，对传承语素的选择取决于“历史的继承性”，如“男足”“女足”“国足”“足彩”（足球彩票）取决于已有的“足球”（无“脚球”）的说法，而无“男脚”“女脚”“脚彩”的说法，“国脚”是另一种意义。作者的结论是，语言的交际职能决定了传承语素的相对稳定性，传承语素的文雅色彩决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作者的深层理路，是在寻找从汉语母语研究通向第二汉语教学的中介。列宁在回答“科学应该从何开始”这样的问题时曾说：“一切都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并把“从联系中分割出来的单独的事实”叫作黑格尔式的“存在”，而把“联系（概念）、相互联系、联结、规律、必然性”看作揭示对象内在规则的科学链（见列宁《哲学笔记》103、297页）。本论文集的主题之一，不正是要把捉两大“存在”对象：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母语之间的中介、“联系（概念）”、规律和必然性吗！

或许是和长期从事二汉教学和专注于一汉和二汉中介研究的经历有关，作者的学术视野开阔。立足于语义学、符号学研究作家、作品，这是有见地的尝试。用语言和语言学研究法来研究其他人文领域，乃至把一切学术研究归结为语言和语言学的研究，是当代西方学术的主潮。最典型的说法，是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这里的“哲学”一词西方往往用指所有的人文学术，“批判”即研究

之意。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认为“个别作品是类似语言学中的言语的东西,是一种更加宽泛的抽象结构的具体体现。结构主义诗学和叙述学的任务就是要探寻支配文学作品的这种内在结构或‘总法则’。”(郑杭生《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336页)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几乎离不开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相关的文献学、文本学、解释学、文体分析风格学等。可以说将语言学科学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外文学界的新气象。关于颜色词的研究,早在1943年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基础》中就已见到(见该书英译本53页)。现在杨同志既研究颜色词语,又将其外延推广到形象色彩词,并用来具体研究鲁迅小说词语中的颜色词和形象色彩词义。本来,外延的推广意味着学术的推进,进而将颜色词,色彩词概念具体运用到鲁迅作品的研究,不能不说在思想方法上完成了一次“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思维全过程。十分重要的是,在这“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过程中,并没有离开语言学自身的方法学。《鲁迅小说的颜色词语论析》一文中说:“鲁迅小说包括了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系列:黑、白、红、黄、绿、蓝、青、灰、紫。”“颜色词语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形象色彩义类聚。”这正是索绪尔理论语言学横向组合(syntagmatic relation)和纵向类聚(paradigmatic relation)对待研究法中的后者。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总是遇到跨文化交际问题。当我们引用洪堡特的话“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来对此进行解释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把这里的“世界观”理解成大字眼。而杨晓黎同志在汉语的民族性和汉语交际,即属性和职能的关系上,她的理解是具体的,可以感知触摸到的。围绕汉语言的民族性和交际职能的耦合关系,论文集涉及到的问题有:从成语看汉民族的交际准则与道德规范中的讲“诚信”、“谨言慎行”密切相关;对言语交际的评价标准是看言语交际中有无修养和能

力;言语交际技巧在于正确处理好“理与情”、“简与繁”、“直与曲”、“庄与谐”四大关系,应奉行中庸,做到“言谈适度”;汉语体态语,无论是传情体态、同义体态、综合体态、礼仪体态都有自己民族特色,应注重背景,举止得体。这四条,或许是汉语所反映的汉民族的“世界观”,它显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倒是个实践理性规范。至于“V 着”的研究,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尤其是表示情貌(aspect,体)的动词词尾‘了’、‘着’、‘过’,最能反映汉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可见“V 着”的研究也是为了说明汉民族的“世界观”的。

25 年耕耘,仅有一年在南大。2005 年 9 月,杨晓黎同志负笈金陵,随中文系国家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科导师组攻读博士学位,我有幸与之一共事和学习。这时,她已经升任安徽大学正教授。既已修成正果,何以自苦为极?曰:学无止境,修知不足,深造自得,其乐无穷。随堂听课,每欣欣然言有所获,课外交谈,举恬恬然悟知可取。鼓舞云何!策进云何!与共勉之。

是忝为序。

2006. 12. 28

《两汉韵部与声调研究》序^①

2001 年秋,冠才考来南京大学当博士研究生,进校不久,他就表示要研究古音学,中国古音学史课程他连续听了两遍,屡屡自述有得。而此前,他从师许绍早教授,毕业后已在大学的讲台上讲授音韵学达十年之久,可谓学有根基,深造自得,而今来南大,沐浴导师组群体的学术光照,或可感受到一些治学方法的训练,感受到“采铜”探源的创新意识,感受到国际学术大潮背景下的若干自我涌动。将这些一般被视为“空洞虚妄”的学术理念与具体的语料相结合,则全面细致的功夫,全凭冠才本人之力。假期他总是走得迟又来得早,回到妻儿身边的时间起码打个对折。律己之严,投入充裕,外加忠恳勤恪之貌,使我深深地敬佩这位“门生长”。

古音学史如何研究?不外乎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1981)序所说:一种是读了许多书,“单刀直入地叙述这一个学术部门的历史”,一种是一本一本地介绍那些著作的体例和内容,然后涉及学术流派、渊源和影响等。无论哪一种,既要深入,学史的研究也就少不了对古音本体的考求。古音学研究是本体研究,全面的古韵分部清人已搞了两百多年,今天的研究可选择分部中的某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或专题,或在时间上选择上古前期甲骨文时代,抑或上古后期两汉时代。本体研究须从经验实证材料作概括,但离不开学术史。冠才《两汉韵部与声调研究》属于后者,故既有文献语料的经验归正,又有学术史载已有成果的借鉴。十分重要的是,时段已定,以空间为维度,突出方言区划分的重要性,使文献语料的归并各得其所,这与泯灭方言差异而作笼统归并的做

① 本文刊于刘冠才博士原著,巴蜀书社 2007 年版。

法,自然要高出一头。例如研究西汉时代脂微两部独用合用情况,将西汉诗文脂微入韵的 95 个韵段分梳于秦晋、海岱、蜀汉、荆楚、吴越、赵魏六大方言区,分别得出脂微两部在六大方言区内或独用,或合用的各自的百分比,或“分合不好确定”的结论。由西汉转入东汉,亦如是观照;由脂微两部而及相关的质物两部、真文两部,悉以遵之;至于两汉侯部研究,预设鱼部和侯部为对待,比照脂、微,不废前例。可见“以相关韵部的用韵韵段分梳于不同方言区,描写出韵部的独用、合用等情况”是全书通例。这一通例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在不同方言的背景上研究上古音。强调在空间参照系内方言背景上研究音变和语音系统内的若干重要变化,是当代异质语言理论的基本点。

书中还提出了韵尾问题,这本是现代学术中的古音构拟问题。上古阴声韵是否有韵尾,是古音学第二次大讨论(1928—1933)中的主要议题。现重申上古后期两汉的九个阴声韵部:脂部、微部、歌部、之部、幽部、宵部、侯部、鱼部、支部有相配之次入声韵,是极富挑战性的议论,其意义显然。

现在,冠才已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遇有名师志翘教授、景伦教授等指教相挟,因谓:好人不啻是一生平安,且一生渐得高攀而高升也。刘君勉之!

是忝为序。

2006 年 2 月 12 日

《〈通雅〉古音考》序^①

明末四公子，共同特点是爱国，各自的个性，陈贞慧以起草声讨阮大铖檄文，善撰表彰抗清志士散文而闻名；冒襄以善诗文，入清后不仕闻名；侯方域以演绎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闻名；方以智与冒襄同龄，以被俘后“看死如归”，“刀锯忘机”而获释佞佛闻名。60年代初著名哲学家杨献珍提出存在与思维的“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理论，并主张用“合二而一”作补充说明时，引用了方以智《东西均》里的话：“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批判杨献珍和张扬方以智几乎同时并存。可是，有谁会想到，哲人方以智的代表作恰恰是语言文字学著作《通雅》。

方以智和顾炎武都是开晚明学术风气的大家，共同特点是，都主张以实证治学，求实方能经国济世；都主张治经须从“无征不信”的小学入手，即所谓“舍经学即无理学”，亦可谓“舍理学即无经学”，更可谓“藏理学于经学”，实际上也是主张“舍小学而无经学”的；都以古音研究为学问重心，顾炎武著《音学五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方以智著《通雅》，明确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卷首“音义杂论”），“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卷六）的正确主张。后两句话中的“声”字仍是指上古音。古音学是《通雅》的逻辑骨架和内容精髓。方、顾二家直启清代古音学的昌明。周远富君以《通雅》古音学为题著论，其学术定位可知。雅学是中国古代的词汇学，古代汉语以词汇为最重要，对同一个词，在世代系列的传承中总是要释义前后一贯，代代相传，这样，变乱通天塔语言的魔术自然就没有用。如

① 本文刊于周远富教授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此看来,雅学的传统历来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传统。远富君论著的学术文化精神,无非是雅学传统,语学传承和促进认同。远富君论著的学术定位和价值重估明确,他又是怎样付之实施的呢?

有关方以智的古音学理论和方法,原书可谓散见不聚,隐匿于字里行间,作者详加考究,识知方氏能将推求音史、考析音证、审辨音理三者结合;作者认为方氏“考察语音的共时差异与历时变化,第一次对语音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时代划断”。识知方氏本人能利用古书异文、历代反切、声训、方言、韵脚字、金石古文、谐声字等材料考求语音的变化,并能重视辅音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以及元音舌位前后高低与唇形圆展的分析;作者评之为“促进了语音研究的精密化,隐含着探究音值的意识”。

有关方以智的古声纽研究,书中列举《通雅》中说及“古人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无别、舌齿音相混、喉牙音淆乱”的相关材料;作者认为方氏的说法在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切合古音实际,开启了清代钱大昕等人的系统研究”。有关方氏的上古韵部研究,书中考知方氏据汉字谐声、经史异文、古籍注疏等材料,归纳古韵为“中通”、“天人”、“亨阳”、“知来”、“无多”、“道咎”、“寒还”七部;周君评之为“比吴棫进步”,“对古韵通转的分析及其中入配阴阳的方法都是学术史上的重要创见”。

有关上古声调的研究,书中举陈方以智的“四声通转”说,作者认定方氏承认“古有四声”,并认为方说与顾炎武“四声一贯”相近,对古调类研究有参考价值。

由以上可知,周君的著论方法不外乎“经文献考古而悉知方氏本意,据本意而确立作者研发深究之我意”。至于参酌他意,正如今人侯外庐所说:“明清之际的方以智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近三十年开始被发现的。”思想哲理尚如此,语言文字则更不用说了。“他意”少见,客观上有利于“我意”频发,所谓“原创性研究”可得来臻,即此亦可见此选题之措意的当。如道其微妙,本意,则是客观的,也是主体性的;我意,

是主体性的,也是客观的。实际研撰中往往主、客两端,首尾相接,得其环中以应之。

综观全书,也有可补之处,如《通雅》有《切韵声原》篇,是讲等韵的,但夹杂方音和古音,当可研补。又因学史研究与本体研究密不可分,书中还可加强语音史的研究。在作学术史和语音史研究时,还可加强对方言材料,特别是徽州方言材料的运用。

周远富君从1995年起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至2001年获博士学位学成返回,历时六度寒暑,洵为勤密究古之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间,远富多次发表论文,同学们赞其发文率高。我思忖之,重视实证,讲求考据,是其治学途辙,正合乎当代学术“求实、创新”之走向,所谓“文章不写半句空”,乃其发文秘宝。今周君专著问世,跃上学术人生的一个新高度,可喜而可贺,勉之矣!

是为序。

2006年3月

《〈广雅疏证〉中的语义学研究》序^①

盛林同志著《〈广雅疏证〉中的语义学研究》即将付梓，嘱我忝述弁语，我当然是不会推辞的。早在她本科生阶段，我给他们班上过古代汉语。1990年盛林同志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我们即是同事。1999年她考上汉语史的博士，我作为导师组成员，接触自然会增多。师生、同事一场，不敢稍存谄谢。硕士生阶段，盛林同志师从同门师王希杰教授，修习理论语言学 and 修辞学，尤其于语义学情有独钟。攻读汉语史博士学位，为扬长避短，前后一贯，既宗专业，又涉义理，选定顶级学人王念孙名著为题研覈之，可称惬当。何九盈教授说，研究先秦词汇不能不读《尔雅》，研究中古汉语词汇不能不读《广雅》。魏张揖《广雅》正是汉魏词义府，唯因语词的继承性，先秦产生的许多词和词义此时还在使用，但隶属此时，不委彼间，纯属情理中的事。王念孙著《广雅疏证》，本质上是为汉魏词和词义谋解和考论，故为汉魏共时语义学的描写和从先秦至曹魏历史语义学的解释。王念孙的著述已超过原典，时人比之为《水经注》之于《水经》。1802年4月，钱大昕有《与王石臞论〈广雅〉书》，赞之为“体大思精，于文字、声音之原本，烛照数计，其启佑后学，功不在许祭酒[慎]、张博士[揖]下”。受“启佑”之后昆，盛林同志的研究，既是以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文献为题的学术史研究，也是以目标课题中的语义问题为对象研究的本体论研究。细绎全书，知其挹胜之处数端：

一是定位明确。有关《疏证》本身，认为连同《说文段注》，是18世纪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划时代的里程碑”，代表乾嘉学术的“最高成就”。认为王氏父子“因生活在鸦片战

① 本文刊于盛林博士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争前夕,已多少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能够娴熟地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其著作讲究逻辑性和系统性”。王引之“开启了近代学术论著的论证之风”。诚然,外国从16世纪文艺复兴即算进入学术思想史的现代时期,我国晚明已经历了第一次西学东渐,以此相较,盛说当为有据。有关语义本体研究,作者旨在发掘“传统语义研究中很多有价值的语义思想和语义研究方法”,以现代语义学审视传统训诂学。应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术探求和研究实践。

二是以最小的词义单位,也是最小的语义单位义素(emes, sememes)来分析词语所指称事物的共同特征或区别性特征。这一分析问题的起点是可取的。莱昂斯在他的名著《语义学》第一卷曾对义素分析法,特别是二分法(某个成分的存在“+”和不存在“-”)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修正为“二分法与一定的层次相结合”,即把二分法放在一定的层次中考察;此外,义素分析还需进一步突破“二分”,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义素的异同。这两点修正,可归结为“讲究层次”和“多项义素分析”两条。盛著阐发《广雅疏证》相关义素思想,都是以这两条为裁夺的。书中指称义和附加义,中心义和次要义之二分,以及各各二分,都是在一定层次中进行的。而各类意义的义素分析,又都是多项的。如“次要义素相同而中心义素不同”的例证“美也”条,分析出美的味道(腴、饴、醴、裂、臙、胝、膾、臍、醕)、美的品行(翼、滑、党、贲、蒸、将)、美的形貌(英、皚、娥、媛、艳、玼)等等。又如从“上位概念并义词”分析下位概念的“不同类型”和语义集合,就既是二分的,层次的,又是多项的。

三是书中对《疏证》归纳特殊义素类型的分析和评估,严格区分了“本意”和“我意”,这在本质上是求真和价值评判的统一。“本意”是王念孙对《广雅》同义词同义要素的辨析,“我意”是作者自己的分析范畴,是将语义与语法相结合的六大义素类:适用范围义素、适用对象义素、程度义素、地域色彩义素、形貌义义素。对“本意”的把握讲究“严”“准”二字,故令人信服,并无“刻意”为之和牵强抵牾之感,这在“以当代绳古

代”类的研究中,是不易做到的。“我意”的确立,“我意”与“本意”的结合,是研究实践中的主体创新之路。

四是揭橥并在微观层次上具体分析《疏证》中的语义运动。有关词义运动的描写,大别为词义引申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方式,早在保罗(1846—1921)《语言史原理》(1880)中已见端倪,后经房德里耶斯(1875—1960)《语言论》(1921)详为阐述三种方式,布龙菲尔德(1887—1949)《语言论》(1933)深化词义引申原理,先后由王力等老一辈学者引进国内,成为研究汉语词义运动的现代理论武器,这是汉语语言学的现代化之路,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语词义运动的研究有深厚的积淀,一部《说文段注》(1807, 1815 刊行),就是专讲引申义的。现在盛林同志研究《广雅疏证》(1787. 8—1796. 1)中的语义运动,可见王念孙的认识比保罗还早将近一百年,更遑论房氏、布氏。十分重要的是,盛著所揭示的《疏证》语义运动,比西方三模式更灵活,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性。大体有以下六种运动状况:语义的具化,指词语的语义原为某一类事物,变而指这一类事物中的某一具体对象,语义的外延缩小了;语义的概括化,它包括指称范围的扩大、由下位概念抽象成上位概念;语义的转移,指变化前后不存在种属关系,但又存在某种密切联系,包括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互变、特征和特征事物间的互相引申、动作和工具间的互相引申、动作和动作对象之间的引申;同类之间的统称;语义的反向引申;传递引申。可谓之语义运动六大范畴:具化、概括化、转移、同类统称、反向引申、传递引申。运动范畴比一般静止范畴要复杂得多,深邃得多。盛著六范畴的提出,不能不说是对于语言世界内部运动的深刻把握。书中围绕六范畴的举证贴切,如具化例,引《广雅疏证·释鸟》“果羸,工雀也”条云:“果羸[果羸]亦小貌,小蜂谓之果羸,小鸟谓之果羸。”的当无间介,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理念和经验事实,当代学术元语言和古学被释对象语言之间的对待和一致。

此外,书中论《疏证》对区分语言义和言语义,对语义系统构成的认

识,也都有据不妄。

书中可改进之处,当然是有的。既言《广雅》以发现新词新义新用法为务,却举证寥寥,《疏证》围绕新词义府的努力,尚可深入挖掘。

盛林同志以细致的观察加以体验,以深邃的思考引出概括,以考论的文笔铸为撰著。有闻其教学叫座,循教学激活科研,科研促进教学之学路欤?

是忝为序。

2006年6月

《学生常用成语多视角解析词典》序^①

汉语成语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从使用到研究,千百年来引无数爱好者为之折腰。开架列见,成语词典林林总总,论条目,有全面搜辑者,有专辑同义者,有专辑反义者;论编纂,有重在溯源者,有重在语义、语法解析者;论类型,有研究型的,有查考型的;论目的,有供研究人员用的,有供中小学生用的。如此等等。有谓: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提出“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把世界历史看作文化发展史,虽有失偏颇,但大大提升了文化的地位。汉语成语几乎是汉文化的聚焦和窗口,有极大的认同作用,人人喜闻乐见。一听说“刻舟求剑”、“胶柱鼓瑟”,脑海里就会蹦出一串故事,一读到“剪烛西窗”、“草长莺飞”,心坎上就会流溢出几缕情思。在当今全球化网络时代,汉语文化的传播当然会蔚成“中国热”,而成语是其一大宗,它对世界文化形态的形成当然也会当仁不让。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是同时进行的,如立足当代观,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故“中国热”之“一大宗”也好,“当仁不让”也好,仍须立足于“我们”,有了属于自己,属于“自我”的本根,才有来自他者,融合他者而成“为我”的茂密的枝叶。民族认同实际上往往是民族认异,即一个民族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特点,文化优势,确立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他性。郭骏先生曾长期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指导工作,职业的敏感会使他投向本题;长期的方言研究又会使他具有割舍不断的本土文化情结;他目下又在当博士研究生,跟随郭熙教授学习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特别是跟随徐大明教授学习以“言语社区调查”为主的社会语言学,美国社会

① 本文刊于郭骏博士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甘柏兹(John J. Gumperz),英国社会语言学家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家臣伯(Chamber)等名家学说,都会使他炼就面向世界的眼光,他说:“今后要以言语社区理论为指导来研究方言。”或许是工作情结、文化情结和学术情结的交互作用,使他选了属于“我们”的业余选题:《学生常用成语多视角解析词典》,而最终达到汇入世界文化潮流以“为我”的目标。今允我先睹而快言其旨:

该词典从十一个方面进行操作,其中常规操作 5 项:成立条目、释义、引例、指出类属、分析结构,个性化操作 6 项:述源、辨义、辨音、辨形、举出同义成语、举出反义成语。据作者提供的资料并加研究后可知,全书收列条目 4 050 条,常规操作共 $4\ 050 \times 5$,个性化操作述源 3 548 条,辨义 2 904 条,辨音 312 条,辨形 109 条,指出同义成语 2 546 条,并作简要辨析者 418 条,指出反义成语 1 997 条。全书共完成操作程序 32 084 项,其中个性化操作 11 834 项。这除了说明所的巨大的劳动以外,后者还说明,在语言大世界中,成语家族内的成员也是姿态各异,有的难以溯源,辨形、音、义亦不可“一刀切”,有的有反义、同义,有的尚无。可以说,水平和功夫全围绕“无”字做文章。他无我有,方得风流。例如:书中收了“金枝玉叶”条,并指出其出处为晋代崔豹《古今注·舆服》,而另一本同样“以中学语文教材为主要依据”的成语词典则未收列。

该词典以中小学语文课本为书证引例来源。书证是词典的灵魂,采撷于人教版、苏教版、国际版等多种教材,教材必经精选,可见采例的权威性、规范性。这对一本供学生使用的常用成语词典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古代有国子监的官方教育,也有民间书院的私学教育,但无论哪种教育,雅言雅学,扶正规范,总是必居其先。在当今国际化人文大潮中,使语文教育循着规范化的路子进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从教材采例可予保证其规范性。

书中也有不足,“述源”一项,当然愈早愈好,但极不容易做到。“饥寒交迫”条,书中引东晋陶潜《劝农》:“儋石不储,饥寒交至。”实际上《后汉书·冯衍传》已有:“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毫无疑问,“述源”的书证每条均须核对原书。可见思辨的述理固不易,经验的编纂亦不易,后者尤须苦功和谨正。我与郭骏同志都从事经验归正的学术研究工作,愿以“苦功”和“谨正”共勉之。

是忝为序。

2006年2月

《中西方语言学史之比较》序^①

王建军教授著《中西方语言学史之比较》(修订本),加入王力先生 20 世纪 60 年代即开始鼓吹,至 80 年代始获兴起的语言学史学术盛举。1980 年 4 月王先生在为他的《中国语言学史》作序时说:“海内不乏此道专家。”果不其然,近 30 年来,我收集到的语言学史著作已不下十数种,但中外语言学史比较之作寥寥。建军此书于 2003 年即由黄山书社初版,“中外语言学史比较”得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成立课题,助弄彼之再度兴起的新时期比较研究之新潮,且初具规模,能有自己的成果,甚可贵;四年来又贾其余勇,马不停蹄,留意于海内外的比较之作,终有新卷。

语言学史,与通常理解的通史、国别史、地区史等历史科学不同,是学史、学术史,再加上语言学在思想方法上有某些自然科学特征,它已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广义的历史科学”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把世界上的学问归结为一门:历史科学,当然就只能是广义的。汉语史也是广义的历史科学,但它以汉语的历史发展为对象,如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则以汉语语言研究的历史为对象,是研究史,学术史,非通常的对象史。既是广义的历史科学,就给理论性留下极大空间。多年来,南京大学招收汉语史研究生考两门基础课,一门是汉语史,一门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后者是作为汉语史的理论课来定位的。

① 本文刊于王建军教授原著,黄山书社 2009 年版。

既然是学史,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学史,学术性就更强。诚然,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历史是“活着的过去”,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语言学有自己的学理,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自己的发展史,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匡亚明校长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1部,传主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名家,“思想家”三字中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同样充满“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的学术成果、学理逻辑和学术思想上。

比较,尤其是中外比较,并非只是个好听的词儿,而是充满艰辛的探索。比较,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依事作比,逐一对照;一是建立比较系统,在系统内作选择性比较。前者如《管锥编》的写法,逐项作中外考验,处处觅对比言论,不是清儒,胜似清儒,几乎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后者如北师大黄药眠、童庆炳教授著《中外比较诗学体系》(1991,人民文学出版社),旨在建立一个比较体系,并在中西民族精神和文化哲学背景下作了18个大范畴的平行比较。建军的这本书采用的是后一种比较法。系统比较框架的建立就是一件颇费推寻的事。大体上说,全书是个“以共同的中西语言学史分期为平台,分头各表,平行深入,综观中西,说同指导”的大框架。如书中第二章即进入比较正题,以中西共同分期为标题:“萌芽时期的中西方古典语言学”;分头说史为第一节“崭露头角的先秦两汉语言研究”、第二节“先声夺人的古印度语言研究”、第三节“后发致胜的古希腊罗马语言研究”;平行深入有“先秦两汉的正名论和名实论研究、语义研究、方言研究、语源研究、语法研究、文字研究,古印度的语法研究、语音研究、语言研究的其他方面,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理论研究、语法研究、语源研究、语音研究”等十三个专题;综观中说同异专列第四节“中西方古典语言研究的共性和个性”,共性涉及相同的研究起因、共同的研究背景、雷同的研究状态,个性涉及研究覆盖面的差异、研究技法的差异、研究角度的差异。从内容上看,在上述平台上演出了中外比较活剧,应该说,学术史的史实或史料对“重新分析”

而言,并非理论形态,构建理论形态需研究者进行创造活动;从平台的建构上看,中外比较的内在逻辑清晰,应该说,书本学理逻辑也是形式化的本体论逻辑,它既处在从具体到抽象的终点,又处在从抽象走向更高级具体的起点,中外语言学史比较框架的发现和构建,有普遍性价值。康德曾说,没有知性图式,就没有客观世界的呈现。同样,没有本书学理逻辑的定式,根本就不会有此著论,这已是常识范围内的事了。作者对中外语言学史比较的逻辑式的追寻和成功著论的实践,自然也就包含对“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若干体验。

现在来看看个别经验事实比较的亮丽之处。如书中举到《春秋·僖公十六年》有“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有“视之则石,察之则五”,“视之则六,察之则鹢”之释。《穀梁传》则更进一步有“后数,散辞也,耳治也”与“先数,聚辞也,目治也”之别。作者认为,在僖公十六年的《传》里,公羊和穀梁二家则揭示了以时间先后为序的词序规律。并认为“这是从认知的角度来阐释词序问题”,这种做法“已露出了功能主义语法学派的端倪”。功能是在一定语境之下体现的,认知亦不能脱离一定环境条件,词序来源于时间先后已成为普遍的认同,认知与功能,认知与语境或情景密不可分。顾炎武“多闻于后学,一治于后王”的《日知录》说,僖公十六年经文“石五”“六鹢”的说法是“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鹢六’,夫子改之‘六鹢’”。“临文”正是语境,传为孔子修《春秋》,笔、削之法甚严,此非存心改史而恰恰“临文”。顾炎武还批评了《公》《穀》二传的脱离语境的穿凿之说,是“世未为之说”之类,即是些不合常理,不合通行表达的说法。强调“临文”,批评不合常理之说,都可说明当视语言表达功能、情景允为至上。书中还说:“古今语法分析的某些暗合现象正说明了人们认知上的相通性和连贯性。当然,古人的分析往往只是出于一种感性认识,而理性思维的光辉尚待开启。”这又使某些超越时空的拟比获得一定的逻辑维度而祛妄,作者的考虑是周到的。

又如,作者指出:唐宋时期,汉语语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梵语语法学的熏染,汉语语法的系统观初步形成。这也是掷地有声的中外比较。作者引唐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年》“尔其勉之!相从为愈”疏有“语法”一说,宋金学者又多次论及“语法”,并引宋王质《诗总闻》“语法如此”、宋陈叔方《颖川语小》卷下“语法尤紧”语证之。梵语语法则据引孙良明“东晋后秦时期的最重要的译经僧鸠摩罗什在其所译的《大智度论》卷44第一次提到了‘天竺语法’这一特定名称”说。以上或为来之不易的知觉材料之比,进而进入实质之比,得出“中古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梵语语法研究之间尽管不乏沟通与借鉴,但大体属于‘两张皮’”的结论。

书中将民族语言研究、古文字研究等列为学史专题,成立比较科目,亦为有识之举。

自然,类似“五石”“六鹺”为“临文”语境功能,孔疏、笔记文见“语法”而可比“天竺语法”等亮点还在所多有,尚可深入之。

建军教授为柳士镇教授的高足,书中引中古汉语本体材料美富以证史,即可知其渊源所自。仅因本书内容所及,约我作序,不克获辞,聊作数语,忝列末端,借以请益于建军教授和学界同好。

2009年4月

《叶音研究》序^①

叶音说是汉语音韵学史的复杂问题,说法多,材料多,见解不一,洪诚先生(1910—1980)截断中流,指出:“凡不合今韵的押韵处,从今韵的角度看,谓之协韵。”并针对宋代吴棫《毛诗叶韵补音》所用的“叶韵”二字指出,吴棫的“叶韵”,“正是改今音以协古韵的意思,并不是原作者临时变读以协其韵”。这句经典表述告诉我们:如吴棫辈正确的叶音说,当是:立足今音看,应是改上古韵字的今音,使原本相谐的韵字上古韵部相谐;并不是立足于古音的原作者临时变读以协其韵,立足注叶者的今音看,也不是离开韵字古音而临时变读以叶其韵。总之,正确的叶音说,是注叶者要以今音为立足点始终指向上古音。这里牵涉到两个时点的错杂,实际解释时使问题复杂起来。如果把后代叶音看作一种存在,“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能够以不同的现存方式显示出来”(海德格尔语),我们研究叶音说,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研究它作为一种当下存在的“在场”或“存在者”,而是要研究它的“存在自身”上古音,但对叶音的中古“在场”,或“存在者”,对其“以不同的现存方式显示出来”的丰富性自然也要着意研究之,也就是说,既要研究它的“存在自身”上古音,又要研究它的中古“在场”或“存在者”,这就是叶音研究变得既根本,又表层,既丰富又复杂,规模会因此大大膨胀出来。这正是本书研究看似一个小小的叶音问题,却规模不小的原因。

对叶音说的系统研究,似著无前例,殊觉陌生。作者大别以四例叙之:一曰叶音史略(犹第一章),二曰音韵学维度下的叶音说(犹第二章),三曰语音史对叶音说的裁夺(犹第三章),四曰叶音与校勘学和文

① 本文刊于汪业全博士原著,岳麓书社2009年版。

献学等(犹第四章)。此四例或可说为叶音说研究范式一般,修补又当别论。

关于音韵学维度下的研究,书中提出“泛古音”说。作者肯定叶音说中的主流倾向是上古音成分,即前述叶音说的语义逻辑指向始终是上古音,但由于叶音说的复杂性,可离析出非古音成分,叶音是杂色物,故说叶音的构成是“泛古音”结构。“泛古音”是一种“存在者”的“在场”,书中说:“说叶音是泛古音,是就叶音古音成分总体构成而言,具体到个体叶音,或为古音,或为某种非古音成分,不一而足。”可见“泛古音”说仅仅是一种价值评判,并非求真系统。

事实上,书中对叶音的本体求真研究蔚成气候,这充分体现在语音史对叶音说的裁夺上。作者以朱熹《诗集传》(八卷本)的有效叶音 1 232 条为基本语料,研究出《诗集传》叶音可分上古韵部 22 部,其中阴声韵 6 部,阳声韵 9 部,入声韵 7 部,似按照预设立义,制为阴、阳、入三分相配之格局。又作《楚辞集注》叶音古韵分部考,考得舒声韵 14 部,入声韵 8 部,亦共 22 部。如将“集传”与“集注”叶音古韵分部作比较,可知“集注”无微、物、文部,而多出盍部、祭部、锡部,总数仍是 22 部,但“集传”与“集注”共同韵部“之、幽、宵、鱼、歌、职、屋、铎、质、月、缉、蒸、东、阳、耕、真、元、侵、谈”19 部,各部所含的中古韵目也不尽相同。在追溯两注疏叶音古韵系统有所不同的根源时,作者认为:“之所以‘小异’,可能语音根据略有不同,如《集注》部分东韵字叶音入阳部,明显是楚方言现象。”此外作者还将朱熹的叶音古韵分部 22 部与江永 21 部作比较,分部对照,各循其本,比较出学理,竟认为“集传”和“集注”叶音古韵分部都能“为五百多年后江永的古韵奠基”。

在用叶音资料研究上古声纽系统方面,亦创获显然。例如:书中利用朱熹叶音涉及唇音的 391 例,轻唇自叶 59 例,重唇自叶 247 例,轻重唇互叶 64 例,轻唇与喉音互叶 10 例,明母与牙喉音互叶 6 例,明母与来母互叶 5 例,得出关及轻重唇互叶/可说明古无轻唇音、明来互叶/可

说明上古有复辅音[*mr-*]、明晓互叶/可说明上古有清鼻音,并举《沪简二册·容成氏》第38简“岷”作“昏”等例。此外,还利用叶音中的舌音和半舌音,证古无舌上音、来彻互叶、见来相叶、明见(来)相叶;还利用叶音中的齿音和半齿音,证照二归精、照三归端、精组与舌头音及余母互叶;还利用叶音中的喉牙音,证浊音清化、全清次清互叶、云与晓匣互叶、见溪与晓匣互叶、影余云互叶;还利用叶音中的异母相叶,证晓匣与敷母互叶、余母与禅母互叶、明母与晓母相叶、余母与邪母互叶、余母与端组互叶,如此等等,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上古声纽的认识。

十分重要的是,如前所说,叶音这一历史上有过的“存在者”的“存在自身”是上古音,尽管书中尚有若干可商之处,但缘叶音而寻找古韵分部,寻找上古声纽系统而知其内部的互叶多多,不能不说是一新开拓,十分珍贵。此外,与研究上古音相平行,利用叶音资料,还可研究中古音和近代音。该书的研究实践表明,音韵学史上的叶音和叶音说是一富矿和涌泉,作者的采铜和掘井已卓有成效。

本书作者汪业全同志曾是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建元教授的高足,后考来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2—2005),沐浴导师组光照,长进日新,毕业后远赴南国,仍耕道不辍,今喜见其论著问世,简述其要在可昭示学界之方法范式,并旧材料之新开拓而成富矿为可贵。汪君有识,洵属可造,勉之矣!

是为序。

2009年5月1日

后记 :本体研究和本体 “延异”研究

拙作《汉语语义理举实》分四大块,一是古音学史,二是古代语言学理和诠释,三是现代语言学专题,四是学习和评介;全书紧扣客体之学史和主体之学习而展开,“举实”之道、之力谋贯全书。“举实”者,《墨子·小取》:“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

客体之学史,必然包括学理,史学之理谓史论。学史,学术史,亦称研究史,研究的对象是他人研究的成果,是研究之研究,因而学术史所用的材料是间接的。典型的例子,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阳明学派之余波黄宗羲一直讲到王锡阐、梅文鼎,从永乐年间的《性理大全》一直讲到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讲论研究者的成就得失,评鹭群书学术精粗,以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为对象,与客观世界本身的对象本体研究大不相同。如果说学人、群书本身也是一种对象本体,那么,为求清晰的畛域,最好将直接外部世界的经验材料的研究叫“对象本体研究”,将基于他人研究基础上的学术史研究叫“对象本体延异研究”。

“延异”(differance/defference)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的用语,它的基本含义是写出来的文本的东西与说出来的话语(反映世界面貌的)的东西是不同的,更深刻的含义是德里达用来批判结构主义的结构,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对文本的阅读与理解,而提出了新的文本阅读法“解构”(deconstruct)。一听“解构”,怪吓人的,实际上词缀de-除了“除去”、“消解”义外,还大有“再”、“重新”、“完全”之意。虽然与结构主义的“重新分析”(reanalyse)是两股道上跑的

车,但形上之义可比,通译的“解构”,实际上是可以理解成“重构”的。又:鉴于学术界将存在论(ontology)派生词 deontology 译成“道义学”,这样更符合 deconstruct 的真实含义,将 deontological ontology 译成“道义化存在论”(赵汀阳,见《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第23页),也可将 deconstruct 译成“道义化结构”或“道义化重构”的。

仅就文本阅读法而言,“延异”之说正对着学术史研究过程,写学术史正是要大量阅读文本,读出诸对象文本之间的“异”,读出己见与对象文本之间的“异”。又“延异”意味着历时性的差异,不是共时性的差异,要写出的学术史文本与它的对象文本之间的差异正是历时性的。又德里达所说的文本不见得是一本书,而是文字间互为参照的“痕迹”,阅读也不是寻找和把握原初的意义,而是可以称之为“解构”的新的阅读方式,“延异”就是“解构”,或者说是“道义化重构”,经此“解构”能在保存旧概念(即所谓“旧语移植逻辑”)的同时移进新的意义。(以上参见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以上三点:文本读出相异点,差异的性质是历时性的,经“解构”移进新的内容,对学术史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说明,不是很有参考价值吗?故将学术史的研究称之为“对象本体延异研究”,以与第一类经验世界的“对象本体研究”区分开来,是一个合适的“《尔雅》名义”。

事实上,本体研究是离不开学术史的,研究任何对象,需要了解前人于此做过什么,取得过何种成绩,你的切入点在何处。多年来我读过一本又一本的从事本体研究的博士论文,第一章总是学术界相关研究状况和成果的介绍,原因就在于此。同样,学术史研究也离不开经验本体研究,如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讲《切韵》音系问题时,介绍了戴震、陈澧、章炳麟的看法(学人研究了的),讲了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说法(书本的),为进一步深入,王力涉及上古支、脂、鱼、虞的分别(经验本体的),入声的韵类等呼与阳声的韵类等呼基本一致,如东韵有一三等,屋韵也有一三等(经验本体的);更从谐声系统看,入声配阳声,如“散”

声有“撒”，“旦”声有“怛”（经验本体的），这些都说明入声配阳声是《切韵》系统。也有入声配阴声，如阴声一等模姥暮配入声一等铎韵，故“各”声有“路”，“莫”声有“暮”，“度”字有徒故、徒各二切，等等，这说明《切韵》的韵若干是从旧反切归纳出来的，反映上古韵的本来面貌（经验本体的）。如此看来，《切韵》既反映实际语言入声配阳声，又反映上古韵入声配阴声，可见《切韵》音系是综合的，不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状况（学术史研究结论）。又如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研论《西儒耳目资》引本题和海内外诸说（学术史本体对象），又证以明末的北京话和南京话都是官话，全浊声母均消失，平声均分阴阳，-m尾均消失，不同点仅北京无入声，南京有入声（经验本体的），以明《西儒耳目资》反映明代南京话能成立（学术史结论）。以上可见，学术史研究离不开以经验对象为本体的学术研究，两者随时随地都在互补，互动。拙作的追求，正是这种互补。书中的经验本体研究，如古文字考释，在所可见。但作为学术史，“对象本体延异研究”始终是主要的，常常令人反思的古音学史研究和古音学研究或古音研究的关系，也应作如此解释。古韵分部、古音构拟是古音学本体研究重要内容之一，构拟是分部的发展，依据什么来构拟？据《诗经》和群经用韵、谐声偏旁、反切、重纽、重音、梵汉对译音、方言（含域外方言）、民族语言、出土文献等，以上均为本体经验材料，也应根据历代韵书所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古音学家的分部和构拟成果，此为学术史的材料。甚至这两者很难分开，反切、重纽、重音都包含在历代韵书，尤其是《广韵》中，谐声偏旁在《说文》中，梵汉对译音在《大藏经》或其他藏经音义中，它们都可看作业已经过加工的学术史材料。所以说，史学和学术史学研究都是本体研究，连材料也难以区分为直接的，本体的，何为间接的，本体延异的。严格地讲，从《诗经》到出土文献材料都是既有直接性，又有间接性。

学术史的研究，无疑牵涉到内在的史论和外在的学术观点问题，或纯化为内在的学理逻辑和外在的科学逻辑问题，但这两者始终是有联系的，如果再进一步作具体的抽象，两者又都会和学术指导思想发生联

系。在全球化语境下,每个学人都会身临两套语境,拥有两套话语,一套是西学的,一套是国学的,但作为当代中国的学人,他又必须面对以下事实:西学早已内化于国学,今日中国学人所持的“中国学术主体性”或“中国学术范式”不可能是纯粹中国式的,汉唐式的,晚清式的,我们不可能抛弃三角函数而改用戴震的勾股割圜记,不可能抛弃阿拉伯数字而改用旧式的商用数码字,不可能抛弃相对论而改用王质烂柯之解释,不可能抛弃波粒二象性而改信八卦图,不可能抛弃国际音标而改用许慎“读若”,不可能抛弃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而改用孔孟之道乃至新儒学治国。应该说,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1990年代以来近二十年的各种涉及中学和西学关系的批判和反思,既有裨益,也有教训可取。作为一名现代语言科学工作者,显然应当是一名“古今中外派”学人,这五个字,或许就是我们要寻求的“中国学术主体性”或“中国学术范式”。

还有,方法论是超时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来研究先秦,这不应该笼统地看作“贴标签”,同样,方法学、方法一般说也是超时空的,当贺麟用黑格尔哲学,牟宗三用康德哲学研究儒学时,并不意味着“等同”、“拔高”、“乱比附”,只是尝试用另一把解剖刀来剖析研究对象,如此而可,如此而已。多年来,汤一介教授反复强调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提倡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在全球化的大势下,脱离整个世界发展的轨道只考虑自己的文化是行不通的。如果从西学已内化于国学,从方法论、方法学去看,恐怕更是如此了。

在这次结集出版时,为体例统一,当下文责等原因,唯割爱而归一于本书责任人,谨表歉仄。

拙作得以问世,得到南京大学文学院领导和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人柳士镇教授,及教研室诸多师友的襄赞,铭记此事;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朱慧君编审、曹勇庆编审等的帮助,感谢诸哲。

李 开 2009年9月15日于南京市龙园北路寓庐